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翁俊雄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仓理新
封面设计：李　梅



ISBN 7 - 81064 - 312 - 6/K·11
定价：18.00元

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翁俊雄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区域经济研究/翁俊雄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ISBN 7-81064-312-6

Ⅰ.唐… Ⅱ.翁… Ⅲ.地区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唐代 Ⅳ.F1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849 号

TANGDAI QUYU JINGJI YANJIU
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41 千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言

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分布和资源、物产都有不同，因而形成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当前发展经济、大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各个地区如何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优势、发展区域经济，是当前的要务。

中国的今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成果。在有文字可考的4000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正是在全国各个地区一步步地进行开发，终于创建了今天的大好河山。探讨、了解这个发展过程，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发展区域经济，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唐朝(618～907年)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在近300年中，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比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就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唐朝与历史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也是人们在一个个地区辛勤劳动的结果。探讨、了解唐朝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意义尤为重大。

现存有关唐朝各地区社会经济的资料，十分丰富，然而大多散见于数十种史书、文集笔记和诗集之中，汇集起来，并非易事。笔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尽可能进行积累。尽管如此，所集资料仍然有限。这是因为，尽管唐代史料十分丰富，但古人并非有事必录；加以笔者个人条件的限制，不能“竭泽而渔”，只能尽可能充分利用已掌握的资料，较为全面、较为具体地描述当时的状况，为人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面对如此丰富的史料，如何组织编写，颇费斟酌。首先是行政区

划问题。唐朝的行政区划，唐初“依山河形便”将全国分为10道[1]。开元年间又将关内道分为京畿、关内2道；将河南道分为都畿、河南2道；将山南道分为东、西2道；将江南道分为东、西和黔中3道，共15道。唐后期，陆续在全国设置46个节度使(方镇)，每个节度使所辖州县数目不等，辖区大小差别很大。本书将唐前期按10道叙述，唐后期则仍以10道为框架，不过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将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这么处理，一是这本来就是开元年间的分法；二是因为唐后期江南和山南道发展迅速，史料比前大为丰富。在此框架内按节度(观察)使辖区叙述。

其次是分阶段问题。为突出唐代经济的发展过程，本书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叙述唐前期经济的发展。其中以唐朝建立至武则天在位为一阶段，即经济的恢复与初步发展阶段；自玄宗即位至“安史之乱”爆发为一阶段，即唐前期经济的迅速发展阶段。下篇叙述唐后期经济的发展。其中以“安史之乱”爆发至平息为一阶段，即经济的破坏阶段；自代宗大历年间至黄巢起义爆发以前为一阶段，即唐后期经济的发展阶段；自黄巢起义爆发至唐朝灭亡为一阶段，即经济的破坏阶段。

为便于了解，本书凡是唐代地名均注出今日的省、市、县名称。为便于检索，本书末附：《涉今市、县名称索引》。唐代各地已出现有名产品，有的至今仍是当地的拳头产品。例如：山东东阿的“阿胶”；山西的红枣；四川的“蜀锦”和“剑南春”酒(唐朝名为“剑南烧春酒”)；宣州(今安徽宣州市)的“紫毫笔”；江西的瓷器；扬州的铜镜；江南的刺绣和广东的药材、象牙、珍珠等等。如果需要查阅某市、某县在唐代有何特产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即可按此《索引》一一查到。

2000年9月6日

著者　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

〔1〕注：关内、河南、河北、河东、陇右、淮南、江南、山南、剑南和岭南道。

目　录

绪论…… 1

上篇　唐朝前期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6

第一章　关内道…… 7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7

一、京畿地区…… 8

（一）农业 …… 9

（二）畜牧业 …… 12

（三）长安：手工业和商业 …… 13

二、关内道中部、北部 …… 18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19

一、京畿地区 …… 20

（一）农业 …… 20

（二）长安：手工业和商业 …… 27

二、关内道中部、北部 …… 30

第二章　河南道 …… 32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 32

一、都畿地区 …… 33

（一）农业 …… 33

（二）洛阳：手工业和商业 …… 33

二、河南道诸州 …… 36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41
一、都畿地区 …… 41
（一）农业 …… 41
（二）洛阳：手工业和商业 …… 43
（三）水上交通 …… 45
二、河南道诸州 …… 46
第三章　河北道 …… 52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 53
一、农业 …… 53
二、手工业、商业 …… 57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59
一、农业 …… 60
二、城市、手工业和商业 …… 64
第四章　河东道 …… 68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 69
一、农业 …… 69
二、手工业和商业 …… 71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72
一、农业 …… 72
二、手工业 …… 73
第五章　陇右道 …… 75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 75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81
第六章　淮南道 …… 86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 87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88
第七章　江南道 …… 91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 91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96
第八章　山南道 …… 101
第一节　唐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101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103
第九章　剑南道 …… 105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 105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 108
第十章　岭南道 …… 114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 116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的经济 …… 119

下篇　唐朝后期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 121

第十一章　关内道 …… 123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 123
一、安史叛军对长安的破坏 …… 123
二、京畿地区经济的复苏 …… 125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 126
一、京畿地区 …… 127
（一）农业 …… 127
（二）长安：手工业和商业 …… 130
（三）关内道南部地区 …… 134
二、关内道中部、北部地区 …… 136
第三节　唐末的破坏 …… 139
第十二章　河南道 …… 141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 141
一、洛阳及河南道诸州的破坏 …… 141

二、洛阳及河南道诸州经济的复苏…… 143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145
一、洛阳…… 145
二、河南道诸州…… 149
三、水上交通…… 154
第三节　唐末的破坏与恢复…… 155
第十三章　河北道…… 158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158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161
一、怀州…… 162
二、河朔三镇…… 162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167
第十四章　河东道…… 170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170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172
第三节　唐末的破坏与恢复…… 176
第十五章　陇右道…… 178
第一节　战乱后的陇右、河西…… 178
第二节　唐后期的河陇与二庭、四镇…… 178
第十六章　淮南道…… 182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与复苏…… 182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185
一、农业…… 185
二、扬州：手工业和商业…… 187
三、水上交通…… 194
第三节　唐末扬州的破坏与恢复…… 196
第十七章　江南东道…… 198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198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201
一、浙江东道、浙江西道节度使…… 202
（一）润州 …… 202
（二）常州 …… 204
（三）苏州 …… 205
（四）湖州 …… 208
（五）杭州 …… 210
（六）越州 …… 214
二、福州及福建观察使管州…… 217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220
一、浙江东道、浙江西道观察使管州…… 220
二、福建观察使管州…… 222
第十八章　江南西道…… 224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224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228
一、宣歙池观察使管州…… 228
二、鄂岳观察使管州…… 232
三、江西观察使管州…… 234
（一）洪州 …… 234
（二）江州 …… 236
（三）饶州 …… 238
（四）吉州 …… 239
（五）信州 …… 239
四、湖南观察使管州…… 240
五、黔中观察使管州…… 243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245
第十九章　山南东道…… 249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249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251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258
第二十章　山南西道…… 260
第二十一章　剑南道…… 263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263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265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271
第二十二章　岭南道…… 274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274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275
一、岭南节度使管州…… 275
（一）广州 …… 275
（二）韶州 …… 280
（三）潮州 …… 282
（四）新、罗、雷、端、琼等州…… 283
二、桂管经略使管州…… 284
三、容管经略使管州…… 286
四、邕管经略使管州…… 287
五、安南经略使管州…… 288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289
后记…… 291
附录：涉今市、县名称索引…… 292

绪　论

唐朝是在隋末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隋末、唐初的战乱和灾荒中，人口大为减少。隋朝鼎盛时期民户超过900万，而唐初贞观年间只有300万户。由于战乱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的，因而，河南、河北遭到破坏最为严重。时人指出：伊、洛水之东“茫茫千里，人烟断绝”。而大河南北民户“比于隋世，十才一在”。

经过近百年的恢复和发展，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不仅民户恢复到900万户，在经济上也出现了繁荣局面。杜甫《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唐朝建立后不久，“河南、河北，桑蚕倍多”，因而，两河的丝织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其他地区。河南、河北农业发达，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这都说明唐前期河南、河北是全国的经济重心。

唐前期在开拓西北边境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唐代“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唐前期在陇右道（节度使治鄯州湟水县，今青海省东部。）广开屯田，多养战马，大大加强了西北边防。在此基础上，先后设置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包括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地区。《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长安城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阊阎相

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由此可知，天宝十二载（753年）是唐前期繁荣、昌盛的鼎盛时期。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其年十一月，边将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叛军先后攻占洛阳、长安。唐玄宗一行逃往成都。叛军所过杀掠，百姓逃亡。唐朝从此进入后期。

安史之乱对唐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由于从西北调兵平定内乱，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占据陇右，唐朝失去对西北广大地区的控制。其次，由于授予安史降将为“河朔三镇”的节度使，致使河朔三镇成为半独立状态。再次，由于战乱主要集中在黄河南北，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从此北方经济停滞不前，而淮河、长江以南的社会经济却蓬勃发展起来。

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个论点如果是指王权衰落、政治腐败和军事失利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从经济方面看，则与事实相去甚远。

容易造成误解的是人口数量问题。史书中关于安史乱后户口减少的记载屡见不鲜。而《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元和年间各州民户的数量比天宝年间大为减少。然而，这仅仅是户籍上的数字。唐后期由于战争和土地所有权大量转移，人口流动性大为加强，社会存在着大量没有户籍的“浮寄客户”。例如，大历年间舒州刺史独孤及到任时户籍上的民户“十不存一”，经他整顿，“百姓并浮寄户共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这就是说，户籍上只有3 500户，而浮寄户则近10 000户。这说明唐后期户籍上的民户数量与实际户数相差甚远。

还有一些事例也能说明这一点。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0 192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宣州，天宝有户121 000，至建中年间“夫宣户五十万，一户二丁”。40年中增长了3倍多。益州，天宝有户592 080，大中

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

由此可知，唐后期的一个半世纪中，人口比唐前期大为增加，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详见拙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安史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或“南驰吴越”，或“尽投江湘”。例如，梁肃在《吴县令厅壁记》中指出：“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安史乱后，北方人口到苏州吴县的，占吴县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江淮以南的经济也蓬勃发展起来。在农业方面，经济作物有长足的发展。饮茶是开元以后逐渐成为时尚，而广泛种植是在唐后期。据《封氏闻见记》载：开元年间，由于僧侣坐禅，夜不能寐，需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北方从邹齐沧棣各州（均在河南、河北），以至京师长安，沿路“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而“其茶自江淮而来”。地当水陆要冲的汴州，唐后期更加繁华：“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反映了茶从南向北走向的情状。《封氏闻见记》还指出：“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唐后期南方各地多有名茶，如寿州（今安徽省寿春）有霍山之黄芽；湖州有顾诸山之紫笋；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有西山之白露；剑南（今四川省）有蒙顶山之石花等等。茶的生产往往规模较大，如湖州长城县（今江苏省长兴）西北四十里有顾诸山，“贞元以后，每岁进奉顾诸山紫笋茶，役工三万，累月方毕”。每年用三万采茶工采茶，其规模可知。茶的普及只是唐后期农业发展的一个例证。

唐后期手工业也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丝织业更为突出。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产量多，而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亳两州的绢列第1等。唐后期江淮以南却超过了两河。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这只是指绢、帛一般的丝织品而言。至于

精美的丝织品，唐后期江南更遥遥领先。唐敬宗曾下诏，令浙西（领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睦州等六州。）“进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这就是说，进贡整幅的绣有立鹅、天马、虎豹等图形的精美丝织品1 000匹。唐文宗曾指出：“每岁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可知四川每年要向朝廷缴纳绫、罗、锦这类精美丝织品8 000余匹！尽管唐前期长安、洛阳等官手工业作坊已能在锦袍上绣成虎豹、麒麟等复杂图形，然而，其产量有限，主要是供宫廷和朝官使用。尽管唐前期江淮、巴蜀的精美丝织品已很著名，然而其产量也很有限：“江淮绮縠[注]、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这句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唐后期江南、巴蜀的精美丝织品，产量比前大为增加。唐文宗对臣下说：“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有之。”这固然说明唐后期奢靡，也透露了唐后期精美丝织品产量大为增加，原先只是“后宫玩好”，今则“富家往往皆有”（旧唐书·郑覃传）。

唐后期科学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杭、越（今浙江省绍兴市）作碑模勒乐天（白居易）及予（元稹）杂诗，卖于市肆中。”当时杭州、越州，有雕版印刷的元白诗集在市肆中贩卖。德宗贞元年间，冯宿在《禁版印时宪书奏》中指出：“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雕版印刷术在隋朝已经出现，唐后期在江淮、剑南推广起来，普及到书籍、日历这些日常用品上来。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后期的商业更为活跃。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治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唐后期扬州（治

〔注〕 縠，音 hú 纺丝而织之也。有绉纹的纱《辞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1 055页。

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市。）更为繁华："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比唐后期"水门向晚茶商闹"的汴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后期的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中心。前面已经提到，北方的茶"自江淮而来"。也就是经扬州转发至北方。扬州还是金银珠宝的集散地。敬宗即位时，令浙西（节度使治润州曲阿县，今江苏省丹阳市。）造盏子妆具二十事。"时李德裕任节度使，他上奏说：所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而当地没有这么多金银，"今差人于淮南（节度使治江都县，今县名。）收买，旋到旋造。"扬州市上能买到这么多的金银，说明唐后期扬州也是当时金银珠宝的集散中心。此外，扬州当时还是药材、木材的交易中心。唐后期的扬州与广州、福建是三大对外贸易的港口。

如果说，唐前期"河南、河北租赋尤广"，是全国的财政中心，那么，唐后期江淮代替了两河的地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杜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他们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是唐后期江淮地区已成为全国财政和经济的中心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唐后期江淮以南（以及巴蜀）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长足发展以及财政中心的南移，不仅说明了唐后期南方超过了北方，还说明了唐后期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了唐前期。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的论点是极不全面的，就经济方面来说，与事实相差甚远。

顺便指出，杜甫在写"忆昔开元全盛日"这句诗时，是在安史乱后，在满目凄凉中回忆往日的繁盛，不免感慨万千。然而，杜甫卒于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他无法目睹的，因而，不能将他的这一名句当作对唐朝300年发展的总的估价。

上篇　唐朝前期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杜甫：《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少陵集》卷13）

元结：《问进士》：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元次山集》卷7）

杜甫、元结不仅生动地描绘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繁荣、昌盛的景象，同时也是对唐朝建立后百余年社会发展的总结。

唐朝是在隋末农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从战乱，灾荒和凋敝，发展到“全盛日”，这个过程值得探讨。

唐朝由建立（618年）至天宝（742—756年）年间，经历了138年。在这百余年中，唐朝的社会经济经历了恢复、发展、繁荣的过程。在这总体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由于自然条件、人口分布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同，又显出极大的差异。而就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来说，各个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现依10道的顺序，依次探讨各道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达到的水平。

第一章　关内道

唐代关内道地域广阔，以今陕西省中部、北部为主体，包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河套地区和甘肃省东部地区。

关内道居黄河中游，黄河从关内道西部会州会宁县(今甘肃靖远县)流入，北上经今内蒙河套地区，东至今内蒙托克托，南折直到潼关再东流入今河南省。也就是说，黄河像天堑从西、北至东护卫着本道。而本道南部有渭水(黄河的支流)贯通东西。这样，关内道四边有河水环绕。中间又有泾水、洛水等大小数十条河流织成网络。

关内道南部是渭河平原，即"关中"地区（潘岳：《关中记》："东自函(谷)关，西至陇关，二关之间，谓之关中。"），人口最为密集，经济也较发达。秦、汉以来，关中地区农业发达，杜佑指出："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1〕唐代关中农业虽不及秦、汉，但在本道内，也属发达地区。

关内道中部、北部地区，地属高原，还有毛乌素等沙漠地带，自然条件较差，人口也较稀少，幸而北有黄河河套，西有黄河和惠农渠、汉延渠等多条水渠，可以溉田，农业有一定规模。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关内道的人口分布很不平衡，人口密集于渭水经流的雍（后改

〔1〕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9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为京兆府，治所在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华（治郑县，今华县）、同（治冯翊县，今大荔）、岐（治雍县，今凤翔）、邠（治新平，今彬县。）等5州，这5州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单独划出为“京畿道”。因此，本节亦分为两部分叙述。

一、京畿地区

京畿数州，有洛水、渭水、泾水贯穿其中，还有秦、汉所修郑国渠、白渠，关中水利本来较好，自然条件较为优越，所谓“关中沃衍”。然而，至唐贞观年间（627—649年）高季辅指出：“今畿内数州，实惟邦本，地狭人稠，耕植不博。”[1]唐初何以出现这一状况？

所谓“地狭”是指可耕土地减少。秦、汉以来，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加以水利失修致使耕地面积日益缩小。杜佑指出：“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至唐永徽（650—655年）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杜佑为“地利损耗”[2]感叹不已。

所谓“人稠”是从人口与耕地的比例上说的。如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来说，并非如此。如以唐贞观年间雍州民户为例，只是隋大业年间（605—618年）的67%；是唐天宝年间（742—755年）的57%[3]。

唐初的京畿地区，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来说，比隋大业年间减少了很多，这与李渊进入关中不久向剑南地区疏散人口有关。他在《定户口令》中指出：“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长安的储粮，难以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因而令“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依本土置令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秋收丰

---

〔1〕刘昫：《旧唐书》（8）卷78《高季辅》2 7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925页。

〔3〕魏征：《隋书》卷29《地理上》(3)：“京兆郡……户308 499。”《旧唐书》卷38《地理一》：“京兆府（唐初为雍州）……旧领户（指贞观十三年领户）207 650，天宝领户362 921”。8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实，更听进止。”〔1〕在唐朝建立前夕，外地流寓长安的人，能够“依本土置令以下”，可见人数之多。这次把隋末以来逃入长安的外地人以及一部分本地人，按原地区，有组织地迁往剑南诸郡，使京畿地区人口减少。

然而，如从耕地面积来说，唐初这里的人口仍感过多。正因如此，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幸零口〔2〕，问授田情况，得知丁壮受田不足，才有“录尤少田者……移之于宽乡”〔3〕的打算。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4〕。至此，“地狭人稠”的情况，才有所缓解。

所谓“耕植不博”，系指人口与粮食产量的关系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地狭”。在地多人少的宽乡，增加劳动力，就为提高粮食产量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在地少人多的狭乡，人多对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不大，反而会造成粮食匮乏的局面。京畿地狭人稠，所产粮食供不应求。

高季辅所说“地狭人稠，耕植不博”，道出了唐初京畿地区经济的基本状况。

（一）农业

开垦土地《新唐书·兵制》：“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元从禁军三万人将白渠旁民弃腴田开垦出

---

〔1〕《全唐文》（1）卷1，18页，高祖皇帝《定户口令》，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司马光：《资治通鉴》（13）卷197，6 207页。胡三省引《九域志》：“京兆临潼县有零口镇。临潼，唐之昭应县。昭应，唐初之新丰县。”北京，中华书局，1956。

〔3〕《册府元龟》（2）卷105《帝王部·惠民门》1 2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4〕《资治通鉴》（14）卷204《天授二年》，6 473页。按：《通鉴》似有误。因为，不仅洛阳县容纳不下这许多民户，就是洛州（天宝元年改称河南府）在天宝元年也只有“户194 746”（《旧唐书·地理一》），看来是通过洛州将此数十万户分送河南道各州安置，才属合理。

来。武德年间土门县（后改为美原县，今陕西省蒲城以西）县令李大亮，在县内“劝垦田”[1]。贞观中，岐州刺史王仁表卒，子方翼与母“居（岐州）凤泉别业。时方翼尚幼，乃与佣保齐力勤作，苦心计，功不虚业，数年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遂为富室。”[2]这些都是唐初开垦土地的例证。

兴修水利　武德六年（623年）“宁民令（武德初析蓝田县置宁民县）颜旭开渠引南山水入京城。至石门谷，有温泉涌出。”[3]武德七年（624年）“同州（治冯翊，今大荔）治中云得臣开渠自龙门引黄河溉灌六千余顷。”[4]岐州虢县（今宝鸡市）“东北十里有高泉渠，如意元年（692年）开，引水入城。又西北有升原渠，引汧水至咸阳县（今咸阳市），垂拱（685—688年）初运岐、陇水入京城。”[5]从武德至如意年间，在京畿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对改善自然条件、扩大灌溉面积起了积极作用。

实行复种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唐太宗“欲幸同州校猎”。栎阳县（今富平以南）县丞刘仁轨上疏，建议“退延旬日”。理由是“今年甘雨应时，秋稼甚盛，尽力收获，月半犹未毕功”，加以“贫家无力，禾下始以种麦”，百姓不仅忙于秋收，贫家还忙于种麦。这时，皇帝校猎，需修桥、铺路，“动费一二万功”影响农业生产[6]。刘仁轨提到贫苦农民在“禾下”种麦，分明是粟、麦复种，一年两收。贫家这样做，看来是因为他们地少，需充分利用土地。这说明京畿地区复种制只在部分土地上实行，但它反映了唐初京畿地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情况。

---

〔1〕欧阳修：《新唐书》(13)卷99，《李大亮传》，3 9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旧唐书》(15)卷185，《良吏上》，4 802页。

〔3〕《册府元龟》(6)卷497，《河渠二》，5 9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4〕《册府元龟》卷497，《河渠二》，5 950页。

〔5〕《新唐书》(4)卷37，《地理一》，967页。

〔6〕王溥：《唐会要》(上)卷27，《行幸》，5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

农业技术

水车　《启颜录》："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1〕邓玄挺于永昌元年（689年）任天官（吏部）侍郎〔2〕。说明唐初京畿地区就有水车。

碾、硙　永徽六年（655年）雍州（治长安，今西安市。）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3〕作为粮食加工工具的碾、硙，至少在战国时就有，但唐初已用河渠水流作动力，并且较为普遍。而"富商大贾"竞造碾、硙，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此时已将粮食加工作为一种行业，收取加工费，亦未可知。碾硙以河水为动力，影响灌溉，但碾硙的发展也反映粮食加工业的进步。

物产

粮食作物：《新唐书·地理一》京兆府（治长安县，今西安市）其贡（向朝廷缴纳的贡品）：稻、麦、面、粟。

经济作物：主要产麻，蚕桑较少。《新唐书·地理一》：京兆府："以关辅既寡蚕桑"，因而除"京兆、同（治冯翊县，今大荔）、华（治郑县，今华县）、岐（治雍县，今凤翔）上贡（丝）绵以外，"余州布（麻布）、麻。"说明关辅地区主要产麻。

竹、箄京兆府周至县（今周至）东十五里有司竹园，园"周回百里"〔4〕由司农寺司竹监掌管。"凡宫掖及百司所须帘、笼、筐、篾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箄，则以时供尚食。"〔5〕

---

〔1〕李昉：《太平广记》(5)，卷250《邓玄挺》，1 9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一》(1)，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上)。卷1《关内道一》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元和郡县图志》（上）卷2《关内道二》，31页。

〔5〕唐玄宗：《唐六典》卷19《司农寺》，377～378页，日本，广池学园事业部，昭和四十八年（1973年）。

葡萄。“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贞观十四年）破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分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太平寰宇记》卷200《北狄十二·杂说》）唐初从西域引进马乳葡萄，值得注意。

樱桃。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四月，丙戌，“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胡三省注：樱桃，按《尔雅》名楔荆桃。树多阴，先百果熟。大如拇指，圆而色朱，味甜。每一朵率一二十颗，核如豆大。亦名含桃。）”[1]当时只有官苑种植，民间尚不多见。

京畿地区是唐朝政治中心所在地。贵族、官员、胥吏以及他们的家属、部曲、奴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集团，对于“耕植不博”的畿内，是难以承担的，“所资畿外”[2]即依靠外地供应。不过，唐初官吏队伍毕竟有限，“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乘舆得以安居。”[3]需外地支援数量不大。

（二）畜牧业

唐初京畿地区西部岐州（今凤翔）、邠州（今陕西省彬县）有空隙土地，朝廷在此二州和与此二州邻近的宁州（治定安县今甘肃省宁县）、泾州（治安定县今甘肃省泾川）置马坊，畜养战马：“初，用太仆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627—649年）至麟德(664—665年）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置八坊于岐、邠、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润，四曰北普润，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4]

---

〔1〕《资治通鉴》(14) 卷209《景云元年》，6 6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2〕《资治通鉴》(13) 卷193《贞观五年》，6 0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3〕《资治通鉴》(14)卷213《开元二十一年》,6 8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4〕《新唐书》(5) 卷50《兵志》，1 3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在古代军队中，战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太宗在贞观十年（636年）建立了府兵制度，“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1]每府平均以1 000人计，634兵府，共有十兵634 000人。而唐初仅在上述八马坊，就畜养了战马70万匹！在唐前期的军事行动中战绩辉煌，在京畿与关内道大力畜养战马，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长安：手工业和商业

长安（今西安市），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唐代的长安城在汉代长安城之南，是隋代创建的。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嫌长安城制度狭小”，纳言苏威指出：“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建议迁都。隋文帝下诏，命“高颎等创造新都十龙首山（龙首山长六十里，首入渭水，尾达樊川。）。”开皇二年十二月，命新都名曰大兴城。开皇三年三月，隋迁都于新都大兴城[2]。

大兴城的总面积为84平方公里。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3]。

郭城是居民区和商区。郭城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周长约36.7公里。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这南北11条，东西14条街，把郭城分成了108个坊（居民区）。大兴城内有两市，东曰都会，西曰利人。两市对称置于皇城外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

皇城是唐朝中央政府各机构所在区。皇城与（其北）宫城位于

---

〔1〕《资治通鉴》（13）卷194《贞观十年》，6 124～6 1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2〕《资治通鉴》（12）卷175《开皇二年》《开皇三年》，5 457、5 4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3〕《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

郭城北部正中。南北长 1843.6 米，东西宽 2820.3 米。

宫城，是宫殿集中地区。宫城与（其南）皇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南北长 1492.1 米，东西宽 2820.3 米〔1〕

史载："开皇三年，上入新都，名其城曰大兴城，正殿曰大兴殿，宫曰大兴宫，宫北苑曰大兴苑。"大兴宫正北的大兴苑（禁苑），是皇家园林，为大兴宫最北之建筑。隋文帝在大兴殿坐朝。开皇二十年九月癸丑，隋文帝"御大兴殿"〔2〕，就是一例。大兴宫南部的正门是广阳门。

隋义宁二年（618 年）五月，改大兴殿为太极殿，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数日后"宴百官于太极殿"〔3〕。唐朝初年皇帝"常日听朝而视事"，则在太极殿后之"两仪殿"，即"古之内朝也。"两仪殿原是隋中华殿之改称〔4〕。

此外，被隋文帝废弃的汉朝未央宫，唐朝初年还存在。唐太宗于贞观七年（643 年）十二月戊午"从上皇（高祖）置酒故汉'未央宫'（原注：汉故未央宫在长安宫城（西）北、禁苑之西偏)"〔5〕。由上述可知，唐朝初年隋朝创建的大兴宫和汉朝兴建的未央宫同时存在，唐初皇帝有时还在未央宫活动。无论大兴宫、未央宫，气势都很雄伟。唐太宗曾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6〕这说明，在贞观年间，长安的宫殿建筑已很雄伟。

唐朝建立后营建的最大宫殿是大明宫。大明宫坐落在禁苑之东

---

〔1〕王玉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322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资治通鉴》（12）卷 179《开皇二十年》，5578 页。

〔3〕《旧唐书》（1）卷 1《高祖纪》，6 页。

〔4〕《唐六典》卷 7《工部》159 页。

〔5〕《资治通鉴》（13）卷 194《贞观七年》，6103 页。

〔6〕《全唐诗》（1）卷 1《帝京篇》，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另，贞观年间还先后在宜君等县造玉华、翠微等离宫。

南面，西接宫城（即隋太极宫）之东北隅。贞观八年（634年）十月，唐太宗为高祖避暑，“营大明宫”，但“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1]。至龙朔二年（662年），“高宗染风痹，恶太极宫卑下，就修大明宫，改曰蓬莱宫”[2]，后又改为大明宫。

大明宫的西墙长2 256米，北墙长1 135米，南墙（即郭城的北墙）长1 624米，东墙长2 614米，形成了一个南宽北窄的形状[3]。大明宫正殿为含元殿，后殿为宣政殿。此外，麟德殿（胡三省引韦执谊曰：翰林院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麟德殿在西重廊之后。）也十分雄伟。高宗、武则天在含元殿坐朝，也常有事于他殿，如高宗开耀元年（682年）正月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4]又如，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九月，癸未，“宴论弥萨于麟德殿。”[5]

含元殿和麟德殿的建成，说明唐初建筑技术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明宫的建成，使长安更为辉煌。骆宾王（高宗、武则天时人）写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6]

长安城北面有“昆明池”，是汉武帝时创建，为皇家苑林。唐中宗在位，其女安乐公主请中宗赐予，“帝曰：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7]安乐公主遂“夺百姓庄园，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引水为涧，飞阁步檐，斜桥磴道。又有“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满苑“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穷天下之壮丽”[8]。虽

---

〔1〕《资治通鉴》(13) 卷194《贞观八年》6 107页。

〔2〕《资治通鉴》(13) 卷194《贞观八年》十月，胡三省注，6 107页。

〔3〕《中国古代物质文化》323页。

〔4〕《资治通鉴》(14) 卷202《开耀元年》正月，6 399页。

〔5〕《资治通鉴》(14) 卷207《长安二年》6 560页。

〔6〕《全唐诗》(3)卷77《帝京篇》,834页。

〔7〕刘餗《隋唐嘉话》下，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张鹭《朝野佥载》卷3，70—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然，这是安乐公主穷奢极侈的表现，但是，如果从建筑史角度上看，唐朝初年已达到很高水平。

此外，长安城中官宦人家的宅第多为豪华建筑。“宗楚客造一新宅成”。皆是文柏为梁，（以）沉香和红纷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硬底靴）行者，（往往）仰仆”。太平公主（高宗女）至新宅观后，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武则天时，张易之造一大堂，也是“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2〕。这些豪华建筑，虽说明宗楚客、张易之等权贵的奢靡，但也说明了唐初长安建筑业的水平。

手工业　唐初的手工业已有很高水准。唐代手工业，除家庭手工业外，技术含量大的为私营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从产品数量来说，属私营手工业，而从产品质量上说，官营手工业为上乘。以丝织业为例，唐中央设置的“少府监织染署”专门生产朝廷所需的精美丝织品。武则天垂拱元年（685 年）“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3〕共计 500 余人。“有金银作坊院”〔4〕。

其产品，十分精美。唐代高官、武将，冬则赐袍，夏则赐衫。武则天天授二年（691 年）二月，朝集使（地方长吏至朝廷报告工作）、刺史（州长吏）赐绣袍，各于（袍）背上绣成八字铭文。长寿三年（694 年）字铭改绣金字、银字。延载元年（694 年）五月，赐文武三品已上“襟背罗衫”。而衫上依武将的官阶绣上不同纹饰：“饰以（一）对狮子”、“饰以麒麟”、“饰以对虎”、“饰以豹”、“饰以鹰”。而诸工“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凤凰池），尚书

〔1〕《朝野佥载》卷 3，70 页。

〔2〕《朝野佥载》卷 6，146 页。

〔3〕《新唐书》（4）卷 48《百官三·少府》，1 269 页。

〔4〕《新唐书》（4）卷 48《中尚署》，1 270 页。

“饰以对鹰”[1] 上述无论绣“金字”、“银字”，还是绣虎豹、麒麟，都足以说明唐初官营丝织业水平之高超。

唐初私营手工业的丝织品，也很精美。高宗在《令雍州长史李义元禁僭侈诏》中指出：长安私营作坊出产的“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过于华丽，“靡费既广，俱害女工”。高宗说：“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开）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所以不著），务遵节俭也。”[2] 可见唐初长安市中的丝织品精美程度，不让于官营手工业作坊。

《朝野佥载》卷三：“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如果安乐公主的百鸟毛裙是产自官营手工业，那么，百姓家的百鸟毛裙必出自私营手工业，也可见私人手工业的技术水平。

商业　长安有东、西二市（商业区）宋敏求《长安志》卷 8：“东市，隋曰都会市，南北居二坊土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市，位置在长安东部，而这一地带多为达官权贵居处，因而，所售货物档次较高。陈子昂至东市，“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之）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3] 同书卷 10：“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西市，位于贯穿长安南北的朱雀街西部，而这一带属平民区，因而西市实为平民市场。例如，“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咀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钱）。”[4] 市丞驯鸟在市中表演，表明

〔1〕《唐会要》（上）卷 32，《舆服下》，582 页。

〔2〕《全唐文》（1）卷 13，161 页。

〔3〕《太平广记》卷（4）179《陈子昂》1 331 页。

〔4〕《朝野佥载》补辑，167 页。

了西市的平民特点，而人取一钱，一日能收数百钱，说明市场之人众。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唐初已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长安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树）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1] 这件事虽未成，但可见邹凤炽财富巨万。

二、关内道中部、北部

唐朝初年，突厥为患。突厥与唐军以关内道北部之黄河为界。黄河以北的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易于耕牧。自秦汉以来，列为州县。隋朝末年战乱，将河套百姓南迁过河至宁州（今甘肃省宁县）、庆州（治安化县今甘肃省庆阳），这样，唐就以宁、庆二州为边境。贞观四年（630 年）于河套地区“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改为丰州（今内蒙五原县）[2]。唐廷“募人实之，西北始安。”[3]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 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北[4]。东受降城（今内蒙托克托）、中受降城（今包头市以西）、西受降城（今内蒙五原县以北）。中受降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里，遥相应接。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通考》作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5]

物产　《唐六典》卷三载关内道中、北部各州贡品如下：

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白毡

会州（今甘肃省靖远）：驼褐

---

〔1〕《太平广记》（10）卷 495《邹凤炽》，4 062 页。

〔2〕《旧唐书》（5）卷 38《地理…》，1 417 页。

〔3〕《资治通鉴》（14）卷 203《弘道元年》6 414 页。

〔4〕《资治通鉴》（14）卷 209《景龙二年》6 621 页。

〔5〕《元和郡县图志》（上）卷 4《丰州》，116～117 页。

夏州（治朔方县，今吉林省白城）：白毡、角弓。

灵州（治回乐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花苁蓉、鹿角胶、野马皮、雕翎。

丰州（治五原县，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野马皮

丹州（治安北县，今甘肃省庆阳）：麝香

《新唐书》卷54《食货四》："唐有盐池……盐州五原（今陕西省定边县）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可知唐代关内道盛产食盐。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自唐朝建立（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天宝（742—755年）年间137年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

在唐初百余年中，人口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关内道来说，就从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97 950户、1 746 274口，增至（天宝十三载，754年）810 213户、4 608 789口。户数增长了103.5%，口数增长了163.9%。[1]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京畿地区"地狭人稠"更为加剧。

京畿是唐朝政治中心所在地，因而是官吏集中的地区。贞观元年并省行政机构，中央机构文武官员只留643人[2]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机构也相应扩大，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定制："内官

〔1〕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222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

〔2〕《资治通鉴》（13）卷192《贞观元年》："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6 043页。

二千六百二十”，而胥吏也不下于此数[1]。开元、天宝之际，京畿地区集中了贵族、官吏及其家属、奴婢，构成了庞大的消费集团。一向是“耕植不博”，又“寡蚕桑”的京畿地区，必须扩大耕植。

前面提到，元结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京畿地区也是如此。

一、京畿地区

（一）农业

由于多年乱砍乱伐，开元、天宝年间，京畿地区几无大树。唐德宗（780—805年在位）曾指出：“开元、天宝年间求美材（大树）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2]乱砍乱伐造成水土流失、“地多咸卤”。开元、天宝年间，在京畿地区发展水利，引水溉田、发展稻米生产。

姜师度于开元七年（719年）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将境内朝邑（今县名）、河西（今合阳县）两县“由来榛棘之地”，引洛水、黄河灌溉，“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官）屯十余所，收获万计。”[3]唐玄宗在《褒姜师度诏》中，将所开稻田分给“同州贫下欠地之户”[4]。

京兆府栎阳（今陕西省富平县南）等县“地多咸卤，人力不及，便至荒废”。后由官府引水灌溉，成为稻田。开元二千六年（738年）正月，玄宗在《亲祀东郊德音》中宣布：“京兆府界内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唐大诏令集》卷73）

天宝六载（747年）少府监张去奢在京畿引水井屯田：“泾渭之汭，旧多泻卤，流浸所集耕者弃之。公（去奢）决潢污于近渎，

---

〔1〕《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230页。

〔2〕《资治通鉴》（16）卷235《贞元十年》，7 563页。

〔3〕《旧唐书》（15）卷185下《良吏下》，4 816页。

〔4〕《全唐文》（1）卷28，318页。

变蒲稷为良畴。奏开屯田，岁收亿秭。”（韦述：《大唐故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公去奢墓志铭》西安博物馆藏。）

从开元至天宝年间，在京畿地区，由少府监或州刺史，大力发展水力灌溉，变荆棘为稻田，分给贫下农户。此外，还将京畿地区的职田分给欠田户。所谓职田，亦称职分田，是官员俸禄的组成部分。唐代规定，中央或地方官员在职期间，按级别享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收取地租。官员调动，“更代相付”。京畿地区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官员集中，因而职田很多。为了解决由民户增多而出现少地、无地农户的耕地需求，开元十年（722年）“内外职田……并官收，给还逃户及贫下户欠丁田。”[1]而在开元十八年（730年）“以京兆府、岐、同、华、邠、坊州隙地、陂泽可垦者，复给京官职田。”[2]也就是说，此时又将京畿6州府的“隙地”、“陂泽”充作职田给京官，由他们开垦成为耕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又将这些职田分给京畿贫民，京官职田改在都畿（即河南府和汝、陕、郑等州）补受[3]。

开元、天宝年间，朝廷一方面大力发展京畿水利，使荒闲土地变成稻田，与此同时又将这些稻田分给京畿贫民，使京畿“地狭人稠、耕植不博”的情况有很大改变。

唐初，京畿“地狭人稠，耕植不博”，当地农业生产不能满足需求，因而只能“所资畿外”。不过，当时政权机构规模有限，官员不多，因而“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

〔1〕《旧唐书》(1) 卷8《玄宗上》，183页。

〔2〕《新唐书》(5) 卷55《食货五》，1 399页。按：此条前有“十八年”三字，新书作者将之列入贞观年间序列，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旧唐书·地理一》：“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开元十三年改豳为邠”，可知此条材料应为开元十八年者。参看《资治通鉴》(14) 卷213《开元十八年》“二月，丁酉，复给京官职田”，可证实。

〔3〕《新唐书》(5) 卷55《食货五》1 399页。：“(开元) 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狭，计丁给田犹不足，于是分诸司在都（长安）者，给职田于都畿（河南府、汝州），以京师地给贫民。”

石，足以周赡。"[1]遇关内水旱，高宗、武则天往往率官员至东都洛阳"就食"。开元、天宝年间在京畿扩大耕地分给贫民的措施，收到效果，京畿的粮食生产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2]玄宗采纳，敕"宜令户部郎中郑昉，殿中侍御史郑章，于京畿，据时价外，每斗加三两钱，和籴粟三四百万石，所在贮掌。"[3]看来，这次从农民手里购买的三四百万石粟米是落实了。这可从停止外州运粮一事可知。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敕："自今已后，关内诸州庸调、资课（按：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每丁每年缴粟2石，谓之租；绢2丈、绵3两，谓之调，出力役20天，折绢缴纳，谓之庸。资课，类似庸）并应准时价折变为粟米，送京师……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舟处，应（折租为绢）以代关中庸调、资课"[4]。这就是说，关内诸州原先应缴纳的绵、绢改缴粮食；而两河不通水舟之处应缴纳的粮食改缴绢帛。这说明此时关内诸州粮食生产的增多，否则这是办不到的。不仅如此，当年六月，进一步规定："河东、陕运两使，每年尝运一百八十万石送京，近已减八十万石……今年应运一百万石并宜停。"[5]当年九月又进一步规定："停今年江淮所运租。"[6]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另外，还可从玄宗不再"东幸"看出。开元初年，由于关内"所资畿外"情况没有扭转，唐玄宗也常至洛阳"就食"《资治通鉴》卷215《天宝三载（744年）》："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

〔1〕《资治通鉴》(14)卷213《开元二十一年》，6 802页。
〔2〕《资治通鉴》(15)卷214《开元二十五年》，6 830页。
〔3〕《册府元龟》(6)卷502《邦计部·平籴》，6 012页。
〔4〕《册府元龟》(6)卷487《邦计部·赋税一》，5 829页。
〔5〕《册府元龟》(6)卷498《邦计部·漕运》5 967～5 968页。
〔6〕《资治通鉴》(15)卷214《开元二十五年》6 830页。

十年（胡三省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自东都还，自是不复东幸）。’”这里说关中蓄积稍丰是“增近道粟赋及和籴”所致，可见京畿和籴的重要性，而能够在京畿大量收购粮食，这又与开元、天宝之际京畿扩大耕地面积有密切关系。

农业技术　唐初京畿地区的粮食复种、水车、碾硙，至开元、天宝年间有了发展，只以碾、硙为例：天宝初年，高力士“于京城（今西安市）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1〕李元纮“开元初，三迁万年县承……俄擢京兆尹……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2〕然而，“未几，所毁皆复。”〔3〕截河渠之水推动碾硙，势必“以害水田”，京畿碾硙的发展，极大地影响水田，然而，从粮食加工业来说，碾硙以水流作动力，必竟是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表现。高力士的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物产

粮食作物：开元年间，京兆府（治长安县，今西安市。）贡糯米。《太平广记》卷149《木上》：“玄宗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得糕糜。”

经济作物：葡萄　前面提到贞观14年破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得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而开元中，民间也有种植。“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出启夏门，直至终南山下……有人家，门庭整肃，生窥之，见茅斋前有葡萄架。”〔4〕马乳葡萄来自西域，而葡萄在京畿早已有之。

---

〔1〕《旧唐书》（15）卷184《宦官》，4 758页。

〔2〕《旧唐书》（9）卷98《李元纮》，3 073～3 074页。

〔3〕《元和郡县图志》（上）卷1《关内道一》，11页。

〔4〕《太平广记》（2）卷72《陆生》448页。

柑　“天宝十年，上谓宰臣曰：‘近日于宫内种柑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1〕这说明南方的柑子、在此时向北方推广。开元、天宝年间的司竹园所产竹、笋依旧。值得注意的是，天宝年间京兆府（长安）不仅有不少作为经济作物的竹、笋生长出来，还有柑树结实，说明唐代京畿地区气温较高，与今日江南不相上下。

牡丹　“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山西省汾阳）众香寺，得白牡丹一颗，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观。”〔2〕这说明山西的牡丹此时发展到陕西。

水上交通　由于唐初京畿地区扩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增多，“所资畿外”的程度大为缓解。然而，这只是就唐初“衣食难周”〔3〕这一点而言。事实上，开元、天宝年间，政权机构扩大、官吏增多，加以军费开支大增“用度浸广”，对外地物资的需求与日俱增。

自隋炀帝开运河，为南北物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唐朝初年，自汴水（隋曰通济渠）北入黄河以后，颇不通畅，具体地说，即洛阳至长安一段“河路艰险”，尤其是三门峡一段，舟船往往沉溺。正因如此全国所征租调，大部在“天下之中”的洛阳贮存。从洛阳至长安，只能走陆路。而“既用陆脚，无由广致。”（陆路交通运费较高，限制了粮食的运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耀卿建议“若能开通（黄）河漕（运），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4〕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所谓“开通河漕”，即将渭水、黄河和汴水水路加以疏通，主要是自汴水入黄河之河口起至华州为

〔1〕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8，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酉阳杂俎》前集卷19《草篇》，185页。

〔3〕《全唐文》（1）卷13，《高祖皇帝》，160页。

〔4〕《唐会要》（下）卷87《漕运》，1596－1597页。

止的黄河段。办法是，在河口建河阴仓；在三门东置集津仓和盐仓（后更名三门仓）这是由于江南船夫不习黄河水道，他们只需将租米运过汴水，即将租米交贮河阴仓，即可返回。官府再雇船夫将河阴仓租米分别经黄河或洛水运至集津仓和盐仓。同时在集津、盐仓之间的黄河北岸开18里山路，“车运而过”，以避三门峡“底柱”之险。[1]裴耀卿的分段运输办法效果显著，“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2]。

裴耀卿“开通河漕”，主要是“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等州）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3]。晋（今山西省临汾）、绛（今山西省新绛），唐代属河东道；濮（今山东省鄄城）、济（今山东省平阴县），唐代属河南道；魏（今河北省大名）、邢（今河北省邢台市）、洺（今河北省邯郸市北）、贝（今河北省清河）、博（今山东省聊城），唐代属河北道。也就是说，“开通河漕”，主要是将河南、河北和河东道之粮食运往京畿地区。

裴耀卿于开元二十一年所通河漕，“渭之北运”。但不久，“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于是“(开元)二十五年，遂罢北运。”[4]“北运颇艰”，主要是因渭水自长安入华州华阴县(今县名)一段，水浅沙多，行船不便。天宝三载(744年)，玄宗又命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长安)西苑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即开凿了沿渭水南岸、与渭水傍行的人工运河。修凿漕河的目的是“引永丰仓(在华阴县)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5]。比裴耀卿时又有超过。不过，通漕河的目的仍然是“通山东

〔1〕《资治通鉴》(14) 卷213，《开元二十一年》，6 803页。
〔2〕《旧唐书》(9) 卷98《裴耀卿》，3 081页。
〔3〕《新唐书》(5) 卷53《食货三》，1 366页。
〔4〕《新唐书》(5) 卷53《食货三》，1 366页。
〔5〕《新唐书》(5) 卷53《食货三》，1 366页。

租赋”，在唐代，所谓“山东”即指太行山以东[1]，实际指唐代河南、河北道，即今河北、河南、山东省而言。

漕河，从华阴永丰仓下，引至长安城东9里长乐坡下，与灞水、浐水交汇。在河水交汇处，“架苑墙”，中有望春楼，成为一大景观，曰广运潭。裴耀卿、韦坚改进漕路后，不仅两河地区、江淮地区乃至岭南的物资源源北上：

天宝三载广运潭成，唐玄宗率文武于望春楼检阅。韦坚事先于洛阳、汴州、宋州取小斛底船二三百只置于潭测，每船悬表牌，例如：

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省江都）船，船中陈列广陵郡所出锦、铜镜、铜器、海味；

丹阳郡（今江苏省丹阳市）船，陈列所产绫衫段；

晋陵郡（今江苏常州市）船，陈列绫绣；

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市）船，陈列铜器、罗、吴绫、绛纱；

南海郡（今广东省广州市）船，陈列玳瑁、珍珠、象牙、沉香；

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船，陈列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

宣城郡（今安徽省宣城）船，陈列空青石、纸笔、黄连；

始安郡（今广西省桂林市）船，陈列蕉葛、蚺蛇胆、翡翠。

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糯米、方纹绫。

玄宗检阅之日，陕县县尉崔成甫为此作歌词十首，其中《得宝歌》曰：“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玄宗行三）当殿坐，看唱得宝歌。”他于第一船作号头领唱，由妇女100人合唱，“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数十只船鱼贯至望春楼下，“连樯弥亘数里”，京城百姓“观者山积”。[2]

---

〔1〕翁俊雄：《丝绸之路的源头在河南、河北、山东》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19～20页。

〔2〕《旧唐书》（10）卷105《韦坚》，3 223页。

开元、天宝年间，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河南、河北的粮食和布帛；江淮地区的铜器、铜镜、瓷器、纸笔、精美丝织品以及岭南的珍珠、象牙和药材，夜以继日，源源不断运往京师府库。史载：天宝八载（749年）二月，“玄宗引百官观左藏（原注：太极宫中，（有）东左藏库、西左藏库……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皆归左藏也），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1]太府卿杨崇礼，“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杨卿者，无不精美。每岁句驳（查对）省便出钱数百万缗”。[2]

（二）长安：手工业和商业

长安　开元、天宝年间在京畿地区又建造兴庆宫和华清宫等建筑群。

兴庆宫　在长安“东市”东北的“兴庆里”。原为“五王子宅”，玄宗即位前与宋王等居此。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以兴庆里旧邸为兴庆宫。宫内有“龙池”，可以泛舟。于宫之西面建一楼，曰花萼相辉楼；南建勤政务本楼。开元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于兴庆宫听政”。此后又加扩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长安东南角曲江之芙蓉园。兴庆宫至芙蓉园的夹城，便于游幸。）。当年于二月三日，毁东市东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广花萼楼前。”[3]玄宗作《春中兴庆宫酺宴》诗记述了当时的盛况[4]。

华清宫　新丰县（今西安市北）南、骊山西北、有温泉。隋文帝时在此修屋宇并种松柏千余株。唐贞观于八年（644年），诏阎

---

〔1〕《资治通鉴》（15）卷216《天宝八载》，6 893页。

〔2〕《资治通鉴》（14）卷213《开元二十一年》6 804页。

〔3〕《唐会要》（上）卷30《兴庆宫》，559页。

〔4〕《全唐诗》（1）卷3《明皇帝》37页。

立德营建宫殿，名汤泉宫。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改名温泉宫。[1] 至天宝六载（747年）改为华清宫，“益治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由于新丰县距温泉稍远，即于温泉所在地置会昌县（时分新丰、万年县置）。当年十二月，发冯翊、华阴县民夫筑会昌城，（今陕西省长安）置百司。千公各置第舍，以致“土亩千金”。早在贞观、咸亨年间，太宗、高宗每年秋季，常至温泉休息。而唐玄宗“自开元以来，每岁十月临幸，岁尽乃归”。[2]

华清宫和会昌城修成之时，正是唐朝全盛之日。开元中，卢象在《驾幸温泉》中写道：

传闻圣主幸新丰，
清跸鸣銮出禁中。
……
千官扈从骊山北，
万国来朝渭水东。[3]

天宝年间的冬季，唐玄宗在千官扈从之下，至华清宫驻跸，而当时万国的使者来朝进谒，其盛况可想而知。

开元、天宝中，贵戚、高官大建府第。崔颢（开元时人）在其《长安道》诗中写道：“长安甲第高人云”[4]。杨贵妃姊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而安禄山在亲人坊中的府第，“但穷壮丽，不限财力”。[5] 除了说贵戚、宠臣奢靡之外，也说明开元、天宝年间的建筑业技术水平有了新的发展。

---

〔1〕《唐会要》（上）卷30《华清宫》559页。则曰：“开元二十一年置温泉宫于骊山上。”

〔2〕《资治通鉴》（15）卷215《天宝三载》和《六载》，6 860、6 882页。

〔3〕《全唐诗》（4）卷122，1 219页。

〔4〕《全唐诗》（4）卷130，1 323页。

〔5〕《资治通鉴》（15）卷216《天宝七载》、《九载》，6 892、6 902页。

手工业　开元中长安有“冶成坊”。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圹中剑，心异之”。[1] 锻冶作坊集中而成“冶成坊”，可知锻冶业的规模。

京畿地区盛产名酒。《唐国史补》卷下：“酒（之著名者）有……富平（属京兆府，今陕西省富平）之‘石冻春’……京城（今西安市）之‘西市腔’。”[2]

商业　开元、天宝年间，京畿地区商业有长足的发展。长安西市出现“锁钱”业。开元初年，有人入京卖绢，索价二万贯。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3] 所谓“锁钱”即将钱存入，此业即钱庄的雏形。

长安（今西安市）是个开放的城市，天宝年间有数十西域胡人滞留长安：“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凡得四千人”[4] 有波斯胡人，至扶风，见一家门外有方石，以钱二千求买。“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5]。他们有很多在长安娶妻、生子，安家落户。

天宝年间京畿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华清宫、会昌城的建成，原有东、西市已不能满足要求，天宝八载（749 年）十月五日，于“西京威远营置南市；华清宫置北市。”[6] 由于会昌城（今陕西省长安）置“百司”即政府各机构，又置王公府第，因而这两市商业活跃，是利之所在。正因如此，文武高官纷纷在两市投资造店铺，出租店铺，收取高额租金。朝廷认为有必要加以控制，因而颁《禁赁店下利诏》：“南北卫（指中央禁军武将）、百官等，

---

〔1〕《太平广记》(6) 卷 330，2 625 页。

〔2〕李肇：《唐国史补》卷下，6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3〕《太平广记》(6) 卷 300《二卫》，2 384 页。

〔4〕《资治通鉴》(16) 卷 232，《贞元三年》，7 493 页。

〔5〕《太平广记》(9) 卷 402《径寸珠》，3 237 页。

〔6〕《唐会要》（下）卷 86《市》，1 581 页。

如闻昭应县（天宝七载省新丰县，改会昌为昭应）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1]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2]朝廷并没有取缔这两市，只是禁止清望官参与此事，对非清望官，只是限制其租金不得过高而已。

二、关内道中部、北部

中部：畜牧业

贞观初年，于岐、邠、泾、宁四州置8马坊。自贞观中，移于关内、陇右两道之间。“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今甘肃省天水市）、渭（今甘肃省陇西）之北、会州（今甘肃省靖远）之南、兰州狄道县（今甘肃省临洮）之西（按：应为东）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

南使在原州（治平高县，今陕西省固原。）西南一百八十里……管十八监；

西使在临洮军（在鄯州城内，鄯州即今青海省西宁市）西二百二十里……管十六监；

北使寄理原州城内……管七监；

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管九监。

四使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天宝十二载（753年）诸监见在马总319 387匹。内133 598匹课马。[3]

北部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于灵州、夏州之间置宥州（今内蒙古

---

〔1〕清资官，即清望官。《唐六典》卷2《吏部》，34页：“清望官，谓内外三品以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等重要官员。四品已下部分官员也属清望官。

〔2〕《全唐文》（1）卷32、363页。

〔3〕《元和郡县图志》（上）卷3《关内道三》，59页。

自治区鄂托克旗)。《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高宗“调露元年于灵州（治回乐县，今宁夏吴忠）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并为匡、长二州。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复置兰池都督府，在盐州白池县（今宁夏盐池县北）北八十里，仍分六州各为一县以隶之。开元二十一年康待宾叛乱，克定后，迁其人于河南、江淮诸州，二十六年还其余党，遂于此置宥州，以宽宥为名也。唐玄宗在《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胡敕》中委任牛仙客“于盐、夏等州界内，选土地良沃之处，都置一州，量户多少置县。”[1]牛仙客遂于宥州，依据胡户数置怀德、延恩、归仁三县[2]。

[1]《全唐文》(1)卷35《元宗皇帝》，392页。

[2]《元和郡县图志》(上)卷4《关内道四》，106页。

第二章　河南道

唐代的河南道，地处黄河与淮河之间，地域辽阔，包括今河南省、山东省以及安徽省、江苏省的部分地区。

黄河自陕、晋边境折向东，成为河南、北两道的分界线。淮河发源于桐柏山区、横贯河南道东南部，作为河南、淮南道的分界线。

在唐代，有通济渠（汴河）将黄河和淮河沟通起来。通济渠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下令开凿的。渠首是在汜水县（今汜水镇）东北35里的板渚（今已在黄河北岸），在此引黄河水入汴口；至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北洪泽湖中）注入淮河。

在唐代，河南道的西部、中部，尤其是西部的洛洲（河南府）人口密集、经济繁盛，而东部各州，相当于今山东省，则人口较稀，经济尚未充分开发出来。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在隋代，河南与河北两地区人口众多，因而，河南、河北是“士马全盛”隋代经济繁盛的基础。经过隋末以及唐初的战乱与灾荒，两河人口锐减，经济也凋敝下来。唐朝统一全国后，自唐太宗贞观初年开始恢复经济。

唐初全国划分为10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划为15道，将河南道分为都畿道和河南道。《通典》卷177《州郡七》：

“大唐分置十五部……都畿：河南府、陕郡（陕州）、临汝郡（汝州）、荥阳郡（郑州）等郡。”其余各州郡属河南道。

一、都畿地区

河南府（原为洛州，天宝元年改为河南府，治洛阳县，今河南省洛阳市）、陕（治陕县，今三门峡市以南）、郑（治管城，今郑州市）汝（治梁县，今临汝）、怀（治河内县，今沁阳）等五州为“都畿”。

（一）农业

唐初，洛州各县“因隋乱，人不土著，”，多“游手末作”。贞观元年（627年）李轨任洛州都督，“（李）轨下令诸县，有游手末作者皆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趋本。”[1]

唐初实行均田制度，河南道是均田制实行较彻底的地区。《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永徽五年（654年），贾敦颐“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均田制度规定，丁壮可占田一顷，但在“宽乡”占田过限，“律不予罪”，然而必须“申牒立案”，唐初洛州（后改为河南府）属宽乡，豪富之室往往占田过限又不申牒立案，以逃避赋税。贾敦颐将“籍外”所占之田检括出来，“以给贫乏”，透露了唐初洛州各县以及郑、陕、汝等州推行均田制的情况。

洛州各县的百姓，在均田制下获得了耕地，勤于耕作，经过20～30年，至永徽五年，农业得到恢复。史载：永徽五年“是岁大稔，洛州粟（每）斗两钱半，粳米（稻之不黏者）斗十一钱”。[2]

（二）洛阳：手工业和商业

洛阳与长安并称两都或二京。高宗、武则天和玄宗初年经常在

---

〔1〕《新唐书》（12）卷95《窦轨》

〔2〕《资治通鉴》（13）卷199《永徽五年》，6 286页。

洛阳。

洛阳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下令营建，并“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1]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兵围洛阳时，“死者相枕倚于道”。尽管如此，在隋末唐初，洛阳未遭破坏。李世民所率唐军攻入洛阳时，“部分诸军，先入洛阳，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2]

洛阳城的布局也是由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和皇城不在郭城的正北，而是位于西北隅。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在皇城西侧苑内修建了上阳宫，修成后高宗和武则天经常居于此。

洛阳的郭城总面积为45.20平方公里。郭城因中腰有洛水通过，因而分为洛北、洛南两部分。郭城共有109坊（居民区），坊基本为正方形，一里见方。坊内有十字街，四面开门。另有3市：一市在洛北，曰北市；西市和南市，都在洛南。其中尤以南市最为繁华。《唐两京城坊考》卷五：“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十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由于洛阳位于“六合之中”，因而成为黄河南北、江淮地区租赋的重要集散地。因此，隋建东都与开运河时，使洛水自西向东横贯全城，以便于漕运。

洛水自洛阳郭城之西南角流入，经西市，北上与汴水（隋曰通济渠）相通。而“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自板渚引（黄）河入汴口，又从大梁（汴州）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扬州）入于海”。[3]这样，通济渠的北端达于洛阳，而南端与淮河沟通，以至于入海，对南北的物资交流起重大作用。

---

〔1〕《资治通鉴》（12）卷180《大业元年》，5 617页。

〔2〕《资治通鉴》（13）卷189《武德四年》，5 916页。

〔3〕《元和郡县图志》（上）卷5《河南道一·河阴县》，137页。

长安四年（704年）杨齐哲在《谏幸西京疏》中指出："神都（洛阳县，今洛阳市。）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1]

洛阳除了是全国的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之外，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前面提到，南市有120行，3 000余肆。武则天圣历（698—700年）中，徐坚在《请停募关西户口疏》中指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户在洛者甚众。"[2]这是指武则天在天授二年（691年）将雍、同等州数十万户迁到河南时，其中雍、同等州的工商业者也有很多移至洛阳。

洛阳的建筑业也很发达。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于洛阳建"明堂"。"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3]证圣元年（695年），命薛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4]

洛州的冶炼、手工技巧也很发达。"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人，隐起鏤镂，窈窕便娟。"[5]"长寿三年（694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6]这都表明当时建筑、冶金业的高超水平。

---

〔1〕《全唐文》(3) 卷260，2 636页。

〔2〕《全唐文》(3) 卷272，2 765页。

〔3〕《资治通鉴》(14) 卷204《垂拱四年》，6 454页。

〔4〕《朝野佥载》卷5，115页。

〔5〕《朝野佥载》卷3，70页。

〔6〕刘肃：《大唐新语》卷8，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洛州殷文亮……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1〕木人可以酌酒行觞，则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高度发展。

二、河南道诸州

劳动力的充实　隋末至唐高祖武德初年，河南道诸州人口锐减，经济凋敝。高祖于武德六年（623年）《简徭役诏》：“大河南北，乱离永久，师旅荐兴，加之饥馑，百姓劳敝，此焉特甚。”（《唐大诏令集》卷111）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魏征指出：“今自（水）、洛（水）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难。”〔2〕从贞观年间各州人口分布来看，魏征所指的地区主要是指许、汝、陈、豫、颍、济、兖、徐、泗、海、沂、密、青、莱等十数州。〔3〕相当今河南、山东和安徽北部地区，当时人口稀少。

唐制：“四夷降户，附以宽乡（地广人稀），给复（免除赋税）十年”〔4〕。因此，自贞观至万岁通天年间，不断以“四夷降户”充实这些地区。贞观四年（630年），突厥降唐，朝十主张“悉徙之河南兖、豫间。”〔5〕此事虽未落实，却可说明兖、豫之间是宽乡。显庆五年(660年)打败百济，曾将其降户“徙于徐、兖等州”。〔6〕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先后将契丹李去闾部落和靺鞨乌素固部落分别“移于徐、宋等州”和“移于淄、青安置。”〔7〕这都说明唐朝初年这一地区人口的稀少。

---

〔1〕《朝野佥载》卷6，142页。

〔2〕吴兢：《贞观政要》卷2，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唐初政区与人口》，71页。

〔4〕《新唐书》(5) 卷51《食货志》，1 343页。

〔5〕《资治通鉴》(13) 卷193《贞观四年》，6 076页。

〔6〕《资治通鉴》(14) 卷202《显庆五年》，6 379页。

〔7〕《旧唐书》(4) 卷39《地理二》慎、玄二州，1 522页。

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十月，“上幸许（治长社县，今许昌市）、汝（治梁县，今临汝）州，问中书令杜正伦曰：‘此间田地极宽，百姓太少。’”〔1〕也说明了这一点。

武则天在位时情况有了改变。关中地区自隋末以来由十各地逃民的到来，人口相对密集。不仅如此，咸亨以来，尤其是永淳以后，关中灾害严重，关中的居民大批出潼关，避难河南。其中多数“流宕亡归”。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置鸿、宜、鼎、稷等州制》：

> 其有诸州人，或先缘饥岁，流宕亡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住，为籍贯属，恐陷刑名，荏苒多时，未经首出。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治浚仪县，今开封市）、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

《制书》透露，自咸亨，尤其是自永淳以来，由于关中屡遭灾害，关内以及其他各州“卫士、杂色人等”未经官府批准，私自逃往洛、郑、汴、许、汝等州。有的官员子弟，父兄去任，不随之而去，却留住在上述地区。他们不愿离去，说明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比他处要好。

天授二年的《制书》又曰：

> 其雍州旧管及同、泰（即华州，为避武则天祖讳，在武则天时改华州为泰州）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于水次量给船乘，般次进发。至都分付洛州，受领支配安置讫，申司录奏闻。（《唐大诏令集》卷99）

这里所谓“雍州旧管及同、泰等州”即雍、鸿、宜、鼎、稷、井、析、同、泰等当时畿内九州。这次由官府组织的徙民措施收到了极大的效果。《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天授二年》载：“徙关内户

〔1〕《通典》卷7《食货七》，40页。

数十万以实洛阳。”不过，《制书》云：“分付洛州，并非“实洛阳”，看来，《通鉴》有误。因为，其时不仅洛阳容纳不下数十万户，即使是天宝年间的洛州，也只有“户十九万四十七百四十六”（《旧唐书，地理志》）河南府）。看来，只是通过洛州，将此数十万户分送河南道各州安置，才属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关中数十万户“无田业者”如何进行“安置”？所谓“安置”，必须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授给他们以土地。前面提到，洛州刺史贾敦颐，检括境内“籍外占田”，“以给贫乏”就是推行均田制。同样，怀、郑、汴、许、汝等州对徙入的关中数十万民户的安置，主要的也就是授给他们以耕地。

兴修水利　唐朝初年，河南道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1. 汴州陈留县（今县名）“有观音陂，贞观十年，（县）令刘雅决水溉田数百顷”。2. 莱州即墨县（今山东省即墨）“东南有堰，贞观十年，（县）令仇源筑，以防淮（河）涉水”。3. 沂州承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南）“县界有陂十三所，并贞观元年已来修立，以溉田焉”。[1] 4. 陕州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南）有南利人渠，“贞观十一年……丘行恭开”。5. 颍州汝阴县（今安徽省阜南）“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田二百顷，永徽中，刺史柳宝积修”。6. 颍州下蔡县（今安徽省凤台县）西北 120 里有大崇陂，80 里有鸡陂，60 里有黄陂，东北 80 里有湄陂，“皆隋末废，唐复之，溉田数百顷”。7. 宿州符离县（今安徽省宿州市）“东北九十里有隋故牌湖堤，灌田五百余顷，显庆中复修”。8. 濠州钟离县（今安徽省凤阳县）“南有故千人塘，乾封中修以溉田”。9. 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市）“长安中，（县）令窦琰于故营丘城东北穿渠，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号‘窦公渠’”。10. 陈州西华县（今河南省西华）

〔1〕《元和郡县图志》（上）卷 11《河南道七》，306 页。

“有邓门废陂，神龙中，(县)令张余庆开，引颍水溉田”。[1]

物产　从贞观至景龙六七十年间，河南道充实了劳动力，推行了均田制度，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发展了农田灌溉，农业从隋末凋敝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发展时期。河南道这一时期不仅盛产粮食，桑蚕业也很发达。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三月十一日敕文：“河南、河北，桑蚕倍多。风土异宜，租庸须别。自今以后，河南、河北蚕熟，依限即输庸调。秋苗若损，唯令折租，乃为常式。”[2]河南、河北道“桑蚕倍多”，刺激了统治者的胃口。正常年景，“依限即输庸调”，赋税中应缴的粮食也改缴丝织品，只有遇到灾年，粮食歉收，两道农民才缴纳租粟。这一敕旨虽在张廷珪的异议下取消了，但它透露了此时河南道与河北道都是盛产桑蚕的地区。

唐初河南道丝织业发达。“河南、河北，桑蚕倍多。”为丝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不仅产量在各道中领先，质量也居首位。《唐六典》卷20：“凡绢（丝织品）、布（麻织品）出有方土，绢分八等，布九等。宋（治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南）、亳（治谯县，今亳州市）之绢第一等。郑（治管城县，今郑州市）、汴（治浚仪县，今开封市）、曹（治济阴县，今山东省菏泽南）、怀（治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之绢第二等”。可知河南之丝织品在10道中遥遥领先。

此外，豫（今河南省汝南一带）、青（今山东省寿光县一带）桑蚕、染业都很发达。“唐长安（701—704年）豫州人元佶居汝阳县……有一妇人，年二十二三许，甚有资质，造一大家门云：新妇不知所适，闻此须人养蚕，故来求作。”[3]这“大家”雇专人养蚕，可见并非简单的农户，其养蚕有一定的规模。“李清（青州）北海（今潍坊市）人也，代传染业……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

〔1〕《新唐书》(4) 卷38《地理二》，988页。

〔2〕《全唐文》(3) 卷269，2 733页。

〔3〕《太平广记》(9) 卷439《元佶》，3 580页。

民……时高宗永徽元年。"[1] 李清"代传染业"，经久不衰。仍"富于财"可知技艺之高。

河南道诸州物产中，郓州东阿县出产的"阿胶"久负盛名。郓州东阿县（今县名）有阿胶井，"大井在东阿，深七八丈，每岁取井水煮胶入贡。《本草》所谓'阿胶'也。"（《太平寰宇记》卷13《郓州东阿县》）阿胶至今仍是补血名药。

郑州荥阳酒也有盛名。《唐语林》卷八："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唐国史补》卷下，以"荥阳（今河南省荥阳）之土窟春"列为天下名酒。

《朝野佥载》卷六："则天如意（692年）中，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2] 前面提到洛州殷文亮能造"酌酒行觞"的木人，与此十二辰车，表明唐初河南地区科技水平已达相当高度。

唐初河南道有采矿业。莱州莱阳县（今山东省莱阳市）"黄银坑在县东一百四十里。隋开皇十八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此坑铸得黄银献之。大业末绝，唐贞观初更沙汰得之。"（《太平寰宇记》卷20《莱州·莱阳县》）蔡州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有"珉玉坑，在古息城东南五步，周回一百八十步，深三尺。其玉颜色洁白，堪为器物。隋朝官采用，贞观中亦令采取"。[3]

水上交通　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在隋末已经"船乘不绝"。隋大业末年，徐世勣参加了翟让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他对翟让说："今此土地是公与勣乡址，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郑两两郡，地管御河（即通济渠），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

〔1〕《太平广记》卷（1）36《李清》，230～232页。

〔2〕《朝野佥载》卷6。

〔3〕《元和郡县图志》（上）卷9《河南道五》，240～241页。

足以自相资助。”[1] 这说明隋朝末年通济渠繁忙的景象。唐睿宗太极元年（712 年）“敕使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通扬州。”[2] 这是疏通通济渠与淮河衔接处的措施。这透露了唐初通济渠在南北物资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河南道莱州（今山东省莱州市）是出海口。隋炀帝大业七年（611 年）“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原注：炀帝改莱州为东莱郡）造船三百艘。”[3]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 年），征高丽，“令太仆少卿萧锐于河南道诸州转运入海。至十八年八月，锐奏称：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今山东省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岛接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诏从之。于是，自河南道运转米粮，水陆相继，渡海军粮皆贮此。”[4] 看来，这次军粮的出海口可能就是莱州。高宗显庆年间征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显庆四年任青州刺史）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5] 青州与莱州均为出海口。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一、都畿地区

（一）农业

都畿地区，有黄河、洛水、伊水、汝水和通济渠通过，又是一马平川，自然条件异常优越。因此，官员、富豪之家多在这里置田庄。从开元十一年（723 年）至十六年（728 年）任东都留守的卢

---

〔1〕《旧唐书》（8）卷 67《李勣》，2 483 页。

〔2〕《新唐书》（4）卷 38《地理二·泗州盱眙》，991 页。

〔3〕《资治通鉴》（12）卷 181《大业七年》，5 654 页。

〔4〕《册府元龟》（6）卷 498《邦计部·漕运》，5 966 页。

〔5〕《朝野佥载》卷 1，16 页。

从愿[1]，在此期间，大量购置田产。开元十二年（724年）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检括逃户，得知卢从愿在任东京留守期间，广占良田，乃密白玄宗："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2]曾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任河南少尹、天宝十四载（755年）东京留守的李憕也在这一带购置大量田产。"憕丰于产业，伊川（洛阳至伊阙之间，这里有伊水流过，故名伊川，唐时未置县。今为河南省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郑岩……田产亚于憕"。[3]

唐初实行均田制度，至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已经历百余年，均田制逐渐瓦解。唐朝初年，民户寡，人口少，无主荒地广泛存在，尤其是河南、河北道，均田制适合了当时的形势。至开元、天宝之际，随着人口繁殖、民户增多（由300万户增至900万户），均田农户的土地日益缩小（下降了$\frac{1}{2}$乃至$\frac{2}{3}$），赋役负担日益加重（官吏增多、事务加繁，势必如此），他们承担不了，往往抛弃田地出逃。而大土地所有者财力雄厚，能够承担赋役，抗拒天灾人祸，而且可以扩大经营规模。

开元、天宝年间，百姓逃亡不绝于书，但从未见有大地主因赋役而逃亡的。与此相反，大地主田庄（别业）却蓬勃发展起来。上述卢从愿、李憕等广占田产就是例证。

事实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农业生产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变，即由均田农民的小规模经营居于主导地位，变为大地主田庄经营居主导地位，因而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现象。

洛阳及都畿地区，自然条件好，极其适于农作物的生长。粮食

〔1〕《旧唐书》（9）卷100《卢从愿》，3 124页。

〔2〕《新唐书》（14）卷129《卢从愿》，4 479页。

〔3〕《旧唐书》（15）卷187下《忠义下》，4 889页。

丰产自不待言。在世俗田庄发展的同时，洛阳的寺院经济也很发达。洛阳（今洛阳市）延福坊福光寺“有水碓，四轮齐转”，这一巨大的粮食加工设备，反映了这一地区粮食生产的规模。

洛阳盛产竹子。“东都崇让坊，有礼部尚书苏颋（时开元八年）竹园……此坊出大竹及桃．诸坊即细小”。[1] 开元年间进士张万顷写道：“洛阳城东伊水西，千花万竹使人迷。”[2] 洛阳牡丹此时已有盛名。洛阳宣风坊安国寺（原为崇因尼寺，景云元年（710 年）改为安国寺。）寺中“诸院牡丹特盛”。[3] 都畿地区盛产梨。“洛阳梨花落如霰”[4]“洛阳报国梨重六斤”[5]“郑州刘元礼（以船）载梨向苏州”。[6] 开元、天宝年间都畿地区的船只已通过通济渠大量驶向江南。

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元、天宝年间已采取了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郑州管城（今郑州市）有“仆射陂”，后魏孝文帝赐仆射李沖，因而得名。“天宝六载（747 年）更名‘广仁池’禁渔采”；汴州开封县（今开封市南）“有福源池，本蓬池，天宝六载更名，禁渔采”。[7] 表明开元、天宝年间，都畿地区农业经济的管理水平大为提高。

（二）洛阳：手工业和商业

洛阳　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在长安修建兴庆宫、华清宫和会昌城，因而洛阳没有大规模扩建，但也有一些土木工程。“洛阳西苑：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虑其泛溢，为

---

〔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 5，163、16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全唐诗》(6)，卷 202，2111 页。

〔3〕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 5，163、16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全唐诗》(4)，卷 119，1204 页。

〔5〕《太平广记》(9) 卷 411《六斤梨》，3 338 页。

〔6〕《文苑英华》(4) 卷 546《梨桔判》，2 791 页。

〔7〕《新唐书》(4) 卷 38《地理二》，989 页。

三陂以御之。一曰积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阳。”〔1〕外郭城“天宝二年（743年）正月二十八日筑神都罗城。号曰‘金城’。”〔2〕

手工业　洛阳的手工业很发达。东都（今洛阳市）织锦坊为官营手工业。开元二年（714年）七月敕：“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造作锦绣珠袍，织成帖绦二色绮、绫、罗，作龙凤、禽兽等异文字及坚栏锦文。”（《唐大诏令集》卷108《禁奢侈服用敕》）这就是说，织成有龙、凤、麒麟、虎等图样，并有珍珠饰物的锦，可知当时丝织业水平之高。前面提到长安的“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看来东都织锦坊巧儿数目当不在此下。私营织染业者也大有人在。“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洛阳缙绅旧闻记》卷4《洛阳染工见冤魂》）

商业　洛阳的北市、南市、西市仍很繁华。储光羲（开元、天宝时人）在《洛阳道五首》中写道：“洛水照千门……走马游新市”〔3〕所谓新市即北市。据《唐两京城坊考》卷5云：“北市，本临德坊，显庆中立为北市。”高宗显庆年间，距开元、天宝年间，时间很近。《朝野佥载》卷3：“河南府（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从储光羲“走马游新市”，到商胡祈福的盛况，可知开元、天宝年间，洛阳商业的繁盛。

都畿地区的手工业

河南府产白瓷。《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河南府：“开元贡白瓷器”。看来其窑址在河南府巩县（今县名）。1959年发表的《河南巩县古窑址调查纪要》：“发掘表明，当地生产碗、瓶、

〔1〕《唐两京城坊考》卷5，《神都苑》，144页。

〔2〕《唐会要》卷86《城郭》，1 584页。

〔3〕《全唐诗》(4) 卷139，1 417页。

盘、壶、罐、枕等大量白瓷，仅白瓷碗就有十一种类型。”[1]

河南府还产金、银、铜、锡。河南府伊阳县（今嵩县西南）“有太和山，有银、铜、锡。伊水有金”。[2]开元十五年（727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3]陕州平陆县（今三门峡市西北）“有银穴三十四，铜穴四十八，在覆釜、三锥、分云等山”。[4]

（三）水上交通

东都洛阳，是全国的水利枢纽。通济渠（汴河）沟通黄河、淮河，以至长江；而黄河又与渭水沟通，可通西京长安。玄宗在《幸东都诏》中指出：洛阳“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黄）河、淇（淇水，在河北道卫、相二州）之运”，[5]这就是说，洛阳可通过通济渠与长江沟通；而又可通过黄河、淇水与河北沟通。从而将南北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

开元、天宝年间，在都畿地区改善漕运。

江淮漕运，经汴河至板渚（河口），再经洛水，输至洛阳含嘉仓，是顺畅的。然而，从河口运至陕州太原仓，却不顺利。这是因从河口须经黄河至陕州，其间有“三门底柱之险”，常遭“风波覆溺”。开元元年（713年）至三年（715年）任河南尹的李杰为陆运使，“从（洛阳）含嘉仓至（陕州）太原仓，置八递场，相去每长四十里。每岁冬初起运八十万石，后至一百万石。每递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交两月而毕”。[6]洛陕之间300里陆运，运费昂贵，又极为不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由裴耀卿主持汇淮漕运。他采取分段运输法。首先“罢陕陆运”。在河口置河阴仓《元

〔1〕《文物》1959年第3期。

〔2〕《新唐书》（4）卷38《地理二》，984－985页。

〔3〕《新唐书》（5）卷54《食货四》，1383页。

〔4〕《新唐书》（4）卷38《地理二》，984－985页。

〔5〕《全唐文》（1）卷28，323页。

〔6〕板渚是黄河与汴河的交汇处，又是汴河的起点，故称为汴河口。

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河阴县（今广武），本汉荥阳县地，开元二十二年以地当汴河口，分汜水、荥泽、武陟三县地于输场东置，以便运漕”。“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河阴）仓而去”。于河清县（今济源县）置柏崖仓。在“三门峡”东置集津仓。在三门峡“凿山十八里以陆运”。在三门峡西置盐仓。这样，江淮运漕粟米，从河阴，经黄河运至柏崖仓、集津仓。再从集津仓，经18里陆运，至盐仓。这样，就避开了水运中的“三门底柱之险”，同时，陆运之程也从300里减至18里，大省运费。此后，又经黄河输至陕州陕县（今三门峡市）“太原仓”，“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

与此同时，“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以上河东道）、魏、汴、邢、贝、济、博（以上为河北道）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崔、萧二人主持下又将漕运向北拓展。

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不仅便于江淮租粟输往京师，也便于河东（今山西省）、河北道的租粟输往长安。“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车或驮费用）三十万缗”。[1]

二、河南道诸州

唐前期河南道（包括都畿道）人口增长最多，在唐初十道中列居第一。

贞观六年（632年）魏征指出：“今自伊（水）、洛（水）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难。”[2]这说明当时自洛阳以东至山东半岛的广大河南地区人口极为稀少。但经过百余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河南道包括都畿道）民户在唐初10道中跃居首位。

---

〔1〕《新唐书》(5)，卷53《食货三》，1366页。

〔2〕吴兢：《贞观政要》卷2，7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天宝十二载河南、都畿道户口占全国的比例

全国总户数	河南（含都畿）道户数	占百分比
9 021 226	1 893 130	21%
全国总口数	河南（含都畿）道口数	
50 817 094	11 373 834	22%

说明：依据《旧唐书·地理志》统计，详见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9 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河南道（含都畿道）在户口增长比例上亦居全国之首位。从贞观十三年（639 年）至天宝十二载（753 年）全国民户从 3 003 202 增至 9 021 226，增长了 200%；人口则从 12 311 698增至 9 021 226，增长了 312%。而河南道（含都畿道）则从 310 434 户增至 1 893 130 户，增长了 510%；从 1 318 429 口，增至11 373 834口，增长了 762%。不仅为 10 道之首，而且大大超过了全国增长的比例。

在河南道诸州中，尤以汝、陈、亳、颍、宋、曹、郓、兖 8 州增长最多。请看下表。

贞观十三年与天宝十二载各州户口比较表

州名	贞观十三年		天宝十二载		增长百分比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汝州	3 884	17 534	69 374	273 756	1 686.1	1 461.3
陈州	6 367	30 961	66 442	402 486	944.0	1 199.9
亳州	5 790	33 177	88 960	675 121	1 436.4	1 935.0
颍州	2 905	14 185	30 707	202 890	957.0	1 330.7
宋州	11 303	61 720	124 268	897 041	999.4	1 353.4
曹州	9 244	54 981	100 352	716 848	985.6	1 205.4
郓州	4 141	21 692	44 299	284 530	969.8	1 215.7
兖州	9 366	15 428	88 987	580 608	850.1	3 663.3

说明：依据《旧唐书·地理志》统计，详见《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 223～225 页。

上述 8 州从贞观十三年（639 年）至天宝十二载（753 年），人

口竟增长了10倍甚至10多倍！只此一点，就足以看出河南地区在当时全国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还要指出，在天宝年间全国各道中，河南道民户在10万户以上的有4州：洛州（河南府）194 746户；汴州（治浚仪县，今开封市）109 876户；宋州（治宋城县，今商丘）124 268户；曹州（治济阴县，今山东省曹县）100 352户。[1]仅次于河北（有5州）居第二。

河南水利资源丰富，在开元、天宝年间，河南地区的州刺史和县令重视水利事业。《新唐书》卷38《地理二》：

> 兖州莱芜（今山东省莱芜）西北十五里有普济渠。开元六年（县）令赵建盛开。
>
> 海州朐山（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与东海县之间）东二十里，有永安堤，北接山，环城十里以捍海湖。开元十四年，刺史杜令昭筑。

蔡州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西北五十里有隋故玉梁渠。开元中（县）令薛务增濬，溉田三千余顷”。

此外，朝廷还在河南推广水稻种植。张九龄自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任宰相。“九龄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2]后由于“甚役功庸”罢屯田，将耕地分给百姓。“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夏四月庚戌诏曰：“陈（治宛丘县，今河南省淮阳）、许（治长社县，今许昌市）、豫（治汝阳，今县名）、寿（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本开稻田，将利百姓，度其收获甚役功庸，何如分地均耕，令人自种？先所置屯田，并定

---

〔1〕《旧唐书》卷（5）38《地理一》洛、汴、宋、曹等四州之“天宝领”，1 421、1 433、1 440、1 441页。

〔2〕《旧唐书》(9) 卷99《张九龄》，3 099～3 100页。

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1〕

开元、天宝年间河南道诸州户口繁多，劳动力充实，加以兴修水利、推广水稻种植，故农业十分发达。开元十三年（725年）“是岁，东都米计十五钱，青（治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县一带）齐（治历城，今山东省齐河）五钱，粟三钱。”〔2〕至天宝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3〕这说明开元、天宝年间，在粮价普遍下降之中，青、齐等州的粮价尤低，这透露了河南农业的盛况。

这一地区还盛产蚕桑。开元时人张鹭指出：“寿安（今河南宜阳县）、永宁（今河南洛宁县）……桑枣成林。”〔4〕早在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三月十一日的敕文就指出：“河南、河北，桑蚕倍多。风土异宜，租庸须别。自今以后，河南、河北蚕熟，依限即输庸调。秋苗若损，唯令折租，乃为常式。”〔5〕这就是说，正常年景“依限输庸调”，即输丝织品，只有遇到灾年，两道农民要将应缴的丝织品折米粟缴纳。它透露了河南、河北道的桑蚕业的发达。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进一步规定：“以关辅寡蚕，诏纳米粟，其河南、河北非通漕州，皆调绢，以便关中。”〔6〕这就是说，因关中寡蚕，因而其应缴纳的丝织品折米粟缴纳，而河南、河北非通漕州，除了应缴纳的庸调（丝织品）外，本应缴的米粟也改为丝织品缴纳。这进一步证明了开元、天宝年间河南道盛产蚕桑。

在河南道诸州中，尤以青州（今山东潍坊市一带）和青州北海县（潍坊市）所产丝织品数量多、质量佳。独孤及在《故睢阳太守

〔1〕《册府元龟》(6) 卷503《邦计部·屯田》，6 036页。
〔2〕《资治通鉴》(14) 卷212《开元十三年》，6 769页。
〔3〕《新唐书》(5) 卷51《食货一》，1 346页。
〔4〕《全唐文》(2) 卷173，1 762页。
〔5〕《全唐文》(3) 卷269，2 733页。
〔6〕《新唐书》(4) 卷37《地理一·关内道》，961页。

赠秘监李公神道碑》中说李少康为青州刺史（时在开元十六年）“于时海岱（岱，即岱宗，指泰山而言）贡篚，衣履天下”。[1]此地丝织品既是贡品数量也多，可以“衣履天下”。《太平广记》卷300《三卫》：开元初，“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匹）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北海）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由此可知北海县之绢质量之高。

河南道诸州还产名酒和好纸。《唐国史补》卷下：“酒（之著名者）有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之‘土窟春’……”“纸则……宋（治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市）、亳（治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素栏’、‘朱丝栏’，又有茧纸。”[2]

蔡州（原为豫州，宝应元年改为蔡州）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有珉玉坑，“其玉颜色洁白，堪为器物”。贞观年间曾令采取，“其后为淮水所没。开元中，淮水东移，珉坑重出，其玉温润倍胜昔时。蔡州至今以为厥贡之首。”[3]

开元初年海州东海县（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人马待封，是能王巧匠。朝廷的“指南车、记里鼓、相风鸟等，待封皆修改，其巧逾于古”。指南车、记里鼓等早已有之，但马待封加以改进，“其巧逾于古”不仅如此，还制造能动作的木人。“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中栉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

〔1〕《文苑英华》(6) 卷899《碑》，4 730页。

〔2〕按：(唐) 李肇：《唐国史补》，所载“都是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间的事情。”

〔3〕《元和郡县图志》(上) 卷9《河南道五蔡州》，240～241页。

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阖。”[1]马待封当时竟能制造如此巧妙的木人，与前面提到洛州殷文亮所造能“酌酒行觞”的木人，表明河南地区科技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1]《太平广记》(5) 卷226《马待封》，1 739－1 740页。

第三章　河北道

唐代河北道极为辽阔，北起大兴安岭以北，南至黄河，西起太行山，东至库页岛。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河北道分为河北道北部和河北道南部两部分。

河北道北部，包括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松漠都督府、饶东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平高丽国，“拔平壤城”（今朝鲜平壤）。“高丽国旧分为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治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以统之”。[1]由于河北道北部现存社会经济资料所限，这里着重介绍河北道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

河北道南部河流纵横，有漳水、滹沱水，以及隋代开凿的永济渠。永济渠的起点在黄河北岸的沁水入河处（在今河南省武陟县境），从此北经卫、相、魏、贝、德、沧、至幽州蓟县（今北京市）。

在唐代，河北道南部地区（除今河北省以外，还包括河南安阳地区和山东省德州、惠民一带）人口密集、经济繁盛。但其东部渤海沿岸人口相对稀少，开发不足。

---

〔1〕《旧唐书》（16）卷199上《东夷》，5 327页。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在隋代，河北与河南人口占全国总数的54%，因而，河北与河南是隋代经济繁盛的基础。河北的人口仅次于河南，居全国第二位。然而，在隋末及唐初的战乱中，河北地区的人口大为减少，社会经济也凋敝下来。与河南相比，河北地区情况稍好。唐朝初年开始恢复经济。

隋末至唐高祖武德初年，河北道诸州人口大为减少，经济凋敝。高祖于武德六年（623年）《简徭役诏》："大河南北，乱离永久，师旅荐兴，加以饥馑，百姓劳敝，此焉特甚。"（《唐大诏令集》卷111）

河北道，这一地区在隋代，民户之多仅次于河南，列全国第二位。隋大业五年（609年）这一地区的民户为2 143 174，贞观十三年（639年）只有339 445户，仅为隋大业五年的16%。[1]

一、农业

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在河北道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1．贞观（627—649年）中，贾敦颐任瀛州（治河间县，今河北省河间县）刺史，"州濒滹沱、滱二水，岁溢溢，坏室庐，浸沏数百里。敦颐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2]

2．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至永徽元年（650年）薛大鼎任沧州（治清池县，今河北省沧州市）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

---

〔1〕隋大业5年户口数见《隋书·地理志》；唐贞观十三年户口数见《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参见翁俊雄著《唐初政区与人口》，第59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2〕《新唐书》（18）卷197《循吏·贾敦颐》，5 622页。

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决长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1]

3. 沧州清池县（今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济堤二，永徽二年（651年）筑。西四十五里有明沟河堤二、西50里有李彪淀东堤及徒骇河西堤，皆（永徽）三年筑”。

4. 赵州平棘县（今河北省赵县）“东二里，有广润陂，引太白渠以注之；东南二十里有毕泓，皆永徽五年（654年）县令弓志元开，以畜泄水利”。

5. 冀州南宫县（今河北省南宫市）“西五十九里，有浊漳堤；显庆元年（656年）筑；有通利渠，延载元年（694年）开”。

6. 恒州获鹿县（今河北省山西鹿泉县）“东北十里有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溉田，总章二年（669年）自石邑西北引太白渠支流入真定界以溉田”。

7. 相州安阳县（今河南省安阳市）“西二十里有高平渠，刺史李景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咸亨三年（672年）开”。

8. 相州邺县（今安阳市北）“南五里有金凤渠，引天平渠下流溉田，咸亨三年开”。

9. 相州尧城（今安阳市东）“北四十五里有万金渠，引漳水入故齐都领渠以溉田，咸亨三年开”。

10. 相州临漳县（今河北省临漳县南）“南有菊花渠，自邺引天平渠水溉田，屈曲经三十里。又北三十里有利物渠，自滏阳下入成安，并取天平渠水以溉田。皆咸亨四年（县）令李仁绰开”。

11. 赵州宁晋县（今河北省宁晋县）“西南有新渠，高宗上元（674—676年）中（县）令程处默引洨水入城以溉田，（所）经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甘”。

---

〔1〕《旧唐书》（15）卷185上《良吏上·薛大鼎》，4 787～4 788页。

12. 赵州昭庆县“城下有洋水渠，仪凤三年（678 年）（县）令李玄开，以溉田通漕”。

13. 德州平昌县（今山东省怀仁县南）“马颊河，久视元年（700 年）开，号新河”。

14. 蓟州渔阳（今河北省蓟县）“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水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705—707 年）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

15. 贝州经城（今河北省巨鹿县东）“西南四十里有张甲河，神龙三年（707 年）姜师度因故渎开”。[1]

16. 韦景骏，神龙中，为洺州肥乡县（今河北省肥乡县）令。“县北漳水，连年泛溢，旧堤迫近水漕，虽修筑不息，而漂流相继。景骏审其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暴水至，堤南以无患；水去，而堤北称为腴田”。[2]

自贞观中至神龙三年，在 50 年中，修筑了近 20 项水利工程，几乎遍布河北道各州。这对河北道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初河北道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作物品种也在增多。

“裴行方，永徽（650—655 年）中为检校幽州（今北京市）都督，引泸沟水广开稻田数十顷，百姓赖以丰给”。[3]

“卫州共城县（今河南省辉县）百门陂，在县西北五里，方五百许步，百姓引以溉稻田，此米明白香洁，异于他稻，魏、齐以来，常以荐御。”[4] 透明、白洁、饭香，说明此地所产的稻米质量之高，北魏、北齐以来往往作为贡品，供奉朝廷。前面提到张九龄在开元二十一年“教河南数州水种稻”则比河北为晚。

---

〔1〕《新唐书》（4）卷 39《地理三》，1 011～1 018 页。

〔2〕《旧唐书》（15）卷 185 上《良吏上·韦景骏》，4 797 页。

〔3〕《册府元龟》（6）卷 497《邦计部，河渠》，5 950。

〔4〕《元和郡县图志》（上）卷 16《河北道》，462 页。

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一月十六日，太宗“过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一带）境，司马陈元琦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1]可知当时河北在冬季已有暖房种菜的技术。

隋、唐初河北已有种植“林檎”的记载：

“王梵志，卫州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2]

“贞观中，顿丘县（今河南省内黄县，属河北道）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时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奈，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3]

“唐永徽（650—655年）中，魏郡临黄（今河南省范县东南，属河北道）王国村人王方言，尝于河中滩上，拾得一小树栽，埋之，及长，乃林檎也。”[4]

何谓林檎？现今日语中的汉字“林檎”，意为苹果。然近日报载“据说太约150年前，英国人将原产于欧洲的苹果传播到了中国。中国栽培苹果的历史要比日本悠久。”（《参考消息》1997年10月17日载《“富士”跨海富民来》一文）。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唐初在今河南省浚县至范县一带种植的林檎，似乎是沙果一类的果品，亦未可知。

这一时期的河北道，不仅盛产粮食和农副产品，而且桑蚕业也很发达。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三月十一日敕文：“河南、河北，桑蚕倍多。风土异宜，租庸须别。自今以后，河南、河北蚕熟，依限即输庸调。秋苗若损，唯令折租，乃为常式。”[5]河南、河北道“桑蚕倍多”，刺激了统治者的胃口。正常年景，“依限即输庸调”，只有遇到灾年，粮食歉收，两道农民要用丝织品折租粟。这一敕旨

---

〔1〕《资治通鉴》(13) 卷198《贞观十九年》，6 231页。

〔2〕《太平广记》(2) 卷82《王梵志》，525页。

〔3〕《朝野佥载》卷3，68页。

〔4〕《太平广记》(9) 卷410《文林果》，3 330页。

〔5〕《全唐文》(3) 卷269《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2 733页。

虽在张廷珪的异议下取消，但它透露了此时河北道与河南道都是盛产桑蚕的地区。

二、手工业、商业

纺织　“唐定州（治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何明远，大富……家有绫机五百张。”[1]家有织绫机500张，显然是个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这在唐代是很少见的，也透露了此时河北丝织业的发达。

金银作　“唐定州安嘉县（应为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绢五百匹……珍以咸亨五年（674年）入海运。”[2]

盐　“钜鹿（今河北省巨鹿县）有大陆泽，有咸泉，煮而成盐”。[3]沧州盐山县（今河北省盐山县北、海兴县西）“有盐”[4]

铁　“相州林虑县（今河南省林县，唐代属河北道）林虑山在县西二十里。山多铁，具有铁官”。[5]邢州沙河县（今河北省沙河市）“有铁”[6]

建筑　隋代工匠李春于开皇、大业年间（590—608年）设计建成安济桥，一般称为赵州桥。“赵州（治平棘县今河北省赵县）石桥甚工，磨砻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有石狮子。龙朔（662—663年）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而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7]

以上数例反映了唐初河北道手工业的高水平。

---

〔1〕《朝野佥载》卷3，75页。

〔2〕《太平广记》(3) 卷134《王珍》956页。

〔3〕《新唐书》(4)，卷39《地理三》，1013、1017页。

〔4〕《新唐书》(4)，卷39《地理三》，1013、1017页。

〔5〕《元和郡县图志》(上) 卷16《河北道一》，456页。

〔6〕《新唐书》(4) 卷39《地理三》，1013页。

〔7〕《朝野佥载》卷5，119页。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显庆（656—661年）中，奉使于临渝关牙市。”[1]临渝关，即今河北省榆关，在秦皇岛市西，唐属营州（治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所谓牙市即边界贸易场所。营州临渝关，地当要冲，是关内外咽喉，而东则与新罗、日本隔海相望。这里往往有渤海、契丹、靺鞨、奚以及新罗、日本商人前来货贸。“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2]有理由认为，安禄山曾在临渝关牙市为互市牙郎。这也透露出，唐前期临渝关乃北方的一个互市口岸。

贞观十九年（645年）“将有事于辽东”，唐太宗“择人运粮”，因而对韦挺说：“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市）以北，辽水二千余里，无州县，军行资粮无所取给，卿宜为此使。”[3]可知贞观末年，“辽水二千余里”未置州县。此后有了很大的变化。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上元三年（676年）二月（内撤），移安东府于辽东郡故城（即辽东城，今沈阳市）置”。[4]此时唐朝的州县建置向东北大大推进了一步，至今辽宁省沈阳市一带。

唐在河北道北部置黑水、室韦、渤海、松漠、饶乐等都督府分统之。

---

〔1〕《太平广记》（3）卷127《馆陶主簿》，900页。

〔2〕《旧唐书》（16）卷200上《安禄山》，5 367页。

〔3〕《旧唐书》（8）卷77《韦挺》，2 670页。

〔4〕《旧唐书》（5）卷39《地理二》，1 526页。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唐前期河北道人口增长迅速，在唐初十道中仅次于河南道，列居第二。

天宝十二载河北道户口占全国的比例

全国总户数	河北道户数	占百分比
9 021 226	1 479 324	16%
全国总口数	河北道口数	
50 817 094	9 998 727	20%

说明：依据《旧唐书·地理志》统计，详见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219页。

值得注意的是，从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全国民户从3 003 202增至9 021 226，增长了312%。而河北道则从339 445户增至1 479 324户，增长了335%；从1 461 780口增至9 998 727口，增长了584%。

在河北道诸州中，尤以相、魏、博、贝、冀、沧、德、平、顺等9州，相当于今河北省中部、南部，增长最多。

贞观十三年与天宝十二载各州户口比较表

州名	贞观十三年		天宝十二载		增长百分比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相州	11 490	74 766	101 142	590 196	780.2	689.4
魏州	30 440	136 612	151 596	1 109 870	398.0	712.4
博州	7 682	37 394	52 631	408 252	585.1	991.8
贝州	17 719	90 079	110 015	834 757	520.9	826.7
冀州	16 023	72 733	103 885	830 520	548.3	1 011.8

州名	贞观十三年		天宝十二载		增长百分比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沧州	20 052	95 796	124 024	825 705	518.5	762.0
德州	10 135	52 141	83 311	659 855	722.0	1 165.5
平州	603	2 542	3 113	25 086	416.3	915.1
顺州	81	219	1 064	5 157	1 213.6	2 254.8

说明：依据《旧唐书·地理志》统计，详见《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226~227页。

上述9州，从贞观十三（639年）至天宝十二载（753年），人口竟增长五倍以上（除魏、平2州户数不及五倍）！这透露出，在此期间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农业

开元年间，河北道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1. 莫州任丘县（今县名）“有通利渠，开元四年（716年），（县）令鱼思贤开，以泄陂淀，自县南五里至城西北入滱（水），得地二百余顷”。

2. 冀州堂阳县（今河北省新河）“西十里有漳水堤，开元六年筑”。

3. 沧州清池县（今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西北六十里有衡漳东堤，开元十年（722年）筑”。

4. 沧州南皮县（今县名）“古毛河，自临津经县入清池，开元十年开”。

5. 赵州柏乡县（今县名）“西有千金渠、万金堰，开元中，（县）令王佐所浚筑，以疏积潦”。

6. 沧州东光县（今县名）“南二十里有靳河，自安陵入浮河，开元中开”。

7. 沧州清池县（今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西南五十七里有

无棣河；东南十五里有阳通河，皆开元十六年（728年）开”。

8. 瀛州河间县（今河北省河间市）“西南五里有长丰渠，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刺史卢晖自束城、平舒引滹沱东入淇（水）通漕，溉田五百余顷”。

9. 魏州贵乡（今河北省大名以北）“有西渠，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刺史卢晖徙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1] 江淮之货通过永济渠运往河北各地，这一点值得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自贞观年间至开元末年，河北道修筑了30余项水利工程，这在唐代是绝无仅有的，为河北道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河北道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唐初实行的均田制度，经过百余年，已经不适于经济发展的形势，开始瓦解，高宗以后各地出现逃户现象，虽在开元九年（721年）经宇文融“括户”，逃户问题暂告一段落。然而，此后“流庸更滋”。[2] 开元中段崇简任深州（治陆泽，即今河北省深州市）刺史，“性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每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讫，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匹，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今河北省束鹿以北）……”[3] 段崇固贪暴，但是，他这样做，也透露了当时逃户现象的普遍。除了丧失土地之外，有的逃户宁愿出售或放弃均田制中分配的土地，作为“客”，投奔地主，成为佃农或雇农，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多，农户土地

---

〔1〕《新唐书》(5) 卷39《地理三》1 494、1 514、1 504、1 507、1 508、1 513页。

〔2〕翁俊雄：《开元、天宝之际的逃户》（《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146～149页。）

〔3〕《朝野佥载》卷3，77页。据《唐刺史考》第1 321页载：段崇简于开元中任深州刺史，开元十八年（730年）罢任，改授定州刺史。

势必愈益减少，而赋役负担不仅未减少，反而日益增多，这样，他们宁愿弃地出逃，成为佃农。这说明，地主田庄的经营方式，更适合当时经济发展的形势。“天宝（742—755年）中，相州王叟，家邺城（今河北省磁县南），富有财……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1]王叟庄宅之广，竟能容纳客户200余户，可知是个大土地所有者。以上说明，至开元、天宝年间，河北道正经历着农业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

随着人口的增长、农田水利的发展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至开元、天宝年间，河北道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进入有唐一代的全盛时期。

《唐语林》卷3：开元初，“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库）；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库）”。所谓“河北诸道”，可能是河北、河南道之简述。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2]无论如何，开元年间，河北道盛产粮食，提供的“租庸”，是国家仓库的主要来源之一。前面提到，“相州王叟”，“家有积粟近至万斛”。参看杜甫《忆昔诗》中所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无稽之谈。

河北道除盛产粮食之外，还盛产丝织品。开元初年，工部员外郎赵务将蒲州（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陕州（治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之布（麻布）运往渔阳（今河北省蓟县），充驻在该地的“渔阳军”军粮。而将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市）、易州（治易县，今河北省易县）之缣（丝织品，是绢的一种）运往长安，入国库。百姓深感不便，他们认为，应反过来，将幽、易的绢就近输往渔阳；而将蒲、陕之布运往长安，这要方便很多。赵务声

〔1〕《太平广记》(4) 卷165《王叟》，1 210页。

〔2〕《全唐文》(1) 卷31，346页。

称："布是粗物，将以供军；绢是细物，宜贮官库。"[1]由此可知、幽、易二州桑蚕之发达，为丝织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唐六典》卷3《户部》载河北道诸州之贡品：

相州（治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贡罗绫、平绸、丝布、丝绸。

恒州（治真定，今河北省正定）贡春罗、孔雀罗等。

定州（治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州市）贡两窠绸、绫。

博州（治聊城，今山东省聊城东北）、魏州（治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以北）贡平绸。

卫（治汲县，今河南省汲县）、赵（治平棘县，今河北省赵县）、莫（治莫县、今河北省任丘市鄚州镇）、冀（治信都，今河北省冀州市）等州贡（丝）绵。

瀛（治河间，今河北省河间）、深（治陆泽县，今河北省深州市）、冀、德（治安德县，今山东省陵县）、棣（治厌次县，今山东省惠民以南）等州，贡绢。

邢州（治龙冈县，今河北省邢台市）贡丝布。

恒州（治真定，今河北省正定）贡罗。

定州（治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州市）贡绸绫。

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市）贡"范阳绫"

河北十数州所产绫、罗、绸、绢等丝织品质量很高，因而每年作为贡品，"输于王府"，而且数量很大。陈鸿祖在《东城父老传》中指出："见张说之领幽州也（张说在开元六年至八年任幽州节度使）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冀州（治信都县，今冀州市）庸调缯布（丝织品的总称），驾辖连轨，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2]江

〔1〕《全唐文》(2) 卷172，1 755页。

〔2〕《全唐文》(8) 卷720，7 414页。

淮和巴蜀所产的绮縠、锦绣这些高级丝织品，只能当做后宫的玩好而已，而宫廷所需大量的丝织品，全靠河北道诸州进贡。由此可知河北道丝织品数量之大。

河北道经济作物也很繁盛。高适在《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一诗中写道："昔余涉漳水，驱车行邺（邺县，今河南省安阳市北）西，遥见林虑山……秋韭何青青？药苗数百畦。栗林隘谷口，栝树森回谿。"[1]。除蔬菜以外，所见"药苗"、栗树林，说明了这一点。李华在天宝十载（751年）所撰《安阳县令厅壁记》中指出："河北贡篚（装着贡品的竹筐）、征税，半乎九州。"[2]可知河北道的地方特产不少。

二、城市、手工业和商业

魏郡（魏州，天宝元年改为魏郡治贵乡县，今河北省魏县东）李白在《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诗中写道：

魏郡接燕赵，美女夸芙蓉。
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
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
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3]

苏明府，指苏晋，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任魏州刺史。魏州于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魏郡。李白此诗可能作于天宝初年。亦未可知。从诗中"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可知开元、天宝时魏州州城贵乡县的繁况，民户多达"万室"，天下豪贵多到此一游。

《唐会要》卷八七《漕运》载："（开元二十八年）九月魏州刺史卢晖开通济渠（?），白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桥，夹州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太平寰宇记》卷五四《魏州》载此事则

〔1〕《全唐诗》(6) 卷212，2 202页。
〔2〕《文苑英华》(5) 卷804，4 252页。
〔3〕《全唐诗》(5) 卷174，1 781页。

称："开元二十八年九月刺史卢晖移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按：魏州境内有永济渠流过，而无通济渠，《寰宇记》为是。从此条记载可知，当时江淮之货已经通过永济渠大量输往河北。正因如此，魏郡才能如此繁华。

有段碧者，"天宝五载（746年）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1]由此可知，当时魏郡市上，有胡商，经营药材等物。

清河郡（贝州，天宝元年改为清河郡。州治在清河县，今河北省清河西）

天宝末年（755年）李华（后改名萼）指出：清河郡"编户七十万，见丁十余万"。[2]这是有问题的。《旧唐书》卷三九《地理二》贝州"天宝，户十一万零十五，口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七"这一组数字，应为天宝十二载（753年）的[3]。贝郡所属9县，天宝十二载全州民户总共只有11万余，。绝对达不到70户。所谓"丁"，指21～59岁壮年男子，一般而言，一户平均只有一丁，一户两丁是较少的。70万户，只有10余万丁，也不成比例。因此《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756）年》载此事时改为"户七万，口十余万"。这一改动虽较合理，但是，看来《旧唐书》所载最为可靠。事实可能是："七十万"衍"七"字，而不是衍"十"字。尽管如此，贝郡当时堪称河北大郡。

清河郡还是唐朝北方储存军需的重地。李华指出："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为天下北

〔1〕《太平广记》(1) 卷28《郗鉴》，182页。

〔2〕《全唐文》(6) 卷514《颜鲁公行状》，5 226页。

〔3〕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18—1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库。今所贮者有江东布三百余万匹　河北租调绢七十余万，当郡（清河郡）彩绫十余万；累年税钱三十余万（缗）；仓粮三十万（石）。”就说明了这一点。

深州饶阳县（今县名），虽不是州治，也是大县。乔谭（天宝时人）在《饶阳县令厅壁记》中指出：“广轮七十里，编户二万计”，人口之多，以至“行或击毂，市或驾肩”[1]

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市）

据房山云居寺保存〈石经〉资料显示，仅幽州一地，可以考知的“行会”名目，就有30多种。其出现于唐前期的，有白米、大米、屠、布、绢、大绢、小绢、小彩、丝帛、幞头等行。可知手工业、商业之发达。[2]

营州（治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隋柳城郡，武德元年（618年）改为营州总管府。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为契丹首领李万荣攻陷。神龙元年（705年）“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今河北省蓟县）安置。开元五年（717年）奚、契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故城……乃诏（宋）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骑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治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南）、青（治益都县，今山东省益都）等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3]至开元末年，营州经济更加发展。樊衡指出：“自开复营州，二十年内，部落不耸，安农互商，金帛山积，我国家之于惠贷亦深矣。”[4]由上可知，开元年间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不仅广开屯田，增加粮

〔1〕《全唐文》（5）卷451，《饶阳县令厅壁记》，4 613页。

〔2〕曾教公：《在北京石刻中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3〕《册府元龟》（9）卷692《牧守部·招辑》，8 255页。

〔4〕《全唐文》（4）卷352，3 569页。

食生产，而且有不少胡商来此贸易，官府还为他们设立店肆，出现了“安农互商，金帛山积”的盛况。

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下高丽，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反，大祚荣与靺鞨乞四北羽聚众东走，阻险自固。后又被迫率其众东据东牟山（今吉林省敦化一带），筑城居之。高丽、靺鞨人稍稍归之，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正式归唐，玄宗“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1]这说明开元初年唐在东北地区进一步拓展至今吉林省敦化一带。

[1]《资治通鉴》（14）卷210《开元元年》，6 680页。

第四章　河东道

唐代河东道，相当于今山西省全境。

河东道北部有桑干河、中部、南部有汾水贯通。

河东道北部“自代州（治雁门县，今山西省代县）、云（治云中县，今山西省大同市）、朔（治善阳县，今山西省朔县）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纵有编户亦染戎风。”（《太平寰宇记》卷47《代州》）

河东道中部、南部，有并、蒲、绛、晋等州。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升蒲州为河东府。开元十一年升并州为大原府，天宝元年（742年）又升为‘北京’，与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并称‘三京’。并州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受到如此重视，早在高祖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就指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1]这是指隋朝末年，李渊在晋阳县（今山西省太原市）[2]起兵而言。

河东道地位的重要不仅如此，还因为其地理位置重要。唐宪宗《授张弘靖大原节度使制》中指出：“全晋山河，陶唐风俗，外以威怀七狄，内以承卫二京（指西、东二京）。”[3]而沈亚之在《河中

---

〔1〕《资治通鉴》(13) 卷187《武德二年》，5 868页。

〔2〕唐初之并州，原为隋之河东郡，其州城名晋阳，而州城内有古晋阳城遗址。隋文帝又将太原县的机构移于州城内的古晋阳遗址之上。这样，唐代的太原、晋阳二县的县治皆在一城之内。正因如此，李渊起兵晋阳，而李世民说：“太原，王业所基。”

〔3〕《文苑英华》(3) 卷452《翰林制诏》，2 294页。

府参军厅记》中指出："蒲（州）河中（府）界三京（西、东、北三京），左雍（州）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即京兆府），故其地益雄。"[1] 河东是唐朝政治中心的屏障。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一、农业

隋末、唐初，河东农业发达。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就指出："河东富实，京邑所资"。[2] 看来唐初河东的粮食源源不断供应京师。唐初李世民讨王世充，以李袭誉摄潞州（治上党县，今山西省长治市）总管"委之转运，以馈大军"。[3] 讨王世充时，唐军的军粮亦大部出自河东。

唐初全国统一以后，河东道大兴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唐高祖武德初，窦静为并州（治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上表，请于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馈运……竟从静议。岁收十万斛。高祖嘉之。六年（623年），秦王又奏请益置屯田于并州界，高祖从之"。[4]

张俭于贞观元年（627年）至四年（630年）为朔州（治善阳县，今山西省朔州市）刺史，"广营屯田，岁致数十万斛，边粮益饶，及遭霜旱，劝百姓相赡，遂免饥馁，州境独安"。[5]

唐初河东道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

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东）"西十里有常渠，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汾州刺史萧头引文水南流入汾州（治隰城，今山西省

---

〔1〕《文苑英华》（5）卷804《记》，4 251页。

〔2〕《资治通鉴》（13）卷187《武德二年》，5 868页。

〔3〕《册府元龟》（6）卷498《邦计部·漕运》，5 966页。

〔4〕《册府元龟》（6）卷503《邦计部·屯田》，6 035～6 036页。

〔5〕《册府元龟》（6）卷503《邦计部·屯田》，6 036页。

汾阳)。”

文水县西北二十里，有栅城渠。“（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民相率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1]

并州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西一里有晋渠。“西自晋阳县界流人。汾（水）东地多咸卤，并不堪食。贞观十三年（639年），（并州）长史英国公李勣乃于汾河之上引决晋渠历县经廛，又西流入汾水”。[2]解决了晋阳百姓的饮水问题。

晋州临汾县（今山西省临汾）“东北十里有高梁堰。武德(618—626年）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

绛州龙门县（今山西省河津县）“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一年（637年）筑”。“（县）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县）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

绛州曲沃县（今山西省曲沃）“东北三十五里有新绛渠，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县令崔翳引古堆水溉田百余顷。”[3]

河东道盛产粮食，唐前期“河东、陕运两使，每年常运一百八十万石米送京。”[4]直到开元中，由于关内道粮食已经自足，才停止了河东、陕运使向京师运米。

农副产品：

水稻　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隋开皇十年（590年）改受阳县为文水县，因县西文水为名。天后朝以枌榆故邑又改为武兴县。神龙元年（705年）复为文水县。县城宽太，约有三十里，百姓于城中种水田”。（《太平寰宇记》卷40《并州》）

---

〔1〕《新唐书》(4) 卷39《地理三》，1 004页。

〔2〕《元和郡县图志》(上) 卷13《河东道二》，363页。

〔3〕《新唐书》(4) 卷39《地理三》，1 473、1 472页。

〔4〕《全唐文》(1) 卷31《停今年漕运诏》，346页。

林檎（即苹果，日文中汉字“林檎”即苹果，也可能是沙果。）“唐永徽（650—655年）中……河东（指河东道，今山西省）亦多林檎”。[1]

蜂蜜　贞观（627—649年）河东（指蒲州，今山西省蒲州。）人裴明理，“善于理生……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2]

枣　代州雁门县（今山西省代县）枣户城《隋图经》云：初筑此城以地多枣树为名。（《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十》）山西枣，至今仍为名产。

二、手工业和商业

食盐　河东道盛产食盐。蒲州解县（今山西省解州）“有盐池，又有女盐池”。

蒲州安邑县（今山西省运城市北县）“有盐池。与解（县）为两池”。[3]

《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解县盐池，在县东十里。女盐池，在县西北三里。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盐味少苦，不及县东大池盐……今大池与安邑县池总谓之两池”。

冶铁　“隋开皇（581—600年）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汾（水）西铸铁（佛）像，高七十尺，鸠集金、炭，经求用度，（经数十年）物力乃办……及开炉，铁（佛）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4]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铁之次。”[5]

---

〔1〕《太平广记》(9) 卷410《文林果》，3 330页。

〔2〕《太平广记》(5) 卷243《裴明礼》，1 874～1 875页。

〔3〕《新唐书》(4) 卷39《地理三》，1 000页。

〔4〕《太平广记》(3) 卷114《僧澄空》，794页

〔5〕《太平广记》(3) 卷146《尉迟敬德》，1 048页。

科技　“将作大将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今山西省沁源）市内，刻木为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1〕这比前面提到的能酌酒行觞的木人，技高一筹。

河东人善于经商　武则天之父武士彠，“太原文水县（今山西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2〕

前面提到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3〕

像武士彠、裴明礼这样“善于理生”在唐代记载中是少见的，而他们都是河东人，值得注意。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开元年间，河东道水利灌溉又有发展。太原府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714年）县令戴谦所凿”。〔4〕

开元初李孟犨为蒲州猗氏县（今山西省临猗）县令。“君之临猗氏也，莱田数十里，上蔽荆榛，下辟咸卤，逋逃夜聚，豺狼晓嗥。公曰：‘谷不足者，地有遗利；食不足者，人有遗功。长其荆棘，孰若树其禾稼？聚其豺狼，孰若利其贫窭？乃寻斧于拱木，疏

〔1〕《朝野佥载》卷6，142页。

〔2〕《太平广记》（3）卷137《武士彠》，986页。

〔3〕《太平广记》（5）卷243《裴明礼》，1 874页。

〔4〕《新唐书》（4）卷39《地理三》，1 004页。

凿于涞川，化草莽为陂塘，变硗确为坟壤。人民胥悦，工亦子来。虽史起决漳（水）、郑国开白（渠），亦何加也！'"[1]

农副产品

牡丹　段成式在其所撰《酉阳杂俎》卷19中说："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有也。开元（713—741年）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治隰城，今山西省汾阳）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棵，植于长安（今西安市）私第。天宝（742—755年）中，为都下奇赏。"可知牡丹是从汾阳传开的。

枣　前面提到代州雁门县（今山西省代县）多枣树。"此枣多输北京"（《太平寰宇记》卷47《代州》）（按：天宝元年（742年）改太原为北京，此处"北京"指太原而言）。

木材　唐德宗曾对臣下说："人云：开元、天宝中，（京师长安）近处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治宜芳县，今山西省岚县北）、胜（治榆林，今陕西省榆林）采造。"[2]可知岚、胜州当时有原始森林。

二、手工业

河东道产麻，因而盛产麻布。张鹭（开元时人）指出："蒲（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陕之布，却入渔阳（今北京市）"[3]由于渔阳为幽州节度使治所，驻有大军，需大量麻布制军装。而蒲州的麻布源源不断入渔阳。

名酒　《唐国史补》卷下："酒则有……河东（指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西。）之乾和葡萄。"说明当时蒲州已有葡萄酒，并为全

---

〔1〕《全唐文》(4)，卷371《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3 769页。

〔2〕《太平广记》(5) 卷239《裴延龄》，1 844。页

〔3〕《全唐文》(2) 卷172《工部员外郎赵务支蒲陕布供渔阳军》，1 755页。

国名酒之一。

名纸　《唐国史补》卷下："纸则有……蒲（州）之'白薄'。"看来蒲纸的特点是白而且薄。

冶铁　河中府（蒲州）河西县（今陕西省合阳）"有蒲津关，一名蒲坂。开元十三年（725年）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1]前面提到隋开皇年间僧澄空在晋阳铸铁佛像高70尺，开元中在河西县铸八铁牛说明河东道冶铸水平的高超。

食盐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一带）盐池渐涸，师度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2]

〔1〕《新唐书》(4) 卷39《地理三》，1 000页。

〔2〕《旧唐书》(6) 卷48《食货上》，2 106页。

第五章　陇右道

唐初在陇山之西的广大地区置陇右道（使治鄯州湟水县，今青海省乐都）包含今甘肃省，青海省西宁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以及阿富汗。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将今乌鲁木齐市以西广大地区分置“安西都护府”，治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又将陇右道西部,即武威以西至敦煌,划为“河西道”(使治凉州武威,今甘肃省武威)。河西道虽“不在十道之内”,但隋唐时期人们将陇右、河西相提并论,已成习惯。

第一节　唐初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

在隋代，贺娄子干指出：“陇右、河西，土旷民稀。”同时指出：“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1]不仅陇右人以畜牧为事，隋朝廷也在陇右置牧监。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文帝派屈突通往陇右检复群牧，“得（知）隐匿马二万余匹，帝大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千五百人”[2]。从此事可知，隋官府在陇右养战马的规模。

---

〔1〕《资治通鉴》(12) 卷176《陈纪十·长城公至德二年（584）》，5 474页。

〔2〕《资治通鉴》(12) 卷178《开皇十七年》，5 556页。

隋末唐初，由于战乱，陇右也遭到破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王麴文泰在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对国人说："往吾入朝（指贞观四年曾至长安），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1] 至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来公敏指出："陇右户口凋敝"[2]

唐朝建立后，经济逐渐恢复，发展。

陇右

高宗调露（679—680年）中，黑齿常之任河源军（驻鄯州鄯城，今青海西宁市）经略大使，"因建言：河源当贼冲，宜增兵镇守，而运馈须广。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垦田五千顷，岁收粟斛百余万。由是食衍士精，戍逻有备。"[3]

娄师德在高宗、武则天在位时，先任河源军（驻鄯州鄯城，今青海省西宁市）司马并知营田事，后任陇右诸军大使，凡40余年。在这期间，在陇右以及关内道北部主持营田，收获粮食不计其数。"天授（690—692年）初，则天降书劳曰：'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今宁夏青铜峡、灵武、吴忠之间的古城）、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

长寿二年（693年）武则天对娄师德说："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又任他为河源（驻今西宁市）、积石（驻今青海省贵德）、怀远等军及河（治枹罕县，今甘肃和政县西北）、兰（治金城县，今甘肃省兰州市）、鄯（治湟水县，今青海省乐都）、廓（治化成县，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西）等州检校营田大使。"[4] 娄师德在数十年间，在今甘肃、青海、宁夏

---

〔1〕《资治通鉴》(13)卷195《贞观十四年》,6 154页。

〔2〕《资治通鉴》(14) 卷201《总章二年》, 6 359页

〔3〕《新唐书》(13) 卷110《黑齿常之》, 4 121－4 122页。

〔4〕《旧唐书》(9) 卷93《娄师德》, 2 976页。

和陕北广置营田，收获的粮食，不仅使“京坻遽积”，而且使“两军（指中央军队）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娄师德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死，《资治通鉴》评曰：“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1〕

冉寔于武则天长寿（693—694）至证圣元年（694年）任河州（治枹罕县，今甘肃省和政县西北）刺史。在任期间，“大田多稼，人和岁丰”，武则天曾当面奖褒：“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卿以足食为心，朕无西顾之忧矣。”张说在《河州刺史冉（寔）府君神道碑》中指出：“国家径流沙，梁弱水，收西域，护南庭，连百万之兵，以济事于外，不一日而乏者，则公之力也。”〔2〕说明当时河州产粮之多。

河西

唐朝初年，河西地广人稀。安兴贵指出：“凉地不过千里，土薄民贫。”〔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李大亮上奏曰：“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4〕高宗总章二年（669）“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凉（州）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5〕由上可知，唐朝初年，河西地区人口稀少、经济凋敝。

从唐高宗即位起，凉州经济开始发展。

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碛口置和戎城（甘肃省古浪），北界碛中置白亭军（驻白亭守捉，在当时的‘白亭海’，今甘

〔1〕《资治通鉴》（14）卷206《圣历二年》，6 541页。

〔2〕《全唐文》（3）卷228，2 310页。

〔3〕《资治通鉴》（13）卷187《武德二年》，5 855页。

〔4〕《资治通鉴》（13）卷193《贞观四年》，6 081页。

〔5〕《旧唐书》（1）卷5《高宗下》，92页。

肃省民勤西北），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至城下。”

“元振又令甘州（治张掖县，今甘肃省张掖）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治姑臧县，今甘肃省武威）粟、麦斛至数千（钱），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可）支数十年。元振风神伟壮，而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1〕

王方翼于高宗仪凤至调露（679—680年）任肃州（治酒泉县，今甘肃省酒泉）刺史。“时州城荒毁，又无壕堑，数为寇贼所乘。方翼发卒浚筑，引多乐水环城为壕，又出私财造水碾硙，税其利以养饥喂（王方翼用自己私财造水碾、水硙，以碾米、磨面。人们碾磨须缴费，用这笔收入救济贫民。）”又于“宅侧起舍十余行，以（使‘饥喂’）居之。属蝗俭，诸州贫人死千道路，而肃州全活者甚众。州人为立碑颂美。”〔2〕从郭元振、王方翼两例，可知唐初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渐渐复苏。

安西都护府及“安西四镇”

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侯君集、薛万钧等率唐军破高昌国，其王麴智盛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九月，以其地为西州”。〔3〕“置交河、柳中等县，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4〕西州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

西州随即与内地各州一样实行均田制度。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天山县（今吐鲁番西北达坂城一带）宁昌乡人张智礼向

〔1〕《旧唐书》（9）卷97《郭元振》，3 044页。

〔2〕《旧唐书》（15）卷185上《良吏上》，4 802页。

〔3〕《资治通鉴》（13）卷195《贞观十四年》，6 155～6 156页。

〔4〕《太平广记》（4）卷189《李靖》，1 415页。

县司申诉：县司欠其“口分常田四亩、部田六亩”，要求县司“于天山县宽乡请授”，[1]就是明证。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击）降处密、处月，破龟兹（今新疆库车）、大拨等五于城，虏数万口，执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以归，龟兹平，西域震骇。”[2]

“太宗既破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一带），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碎叶（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谓之‘四镇’……其后吐蕃大人，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区）以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3]

北庭都护府

（《旧唐书》卷40《地理三》）“贞观于四年（640年），侯君集讨高昌，西突厥屯兵于浮图城，与高昌相响应。及高昌平，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乃置庭州（今乌鲁木齐市以东、以北地区）处叶护部落。长安二年（702年）改为北庭都护府。自永徽至天宝，北庭节度使管镇兵二万人、马五千匹；所统摄突骑施、坚昆、斩啜；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镇兵万余人、马五千匹。”

《旧唐书》卷40《地理三》之《西域十六都督州府》：

“龙朔元年（661年），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千，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千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

---

〔1〕吐鲁番出土文书 75TAM239：9/1－18 据吐鲁番文书整理组录文。

〔2〕《旧唐书》（1）卷3《太宗下》61～62页。

〔3〕《旧唐书》（16）卷198《西戎》，5 304页。

月氏都督府　于吐火罗所治遏换城置，以其王叶护领之。于其部内分置二十四州，都督统之。

大汗都督府　于嚈噠部落所治活路城置，以其王大汗领之。仍分其部置十五州，大汗领之。

条支都督府　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

大乌都督府　于解苏国所治数瞒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高附都督府　于骨咄施国所治妖沙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修鲜都督府　于罽宾国所置遏纥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十一州。

写凤都督府　于失苑延国所治伏戾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四州。

悦般都督府　于石汗那国所治鼊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双靡州。

奇沙州　于护特健国所治遏密城置。仍分其部置沛薄、大秦二州。

和默州　于怛没国所治怛城置，仍分置栗弋州。

旅獒州　于乌拉喝国所治摩竭城置。

昆墟州　于护密多国所治抵宝那城置。

至拔州　于俱密国所治措瑟城置。

鸟飞州　于护密多国所治摸廷城置。

王庭州　于久越得犍国所治步师城置。

波斯都督府　于波斯国所治陵城置。

右西域诸国，分置羁縻州军府，皆属安西都护统摄，自天宝十四载（755年）以前，朝贡不绝"。

上述"西域十六都督州府，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5册《唐·陇右道西部》，据此可知，唐高宗在位，唐朝在今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阿富汗部分地区设置羁縻州军府，这些州府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以前，“朝贡不绝”。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陇右、河西一向是沙碛多、人口少的经济落后地区。高宗、武则天时，在这一带扩充屯田、畜养战马，经济有很大飞跃，此后发展迅速。

王君㚟，在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至十五年（727年）“持节河西、陇右两道节度使”。张说在《右羽林大将军王公（㚟）神道碑》中指出：“既督陇右，兼统河西，绾塞垣之十军，佩节制之两印，大田多稼，而屯廪百亿。”〔1〕

“河西节度使王君㚟召（牛仙客）为判官。”牛仙客“始在河西，嗇事省用，仓库积巨万、器械犀锐。”〔2〕这证明王君㚟在任期间“大田多稼，而屯廪百亿”并非子虚。

张守珪在开元十五年（727年）至十七年（729年）为瓜州（治晋昌县，今甘肃省东南）刺史、墨离军使。不久任瓜州都督。“州地沙堦不可蓺，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堨为虏毁，材木无所出。守珪密祷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复堰坊，耕者如旧。”〔3〕

农业保持发展的势头，而官府经营的畜牧业也有相当规模。唐初京畿西部的马坊，贞观中移至关内、陇右两道之间，此后更移至

〔1〕《全唐文》(3) 卷229，2 313页。

〔2〕《新唐书》(15) 卷133《牛仙客》，4 555页。

〔3〕《新唐书》(15) 卷133《张守珪》，4 549页。

陇右。张说在《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指出："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渭州）、金城（兰州）、平凉（凉州）、天水（秦州）四郡之地……（开元）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初有牛三万五千头，是年亦五万头；初有羊十一万二十口，是年乃亦二十八万六千口。"〔1〕

牧马为何从70万匹减至24万匹？郗昂指出："属张氏（万岁）替职，圉师败官，马之教骁，日失其序。逮开元初唯得二十四万匹。"〔2〕后又恢复。

至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头匹。口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匹……牛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五头……驼五百六十三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骡一头。"〔3〕

《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长安城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语林》卷3：开元初"人河湟（指黄河、湟水，即指陇右）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开元，天宝年间陇右、河西之富，可与当时经济重心所在地河北（以及河南）相提并论，这主要是因为数十年来在这一带屯田、养马，而又皆为官府经营，收入归国库，也就是说，当时陇右上缴国库的钱物（加上赋税）可与河北（以及河南）相比。此外，由于在安西广大地区"列置州县"而收取的赋税或"贡献"，也通过陇右、河西道上缴朝廷，这可能也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

〔1〕《全唐文》(3) 卷226，2 283页。

〔2〕《全唐文》(4) 卷361、《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3 670页。

〔3〕《唐会要》(下) 卷72《军杂录》，1 303页。

陇右”的一个因素。

唐朝在西域统治的巩固和继续拓展

《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三年（715年）》：“拔汗那者，古乌孙也（中亚费尔干纳以北），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郭）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阿拉伯）、康居（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宛（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

天宝十二载（753年）又收复了河西九曲（今青海省共和县、同德县和甘肃省夏河县、玛曲县之间）、攻下了大勃律国（喀喇昆仑山以南今印度克什米尔地区）。

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唐中宗将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当年，吐蕃以给公主“汤沐邑”为由，向唐索取河西九曲之地。吐蕃遂置洪济、大漠门（今青海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之间）二城以防守九曲之地。河西九曲之地，土地饶沃、水草肥美，吐蕃在这一地区畜养大量战马、牛羊、力量增强，往往从此出兵进扰唐陇右、河西一些州县。此后，唐蕃反复争夺九曲之地。唐军于天宝八载，攻占吐蕃的石堡城，为收复河西九曲奠定了基础。天宝十二载（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军打败吐蕃，拔洪济、大漠门二城，“悉收九曲部落”[1]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兵围小勃律（喀喇昆仑山以南今巴基斯坦控制的吉尔吉特地区），其王没谨忙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求救，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张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步骑四千人救援。张思礼与没谨忙合击吐蕃，大破

[1]《资治通鉴》(15) 卷216《天宝十二载》，6 918页。

之，斩获数万，“自是晏岁，吐蕃不敢犯边”。[1]

吐蕃染指小勃律未能得逞，遂改变手法，以女妻小勃律王，使之附己。此后，小勃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唐廷)”。形势严峻。天宝六载（747年）唐以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万骑讨小勃律。当年八月，高仙芝打败吐蕃，攻占小勃律，“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2]《新唐书·食货三》：“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可见唐收降小勃律的重要。为稳定西域的形势，天宝十二载（753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率兵进击大勃律（在小勃律之南今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大破之，受降而还”。[3]

天宝十二载，唐军在河湟、西域战绩辉煌，对西域的控制更加牢固。看来《资治通鉴》作“是时中国强盛”云云，也有这方面的意义。

陇右、河西的物产及与丝绸之路

“唐永徽（650—655年）中，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尝于河中滩上，拾得一小树栽，埋之，及长，乃林檎（苹果或沙果）也……河东亦多林檎，秦中（治成纪县，今甘肃省秦安以北）亦不少。河西诸郡（甘、肃、凉、瓜、沙等州）亦有林檎。”[4]

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产“白叠布”。“彼州妇女以婆罗树皮绩白叠布。尤好以充职供。”（《太平寰宇记》卷156《西州》）西州向朝廷进贡，当在开元天宝年间或稍前之事。

陇右、河西地当丝绸之路要冲，商旅、僧侣来往不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一：贞观（627—649年）中“凉州为河西

〔1〕《资治通鉴》(14) 卷212《开元十年》，6 752页。

〔2〕《资治通鉴》(15) 卷215《天宝六载》，6 886页。

〔3〕《资治通鉴》(15) 卷216《天宝十二载》，6 920－6 921页。

〔4〕《太平广记》(9) 卷410《文林果》，3 330页。

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开元（713—741年）初，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时“有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长安）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今印度）”。[1]大量丝绸通过陇右、河西运至西域，这只是其中一例。

〔1〕《太平广记》(7) 卷329《张守珪》，2 615页。

第六章　淮南道

唐代淮南道，北起淮河，南至长江；东自东海，西至桐柏山——洪湖以北一线。以今安徽省为主体，包含河南、江苏、湖北、江西省部分地区。

淮南道与江南道，在唐人眼里视为一个地区，因而往往呼之为“江淮”。淮南道是北方与江南交通的枢纽。隋炀帝时开凿的南北大运河：汴河—邗沟（唐曰漕渠）—江南河，其中段邗沟，正在淮南道境内。邗沟今名里运河，在今江苏省境内。随着南北经济交流日益发达，邗沟与江南河衔接的枢纽城市——扬州，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淮南地区经六朝的开发，至隋代，已较发达。不过，主要表现在工商业方面。例如，梁朝天监（502—519 年）中，有张老者，于王屋山下，给韦恕一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郡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后韦恕果于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王老处，凭席帽取钱一千万。[1] 这虽并非现代金融业务，但店肆办理大宗金钱存取业务，反映了当时扬州工商业的发达。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 年）“江都（今江苏省江都）新作龙

[1]《太平广记》（1）卷 16《张老》，114 页。

舟成，送东都”。隋炀帝做诗有“我梦江都好”之句。[1] 江都县是唐淮南道扬州的治所，在隋代已是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以致隋炀帝都很向往。

隋末淮南地区虽未遭到巨大破坏，但农业却较萧条。唐高祖在武德六年（623年）三月《简徭役诏》中指出：“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唐大诏令集》卷111）当时江淮之间，人口稀少，流民较多，农业生产没有走上正轨。唐朝建立后，着手恢复生产。

农业　武士彟，武德末为扬州都督长史，开辟田畴，示以刑礼，数月之间，歌谣载路。[2]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李袭誉为扬州大都督长史。“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业。袭誉为引雷陂水，筑句城塘，溉田八百顷，以尽地利，民多归本”。[3]

经过20余年的努力，扬州从“流寓者多”至“民多归本”，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楚州安宜县（今江苏省宝应）“西南八十里有白水塘、羡塘，证圣（695年）中开，置屯田”。

光州光山县（今河南省光山）“西南八里有雨施陂，永徽四年（653年），刺史裴大觉积水以溉田百余顷”。[4]

手工业　《太平寰宇记》：“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重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愈于西域所出者。”（《太平寰宇记》卷200《四夷二十七》、《北狄十二》）

所谓“石蜜”，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33卷《唐本草》中指出：“石蜜即白沙糖也……轻白如霜者为糖霜；坚白如冰者为

〔1〕《资治通鉴》（12）卷183《大业十二年》，5 705页。
〔2〕《册府元龟》（9）卷677《牧守部·能政》，8 092页。
〔3〕《新唐书》（12）卷91《李袭誉》，3 791页。
〔4〕《新唐书》（4）卷41，1 054页。

冰糖。”唐太宗令扬州造石蜜，反映了唐初扬州已是著名的手工业发达的城市。

《朝野佥载》卷3：“中宗令扬州（今扬州市）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唐初扬州能制造“方丈”镜，可知扬州铜器制造业技术水平之高。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开元、天宝年间，淮南道经济在唐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淮南道作为南北经济交流的枢纽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增强。

农业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陈、许、豫、寿（治寿春县，今安徽省寿县）四州开稻田。”[1]和州乌江县（今安徽省和县北）“东南二里有韦游沟，引江至郭十五里，溉田五百顷，开元（713—741年）中，丞韦丹开”。[2]

“唐天宝（742—755年）中，有名曰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河北道魏州，天宝元年改州为郡。治于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以北），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今山西省五台）。”[3]寿州产茶，茶园规模很大，刘清真师徒20余人一起经营，并远销河北、山西。

手工业　天宝初年，韦坚为水陆转运使，在长安城东长乐坡下穿“广运潭”，天宝二年（743年）韦坚造二三百只船，每船陈列一州郡的物产，其中有“广陵（扬州，天宝元年改为广陵郡）所出锦、镜、铜器、海味”。“先是，人间戏唱歌词云：“潭里船车闹，

〔1〕《旧唐书》（1）卷9《玄宗下》，208页。

〔2〕《新唐书》（4）卷41《地理五》，1053页。

〔3〕《太平广记》（1）卷24《刘清真》，160页。

扬州铜器多。”〔1〕可知至天宝初年，扬州已是手工业发达的城市。

在扬州铜器中，尤以铜镜最著名：“唐天宝三载（744年）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二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2〕如此精美的铜镜，其制作要求十分严格，“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于）扬子江所铸也”。〔3〕“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上）铸之”。〔4〕“或言无百炼者，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鸣者”。〔5〕“水心镜”或谓“江心镜”在制造过程中，无论在时间、地点上，还是在烧炼次数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正因如此，其质量居全国首位，成为扬州最重要的贡品。

不难想象，扬州铜镜受到唐代妇女多大的青睐：“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今江西省新干县）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少女白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6〕

市　有唐若山者，开元中为润州刺史。“其后二十年，有若山旧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鱼市中见若山鬻鱼于肆，混同常人。”〔7〕可知扬州有“市”。

水上交通　漕渠（邗沟）在南北物资交流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楚州淮阴县（今江苏省淮安）北接泗水；由淮阴逆淮而上至（河南道）泗州临淮县（今江苏省盱眙），该县则是汴水入淮处。淮阴、临淮两县是泗水、汴水经淮水入漕渠（邗沟）的要冲。而扬州扬子县（今江苏省扬州）的“瓜洲”，则是淮河与长江的衔接处。这样，

〔1〕《旧唐书》（10）卷105《韦坚》，3 223页。
〔2〕《太平广记》（5）卷231《李守泰》，1 771页。
〔3〕《太平广记》（5）卷232《扬州贡》，1 776页。
〔4〕《太平广记》（5）卷213《李守泰》，1 771页。
〔5〕《太平广记》（5）卷232《扬州贡》，1 776页。
〔6〕《太平广记》（7）卷334《韦栗》，2 651页。
〔7〕《太平广记》（1）卷27《唐若山》，177页。

淮河以北各地可经汴水、泗水入漕渠以至长江。正因如此，白居易(772—846年）在《长相思》一诗中写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1〕

漕渠（邗沟）在南北物资交流上的作用日益显著。早在武德六年（623年）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之米，以实洛阳。"〔2〕武则天时，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说："自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今北京市），纳充军粮。"（《陈伯玉集》卷8）

开元十五年（727年）秋，"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给之"。〔3〕

上述江淮米都是通过漕渠运往北方的，而扬州的江面上来往船只不可胜计。"天宝十载（751年）广陵郡（扬州，天宝元年改为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4〕开元、天宝年间扬州作为南北经济交流的枢纽，其作用愈益重大。

〔1〕《全唐诗》(25) 卷890，10 057页。

〔2〕《册府元龟》(6) 卷498《邦计部·漕运》，5 966页。

〔3〕《旧唐书》(1) 卷8《玄宗》，191页。

〔4〕《旧唐书》(4) 卷37《五行志》，1 358页。

第七章　江南道

唐初以“山河形便”分为10道，其中江南道地域极为辽阔，包括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省和安徽、湖北省部分地区。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天下为15道，其中将江南道一分为三：“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黔中道，理黔州”。[1]不过，由于本章所述多为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故仍将江南道作为一道叙述。为叙述方便，分为江南道东部、江南道西部和黔中地区。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江南道东部（江东）

江南地区虽经六朝的开发，但民户一向稀少，隋平陈（淮南和江南）“得五十万户”[2]其中江南地区，也不过半数左右。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江南民户增至304 248户[3]隋末战乱，民户有所减少。唐武德六年《简徭役诏》：“江淮之间，爰及岭外……土旷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唐大诏令集》，卷111）

不过，自隋末至唐初，北方遭到巨大破坏，民户大批逃往江南

〔1〕《旧唐书》（5）卷38《地理一》，1 385页。

〔2〕《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40页。

〔3〕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97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避难。“隋末大乱，道不通，审礼（徐州彭城人）尚少，自乡里负祖母渡江，转侧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长安”。[1] 从中可知隋末避难江南的当不在少数。刘审礼及其祖母后来虽然“西入长安”，其他人未必如此。因而自隋末至唐初，江南人口有些增长。贞观十三年（639年）江南道有户388 600，是隋大业年间的128%。而在此期间全国民户下降了65%以上[2] 而江南道民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值得注意的。

唐朝初江南修筑了不少水利工程。

润州丹阳县（今江苏省丹阳）有练湖，东晋陈敏“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3] 唐初重新疏浚。南唐吕延祯指出：练湖“兴于前唐之初，废于前唐之末”。[4] 可知唐初练湖处于兴盛之时。

润州金坛县（今江苏省金坛县）“东南三十里有南、北谢塘，武德二年（619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溉田”。[5]

润州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西南三十里有绛岩湖，麟德（664—665年）中，县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

杭州富阳县（今浙江省富阳）“北十四里有阳陂湖，贞观十二年（638年）令郝某开。南六十步有堤，登封元年（696年）令李濬时筑，东自海，西至十觉浦，以捍水患”。

杭州新城县（今浙江省临安县南）“北五里有官塘，堰水溉田，有九澳，永淳元年（682年）开”。

湖州安吉县（今浙江省安吉北）“北三十里有邸阁池，北十七里有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皆圣历（698—700年）初令

〔1〕《新唐书》（13）卷106《刘审礼》，4 054页。

〔2〕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61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3〕《元和郡县图志》（下）卷25，592页。

〔4〕《全唐文》（9）卷871《练湖碑铭》，9 117页。

〔5〕《新唐书》（4）卷41《地理五》，1 057页。

钳知命置"。

越州会稽县（今浙江省绍兴市）高宗末年任常州刺史的杨德裔，曾任越州都督府长史，他"在会稽，引陂水溉田数千顷，人获其利"。[1]

福州连江县（今福建省连江）"东北十八里有材塘，贞观元年（627年）筑"。[2]

泉州莆田县（今福建省莆田）"西一里有诸泉塘，南五里有沥浔塘，西南二里有永丰塘，南二十里有横塘，东北四十里有颉洋塘，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溉田总千二百顷，并贞观（627—649年）中置"。

唐初江南地区盛产粮食，自武德初年即大量北运。"武德六年（623年）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米，以实洛阳"。[3]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是岁，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就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4]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指出："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5]由此可知，唐朝初年江南的租米大量运往北方，动辄上百万斛，或运洛阳，或运关中，或运幽燕，无往而不至；或储存，或赈灾，或充军粮，缓急是赖。

不仅如此，江南米质很高。娄师德于武则天长寿三年（694年）至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治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

〔1〕《文苑英华》（6）卷950，4 995页。

〔2〕《新唐书》（4）卷41《地理五》，1 065页。

〔3〕《册府元龟》（6）卷498《邦计部·漕运》，5 966页。

〔4〕《旧唐书》（1）卷5《高宗纪下》，95页。

〔5〕《全唐文》（3）卷211，2 136页。

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1〕驿站为诸人提供的米黑而粗，为娄师德提供的白而细的米是"浙米"。由于往往买不到浙米，所以只能供应贵客。由此可知浙米的质量大大超过其他地区所产者。

在粮食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唐初江南东部各州的经济作物也发展起来。

《唐国史补》卷下："苏州进藕，其上者名曰'伤荷藕'。"

《文苑英华》卷546《梨桔判》：

郑州刘元礼载梨向苏州，苏人弘执信载桔来郑州。行至徐城，水流急，两船相冲，俱破。梨及桔皆流。（元礼）梨散；（执信）接得半桔，薄盛，总不失。元礼（向）执信索赔，执信不伏。

由上可知，苏州产藕、桔，并且或以进贡，或以贸易方式运至北方。虽然两书所载之具体年代不详，但是，这些经济作物的栽培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至少，唐初已经种植，当无疑问。

自贞观年间，中印邦交由玄奘而促成，印度使者东来，唐派"王玄策等二十一人随往大夏，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高僧传》2集，卷5）前面提到，"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石蜜造法），令扬州（今扬州市）煎蔗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愈于西域所出者"。看来从西域学来的白沙糖制造法，分别在扬州、越州制造，皆得成就。

江南道盛产麻和麻布。这可从《通典·食货六》所载"天宝中计账"得知。天宝中，全国分为"出丝绵郡县"和"出（麻）布郡县"。而"江南郡县"归入"出布郡县"。然而，唐朝初年，江南道已有桑蚕业。贞观中，监察御史萧翼，为替太宗至江南寻找王羲之《兰亭序》真迹，曾"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至越州"。至

〔1〕《太平广记》(4) 卷176《娄师德》，1 308页。

一寺院，遇禅师，自称："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1]这透露唐初北方蚕种过江的情形，也说明当时南方桑蚕业不如北方。

江南道西部地区（江西）

江州彭泽县（今江西省彭泽以东）武则天时，狄仁杰为彭泽县令，至任"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2]反映了唐初江南西部农业滞后的情形。

洪州（治豫章县，今江西省南昌市）盛产木材。贞观中，阎立德为将作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3]以征辽。

宣州（治宣城，今安徽省宣城）、饶州（治鄱阳，今江西省波阳）盛产银。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数百万贯。"[4]尔后饶州银坑得到开发。"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并是草屋。（睿宗）延和（712年）中，火发，万室皆尽。"[5]不过，这只是暂时停产。《新唐书·地理五》载饶州鄱阳郡之"土贡"（据王永兴先生考证当为长庆贡）其中有"麸金、银"。

潭州（治长沙县，今湖南省长沙市）的农业　武则天长安（702—705年）中，杨志本为潭州刺史，在他在任期间，"盗子悦化（感动得盗贼都高兴地）以归农，激之以至淳；浮客（无户籍的民户）感携而请赋。故年景未及于周次，风化穆著于衡湘矣"。[6]

---

〔1〕《太平广记》(5) 卷208《购兰亭序》，1 589页。

〔2〕《全唐文》(2) 卷169《乞免民租疏》，1 728页。

〔3〕《新唐书》(13) 卷100《阎立德》，3 941页。

〔4〕《贞观政要》卷6《贪鄙第二十六》，212页。

〔5〕《太平广记》(3) 卷104《银山老人》，701页。

〔6〕《全唐文》(3) 卷267，《潭州都督杨志本碑》，2 709页。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江南道东部

开元、天宝年间，江南道东部，除了继续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外，手工业，尤其是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此外，在唐初的基础上，大力开发福建地区，为福建地区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农业　开元、天宝年间江南东部继续兴修水利，发展粮食生产。

杭州盐官县（今浙江省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713年）重筑”。[1]

衢州信安县（今浙江省江山、遂昌、衢州市之间）“东五十五里有神塘，开元五年，因风雷摧山，偃涧成塘，溉田二百顷”。

越州会稽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开元十年（722年）县令李俊之增修”。

明州鄞县（浙江省宁波市东）“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713—741年）中县令王元纬置”。“东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743年）县令陆南金开广之”。

越州诸暨县（今浙江省诸暨）“东二里有湖塘，天宝（742—755年）中县令郭密之筑，溉田二十余顷”。[2]

江南所产粮食较前更多地输至北方。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淮转运使裴耀卿改进漕，主要是为解决江淮租米顺利运送至关中的问题。采取分段运输之法，结果“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在陕州）”，“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3]

---

〔1〕《新唐书》(4) 卷41《地理五》，1059页。

〔2〕《新唐书》(4)，卷41《地理五》，1061～1062页。

〔3〕《新唐书》(5) 卷53《食货三》，1366页。

江南的稻、粟还通过海运运往河北。杜甫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1]说明东吴的粮食北运至幽燕之地。

手工业

江南东道盛产麻与麻布。唐前期赋役制度为"租庸调"制。其中"调"，规定每一丁男，每年"随乡土所产，绫、绢、绝各二丈，(麻)布加五分之一。"[2]而江南道为"出(麻)布郡县"。《唐六典》卷3载江南东道之调："润州调火麻，余州并以纻布。"天宝末年，李峤指出："清河，有江淮租布备北军(之需)，号'天下北库'，计其积，足以三(倍)平原之有。"[3]由此可知，唐前期江南所产麻布大量北运。

不过，至开元年间，江南道东部各州已出产精美丝织品，每年作为贡品输往京师。《唐六典》卷3所载"赋贡"，为开元年间贡品：

润州(治丹徒县，今江苏镇江市)：方棋、水波绫；

常州(治晋陵县，今江苏省常州市)：紫纶巾、兔褐。

苏州(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红纶巾。

杭州(治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白编。

越州(治会稽县，今浙江省绍兴市)：白编、交梭、吴绫。

睦州(治建德县，今浙江省建德县)：交梭。

衢州(治信安县，今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和遂昌县之间)：丝绵、藤纸。

婺州(治金华县，今浙江省金华)：丝绵、藤纸。

---

〔1〕《全唐诗》(7)卷222《昔游》，2 358页。

〔2〕《旧唐书》(5)卷51《食货一》1 342页。

〔3〕《新唐书》(16)卷153《颜真卿》，4 854页。

上述方棋绫、水波绫、白编、交梭、吴绫以及红紫纶巾都属精美丝织品，而兔褐则是以兔毛编织的衣料。由此可知，至开元年间，江南各州除产麻布以外，不仅能产丝织品，而且生产了精美的丝织品，反映了当地手工业水平之高。

天宝元年（742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在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揭幕之日，以二三百只小船，陈列各州郡运来的特产，其中有“丹阳郡（润州）（治丹徒县今江苏省镇江市）船陈列京口绫衫段；晋陵郡（常州）船，陈列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越州，今绍兴市）船陈列铜器、吴绫、罗、绛纱”。在全国300余州郡的船中，江南船十分显著。[1]而以精美丝织品最为突出。

为改进江南至北方的水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润州刺史齐澣奏请开伊娄河。齐澣在《请开伊娄河奏》中说：

> 润州北界，隔江为限。每船绕瓜步江沙尾迂回六十里，多风涛所损。臣请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一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之灾，岁收利有亿。[2]

伊娄河开通后，效果显著。李白在《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赍》诗中写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3]讴歌了齐澣的功绩。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九月，魏州刺史卢晖，开通济渠（《新唐书·地理三》作“徙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以北）西，都注魏桥，夹州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4]由此可知江南之货物不仅输往京师，还运至河北，卢晖在州城制楼百余间，可知运至河北地区的江南货物数量极为可观。

---

〔1〕《旧唐书》卷（10）105《韦坚》，3 222页。

〔2〕《全唐文》（4）卷353，3 577页。

〔3〕《全唐诗》（6）卷184，1 874页。

〔4〕《唐会要》（下）卷87《漕运》，1 597～1 598页。

福建地区的深入开发　今福建省的南部地区以及福建中部的山区，在唐初，仍属人稀地广，落后地区。垂拱四年（688年）陈元光任漳州（治漳浦县，今福建省漳浦）刺史，他在《漳州刺史谢表》中指出："窃念臣州，背山面海，旧有蛇豕之区，椎髻卉裳，尽是妖氛之党，治理诚难。"在开元年间在这些地区设立州县。

置汀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1]当时汀州只有一县（长汀县，为州治所，即今福建省长汀）汀州在今福建省西南部，即今三明市、明溪、永安、清流、长汀、连城、武平、漳平、上杭、龙岩、永定等地。

置汀州宁化县、福州尤溪（今县名）、古田县（今县名）

宁化县（今福建省宁化县）"宁化县，本沙县地，开元二十二年开山洞置"。[2]

古田县"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3]

尤溪县"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今县名）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险竣，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循?）忠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一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太平寰宇记》卷100《南剑州》）

上述汀州以及宁化、古田、尤溪诸县，皆为"开山洞置"。所谓"山洞"，是指群山环抱的山坳，其中往往有千里，能居数千户。这就是说，此前大山之中，曾是人迹罕至的世外桃园。在开元末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朝廷的徭役日渐增多，为贫苦农民所不能忍受，他们成群结队，爬山越岭，来到人迹罕至的山坳中开荒种地，

〔1〕《元和郡县图志》（下）卷29《汀州》，722页。

〔2〕《元和郡县图志》（下）卷29《汀州》，723页。

〔3〕《旧唐书》（5）卷40《地理三》，1 599页。

发展了生产。为时不久，官府即检括逃户，将他们编入版籍，设立州县。这个过程即是农民开拓荒地的过程。元结云："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丰耜亦满。"其中也包含这一情况。

在今浙江省宁波市一带及舟山群岛置州县《旧唐书》卷128《齐澣》：开元中"招还流人五百户置明州以安辑之"。《新唐书》卷41《地理五》：明州余姚郡，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采访使齐澣奏以越州鄞县（今宁波市以南）置，以境有四明山为名。"《旧唐书》卷40《地理三》明州"天宝领县四：鄞县。奉化（今浙江省奉化）、慈溪（今浙江省慈溪以南）、翁山（今舟山岛定海、普陀之间）已上三县，皆鄞县地，开元二十六年析置"。明州与汀州的设置，说明开元年间在东南地区的深入开发。

江南道西部

洪州（天宝元年改为豫章郡。治南昌县，今江西省南昌市。）"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扬州市），利则数倍。天宝五载（746年），有杨溥者，与人入林求木"。[1]

宣州《天宝元年改为宣城郡》当涂县（今安徽省当涂）"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春二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2]

江州（治浔阳县，今江西省九江市）"玄宗时……江州有张安者，惟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3]可知江州浔阳县有"市"。

开元、天宝年间江南西道的资料甚少，或许透露了这一阶段这一地区发展有限，亦未可知。

---

〔1〕《太平广记》(7) 卷331《杨溥》，2 632页。

〔2〕《太平广记》(10) 卷470《刘成》，3 872页。

〔3〕《太平广记》(7) 卷301《张安》，2 389页。

第八章　山南道

唐初以“山河形便”分天下为10道。其中山南道，以今湖北省、四川省东部地区为主体，包括湖南、陕西和河南省部分地区。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为15道，其中，山南道一分为二：“山南东道（理襄州），山南西道（理梁州）。”本章仍将山南道作一道叙述，不过，为阅读方便，分为山南道东部、西部两部分。

第一节　唐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山南道东部：襄、邓、唐、均、房、隋、郢、复、荆等州。

本地区以襄、邓、荆3州经济较为发达。隋朝末年，本地区遭到巨大破坏。“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1]唐朝建立后，逐渐恢复，并有了初步的发展。

邓州（治穰县，今河南省邓县）陈君宾自贞观元年（627年）至二年任邓州刺史。“州承丧乱后，百姓流冗，君宾加意劳徕，不期月，皆还自业。明年，四方霜潦，独君宾所治有年，储仓充羡，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2]在陈君宾的治理下，邓州粮食充足，可接待蒲、虞二州饥民前来“就食”。

---

〔1〕《太平广记》(6) 卷267《朱粲》，2093页。

〔2〕《新唐书》(18) 卷97《循吏》，5617页。

房州（治房陵县，今湖北省房县）《太平广记》卷121《邢文宗》："唐河间邢文宗……贞观中……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将向房州，欲买经纸。'"房州产纸。

朗州（治武陵县，今湖南省常德市。朗州旧属江南西道，天宝初割隶山南东道。）

《新唐书》卷40《地理四》朗州武陵。"北有永泰渠，光宅（684年）中，刺史胡处立开，通漕"。"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698—700年）初，（县）令崔嗣业开。"

山南道西部：梁、兴、凤、利、通、洋、合、集、巴、蓬、壁、商、金、开、渠、渝等州。

唐朝初年，这一地区尚未充分开发，人口较少，经济滞后。严震指出："梁、汉间刀耕火耨，民采稆为食。虽领十五郡，而赋人才比东方数大县。"[1]

陈子昂（武则天时人）在《上蜀川安危事》中指出：剑南诸州"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在蓬（治大寅县，今四川省仪陇以南。）、渠（治流江县，今渠县）、果（治南充，今南充市）、合（治石镜，今合川）、遂（属剑南道，治方义县，今四川省遂宁）等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太族，阿隐相容。"（《陈伯玉集》卷8）由此可知，唐初山南西道蓬、渠、果、合、遂等州大片山林未被开发，甚至可容纳三万余逃户落脚。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诸州空旷之地。"所谓山南诸州空旷之地，看来多在山南道西部。

---

〔1〕《新唐书》（16）卷158《严震》，4 943页。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山南道东部

襄州（治襄阳县，今湖北省襄樊市）开元十一年（723年）张九龄在《唐故襄州刺史靳（恒）公遗爱碑颂》中指出："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1] 所谓"旧多三辅之家"指前代长安附近的达官贵人往往在襄阳安家。至唐前期为"一都之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

李孟犨于开元中任邓州（治穰县，今河南省邓县）司马兼陆门堰稻田使。至任"君乃豁白水之口。壅樊阳之陂，筑埔云屯，垒石山积，树楗立则，截流施扃，制蓄泄之门，为水府之权，分血脉之经纬，为农夫之司命，条流百道，浸润七邑"。兴修水利的结果，"稼穑"如"龙鳞"[2]

荆州（治江陵县，今湖北省江陵）张说在《送任御史江南发粮以赈河北百姓》诗中写道："河朔人无岁，荆南义廪开。将兴汎舟役，必仗济川才。"[3] 开元年间荆南以粮食支援河北灾民，可知荆州较为富庶。

荆州产黄柑　《新唐书》卷101《萧瑀传附薛嵩》：开元（713—741年）中，玄宗"遣高力士诏嵩曰：'朕将尔留，而君臣谊当有始有卒者。'乃授尚书右丞相……是日，荆州进黄柑，帝以紫帊包赐之"。

房州（治房陵县，今湖北省房县）韦景骏自开元十七年（729年）至二十年（732年）任房州刺史。房州"州带山谷，俗参蛮

〔1〕《文苑英华》（5）卷774，4 081页。

〔2〕《全唐文》（4）卷371《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3 769页。

〔3〕《全唐诗》（3）卷87，949页。

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景骏始开贡举，悉除淫祀。又通狭路，并造传馆，行旅甚以为便"。[1]

朗州（治武陵县，今湖南省常德市。）《新唐书·地理四》朗州武陵："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刺史李琎增修，接古专陂，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入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

山南道西部

巴州（治化城县，今四川省巴中）产木材"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2]

涪州（治涪陵，今四川省涪陵）产荔枝《资治通鉴》卷215《天宝五载（746年）》：

"杨贵妃方有宠……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胡三省注：自苏轼诸人，皆云：此时荔枝自涪州致之，非岭南也）。比至长安，色味不变（胡三省注：白居易曰：荔枝生巴、峡间。）"

[1]《旧唐书》（15）卷185上，《良吏上》，4 797～4 798页。

[2]《太平广记》（9）卷426《巴人》，3 472页。

第九章　剑南道

唐初剑南道，以今四川省为主体，包含今云南省和贵州省的部分地区。

开元七年（719年）于剑南道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天宝元年改益州为蜀郡）、彭、蜀、汉、眉、邛、嘉、嶲、黎、戎、维、茂、雅、合、绵、梓、遂、剑、荣、陵、资、简、龙、泸25州。治益州（蜀郡）。

安史乱后，至德二载（757年）。又以梓、遂、剑、绵、龙、阆、普、陵、泸、荣、资、简12州置东川节度使，治梓州。以成都府（至德二年改蜀郡为成都府）、彭、蜀、汉、眉、姚、邛、嘉、嶲、黎、戎、茂、雅、简等14州置西川节度使，治成都府。

为前后照应，区分为剑南西部，剑南东部两部分叙述。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隋朝末年的战乱，使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然而“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其百姓富庶”。[1]

早在武德二年（619年）二月“太府少卿李袭誉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2]由于隋末战乱，河南、河北百姓逃往长安一带，使

---

〔1〕《资治通鉴》(13) 卷199《贞观二十二年》，6 258页。

〔2〕《册府元龟》(6) 卷498《邦计部·漕运》，5 966页。

京师负担沉重。唐高祖颁《定户口令》："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缺支拟。今岷蕃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本土置令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秋收丰实，再听进止。"〔1〕唐朝建立之初，京师缺粮，"运剑南之米"以解燃眉之急。而后终于将外来人口以及部分长安居民在官府组织之下"就食剑南诸郡"。武则天在位，陈子昂在《上蜀川军事》中说："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于蜀。"〔2〕由以上可知，唐朝初年剑南诸州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其物产不仅充分满足本地区的需要，而且支援京师以及供应陇右、河西。

剑南西部

益州（天宝元年改为蜀郡，至德二年改为成都府。治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兴修水利工程　高士廉于贞观初年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他继秦时李冰之后大兴水利："秦时李冰守蜀，导引汶江（《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成都府：'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经县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创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士廉乃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3〕

高士廉是贞观年间的著名宰相，他继李冰之后在益州大兴水利工程，过去很少有人提到，这是值得注意的。

手工业发达　《唐会要》卷52《忠谏》提到"（贞观）十五年（641年）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朝廷指定在益州织造高级丝织物和金银器物，表明益州在当时手工业已有盛名。

武则天时，陈子昂上书曰："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

〔1〕《全唐文》（1）卷1，18页。

〔2〕《全唐文》（3）卷211，2 133页。

〔3〕《旧唐书》（7）卷65《高士廉》，2 442页。

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1]这里的“蜀”应是指蜀县，因而才能说：“蜀为西南一都会。”《旧唐书·地理四》成都府华阳县：“贞观十七年，分成都置蜀县，在州郭下，与成都分理。乾元二年，改为华阳。”所谓“与成都分理”，只是指将成都县分成两县，设两个县令，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而不言成都，看来蜀县可能已成为物资的吞吐中心，是个繁忙的商业城市。相形之下，成都县则是州治，政治性更强些。

彭州（治九陇县，今四川省彭州市）的水利工程：

《新唐书》卷42《地理六》载：

彭州九陇县：“武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今四川省唐昌）淹江，凿川派流，合堋口、堰岐水，溉九陇（今四川省彭县）、唐昌田，民为立祠”。

彭州导江县（今四川省灌县）“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引江水以溉彭（州）、益（州）田，龙朔（661—663年）中筑”。

姚州（武德初年名南宁州，武德四年（621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人多姓姚，故置姚州。治姚城县，今云南省姚安）。

唐朝建立之初，韦仁寿任嶲州都督府长史。“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嶲（属嶲州，州治所。今四川省西昌），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豪帅为牧宰。法令肃清，人怀欢心”。[2]

《旧唐书》卷41《地理四》姚州：

“武德四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内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三于二（按：比前大为拓展）。麟德元年，移姚州治于弄栋川。自是朝贡不绝。”

---

〔1〕《旧唐书》（15）卷190中《文苑中》，5023页。

〔2〕《旧唐书》（15）卷185上《良吏上》，4782页。

剑南东部

遂州（治方义县，今四川省遂宁）

绵州（治巴西县，今四川省绵阳）

王希隽于武则天末年、中宗在位先后任遂、绵州刺史。他在任期间“先是，俗苦刓弊，人尽流庸。公亦来思，抚之如子，彼得攸暨，归之如市”。[1]

邛州临邛县（今四川省邛崃） 陈子昂（武则天时人）在《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中指出：县令封某到任：“下车而宰，览其谣俗，永叹于良图，想其风流，慨然于惠化。”[2]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发展

开元、天宝年间，剑南道稍稍出现，然而却是重大的变化，即人口由西逐渐东移。与此同时，户籍上的民户数量大为降低，而“户籍不挂”的客户数量大为增多。而后一现象在唐后期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而剑南道实开了这现象的先河。

前面提到，武则天时，剑南诸州有3万余户向东逃入遂州（属剑南道）（治方义县，今四川省遂宁）和山南道的蓬、渠、果、合诸州。武则天末年，遂、绵二州“人尽流庸”。渝州（属山南西道）壁山县（今四川省壁山）“本江津、万寿、巴三县地，四面高山，中央平地，周回约二百里。天宝中，诸州逃户多投此营种”。[3]这表明，从武则天到玄宗天宝年间，剑南道西都（主要是人口密集的成都平原诸州）百姓为避日益沉重的赋役举家向东迁移。除此以外，杜甫在《东西两川说》指出：“流冗之辈，近者交互其乡村而

[1]《文苑英华》(6) 卷940，《太仆卿上柱国华容县男王府君墓志》，4 942页。

[2]《全唐文》(3) 卷215，2 172页。

[3]《元和郡县图志》(下) 卷33《剑南道下》，855页。

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大抵只与兼并豪家力田耳。”[1]归纳起来，剑南诸州百姓或逃往东部空旷之地，或者在剑南西部诸州，互相交换乡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因失掉土地或抛弃了原有的少许土地，不做编户，而宁愿为“兼并之家”当佃农，成为“户籍不挂”的客户。他们虽然承受了大约收获物半数的剥削，也比作为编户的负担要轻些。这一现象在唐后期普遍化，而在这一进程中，剑南道诸州起了先导作用，这是值得注意的。

在开元、天宝年间，西部地区在社会经济上遥遥领先，但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增多，也开始发展。

剑南西部

本地区物产丰富，尤以精美丝织物、柑桔和贵重药材为特产。除了作为赋税上缴朝廷外，还以“土贡”形式每年上献朝廷。

精美丝织物

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天宝（742—755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其后金玉珍宝，并不许贡。’”玄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提倡节俭，此诏即是一例。从“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一事可知西川的精美丝织物，是享有盛名的。“五色背子”虽不贡，但西川在开元、天宝中进贡的精美丝织物种类繁多。

《元和郡县图志》卷31～33《剑南道》记载了“开元贡”；《通典》卷六《食货六》记载了剑南西部诸州的“天宝中贡”，其中属精美丝织品列表如下：

---

〔1〕《全唐文》(4) 卷360，3 656页。

精美丝织物土贡表

州名	开元贡	天宝中贡
益州	罗 8 匹	罗 20 匹
彭州	交梭罗	交梭罗 20 匹
蜀州	罗 18 匹	罗 20 匹
汉州	交梭罗	/
简州	绵紬 15 匹	绵紬 10 匹
邛州	丝布	丝布 10 匹

注：益、彭等 6 州今地名如下：

益州（治成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

彭州（治九陇县，今四川省彭州市）

蜀州（治晋原县，今四川省崇州市）

汉州（治雒县，今四川省广汉）

简州（治阳安县，今四川省简阳）

邛州（治临邛县，今四川省邛崃）

柑桔　《太平广记》卷 401《天宝甘子》："唐天宝十年（722 年）上谓宰臣曰：'近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据《元和志》与《通典》所载"开元贡"或"天宝中贡"所列，江南道杭州、越州开元贡桔或柑桔，而"天宝中贡"只有杭州贡"桔子二千颗"。反之，剑南道在开元年间只有眉州（治通义县，今四川省眉山）贡柑，而在天宝中，除眉州以外，简州（治阳安县，今四川省简阳）、资州（治盘石县，今四川省资中）也贡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数量"（柑子）不限多少"。这样看来，天宝年间剑南道的柑子生产在全国名列前矛。

荔枝　前面提到天宝年间杨贵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而苏轼、白居易均谓此荔枝，非岭南所产，而是由涪州（今四川省涪陵）致之。《通典·食货六》载戎州（治僰道县，今宜宾市）每年"六月进荔枝煎"。所谓"荔枝煎"即将荔枝做干燥处

理。

沙糖　前面提到，贞观年间，朝廷派王玄策等人往大夏，召其石蜜匠“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石蜜，轻白如霜者为糖霜；坚白如冰者为冰糖。《元和志》载蜀州“开元贡：罗十八匹、木兰皮、沙糖”。这表明开元年间，越州的造沙糖技术已传至剑南道蜀州（治晋原县，今四川省崇庆）。

贵重药材　《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二：“玄宗幸蜀，梦孙思邈乞武都（武都城，属泸州，今四川省泸县）雄黄。乃命中使赍雄黄十斤，送于峨眉顶上。”在唐代，医学、医药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代表者即孙思邈和《唐本草》。这一故事不仅说明唐朝廷对医学的重视，也说明当时药材的重要，尤其是贵重药材。据《元和郡县图志》和《通典》所列“开元贡”和“天宝中贡”所列，可知贵重药材多出自剑南西部。现列表如下：

贵重药材土贡表

州名	开元贡	天宝中贡
松州	当归	麝香 30 颗、当归 7 斤、羌活 5 斤。
茂州	麝香	麝香 60 枚
维州	麝香	
当州	麝香、大黄、当归、羚羊角	
悉州	麝香、当归、羌活	麝香 6 颗　当归 20 斤
静州	麝香	麝香 6 颗、当归 20 斤、羌活 10 斤
拓州	麝香、当归、羌活	当归 10 斤、羌活 10 斤
恭州	麝香 20 颗，当归 10 斤	
翼州		麝香 34 颗，当归 10 斤

注：松、茂等 9 州今地名如下：

松州（治嘉诚县，今四川省松潘）

茂州（治汶山县，今四川省汶川）

维州（治薛城县，今四川省黑水县一带）

当州（治通轨县，今四川省黑水）

悉州（治左封县，今黑水东南）

静州（治悉唐县，今黑水县一带）

柘州（治柘县，今黑水以南）

恭州（治广平县，在柘州以南）

翼州（治翼针县，在悉州以东）

此外，剑南西部还出产麸金。何谓麸金？即在江沙中淘汰而得，其色浅黄，皆是生金，得之当皆铸炼。“麸金耗多”。（《本草纲目》金石部第八卷《金石之一》）

《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载：

益州温江县（今四川省温江）“大江，俗谓之温江，南流经县一里，出麸金。

蜀州唐兴县（今四川省崇庆）“鄨江，一名阜江，经县东二里，出麸金”。

眉州通义县（今四川省眉山）“大江，一名汶江，经县东去县五里，出麸金”。

由此可知上述诸县所产麸金都是从江沙中淘汰而得。但是，在开元贡和“天宝中贡”中，剑南西部地区只有眉、雅、嘉三州贡麸金，也许是因这三州麸金的质量高的缘故。

剑南东部

唐初剑南东部劳动力逐渐增多，社会经济比前有了一定的发展。剑南西部的精美丝织品生产技术、柑桔的种植逐渐传入东部地区。

精美丝织品　《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下》和《通典》卷6《食货六》分别记载了剑南东部数州的“开元贡”和“天宝中贡”：

梓州（梓橦郡治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

开元贡：绫、绵、丝布。

天宝中贡：贡绫十六匹。

绵州（巴西郡治巴西，今四川省绵阳市）

开元贡：对凤两巢、独巢白纫、绢。

天宝中贡：贡双纰二十匹。

遂州（遂宁郡治方义，今四川省遂宁市）

开元贡：樗蒲绫十五匹。

天宝中贡：贡樗蒲绫十五匹。

柑桔　资州（治盘石县，今四川省资中）“天宝中贡”列：“柑子不限多少”。开元年间东部诸州均无贡柑桔者，而“天宝中贡”，也是东部地区惟一贡柑子的州。

贵重药材　在东部地区开元贡中，只有扶州（治同昌县，今四川省南坪。）贡“麝香十颗”。而在“天宝中贡”中，除扶州仍贡麝香之外，剑南道东部的遂州（治方义县，今四川省遂宁）贡天门冬，普州（治安岳县，今四川省安岳）贡“天门冬煎”即将天门冬做干燥处理。

此外，资州（治盘石县，今四川省资中）产麸金，开元和天宝中贡均列入。（《唐六典》卷3《户部》：“龙、雅、眉、嘉、资等州（贡）麸金。”）

第十章　岭南道

唐初岭南道，包含今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

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指出："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这22州为：广韶循潮康泷端新封春勤恩罗潘高雷崖琼震儋滕和万安州。岭南节度使治广州。

韩愈还说："其四十余（州），分四府。"[1]这四府自高宗开耀（681—682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先后设置：

1."开耀后置桂州管内经略使，领桂、梧、贺、连、柳、富、昭、蒙、严、环、融、古、思唐、龚十四州，治桂林"。

2."天宝十载（751年）置安南管内经略使，领交、陆、峰、爱、驩、长、福录、芝、武峨、演、武安十一州，治交州"。

3."天宝十四载（755年）置邕州管内经略使，领邕、贵、横、钦、澄、宾、严、罗、淳、瀼、山、田、笼十三州，治邕州"。

4.同年置容州管内经略使，领容、白、禺、牢、绣、党、窦、廉、义、郁林、汤、岩、辩、平琴十四州，治容州"。[2]

韩愈指出："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3]肃宗至德元载（756

〔1〕《全唐文》(6) 卷556，5 626页。

〔2〕《新唐书》(6) 卷69《方镇六》，1 934页。

〔3〕《全唐文》(6) 卷556《送郑尚书序》，5 626页。

年）“升五府经略讨击使为岭南节度使”，领广、韶等22州。[1]

桂、邕、容和安南四府经略使，受岭南节度使节制。他们“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谘而后行”。[2]

岭南五府地域辽阔，包括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以及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隶府之州，离府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使（者）必数月而后能至”。[3]

岭南为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广州器热”[4]“南海秋、夏间，或云雾惨然，则见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此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见忽有震雷，则飓风不作矣”。[5]

岭南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高山深林较多，故野生动物种类很多。“唐开元三年（715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6]李商隐在《昭州》诗中写道：“虎当官道斗，猿上驿楼啼。”[7]宝历（825—827年）中，循州河源县（今广东省河源市）有猎人蒋武，在罗浮山“遇十象”[8]“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即岭南地区）多鹿，最惧此物”。[9]

岭南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因此各地发展程度与风俗大有差异。“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豪（原注：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10]而广州（今广州市）文化发达。《太平寰宇记》

---

〔1〕《新唐书》(6) 卷69《方镇六》，1 934页。
〔2〕《全唐文》(6) 卷556《送郑尚书序》，5 626页。
〔3〕《全唐文》(6) 卷556《送郑尚书序》，5 626页。
〔4〕《太平广记》(8) 卷386《李强名妻》，3 079页。
〔5〕《太平广记》(8) 卷394《南海》，3 149页。
〔6〕《太平广记》(3) 卷143《李处鉴》，1 027页。
〔7〕《全唐诗》(16) 卷540，6 210页。
〔8〕《太平广记》(9) 卷441《蒋武》，3 603页。
〔9〕《太平广记》(10) 卷464《鳄鱼》，3 820页。
〔10〕《通典》卷184《州郡十四》，984页。

卷157《广州》："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华。"

由于岭南各地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唐前期"以金银为货币"[1]《新唐书》卷52《食货二》：大历（767—779年）以前，岭南货币"杂以金银、丹砂、象齿"。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杨于陵指出："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也就是说，自建中元年起，岭南才使用唐朝颁行的货币。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

桂州（治始安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唐朝建立不久，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靖度岭，遣使分道招抚诸州，所至皆下……以李靖为岭南安抚大使，检校桂州总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户六十万。"《旧唐书》卷67《李靖》："乃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等皆遣子弟来谒，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优诏劳勉，授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唐朝进入岭南，是从控制桂州开始。

《册府元龟》卷692《牧守部·招辑》：

"则天时，始安（隋始安郡，唐为桂州，天宝元年改为始安郡，后复为桂州。）贼欧阳倩，拥徒数万，剽陷州县。授（裴）怀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才及岭，飞书招诱，示以祸福，贼徒迎降，自陈为吏人侵逼乃举兵尔。怀古知其诚恳乃轻骑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难亲，未可信也。'怀古曰：'吾仗忠信，可通于神明，况于人也。因造其营，以慰喻之。群贼喜悦，归其所掠财货，纳于公府。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尽皆款附，岭外悉定。'"武则天时巩

[1]《文苑英华》（5）卷769《钱货议》，4 046页。

固了对桂州的控制。

王睃自中宗景龙（707—710年）末至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任桂州都督。“桂州旧有屯兵，常运衡（治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永（治零陵县，今湖南省零陵）等州粮以馈之。睃始改筑罗郭，奏罢屯兵及转运。又堰江水，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1]桂州的粮食生产发展起来。

广州（治南海县，今广东省广州市）王方庆自武则天长寿（629—694年）中至证圣元年（695年）任广州都督。《旧唐书》卷89《王方庆》：

> 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又管内诸州首领，旧多贪纵，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即接受其贿赂），未尝鞫问。方庆乃集止府僚，绝其交往，首领纵暴者悉绳之。由是境内清肃。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

由此可知广州是外贸口岸，而在王方庆治理下，“境内清肃”。

物产

沉香：《隋唐嘉话·补遗》：“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卿宅去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香，唯朽者始香矣。’”

杨梅《太平广记》卷62《何二娘》：“罗浮山北是循州（治归善县，今广东惠州市），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

铜镜　王勃在《检鉴图铭序》中说：上元二年（675年）十一月“予将之交趾，旅次南海（广州又曰南海郡，今广州市），有好事者以转轮钩枝八花鉴铭示予云：‘当今之才妇人作也。观其藻丽

[1]《旧唐书》(9)卷93《王睃》，2 985页。

反复，文字荣回，句读曲屈，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作鉴前烈，辉映将来者也。'"从铜鉴上的铭文可看出当时广州铜鉴制作的精美，而文字高雅、藻丽出于妇女之手，也透露了当时广州文化的发达。[1]

翠裘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2]所谓翠裘，即以百鸟毛编织而成。安乐公主出嫁时"大会群臣，主（安乐公主）被翠服出"。[3]看来就是广州进贡的"集翠裘"。

琼州（治琼山县，今海南省琼山）《太平寰宇记》卷169《琼州》：

> 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法，须以威服。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布，以木棉为毯……打鼓吹笙以为乐。男人则鬟发首插梳带，人齿为璎饰。好弓矢，削竹为箭镞，锐而无羽。女人文领，穿耳垂环。病无药饵，但烹羊犬祀神而已。

安南（隋为交趾郡，唐初为交州，后改为安南，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

《资治通鉴》卷204《垂拱三年（687年）》："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祐使之全输，俚户不从。"

冯元常于垂拱三年任广州都督。"寻属安南首领李嗣仙杀都护刘延祐，剽陷州县。敕元常讨之。率士卒，济南海，先驰檄，示以威恩、喻以祸福，嗣仙徒党多相率归降，因纵兵诛其魁首，慰居人而旋"。[4]

沈佺期于武则天长安（702—704年）因罪流放驩州（在安南

---

〔1〕《全唐文》(2) 卷180，1 836页。

〔2〕《太平广记》(9) 卷405《集翠裘》，3 267页。

〔3〕《新唐书》(12) 卷83《诸帝公主》，3 655页。

〔4〕《册府元龟》(9) 卷692《牧守部·招辑》，8 254～8 255页。

境内），作《题椰子树》一诗：

“日南（隋为日南郡，唐初改为骠州。）椰子树，香褁出风尘。丛生凋木首，圆实槟榔身。”[1]

第二节　开元、天宝年的经济

宋璟于玄宗开元四年（716年）任广州节度使。“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2]

《旧唐书》卷98《卢怀慎附卢奂》：

> 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瑰宝山积，刘巨鳞、彭果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脏巨万而死，乃特授（卢）奂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以为自开元已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开元四年）、裴伷先（自开元七年（719年）至十年（722年））、李朝隐（自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至二十三年）及奂（自天宝八载（749年）至十载）。

物产

荔枝：张九龄在《荔枝赋》中写道：“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状甚瓌瑰，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唐丞相曲江张文献公（九龄）集》卷1）《岭表录异》卷中：“荔枝，新州（治新兴县，今广东省新兴县）与南海产者最佳。”《唐国史补》卷上：“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前面提到苏轼、白居易均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此时荔枝自涪州（山南道）致之，非岭南也”。《唐国史补》则将两地荔枝作了比较，认为是自南海飞驰以进，似乎理由较充足，是否如此，只

---

〔1〕《全唐诗》(4) 卷96，1039页。

〔2〕《旧唐书》(9) 卷96《宋璟》，3032页。

好存疑。

鹦鹉:《太平广记》卷460《雪衣女》:“天宝(742—755年)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

下篇　唐朝后期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其年十一月，边将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叛军先后攻占洛阳、长安。唐玄宗一行逃往成都。叛军所过杀掠，百姓逃亡。至宝应元年（762年）史朝义（史思明之子）死，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始告平息。从战乱爆发唐朝历史进入了它的后期。

从安史之乱爆发，至唐朝灭亡（唐昭宗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唐朝继续存在了152年。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经历了战乱（肃宗在位，756—761年）和恢复（代宗在位，762—779年）阶段；继续发展（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宗在位，780—859年）阶段；和唐末战乱（懿、僖、昭宗和哀帝在位，859—907年）阶段。

安史之乱对唐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在全国普遍设置节度使（战事平息改为观察使），使地方行政机构由州—县二级制，改变为“节度（观察）使—州—县”三级制。其中“河朔三镇”，由于授安史余党为节度使，因而成为半独立状态。其次，朝廷为平定叛乱，从西北边境调兵，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占据陇右大片土地，至宣宗大中年间才收回。再次，安史之乱使黄河南北成为战区，百姓流亡，改变了人口分布状况，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因而，北方经济停滞不前，长江以南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人口大量流动的结果，还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转变。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起来。与此相适应，以

“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让位于“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

安史之乱虽然使开元、天宝年间出现的繁荣、昌盛局面出现逆转，出现了二三十年的经济凋敝，但是至大历中期开始复苏。自德宗即位至宣宗在位的近 80 年中，唐代经济在唐前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唐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更是如此，直到唐末的战乱，才终止了这一发展过程。

第十一章　关内道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一、安史叛军对长安的破坏

安史乱军攻入洛阳后，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即皇帝位。6月8日叛军攻破潼关，13日黎明，唐玄宗一行出延秋门（禁苑之西门）向成都方向逃去。“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1]为了动员地方力量平定叛军。在逃往成都的路上，玄宗在普安郡（剑州）任命了一大批贵族、官员为地方节度使，将唐前期边境置节度使的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不仅如此，还规定：“应须于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2]也就是说，从此节度使在全国普遍设置，而他们拥有任命官吏权，统军权和财政权。如果说，以前地方行政机构为“州—县”二级制，从此则改为“节度使—州—县”三级制。在此前数日，即七月初九，太子李亨在灵武（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安禄山入长安后，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3]安

---

〔1〕〔2〕　《资治通鉴》（15）卷218《至德元载》，6 971、6 984页。

〔3〕《资治通鉴》（15）卷218《至德元载》，6 980、6 994页。

禄山听说百姓乘乱多盗库物，“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1] 此时社会秩序大乱。有郑会者，“家在渭南（今市名），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所在贼盗蜂起，大多群聚州县。郑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2] 可知当时乡村更不安全。韦应物有诗《江南遇天宝乐叟》：“禄山未乱入黎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欢娱未足燕寇至……从此飘沦落南土。”[3] 可知当时有许多人逃至江南。安史叛军不久退出长安，但给京畿地区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将西北边军调入以平定叛乱，吐蕃“乘艰难际，盗据河右（陇右、河西道），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州）由是为边郡”。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十月，吐蕃攻入长安，代宗逃至陕州。“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数月后，因传闻唐军将大举反攻，“吐蕃惶骇，悉众遁去”。[4] 吐蕃撤出长安，占据原州（今宁夏固原县）、会州（今甘肃靖远县）；经常骚扰泾州（甘肃镇原）、陇州（甘肃陇县），因而邠州（治新平县，今陕西省彬县。）成为边州。

常衮自永泰元年（765 年）为中书舍人，起草诏敕。在其起草的《授徐演长安县令等制》中，指出：“京兆素称雄剧，今则仓廪空虚……人户离逿”[5] 这一时期连年灾荒，加以吐蕃骚扰，加以赋役沉重，至大历四年（769 年）三月，京畿地区“比屋流散”，以致“京畿户口，减耗大半”。[6]

---

〔1〕《资治通鉴》（15）卷 218《至德元载》，6 980、6 994 页。

〔2〕《太平广记》（8）卷 376《郑会》，2 989 页。

〔3〕《文苑英华》（3）卷 348，1791 页。

〔4〕《资治通鉴》（15）卷 223《广德元年》，7 153 页。

〔5〕《文苑英华》（3）卷 407，《中书制诰》，2 064 页。

〔6〕《旧唐书》（2）卷 11，《代宗》，292 页。

天宝年间繁盛的昭应县华清宫，已是败落景象。“大历十才子”耿沣在《晚次昭应》诗中写道：“骊宫户久闭”、“牛羊下荒冢”〔1〕。韦应物在《温泉行》中写道：“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2〕不仅如此，为了章敬太后（代宗母）冥福修建的章敬寺，“尽都市之材不足用”，鱼朝恩“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3〕华清宫的凋残景象，正是安史乱后20余年京畿地区的写照。

二、京畿地区经济的复苏

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唐代宗时，朝廷采取了一些恢复京畿地区农业生产的措施，颇见成效。

唐初在京畿地区西部岐州（今陕西省凤翔），邠州（今陕西省彬县）以及宁州（今甘肃省宁县），泾州（今甘肃省泾川）置七马坊，畜养战马数十万头。虽然马监后移至陇右，但岐、宁、泾等州旧马坊的土地仍旧闲置。“至德以后，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散，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其地利因归于闲厩使。宝应（762—763年）中，凤翔节度使请以监牧地赋给贫民为业，土著相承。”〔4〕这些土地逐渐开垦出来。

华州（陕西省华阴）屯田散给百姓。常衮起草的《废华州屯田制》中写道：“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以来，皆变良沃。”“华州人户，土地非广，其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唐大诏令集》卷111）

拆除碾硙，以利民田灌溉。大历十三年（778年）代宗下诏“毁除白渠水友流碾硙”，因为碾硙“妨民溉田”。升平公主有硙两轮，公主见代宗诉之，“帝谓公主曰：‘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耶？可为众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5〕由于碾硙

〔1〕《全唐诗》（8）卷268，2 973页。

〔2〕《全唐诗》（6）卷194，2 001页。

〔3〕《资治通鉴》（15）卷224《大历二年》，7 195页。

〔4〕《旧唐书》（12）卷141《张孝忠》，3 861页。

〔5〕《旧唐书》（11）卷120，《郭子仪》，3 470页。

用河水作动力。设置大量碾硙势必“妨民溉田”，拆除碾硙，这对当时京畿地区农业生产的复苏有重大意义。

从宝应元年（762 年）至大历四年（769 年）的经营，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复苏。大历四年，常衮起草的《减征京畿丁役等制》：“劳精极虑十有四年[1]……游食之人悉归南亩，垦田之数渐复平时。神降嘉禾，岁乃大熟。”[2] 代宗在《大历八年赦》中指出：“关辅之内，农祥荐臻，嘉谷丰衍，宿麦滋殖。闾阎之间，仓廪皆实，百价低贱，实曰小康。”（《唐大诏令集》卷 850）从安史之乱爆发，至大历八年，京畿地区农业走出低谷，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关内道的地方行政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在开元元年（713 年），作为边境十节度使之一的“朔方”节度使就设置于灵州（宁夏吴忠），其职权只是统兵作战。自肃宗乾元二年（759 年）至德宗贞元元年（785 年）在关内道先后设置邠宁、凤翔、鄜坊、振武、泾原和夏绥银等六节度使。连同朔方节度使，关内道共置七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亦称“方镇”，拥有行政、统军和财权、实际是州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而由于凤翔（治岐州）、邠宁（治邠州）节度使的设置，唐后期“京畿”比前大为缩小，只包括京兆府、同州和华州三州府。

自大历中期京畿地区农业生产复苏以后。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宗各朝，关内道（含京畿）社会经济在唐前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

〔1〕“劳精极虑十有四年”指从安史之乱爆发至大历四年而言。

〔2〕《文苑英华》(3) 卷 434，2 198 页。

一、京畿地区

（一）农业

贞元二年（786年）德宗“以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下诏“诸道进耕牛。待诸道观察使各选拣牛进贡，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1]敬宗宝历年间（825—827年）诏：“委度支于东镇武、灵盐、夏州分市耕牛万头交付京兆尹，均给畿内贫下百姓。其价以户部绫绢充。”[2]京兆府高陵县（今县名）令刘仁师，彭城人，于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将境内古白渠加以疏浚，又筑新堰，百姓请命新渠曰刘公渠、而名堰曰彭城堰。次年，又于泾原、三原（今县名）二县“拥其冲为七堰，以析水势”[3]使三县耕地得以灌溉。

同州（治冯翊县，今大荔）土地贫瘠，而临近黄河各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侧近，且有河砾填淹”，而赋税早有定额，百姓深受其害。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同州刺史元稹将荒田以及河侵沙淹之地的赋税旧额全部免除，减免了百姓的不合理负担[4]。同州的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元和年间崔某任华原令，在境内“复流庸，辟旷土。”[5]华州的农业劳动力增多，开垦了更多的耕地。

从贞元至宝历数十年的经营，京兆府和同、华二州的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

尽管如此，但由于京师人口过多，加以官员、戍兵数量庞大，而京畿所产粮食有限，仍需外地供应。穆宗长庆年间，沈亚之在《东渭桥给纳使新厅记》中写道：东渭桥为“天廪”所在地，“内淮

---

〔1〕《旧唐书》（12）卷153《袁高》，4 088页。

〔2〕《全唐文》（1）卷68《令市耕牛诏》，716页。

〔3〕《全唐文》（6）卷609《高陵令刘君遗爱碑》，6 152页。

〔4〕《全唐文》（7）卷651《当州两税地》6 618页。

〔5〕《全唐文》（7）卷631《博陵崔公行状》，6 367页。

江之粟，而群曹、百卫于是仰给。”[1]除粮食以外，丝织品也需外地供应。前面提到，京兆府、同、华二州虽产丝、绵，但对实际需要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十月，中书、门下奏言：“京邑元无土绢，市中所货，皆是外州将到。”[2]

物产

樱桃　张籍（贞元十五年进士）在《朝日赦百官樱桃》：“仙果人间却未有，今朝忽见下天门，捧盘小吏初宣赦，当殿群臣共拜恩。”[3]前面提到景云年间官苑种樱桃，七八十年后，民间仍未有。

梨　“唐兴平（属京兆府）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太和四年（830年）冬十一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4]

竹　“凤翔（原岐州，至德二载改为凤翔府）王鲔，年十四五，与童儿辈戏于果园、竹林下。”[5]

甘蔗　代宗时，常衮在《谢赐甘蔗、芋等状》中写道：“乔甘至，奉宣恩命，赐苑中所种甘蔗及芋等，其形丰，其味甘。”[6]

牡丹花　随着经济的发展，唐后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喜爱花卉，成为时尚。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从朗州返长安（今西安市）正值春暖花开时节，长安士女纷至玄都观赏花。刘禹锡作《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当日传于都下”。刘禹锡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予为屯田员

〔1〕《全唐文》(8) 卷736，7 602页。

〔2〕《册府元龟》(8) 卷616《刑法部·议谳门》，7 410页。

〔3〕《全唐诗》(12) 卷385，4 338页。

〔4〕《太平广记》(9) 卷417《花卉》，3 397页。

〔5〕《太平广记》(8) 卷352《王鲔》，2 787页。

〔6〕《文苑英华》(4) 卷633《状》，3 268页。

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此篇，志一时之事耳。"〔1〕玄都观千树桃花，能吸引满城士女观赏，而刘禹锡之诗"当日传于都下"，在当时没有近代媒体条件下，仅靠口传、手抄，可知唐后期长安百姓文化素质之高。

至于富贵人家，不惜一掷千金用于买花、种花。宣宗大中年间，司马扎作《卖花者》诗："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2〕刘言史：《买花谣》："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千金使买一株红，院多花少栽未得。""浇红泛绿千万家。"〔3〕

在诸多花卉中，以牡丹花最为珍贵。开元末年京畿已有牡丹，唐后期种植广泛。《酉阳杂俎》续集卷九：李德裕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茂葵校几多。'"白居易：《买花》诗："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4〕毛熙：《牡丹》："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5〕牡丹花如此昂贵，说明它是新出现的品种，"今朝始得分明见"一句，正说明了这一问题。白居易、毛熙的感慨也很自然。尽管牡丹昂贵，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唐白居易初为杭州刺史，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栏门甚密，他处未之有也……牡丹花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6〕白居易于穆宗长庆二年

〔1〕《太平广记》(10) 卷498《刘禹锡》，4 086页。
〔2〕《全唐诗》(18) 卷596，6 900页。
〔3〕《全唐诗》(14) 卷468，5 323页。
〔4〕《全唐诗》(13) 卷425，4 676页。
〔5〕《全唐诗》(15) 卷505，5 743页。
〔6〕《太平广记》(4) 卷199《杜牧》，1 492页。

(822 年) 至四年任杭州刺史。由此可知，此前江南没有牡丹花，直到长庆二年或稍前些时，才由长安引入而分种之也。

(二) 长安：手工业和商业

唐后期长安（今西安市）的居民大为增多。代宗时，岑参在《秋夜闻笛》中说："长安城中百万家"[1] 德宗、宪宗、穆宗时人韩愈在《出门》一诗中写道："长安百万家"[2]。文宗、武宗时人贾岛在《望山》一诗中指出："长安百万家"[3] 由此可知，安史乱后，长安民户达百万，至文宗、武宗时不变。尽管这不是统计数字，而是诗人的夸张，但长安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则是不争的事实。

唐后期长安的手工业、商业有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专业化的"行"和"市"大为增多。

西市

柜坊　即专门办理储钱业务，即前揭"锁钱"业务。窦义，大历时人。他于西市柜坊储钱很多。崇贤里有小宅出售，价值 200 贯文。窦义欲购之。于是至"西市柜坊""依直（值）出钱市之"。[4]

秤行　"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曰'小海池'"[5] 秤行，即制作秤的作坊，而作坊集中之地称为行。

鞦辔行　即制作秋千和马索的作坊的集中地。江陵（自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改荆州为江陵府）副使李君，年轻时一日至"西市秋辔行头坐"[6]

金市　经营金银首饰的店肆集中的街面称金市。唐宪宗元和年

---

〔1〕《全唐诗》(6) 卷 201，2 107 页。

〔2〕《全唐诗》(10) 卷 337，3 783 页。

〔3〕《全唐诗》(17) 卷 571，6 617 页。

〔4〕《太平广记》(5) 卷 243《窦义》，1 877 页。

〔5〕《太平广记》(5) 卷 243《窦义》(代宗大历时人)，1 877 页。

〔6〕《太平广记》(4) 卷 157《李君》，1 130 页。

间，王琚自郑州入长安，过洛阳，在天津桥，有人送给他金子五两，并说："此不可与常等价也。到京，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1]

药市　柳宗元：《宋清传》："宋清长安西部（市？）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2]

东市

铁行　"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3]在东市铁行地段，有范生以算卦为生，各地举人来长安应科举考试，来卜成败，范生连连卜得灵验，而一卦要价一匹丝织品。可知东市铁行的存在。

东市经营的行业很多。"唐长安市里风俗，每岁至元日以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4]"笔生"可能是制笔工匠。

文宗"开成（836—840年）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5]可知东市有专售装殓用具之店肆。

扶风县人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6]可知东市有"赁驴"行业，行人可以之代步。

唐后期手工业、商业已超出两市的界限。"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7]通化门，是长安城东北门。通化门之内即开元年间所修的"夹城"，

---

〔1〕《太平广记》(1) 卷35《王四郎》，223页。
〔2〕《文苑英华》(5) 卷794，4 197页。
〔3〕《太平广记》(6) 卷261《郑群玉》，2 043页。
〔4〕《太平广记》(3) 卷134《赵太》，955页。
〔5〕《酉阳杂俎》前集卷15，147页。
〔6〕《太平广记》(7) 卷346《马震》，2 741页。
〔7〕《太平广记》(2) 卷541《奚乐山》，541页。

而夹城只是贯穿南北的夹道。因此所谓“通化门长店”只能在通化门之外。而这里“多是车工之所居”这就是说，唐后期在长安城外已出现一些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地。与此同时，坊（居民点）中也开了店肆。“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邀入长兴里（即长兴坊，在“东市”西）毕罗（面食）店……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1〕至于小贩走街串巷的更多，例如，名为邹骆驼者，常推小车卖蒸饼于胜业坊〔2〕饮食业的规模很大。德宗时，京兆尹吴凑奉命上调，在府中举行告别宴会。很快就列筵，吏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3〕

早自开元、天宝以来，手工业日益发达，生产了更为精美的手工业品。京师长安富豪很多，他们享受这些各地所产的精美物品。开元年间，韦陟有疾。尚书房琯使弟子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侍婢皆笑。举朝以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4〕这说明当时富豪家已铺地毯。白居易（772—846）在《红线毯》中说：“织作披香殿上毯”是“年年十月来宣州（治宣城县，今安徽省宣州市）”（《白居易集》卷4《讽谕四》）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宰相令狐绹，提到奇异之物，遂“自出铁桶，径不及寸，长四寸。内取小卷书于日中视之，乃《九经》并足（全文）。其纸即蜡蒲团，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难以言述”。除精制小书以外，“复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视之似非人世有”。〔5〕长安妇人首饰异常精美。“长庆(821—824年)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

〔1〕《太平广记》(6) 卷278《国子监明经》，2 209页。

〔2〕《太平广记》(8) 卷400《邹骆驼》，3 216页。

〔3〕王谠：《唐语林校证》卷6，5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唐国史补》卷上，18页。

〔5〕《太平广记》(5) 卷232《令狐绹》，1 779页。

'百不知'。"〔1〕

随着长安与各地经济交流日益发展，长安的巨商大贾日益增多。"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2〕白居易"退居渭南"时，"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3〕，东京（洛阳）收粟帛，西市鬻金珠"〔4〕。

唐后期长安胡人较前大为增多。崇贤坊窦某，于东市以廉价购得一片洼地，以砖瓦填之，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于上"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5〕此旅店专门接待波斯商人，可知当时长安胡人之多。胡人从事饮食业者有之。如"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6〕贺朝在《赠酒店胡姬》一诗中写道："胡姬春酒店，弦管乐锵锵。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7〕描述了胡姬酒店的盛况。胡人还经营珠宝行业。有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如弹丸。其后严生游长安，于春明门逢一胡人。胡曰："衣囊中有奇宝愿得一见。"生以"弹丸"示之。胡人捧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钱）为价。"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厚价而归。〔8〕有波斯胡人至扶风（今陕西省扶风），以钱2 000买得某户门前一石。"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9〕前面提到，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有

〔1〕《唐语林》卷6，593页。

〔2〕李复言：《续玄怪录》卷4《驴言》，183页。

〔3〕《旧唐书》(5) 卷38《地理一》1 402页。凤翔府（原为岐州）："至德二年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长安）、河南（洛阳）、太原为五京。"

〔4〕《全唐诗》(13) 卷428《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4 721页。

〔5〕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0，84页。

〔6〕《太平广记》(9) 卷402《鬻饼胡》，3 243页。

〔7〕《全唐诗》(4) 卷117，1 181页。

〔8〕张读：《宣室志》卷6，78页。

〔9〕《太平广记》卷402《径寸珠》，3 237页。

4 000人，由于吐蕃陷陇右，他们的归路断绝，因而“仰给于鸿胪”、“于度友受直”，成为朝廷的负担。德宗贞元三年（787 年）李泌对德宗说：“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由于这些胡人在长安居住了 40 年，且“皆有妻子、买田”，因而“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李泌将之“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1]

唐后期不仅长安有市，京兆府周至县（今陕西省周至）、华州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也有市。沈亚之于长庆年间所撰《周至县丞厅壁记》中指出该县“三蜀（即东川、西川和山南东道）移民游手其间，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于（之）九；趋农桑业者十（之）五”。[2]“道士张谨，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3]

（三）关内道南部地区

唐前期关内道南部泾、原、邠、宁、岐（后改为凤翔府）、陇等州属京畿、唐后期先后分置泾原、邠宁和凤翔陇州等节度使。由于这些节度使的设置，唐后期京畿道辖区大为缩小。为叙述前后一致，这里仍以唐前期京畿地区的范围加以叙述。因而，在叙述长安、同州、华州之后，将上述节度使辖区的经济发展加以介绍。

泾原　德宗贞元四年（788 年）至十九年（803 年）刘昌任泾原节度使。刘昌在任期间，屯军原州之平凉县（今甘肃省平凉），“开地二百里”，在境内“有市列，井树之间，鸡犬相闻。”并使士卒“辟彼堵硗，麦禾蔽野”。贞元十五年（799 年）将所产粟米“上献天府，数至十万，以赡东师”。[4]

---

〔1〕《资治通鉴》（16）卷 232《贞元三年》，7 493 页。

〔2〕《文苑英华》（5）卷 805，4 256 页。

〔3〕《太平广记》（10）卷 455《张谨》，3 716 页。

〔4〕《全唐文》（5）卷 496《南川郡王刘公纪功碑铭》，5 061 页。

“杨元卿，敬宗时为泾原节度使。宝历元年上言：‘营田收禾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又“张惟清为泾原节度使。太和五年进助边粮粟、麦，合二十万”。[1]

杨元卿于长庆元年（821年）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任泾原节度使。在任“乃奏置营田五千顷，每屯筑墙高数仞，键闭牢密，猝然寇至，尽可保守”。营田成，“泾人论奏为立德政碑。”[2]

邠宁　邠宁节度使管内在大和年间立屯田。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户部尚书王起奏曰：“……邠宁田土宽广，又复肥浓，悉堪种莳。”建议朝廷“与本道计会立营田。”文宗“从之。”[3]宣宗大中六年（852年）毕诚任邠宁节度使。“诚募士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斛，以省度支经费，诏以嘉美。”[4]

邠州、宁州畜牧业较为发达。《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785—804年）初，西行邸邠宁，回易其羊……遂得大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

凤翔陇州　元和六年（811年）李惟简任凤翔、陇州节度使。在境内，购买耕牛，铸农器“给农之不能自具者”。于是“丁壮兴励，岁增田数十万亩，连八岁，五谷俱熟，公私有余。”将剩余农产品，由“贩者负入褒斜（道）、沿循渭（水）而下，首尾相继不绝”。[5]

由上可知，唐后期关内道南部地区，开屯田，置营田，“开地二百里”、“营田五千顷”，开垦了大量荒地，发展农业生产。

---

〔1〕《册府元龟》（6）卷485《邦计部·济军》，5 798页。

〔2〕《旧唐书》（13）卷161《杨元卿》，4 229页。

〔3〕《册府元龟》（6）卷503《邦计部·屯田》，6 038页。

〔4〕《新唐书》（17）卷183《毕诚》，5 380页。

〔5〕《全唐文》（6）卷565《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5 720页。

二、关内道中部、北部地区

德宗贞元三年（787年），以韩谭为夏州刺史、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1〕。夏州，在今内蒙毛乌素沙漠一带；绥州在今陕西省绥德；银州，在今陕西榆林、米脂一带。

夏州（治朔方县，今吉林白城）一般地说，虽是“夏州沙碛，无树艺生业”〔2〕。在韩谭任节度使时，于贞元七年“奏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3〕李愿于元和元年（806年）至六年（811年）任节度使时，“威令简肃，甚得绥怀之术”。〔4〕

银州（治儒林县，今陕西省佳县西）置马监。文宗太和七年（833年）筹得羡余绢5万匹，按时价可购“孳生堪牧养马”三千余匹。由夏绥银宥节度使刘源充银州监使筹办。开成二年（837年）刘源奏：“伏准太和七年十一月敕：委臣于银州监置监城一所，收管群牧。自立务后，今计蕃息孳生马，约七千匹。”〔5〕

宥州，今内蒙鄂托克旗。唐玄宗开元二千六年（738年）于此置宥州。安史乱后废置。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宰相李吉甫建议复置宥州。“九年五月，诏复于经略军城（鄂托克旗之东）置宥州，仍为上州，于州郭下置延恩县为上县，改隶夏绥银观察使”。〔6〕

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以王佖为灵盐节度使。〔7〕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银川一带；盐州，今陕西省定边一带。

盐州，地势重要。“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

〔1〕《旧唐书》（2）卷12《德宗上》，357页。
〔2〕《新唐书》（15）卷141《韩全义》，4 659页。
〔3〕《旧唐书》（2）卷13《德宗下》，372页。
〔4〕《旧唐书》（11）卷133《李晟传附李愿传》，3 676页。
〔5〕《唐会要》（中）卷66《群牧使》，1 147页。
〔6〕《元和郡县图志》（上）卷4《新宥州》，106～107页。
〔7〕《旧唐书》（2）卷14《宪宗上》，428页。

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捍王畿。”[1] 因此，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德宗按图自定计”，加强盐州的防守，“乃诏（杜）希全及朔方、邠宁、银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营诸节度，合选士（卒）三万五千屯盐州”、“由是虏惮，不轻入。”[2] 同时修筑盐城城垣，“取六千人充”“板筑杂役”[3] 白居易在《城盐州》中写道：“自筑盐城千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4]

盐州以产盐得名。“乌池在盐州，旧置榷税使。长庆元年（821年）三月敕：“乌池每年粜盐收博榷米，以一十五万石为定额。”[5]

灵州（治灵武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田土宽广，又复肥浓，悉堪种莳”[6] 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李听任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将议屯田。诏（李）听复开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7] 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七月，“灵武节度使奏于‘特进渠’新置营田六百顷”。[8]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三月赦节文：“灵武、天德三城（天德军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东、西、中三受降城，在今托克托、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包头市）封部之内，皆有良田，缘无居人，久绝耕种。自今以后，天下囚徒合处死刑，愤非巨蠹者特许生全，并家口配流此三道，仍令本镇各收管安存兼接借农具务使耕植”。[9]

李听所开光禄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所谓“至今”当为《旧唐书》成书的后晋之时。由此可知，会昌六年所称“久绝耕种”

---

〔1〕《旧唐书》（12）卷144《杜希全》，3 924页。

〔2〕《新唐书》卷156《杜希全》，4 908页。

〔3〕《旧唐书》（12）卷144《杜希全》，3 924页。

〔4〕《全唐诗》（13）卷426，4 695页。

〔5〕《旧唐书》（6）卷48《食货上》，2 110页。

〔6〕〔9〕《册府元龟》（6）卷503《邦计部·屯田》，6 038页。

〔7〕《旧唐书》（6）卷133《李晟附李听》，3 683页。

〔8〕《册府元龟》（6）卷503《邦计部·屯田》，6 037页。

原指屯田、营田之外的广大田野而言。而这些田野于会昌以后，也陆续开垦。

前面提到，敬宗宝历年间“度支于东镇武（振武军，在今内蒙托克托）灵盐、夏州所市耕牛万头”一事，说明上述地区畜牧业很发达。

关内道北部，其东部，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置振武（振武军，在今内蒙托克托）、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胜州（内蒙托克托）节度使。其西部，同年置天德军（内蒙乌拉特前旗）、西受降城（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都防御使。

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冬，韩重华任水陆转运使，于振武军置屯田。募人为15屯。屯置130人，种100顷。“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转而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今内蒙包头市之东），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朝廷从其议，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1]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李德裕在《条疏边上事宜状》中指出：“麟、胜两州中间，地名富谷，人至殷繁，盖藏甚实”。建议“令度支拣干事有才人充和籴使，及秋收就此和籴。”[2]可知麟、胜两州农业发达。

德宗贞元中，“李景略为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于丰州境内。“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公私利焉”。[3]

丰州（治九原县，今五原以南）盐池。“先是，（温池盐）湖落地在丰州界，河东供军使收管。每年采盐约一万四千余石，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武宗会昌四年（844年）三月，

---

〔1〕《全唐文》(6) 卷556《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5 623页。

〔2〕《全唐文》(7) 卷705，7 235页。

〔3〕《旧唐书》(6) 卷48《食货上》，2 110页

“因收复河陇敕令度支收管温池盐，仍差灵州分巡院官专勾当”。（《册府元龟》卷492，邦计部·山泽二）

第三节　唐末的破坏

唐朝末年，长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当此前僖宗出逃时，“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1]然而，“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2]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四月八日，官军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3]黄巢“焚宫室遁去”，并未造成巨大破坏。“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4]官军造成的破坏更大。

由于长安宫室焚毁，僖宗以王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园陵等使。王徽“招抚流散，户口稍归，复缮治宫室，百司粗有绪”。[5]“数年之间，版户稍葺，东内（即大明宫）斋阁，缮完有序”。[6]《太平广记》卷499《王氏子》：“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不仅如此，“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这说明，黄巢退后，长安逐渐修复；而王酒胡自西市运钱，

〔1〕《资治通鉴》（17）卷254《广明元年》，8 240页。
〔2〕《旧唐书》（3）卷19下《僖宗》，722页。
〔3〕《资治通鉴》（18）卷255《中和三年》，8 293页。
〔4〕《旧唐书》（3）卷19下《僖宗》，722页。
〔5〕《资治通鉴》（18）卷256《中和四年》，8 313页。
〔6〕《旧唐书》（14）卷178《王徽》，4 642页。

也透露了“居市间里”破坏有限。然而，至唐昭宗时，长安才遭毁灭性破坏。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为挟持昭宗至洛阳，“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以运至洛阳）。长安自此遂为丘墟矣。”〔1〕

京畿地区各州县，未遭严重破坏。十数年后，至后梁时，逐渐得以恢复。例如，后梁龙德年间（921—923年）牛知业为宁州牧守，在宁州州城（今甘肃宁县）大加修缮。“次下马门，次中衙戟门，大厅小厅，内厅寝堂，中堂暖堂，皆栋梁宏丽”；“自余厩库曹署、军事院、州院、牙将、孔目诸院，马将鞠场，教旗讲武，驰驿之传舍，兵食之储廪，皆新所创置焉。”更为重要的是，“然后疏彼康庄，高其闳闬，右列廛阓，贾区贸货于市中，平分井居，堵（缺一字）周环于宇下，四民各敬其本，百工用肆其业，既富既庶矣”。〔2〕

〔1〕《资治通鉴》（18）卷264《天祐元年》，8 626页。

〔2〕《全唐文》（9）卷829《柱国牛公新筑州城创建公署记》，8 734页。

第十二章　河南道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一、洛阳及河南诸州的破坏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举兵叛乱，十二月十三日攻陷东都。“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1]然而，此时洛阳并未受到重大破坏。肃宗至德二载(757年)，“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肃宗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德二载九月二十八日，唐军、回纥兵收复长安，回纥叶护可汗欲如约，广平王李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如约。”十月十八日，又克洛阳，叶护请如约，洛阳“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2]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四月，洛阳又陷于叛军。“史思明入东京”。[3]此时安禄山已死。肃宗再一次使用回纥兵，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

〔1〕《资治通鉴》(15) 卷217《天宝十四载》，6 939页。

〔2〕《资治通鉴》(15) 卷220《至德二载》，7 033、7 034、7 041页。

〔3〕《资治通鉴》(15) 卷221《上元元年》，7 092页。

火”。不仅如此，唐军“朔方军”、“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1] 这一次，洛阳遭到严重破坏，而郑（今郑州市）、汴（今开封市）、汝（今临汝）等州亦遭涂炭。

早在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二月十三日安禄山攻陷东京时，“（封）常清奔至陕州（今三门峡市以西），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2]“太原仓”是江淮、河南、河北漕粮输至长安的转运站。而在乾元二年（759 年）“逆党史思明侵河南，守将李铣于（齐州）长清县（今山东省长清县）界“边家口”，决黄河水灌师，因此，河水漂没，城邑百姓流散，其城遂废”。（《太平寰宇记》卷 19《齐州禹城县》）由此看来，在安史之乱中，回纥兵与官军给洛阳及河南诸州的破坏远远超过安史叛军。

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郭子仪指出：“洛阳自太盗以来，焚埃略尽，百曹榛荒，寰服不满千户，井邑如墟，豺狼群嗥；东薄郑、汴，南界徐，北绵怀、卫、相，千里萧条，亭舍不烟。”[3] 这就是说，自安史之乱以后至广德元年这八年中，不仅洛阳和都畿地区“井邑如墟”，而且河南道大部州县，以至河北道南部诸州也都“千里萧条”。

代宗上元元年（760 年）刘宴任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广德二年（764 年）刘宴给元载书中指出：“晏自尹京入为计相，共五年矣。”这时，他“驱马陕郊，见三门渠津遗迹，到河阴、巩、洛、见宇文恺置梁公堰……”、“涉荥郊、浚泽，遥瞻淮甸，步步探讨（漕运）”在他考察漕运过程中，看到的是“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隋宜阳县，唐改为福昌县）、熊耳（山

〔1〕《资治通鉴》（15）卷 222《宝应元年》，7 135 页。

〔2〕《太平广记》（4）卷 189《封常清》，1 418 页。

〔3〕《新唐书》（15）卷 137《郭子仪》，4 604 页。

名，在河南府永宁东北45里、卢氏县南50里）至武牢（汜水县有武牢城，成皋府在县北）、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1〕安史之乱十年后，洛阳东至汜水，西至福昌的500里内，百姓只有1000余户。

常衮在《刘宴宣慰河南淮南制》中写道：“自兵乱一纪，事殷四方，耕夫困于军旅，蚕妇病于馈饷……致令户口减耗，十无一二，而河南、淮南，又甚诸道。”〔2〕由此可知，安史之乱的七八年中，河南、淮南破坏最大。

二、洛阳及河南诸州经济的复苏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史思明之子）缢死林中，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始告平息。早在玄宗逃往成都的路上，下诏在全国遍置节度使，授予财权、军权和任命属吏权，在战乱平息后，州刺史和节度使在管内着手恢复经济。

东都洛阳　张延赏“大历二年（767年）拜河南尹，充诸道营田副使。河洛久当兵冲，闾井丘墟。延赏勤身率下，政尚简约，疏导河渠修筑宫庙，数年间，流庸归附，邦畿复完”。〔3〕

郑州（治管城县，今河南省郑州市）马燧自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三年（768年）任郑州刺史，“燧乃劝课农亩，总其户籍岁一税之，州人以为便”。〔4〕安史乱中，赋税名目繁多，马燧“岁一税之”，改革税收，使百姓安心生产。

都畿地区经济复苏的同时，河南道诸州也逐渐复苏。

滑（治白马县，今滑县）、亳（治谯县，今亳州市）等州，自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八年（773年）任滑亳节度使的令狐彰，

〔1〕《旧唐书》（11）卷123《刘宴》，3 512页。

〔2〕《全唐文》（5）卷414，4 240页。

〔3〕《旧唐书》（11）卷129《张延赏》，3 607页。

〔4〕《旧唐书》（11）卷134《令狐彰》，3 690页。

初到任，“滑州疮痍未复，城邑为墟”，经过数年的治理，“数年间，田畴大辟，库藏充积，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缺”。[1]

淄（治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南）、青（治寿光县，今县名，）、齐（治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等州。自宝应元年（762年）至永泰元年（765年）任淄青节度使的侯希逸，在职期间，“甚著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2]自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任淄青节度使的李正己，自大历十二年(777年)，除“初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此二州属河北道）等州之地……复得曹、泗、徐、兖、郓，共十有五州。”几乎囊括了河南道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而在其管内“法令齐一，赋税均轻”。由于李正己所辖地区大，加以治理有方，因而“最称强大”。[3]

早在广德二年（764年）平息叛乱，朝廷就着手疏浚汴河。“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4]这是因为汴水（通济渠），的水源来自黄河，而黄河水“一石水，五斗泥（沙）”。因此，“河汴有初，不修则毁溃，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茨，决泄淤，清明桃花以后，远水自然安流”。[5]在安史战乱中，数年不疏浚，汴水经常淤塞，漕路不通，因而漕运改为“溯江入汉（水），抵梁洋，故汴渠堙废不治。”[6]是年3月，“以太子宾客刘宴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由于江汉漕路“迂险劳费”漕粮有限，以致“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援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前面提到刘晏给元载（时任宰相）书，“具陈漕运利病，令中外相应”。汴河疏浚后，“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7]

---

〔1〕《旧唐书》(11) 卷124《马燧》，3 528页。

〔2〕《旧唐书》(11) 卷124《侯希逸》，3 534页。

〔3〕《旧唐书》(11) 卷124《李正己》，3 535页。

〔4〕〔6〕〔7〕《资治通鉴》(15) 卷223《广德二年》，7 164页。

〔5〕《旧唐书》(11) 卷123《刘宴》，3 513页。

为使漕运通畅，还采取了安全措施。代宗在《缘汴河置防援诏》中指出："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因此，"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使）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盗贼）"。[1]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河南道遍置节度使，而各节度使所辖州经常变动，节度使名称也随之变动。这些节度使大多服从中央政令，只有少数节度使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半独立状态，不朝觐、不纳贡赋。但各节度使在其辖区内，发挥了一级行政机构的作用，对发展地区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自代宗大历中期洛阳及河南诸州经济复苏以后，至文、武、宣宗各朝，河南道的社会经济在唐前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一、洛阳

张籍，贞元十五年（799年）进士及第。他在《洛阳行》一诗中，对当时东都洛阳有具体的描述：

洛阳宫阙当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楼。

……

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

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宫。

百官月月拜章表，驿使相续长安道。[2]

从"御门空锁五十年"、"农夫修玉殿"，可知洛阳城的建筑在战乱中破坏很大，而在50年中，农夫已陆续修缮完好。从"御门

〔1〕《全唐文》(1) 卷46，513页。

〔2〕《全唐诗》(12) 卷382，4 285页。

空锁”“月月拜章表”和“驿使相续长安道”，可知唐后期皇帝已很少至东都，与高宗、武则天时大不相同。不过，朝廷在东都设置“东都留守”一职，由高官担任，常驻东都，处理事务。在东都“百官月月拜章表”，而东都与长安之间“驿使相续长安道”，保持经常的联系。例如，贞元五年，杜亚为“东都留守”，曾“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1]

于武俊，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年）人，他在《过洛阳城》一诗中写道：

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

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又行。[2]

后一句，勾画了会昌年间，洛阳六街九陌的繁华景况。不过，唐后期的洛阳比起唐前期，稍有逊色。这恐怕是后来失去都城地位的原因。而前一句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即唐后期东都曾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场所。敬宗宝历二年（826 年）崔郾任礼部侍郎，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者无非名士”。[3] 正因如此，于武俊才说“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

唐后期田庄、别业迅速发展，而洛阳一带自然条件优越，因而贵族、高官多在这里修建庄园。李德裕的平泉庄尤富盛名：

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树，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潆回疏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脉，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故数年之间，无所不有。[4]

---

〔1〕《旧唐书》（12）卷 146《杜亚》，3 964 页。

〔2〕《全唐诗》（18）卷 595，6 897 页。

〔3〕《旧唐书》（13）卷 155《崔邠附崔郾》，4 118 页。

〔4〕《太平广记》（9）卷 405《李德裕》，3 271 页。

是时达官贵人的府邸中皆有园林。宣宗大中年间（847—858年）“分司东都”韦瓘说：“余洛川敝庐在崇让里，有竹千竿，有池一亩。”〔1〕“东都尊贤坊田令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朵。”〔2〕

白居易罢杭州刺史（时在穆宗长庆四年）“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恬宅”，其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3〕白居易又复出于敬宗宝历元年（825年）至二年任苏州刺史。罢去之日，携藕种归洛阳，于园中种植。他在《种白莲》一诗中写道：“吴中白藕洛中栽”〔4〕，在《感白莲花》中写道：“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滨，谁移尔至此？姑苏白使君。”〔5〕看来，此前北方未有藕，此后才在北方普及。

洛阳的樱桃与石榴被视为珍品。前面提到上元元年（760年）四月，叛将史思明入东京，不久“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时伪封怀王），欲寄遗之。因做诗同去，诗云：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怀王之傅）。”〔6〕可知洛阳樱桃之名贵。唐武宗在位时，曾对左右提到：“东都进石榴，时已熟矣。”〔7〕可知当时洛阳石榴是贡品。

洛阳的手工业和商业有进一步发展。织造业的技术和绫锦花色品种日益精美。《卢氏杂说》载：有卢氏子在洛阳城门东，遇一人吟诵白居易诗，卢愕然，问其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不久前）“以薄艺投本行，皆云：

〔1〕《唐两京城坊考》卷5《崇让坊》，163页。
〔2〕《西阳杂俎》续集卷2《支诺皋中》，208页。
〔3〕《旧唐书》（13）卷166《白居易》，4 354页。
〔4〕《全唐诗》（13）卷448，5 043－5 044页。
〔5〕《全唐诗》（14）卷452，5 113页。
〔6〕《太平广记》（10）卷495《史思明》，4 064页。
〔7〕《太平广记》（2）卷74《唐武宗朝术士》，467页。

'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彩求售者，不重于世。'"〔1〕这说明唐后期丝织业技术日新月异。顺便提到，河南府巩县（今县名）盛产瓷器。"陆羽，字鸿渐……茶术尤精。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2〕

洛阳市中出现劳务市场。"南阳张茂实，唐宣宗大中初（847年）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余，傭仆之直月五百（钱）。"〔3〕张茂实就是从洛阳南市劳务市场雇得王夐的。

洛阳南市有书肆。吕温在《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其《诗注》云："贞元十四年（798年）友人崔人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4〕

唐后期已打破市的界限，店肆在城外、道边纷纷设立。唐文宗开成（836—840年）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5〕

唐后期洛阳与外地的物资交流亦很频繁。"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785年）西行至邠、宁（今陕西省彬县、甘肃省宁县一带），回易其羊"。〔6〕白居易"退居渭上"时，他的"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7〕《东城父老传》：贾至德"贩缯（为帛的一种）洛阳市，来往长安间"。

〔1〕《太平广记》(6) 卷257《织锦人》，2 005页。
〔2〕《国史补》卷中，34页。
〔3〕《太平广记》(2) 卷53《麒麟客》，325页。
〔4〕《唐两京城坊考》卷5《次北南市·长寿寺》，160页。
〔5〕《太平广记》(8) 卷372《卢涵》，2 956页。
〔6〕《太平广记》(3) 卷133《朱化》，944页。
〔7〕《全唐诗》(13) 卷428《效陶潜体诗十六首》，4 724页。

二、河南道诸州

1. 汴（治所为浚仪，今开封市）、宋（以宋城为治所，今商丘市南）二州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置汴、宋节度使治所于汴州。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改称宣武军节度使。

刘宽夫于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在《汴州纠曹厅壁记》中写道："太梁（即汴州治所浚仪县，今开封市）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系，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1]由于汴州有黄河和汴河通过；前者"控河朔之咽喉"；后者"通淮湖之运漕。"由于汴州是全国交通的"要总"，因而人口日渐增多，因此，当地地方官"以（浚仪）城隘不容众，请广之"。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三月庚申朔（即三月初一）筑汴州城"。[2]

在这时期，宣武军节度使对汴州用心治理，效果显著。长庆四年（824年）至太和二年（828年）令狐楚任宣武军节度使。刘禹锡于太和元年五月所撰《汴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

> 既视事三日，挹群吏与之言：
>
> 吾食止圭田，吾用止公人，凡他给过制，伤廉溃洁者，悉罢之，一归于公藏；
>
> 凡曲防苛禁、不情乖体者，悉划之，
>
> ——出乎《典》、《令》；
>
> 凡关征船算，夺时专利者，悉更之，
>
> ——遵乎诏条。[3]

令狐楚宣告：自己除官俸以外，不要一钱；除官派僚属外，不用一个私人；除制度规定以外，不增加一条苛禁；除制度规定以

---

〔1〕《文苑英华》(5) 卷803，4 246页。

〔2〕《旧唐书》(2) 卷12《德宗上》，328页。

〔3〕《全唐文》(18) 卷606，6 121－6 122页。

外，关津征税，不枉加一钱。在他的治理下汴州的经济可想而知。

文宗开成元年(836 年)至五年(840 年)李绅任宣武节度使。在任五年，“一年而下惩劝；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肃然丕变，薰然太和。抚之五年，人俗归厚。”〔1〕这就是说，第一年对僚属、百姓实行劝善、惩恶，第二年做到下面畏服，第三年达到以恶为耻的地步，社会道德水准有很大提高。历时五年，“人俗归厚”。

由于汴州是全国水陆枢纽，十分繁华。王建在《寄汴州令狐(楚）相公》一诗中写道：

水门向晚茶商闹，

桥市通宵酒客行。〔2〕

难得的是，在当时如此繁华的汴州，其社会秩序也很安宁。刘禹锡晚年在《客有话汴州新政书事寄令狐相公》一诗中，写道：“天下咽喉今大宁，军城喜气彻青冥”、“汴州忽复承平事，正月看灯户不扃”。〔3〕人们在正月十五看灯时家家户户门不扃，可知社会秩序的良好。这里所谓“汴州新政”指新上任的宣武节度使令狐楚，而时间约在太和初年。

刘玄佐（原名洽，后赐名玄佐）于大历十二年（777 年）至兴元元年（784 年）任宣武节度使。顾况在贞元五年（789 年）四月十九日撰《宋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该州“无土不殖，桑麦翳野，舟舻织川，城高以坚，土选以饱……自贞观以来，列名氏者，以房梁公（指房玄龄，贞观十一年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事竟不行）为首，存乎东壁。大历之后，继声躅者，宜司徒公（指刘玄佐，建元二年曾为“检校司空”）为首，遂刊于座右。”〔4〕

---

〔1〕《全唐文》（7）卷 678《淮南节度使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6 931 页。

〔2〕《全唐诗》（9）卷 300，3 406 页。

〔3〕《全唐诗》（11）卷 360，4 068 页。

〔4〕《全唐文》（6）卷 52 9，5 371 页。

2. 陈（治所在宛丘县，今河南省淮阳）、许（治所在长社，今许昌市）二州。

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至十五年（799 年）曲环为陈、许节度使。“时陈、许州以李希烈扰乱，遭剽颇甚，人多逃窜他邑以避祸。环勤身恭俭，赋役均平，政令宽简，不三二岁，襁负而归者相属，训农理戎，兵食皆丰羡”。[1]

文宗太和元年(827 年)至六年(832 年)高瑀为陈许节度使。在任期间“奏修筑许州绕城水堤及开渠沟周回一百八十里，毕功”。[2]《新唐书》卷 171《高瑀传》讲到此举之意义曰：“州比水旱无年，瑀相地宜，筑堤庸百八十里，时其钟泄，民赖不饥。”[3]

3. 郑（治管城，今郑州市）、滑（治白马县，今滑县）二州

德宗贞元九年（793 年）至十年李融为义成军节度使、郑滑观察使。“李融为郑州刺史，作赋税法，得其条贯，无兼并豪夺之家，而农者兢劝；境内无荒田，人到于今赖之”。[4]

贞元十年至十三年（797 年）李复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郑滑观察营田等使。“到任，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不率于民，众皆悦之”。[5]

宪宗元和七年（812 年）至十四年（819 年）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元和七年秋，河南瓠子（瓠子河。自河南濮阳南，分黄河水东出，经山东郓城、阳谷、茌平、注入济水）堤溢，“东泛滑，距（滑州州城）才二里。”居民恐慌，薛平“迎河西南行”进行考察。在考察中得知“其水尝导出黎阳县（属河北道卫州，其时属魏博节

〔1〕《册府元龟》(9) 卷 692《牧守部·招辑》，8 255～8 256 页。

〔2〕《册府元龟》(9) 卷 678《牧守部·兴利》，8 163 页。

〔3〕《新唐书》(17) 卷 171，5 193 页。

〔4〕《册府元龟》(9) 卷 678《牧守部·劝课》，8 107 页。

〔5〕《旧唐书》(10) 卷 112《李晟传附李复传》，3 338 页。

度使管辖）傍”，必须取得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允许。于是派僚佐裴弘泰谒见田弘正，得到允许并大力支持。“明年春，滑（州）凿河北黎阳西南（地），役卒万人”，“疏道二十里”使大水通过这20里新渠，流入黄河。“自是滑人无患”。不仅如此，“还堰田（岸边地）凡七百顷，皆归属河南”。[1]

4. 淄（治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南）、青（治益都县，今山东省寿光）、齐（治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三州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平李师道，以其所辖淄、青、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以薛平为节度使。“在镇六周岁（至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兵甲完利、井赋均一。至是入觐，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时人以为，近日节制，罕有其比”。[2]

5. 郓（治郓城，今山东郓城）、曹（治济阴县，今山东菏泽南）、濮（治鄄城，今山东鄄城）三州

元和十四年平李师道，以其郓、曹、濮为天平军。文宗太和三年（829年）至六年（832年）令狐楚为天平军节度使。在任期间，“去苛法”，罢苛捐杂税，“故流庸自占四万室。众无吁咨，和气乃来，三田仍稔，草木咸瑞”。[3]

6. 上述李师道原辖淄青、郓濮等州以外，李师道原先尚领兖（治瑕丘县，今山东济宁市北）、海（治朐山，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南）等州。这些州大多产铜铁。太和四年（830年）王涯领盐铁转运使，于其年九月“奏李师道前据河南十二州，其兖、郓、淄、

〔1〕《全唐文》（8）卷737《魏滑分河录》，7 614页。

〔2〕《旧唐书》（11）卷124《令狐彰》，3 528页。

〔3〕《全唐文》（6）卷606《大平军节度使厅壁记》，6 118页。

青、濮州界，旧有铜、铁冶，每年额利百余万。自收复，未定税额，请复系盐铁司”。[1] 王涯在《请开采铜铁奏》中指出：“兖海等道，铜铁甚多”[2]。

不过，山东半岛各州的广大农村开发有限。日本和尚圆仁在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七月至楚州（属淮南道，治于山阳县，今安徽省淮安）欲往登州（河南道，治于蓬莱，今山东省蓬莱）译语刘慎言对他说：“从楚州至登州，道路尽是山坂旷野，草木高深，蚊虻如雨，终日逾山行野，村栅迢远，希见人家……行七八十里，方有一二家”。[3]

7. 陕（治陕县，今河南省陕县）、虢（治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县一带）二州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置陕虢节度使，后改为观察使。陕、虢二州地处洛阳与长安之间，也是漕运要路。然而，两州地皆贫瘠。德宗贞元十年（794年）至十二年崔衍为华州刺史，他上陈德宗：“臣所治多是山田，且当邮传要冲，岁属不登，颇甚流离。”[4] 由于耕地有限，加以山多，民多以射猎为生。《唐会要》卷67《留守》：“东都西南联邓（邓州，属山南道，治于穰县今河南省邓县）、虢，山谷旷远，多麋鹿猛兽，人习射猎，不务耕稼。”而陕州的土地亦贫瘠。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崔郾任陕虢观察使，他指出：“陕土瘠民贫，吾抚之不暇。”[5] 陕、虢二州的自然条件制约了经济发展。

---

〔1〕《旧唐书》(13) 卷169《王播传附王涯》，4 404页。

〔2〕《全唐文》(5) 卷448，4 579页。

〔3〕(日)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1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旧唐书》(15) 卷188《孝友》，4 935页。

〔5〕《资治通鉴》(17) 卷244《太和五年》，7 877页。

三、水上交通

汴河自广德二年(764 年)疏浚后,除德宗时因战乱暂时受阻以外,直至唐末,汴河始终畅通,在南北经济交流中起了积极作用。

李敬方(长庆至太和时人)在《汴河直进船》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收尽脂膏是此河。”[1]诗人尖锐地指出汴水将东南数十州的民脂民膏输往北方,运进朝廷,但从中也可看出唐后期汴河在南北物资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除漕运以外,在汴河上还活跃着各地的商人。《太平广记》卷125《崔无隐》:唐元和(806—820 年)汴州招提院有一僧曰:“某家于梁(汴州),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之货为业。(最)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获利可倍。”

王建(大历至太和时人)在《汴路即事》中写道:“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2]诗人除了描绘了沿河“草市迎江货”这一热闹的情景外,还指出在汴河上的旅客“人语各殊方”,这说明汴河上汇集了各地区的人们。白居易于穆宗长庆四年(824 年)罢杭州刺史,他北返时于汴河上写了《汴河路有感》一诗:“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3]可知汴河还是南北人员往来的水上走廊。

唐后期活跃在汴河上的还有海商。《唐语林》卷1:“崔枢应进士(举),客居汴半岁,与海贾同止。其人得疾即笃,谓崔曰:‘某有一珠,价万缗,实至宝也,敢以奉君。’崔受之。”前面提到《汴路即事》中“津桥税海商”,即沿汴河所设诸多“津桥”,不仅向过往商贾抽税,还向这些海商抽税,可见,通过汴河的海商之多。

---

〔1〕《全唐诗》(15)卷 508,5 776 页。

〔2〕《全唐诗》(9)卷 299,3 391 页。

〔3〕《全唐诗》(14)卷 446,5 008 页。

青州（治益都，今山东省益都）、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是出海口。《太平广记》卷274《薛宜僚》："薛宜僚，会昌（841—846年）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由此可知，唐后期青、登二州皆为出海口，可至日本和朝鲜。

第三节　唐末的破坏与恢复

唐朝末年，洛阳遭到巨大破坏。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攻入洛阳。"黄巢陷东都，（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1]

在农民起义军撤出洛阳以后，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叛唐，于僖宗光启元年（885年）六月攻入洛阳。其部将"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2]据《新唐书》卷187《李罕之》载："（孙）儒去东都也，井闬不满百室。"

在孙儒离开洛阳以后，张全义于光启三年（887年）为河南尹，着手洛阳的恢复工作。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

> 初，东都经黄巢之乱……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牌，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牌，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无租税，民耕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

---

〔1〕《资治通鉴》（17）卷254《广明元年》，8236页。

〔2〕《资治通鉴》（18）卷256《光启元年》，8324页。

张全义对洛阳的恢复贡献很大。

然而，洛阳“旧有朝臣、诸司宅舍”大多无存。哀帝：《禁论认洛阳田宅敕》：“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以耕垦……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1]看来，东都宫室虽已修复，但大多朝臣、诸司宅舍，已成耕地，洛阳城已非旧貌。

河南诸州亦经历由破坏到恢复的过程。

郑州　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宗权至郑州，乃尽焚其庐舍，屠其郡人而去……帝乃慎选将佐，俾完葺壁垒，为战守之备。于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2]

陈（治宛丘县，今淮阳）许州（治长社县、今许昌市）徐𡼏在“龙纪元年”（889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军节度使，仍以陈州为理所。由是中原尘静，唐帝（昭宗）复归长安，陈、许流亡之民，襁负归业，𡼏设法招抚，人皆感之”。[3]昭宗景福元年（892年）正月，“丁会于兖州（治瑕丘县，今山东省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4]

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省盱眙）

李磎于僖宗中和五年（885年）九月三十日撰《泗州重修鼓角楼记》中曰：泗州防御使刘公，在黄巢乱后，不仅修复鼓角楼；“左右臂出廊及都厢等院二百余间，悉公重修”；“又修孔子庙、佛祠、道宫观、文武吏舍……凡数百千间”；“又劝里人益构其居，荒毁更新，郁郁如春发寒槎”；“又教属县树桑、柳、枣、榆至二万本”。在这种情况丁，“逋窜自返万三千户”。[5]

---

〔1〕《全唐文》(1) 卷94，975页。

〔2〕《旧五代史》(1) 卷1《太祖纪第一》，8页。

〔3〕《旧五代史》(1) 卷14《徐𡼏》，194页。

〔4〕《旧五代史》(1) 卷1《太祖纪第一》，14页。

〔5〕《全唐文》(9) 卷803，8 443页。

汝州（治梁县，今河南省临汝）

《太平广记》卷402《卫庆》："卫庆者汝坟（在今河南省叶县南）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惰，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余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879年），庆忽疾。"这说明，在唐末，远离战场的汝州叶县一带，仍有人在开发土地。

第十三章　河北道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相继死去，而史朝义也走投无路。朝廷苦于长年战乱，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因而将安史集团盘踞的河北地区一分为三，分别任命安史降将为各地的节度使：

1. 代宗宝应元年（762 年）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大体在今河北省中西部。

2. 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幽州统幽、蓟、营、涿、平、檀、妫、莫八州；卢龙统青、密、登、莱四州。大体在今河北省北部。

3. 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防御使（后改为节度使）。代宗大历十年（775 年）原薛嵩所领相、卫、洺、贝、磁六州，被田承嗣吞并。这样大历八年魏博节度使领十一州。大体在今河北省南部。

这样，在原安史盘踞的河北（24 州）形成幽州、成德、魏博三节度使分统的局面。此三节度使，史称“河朔三镇”。三镇节度使父死子继，不服从朝廷命令，自己任免官属，赋税不上缴朝廷，形成割据状态。不过，各节度使的任免，在形式上仍须通过朝廷。这些节度使各个人、各个时期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就实际情

况来说，河朔三镇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

常衮指出："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为用武之地……比屋凋伤，疲于抒轴。"[1] 元结在代宗宝应元年（762 年）指出："天下兵兴，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元次山集》卷 7《左黄州表》）可知安史乱中，河北地区破坏极大。

前面提到唐前期河北道水利工程很多，农田灌溉发达。安史之乱对河北道水利破坏极为严重。北宋王沿指出："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756—758 年）后，渠废。而相（治安阳县，今河南安阳市）、魏（治贵乡，今河北省魏县东）、磁（北宋州名，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洺（治永年县，今河北省永年）之地近漳水者，屡遭决溢，今（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 1026 年）皆斥卤不可耕。"[2]

河北道诸州虽遭战乱破坏，在战乱平定后，无论朝廷直接掌管的怀州，还是节度使管内诸州都先后着手恢复社会经济。

怀州（治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

杨承仙，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至大历二年（767 年）任怀州刺史。当时"大兵之后，城郭为墟"，他"既至，则吊其疮痍，翦其荆棘，省事节用，宽其征而均其力，然后浚决古沟引丹水以溉田，田之污莱，遂为沃野，衣食河内数千万口，流人襁负，不召自至，如归市焉。鳏茕无告不能自耕者，贷其种与农器而教之，视五谷所宜，督其程课，劳来不怠，使民无不咸返其本"。[3]

大历四年（769 年）马燧任怀州刺史。"乘乱兵之后，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务修教化，将吏有父母者，燧辄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烦苛。至秋，界中生穭谷，人颇赖之"。[4]

---

〔1〕《文苑英华》（3）卷 434《宣慰魏博德音》，2 196 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卷 104《天圣四年八月辛巳》，92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全唐文》（4）卷 390《少傅杨公遗爱碑颂》，3 967～3 968 页。

〔4〕《旧唐书》（11）卷 134《马燧》，3 690 页。

由于怀州在安史之乱后破坏严重，虽然杨承先、马燧的治理，流民归，民耕稼，仍没有“饶足”，经不起灾害。

相州（治安阳县，今河南省安阳市）

薛嵩，肃宗至德(756—757年)中至代宗大历八年(773年)任相卫节度使。(大历十年其辖区被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吞并)。当时，“兵不满百，马惟数驷，府微栖粮，家仅余堵”，薛嵩到任，“公乃扫除秕政，济活人命，一年而墙宇兴，二年而耕稼盛，日就月将，遂臻夫小康”。[1]

魏州（治贵乡县，今河北省魏县东）

田承嗣，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十三年（778年）任魏博节度使。“初公之临长魏郊也，属大军之后，民人离落，闾阎之内，十室九空。”到任后，“一年流庸归，二年田莱辟，不十年间，既庶且富，教义兴行”。[2]

田承嗣初任节度使时，“职贡不俟于命锡”[3]即按时上缴地方赋税。不仅如此，在管内州县变动时，也上奏朝廷。例如，大历七年(772年）在管内新置澶州和永济县，田承嗣都事先奏报朝廷。[4]

易州（治易县，今河北省易县）

张孝忠自代宗大历十年（775年）至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为易州刺史。“戊午岁（大历十三年），天作淫雨，害于粢盛。人多道殣，邑无遗堵”。“王之来也”（按：张孝忠封为符阳郡王），“其一之岁，郭理疆场，缉逋亡，恤鳏寡，躬问疾苦，坐不安席。志通邻好，忧人阻饥，使屡空之家，无不自给，负米之孝。知其所归。况征敛输纳，重轻之法，人吏一变，奸欺绝源，老幼相携，归府如市”。[5]

---

〔1〕《全唐文》(5) 卷443《相州公宴堂记》，4 514页。

〔2〕《全唐文》(5) 卷444《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4 532页。

〔3〕《全唐文》(5) 卷427《送张中丞归魏博序》，4 354页。

〔4〕《元和郡县图志》（下）卷16，466页。

〔5〕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65《张孝忠由亭再葬记》，45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由上可知，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河北地区不仅直属朝廷的怀州，包括节度使辖区无不着手恢复经济，农业生产逐渐复苏。然而，正如王沿所指出，河北地区的水利却大不如前。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安史乱后，河北道遍置节度使，而各节度使所辖州经常变动，因而节度使数以及名称也随之变动。河朔三镇，自任属吏，不贡不觐，独立性最强。然而，其中也有忠顺于朝廷的，如怀州节度使则始终忠顺于朝廷。

尽管如此，唐后期河北地区，依然是节度使中独立性最强的，如唐武宗在会昌年间（841—846 年）“灭佛”，河北诸镇即“不尊朝廷法制”各行其事。日本和尚圆仁，在武宗灭佛时在文登县（今山东省文登）。当时张咏任“平卢军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负责掌管新罗人户。会昌五年（845 年）十一月三日，张咏对圆仁和尚说：“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唯黄河以北，镇（原为恒州，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这里指成德军节度使）、幽、魏、潞（泽潞节度使，属河东道）等四节度使，原来敬重佛法，不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对）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1〕会昌年间，全国州县大力灭佛，只有河北三镇以及泽潞节度使不尊朝廷法令，可知其独立性之强。

河北道在安史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唐后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也有限，例如河北道的水利灌溉按北宋王沿所述，就没有恢复至唐前期的水平。

尽管如此，河北道的经济在唐后期仍居重要地位。唐文宗太和

〔1〕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 4，1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827—835 年）中，杜牧指出：

>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肢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肢苟去，吾不知其为人……（河北）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1]

由此可知唐后期的河北道仍较富庶，且“自可封殖”，能够自给自足。

一、怀州

怀州（治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六月二十五日以李芃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割东畿五县（河阳、河清、济源、温、王屋）隶焉。

崔弘礼于穆宗长庆三年（823 年）至敬宗宝历二年（826 年）任河阳节度使，在任期间，“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2]此外，还于宝历元年十二月上言：“于秦渠下辟荒田二百顷，岁收粟二万斛，从宝历二年减去度支所给数。”[3]

温造，文宗太和五年（831 年）九月制授河阳、怀节度观察使。在任“造以河内膏腴，民户凋瘵，奏开浚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七年十一月，入为御史太夫”。[4]

二、河朔三镇

独立性最强的河朔三镇，在宪宗元和年间一度归顺朝廷。宪宗即位不久，西川节度使留后刘辟志骄意满，要求兼领东川（山南西道，辖梁、洋、利等州），促使宪宗下决心讨伐。只用数月时间，即生擒刘辟，平定西川。在平定西川的威慑下，元和五年（810

〔1〕《全唐文》（8）卷 754《战论》，7 813 页。

〔2〕《新唐书》（16）卷 164《崔弘礼》，5 051 页。

〔3〕《册府元龟》（6）卷 497《邦计部·河渠》，5 954 页。

〔4〕《旧唐书》（13）卷 165《温造》，4 318 页。

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易定节度使张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书、管钥”送朝廷[1]。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留后田兴（后赐名弘正）“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2]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幽州节度使刘总表以幽、蓟七州上献，请朝廷命帅”。至此，“河朔三镇复入提封。”[3] 然而，为时不久，“河朔再叛”。

唐后期河朔三镇节度使，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制约，在特定时期内表现不尽相同，在境内的治理，也有优劣。分别叙述如下：

1．幽州节度使

涿州　“本幽州之范阳县（今北京市）。大历四年（769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固安（今河北省固安县）三县以隶涿”[4]。

由于涿州新置，没有州学。建中初（780年）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怦之子刘济，“年始弱冠”，“操长是邑”。在此期间，于涿州置文宣王庙（即州学）。刘济“心规其制，口划其地，度广狭之量，平庐舍之区”，雇匠人修建。“圣贤之像备，馈奠之器具”，“于是置食钱二百万，（生）徒三千员，洙泗之风，集于期月”。学校规模很为可观。韦稔在《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中叙述刘济（德宗贞元元年刘怦死，刘济继任）在涿州范阳建庙之经过，其中指出：“（涿州）至于阛闬井肆之大，关梁襟带之固，自河达燕，其北不过一二”，而涿州范阳即其中之一。范阳县“先朝次列县之级第为‘望’”，而今“领户万，流庸附占者如之”。[5] 范阳县在户籍之民户有一万，

[1]《资治通鉴》（16）卷238《元和五年》，7 677页。

[2]《资治通鉴》（16）卷238《元和七年》，7 694页。

[3]《旧唐书》（10）卷119《崔佑甫传·附崔植传》，3 443页。

[4]《旧唐书》（5）卷39《地理二·涿州》，1 517页。

[5]《全唐文》（5）卷480，4 905页。

而另有外来客户也有一万户。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地理二》幽州条载：天宝（实为天宝十二载）领县十：蓟、良乡、潞、范阳、固安、武清、永清、昌平、归义、安次县[1]。领户 67 242。天宝十二载（753 年）幽州十县共有户六万余，而建中初（780 年），只范阳县，就有户二万。这除了说明涿州“阛阓井肆之大”以外，还说明唐后期比开元、天宝年间有所发展。

朱克融，穆宗长庆二年（822 年）至敬宗宝历元年（825 年）任幽州节度使。长庆二年，朱克融“上表进马万匹、羊十万口。先请其价赏军。”[2] 朱克融将马万匹、羊十万口卖给朝廷，固然表明朱克融的独立性强，也表明幽州畜牧业的发达。

张仲武，武宗会昌元年（841 年）至宣宗大中三年（849 年）任幽州节度使。“以边塞既宁，尤勤抚育。每春则劝农，及夏，亲行县，以较民之稼穑，见稊莠不去者必挞之；见滋长如云者，必坐于木荫，赐酒、茗以厚之”。[3]

刘滩，刘怦之次子，德宗贞元三年（787 年）至十年（794 年）任瀛州（治河间县，今河北省河间）刺史。瀛州“地饶俗杂，久号难理”。刘滩到任，“简其约束，峻其堤防，均其有无，一其劳逸”。结果，“盗奔他境，人复先畴，亦既富庶，聿观礼让。”[4]

2. 魏博节度使

卫州黎阳县（今河南省浚县），有黄河古道，宪宗元和八年

---

〔1〕“天宝十二载”之说及十县县名，均为笔者考订者，详见《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 98 页。

〔2〕《旧唐书》（2）卷 16《穆宗》，497 页。

〔3〕《册府元龟》（9）卷 678《牧守部·劝课》，8 107 页。

〔4〕《全唐文》（7）卷 630《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山刘公神道碑铭》，6 360 页。

(813 年) 开。“先是，滑州（治白马县，今河南省浚县东南）岁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二里，每夏雨涨溢则浸坏城郭及羊马之半”。郑滑观察使薛平“询诸将吏，得古道于卫州黎阳县界，遣从事裴弘泰，以水患告于（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请开古河，用于分水”。田弘正原名田兴，元和七年以魏、博、贝、卫、澶、相六州之地归朝，宪宗嘉之赐名弘正，任其为“检校工部尚书、充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薛平将开古河事上奏朝廷。“诏许之”，于是“移河于卫之于四里，且役卫功三万余”。田弘正部将“皆曰坏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无有也。弘正曰：‘魏于滑，信彼此矣，朝廷何异焉?’而郑、滑也役工万人。结果“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引旧河以注新河。滑人遂无水患”。[1]

3. 成德节度使

王士真，德宗建中十七年（797 年）至宪宗元和四年（809 年）充成德军节度使、恒、冀、深、赵、德、棣等州观察使。“得位之后，恬然守善，虽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然岁贡财货，名为‘进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2]

王庭凑，穆宗长庆二年（822 年）至文宗太和九年（835 年）为成德军节度使。“庭凑既立，甚有治声，朝廷称之。在位十三年卒”。[3]

“廷凑卒，三军推（其子元逵）主军事……元逵素怀忠顺，顿革父风。及领藩垣，颇输款诚，岁时贡奉，结辙于途，文宗嘉之。”[4]

4. 沧景节度使在河朔诸藩镇中，沧景节度使辖区沧州（治清

〔1〕《册府元龟》(6) 卷 497《邦计部·河渠》，5 953～5 954 页。

〔2〕《旧唐书》(12) 卷 142《王武俊附王士真》，3 877 页。

〔3〕《太平广记》(5) 卷 217《五明道士》，1 661 页。

〔4〕《旧唐书》(12) 卷 142《王廷凑子元逵传》，3 888 页。

池县，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孟村回族自治县）、德州（治安德县，今山东省陵县）大力营田，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按：景州所管弓高、东光、胡苏三县原属沧州，贞元二年设景州，太和四年废景州三县复入沧州。“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是冬，元卿上言：‘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1〕

文宗太和四年（830年），以殷侑为沧齐德观察使。“时大兵之后，满目荆榛，遗骸蔽野，寂无人烟，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与士卒同劳苦，周岁之后，流民襁负而归。”〔2〕

《册府元龟》记载较详：“文宗太和中，殷侑为沧齐德等州观察使。上言：

> “当管河北两州（按：齐州属河南道，沧、德属河北）百姓（有）耕牛见管户一万三千六百九千四，除老弱单独外，其间大半力堪营种。去年缘无耕牛，百姓掘草根充粮，一年虚过，饥饿相继，转死道路。臣去年躬亲劝责酌量人力千一万三千户内每户请牛一具，支绢绫五匹，计三万匹，余二千户不得牛，营田不敢不奏。”诏曰：“沧州营田已有次第，耕牛欠数，频有奏论，方及春农，实资济恤，宜更赐绫绢一万匹。其来年将士粮米便勒本道自供。”〔3〕

在殷侑的治理下，13 000户无耕牛者，皆获得耕牛。这样沧、德二州“数年之后，户口滋饶，仓廪盈积，人皆忘（流）亡”。〔4〕

---

〔1〕《册府元龟》(6) 卷503《屯田》，6 037页。

〔2〕《旧唐书》(13) 卷165《殷侑》4 321页。“大兵之后”指李同捷之乱。

〔3〕《册府元龟》(6) 卷503《邦计部·屯田》，6 038页。

〔4〕《旧唐书》(13) 卷165《殷侑》，4 321页。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唐朝末年，关内、河南道诸州遭受严重破坏，而河朔三镇所在地河北道，却不见这方面的记载，反之，却有人以为“河北安静”，至河北“避地”。

张允伸，自宣宗大中四年（850年）至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任幽州节度使。史载：“允伸镇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市）二十三年，勤俭恭谨，边鄙无警，上下安之。”[1]

魏博节度使，领魏州（治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北）、博州（治聊城县，今山东省聊城东北）、相州（治安阳县，今河南省安阳市）等六州。

钱珝在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指出：“自河而北，地阔，兵赋之大，实在邺中”[2]所谓“邺中”，指相州，因天宝年间一度改为邺郡而得名。这里，泛指黄河北岸的相、魏、博等州。

《资治通鉴》卷265《昭宣帝天祐三年》：“（朱）全忠留魏半岁，（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豚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天祐年间，魏博能供应如此多的物资和货币，说明唐末魏博六州经济实力的雄厚。直到后唐（923—936年）时，“邺都……原田沃野，户赋殷繁”[3]仍很富庶。

王铎于僖宗中和四年（884年）罢滑州节度使。王铎“以河北安静，与杨全玫有旧，避地浮阳”。[4]时杨全玫任沧景节度使，驻沧州（治清池县，今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汉为浮阳县、隋、唐

---

〔1〕《资治通鉴》(17) 卷252《咸通十三年》，8 162页。

〔2〕《全唐文》(9) 卷832《授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开国侯制》，8 774页。

〔3〕《全唐文》(9) 卷854《论安重荣请讨契丹疏》，8 961页。

〔4〕《北梦琐言》卷13，100页。

称清池）王铎与杨全玫有旧好，因而投奔他。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末年从黄巢起义始，各地战争不断，而此时惟有“河北安静”，而且富庶。

唐末河北道手工业、商业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邢州）钜鹿郡南和县（今河北省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1] 南和县产纸。

定州（治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州市。）手工业、商业一向发达。“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治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州市）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长安），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2] 定州商人足遍各地，出手阔绰，以至于是，可知定州商业的发达。

营州（治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渝关（即临渝关，今河北省榆关，在秦皇岛市西）

“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旧置八防御军，募士兵守之”[3]“自营州东至渝关，并无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其山之南，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4] 在这千里沃野中，“士兵皆自为田园”，“田租皆供军食”，“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5]。

契丹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胡峤为宣武军节度使萧翰掌书记，因随入契丹，翰诛，无所依，居契丹七载，后周广顺三年（953年）逃归。胡峤：《陷北记》：“自幽州西北人居庸关，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坊）。宦者、翰林、技术、

〔1〕《太平广记》（3）卷145《钜鹿守》，1 042页。

〔2〕《太平广记》（10）卷499《王氏子》，4 095页。

〔3〕《资治通鉴》（19）卷269《后梁纪四》，8 812页。

〔4〕《资治通鉴》（19）卷269《后梁纪四》注文，8 813页。

〔5〕《资治通鉴》（19）卷269《后梁纪四》，8 813页。

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蓟人尤多。”[1]从胡峤的记述中，可知当时契丹上京的情景，此虽为五代时后周时事，但是，并、汾、蓟人陆续至契丹，并非自五代始，恐亦是事实。

[1]《全唐文》(9)卷859，9010页。

第十四章　河东道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和经济的复苏

为加强北方边境的防御，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置河东节度使，领太原（府）及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等北部九州，治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

安史之乱中，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置河中节度使，领蒲、晋、绛、隰、慈等西南部各州，治蒲州（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西。）

同年又置泽潞节度使。泽潞节度使领州变动很大，至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始稳定，领潞、泽、磁（位于河东道东南部）和邢（治龙冈县，今河北省邢台市）、洺（治永年县，今河北省永年东）等州，治潞州（治上党县，今山西省长治市）。

河东道节度使与“河朔三镇”不同，除个别节度使（文宗、武宗在位时，刘从谏、刘稹父子效法河朔）以外，皆忠顺朝廷。李德裕指出：“自天宝以后，兵起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而言），惟泽潞一军，不亏臣节。”[1] 李绛指出：“泽潞五州，据山东要害。河北连结，惟此制之……国纪所在，实系安危。”[2] 可知朝廷一向以泽潞

[1]《全唐文》(7) 卷707《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7 255页。

[2]《全唐文》(7) 卷646《论泽潞事宜状》，6 537页。

节度使抑制河朔三镇。

安史之乱中，河东道遭到破坏较轻，因而恢复较快。

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王思礼“资储丰衍，赡军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1]

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郭子仪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至大历十四年（779年）任河中节度使。“郭子仪以河中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是岁（大历元年），河中无旷土，军有余粮”。[2]

泽潞节度使（治上党县，今山西省长治市）李抱真于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至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任泽潞节度使。大历年间李抱真为“节度使留后”，当时“抱真密揣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即河北三镇而言）当有变，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则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乡兵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3]在李抱真为节度使时，泽潞地区“府库益实”、“精兵二万”，成为朝廷的屏障。

安史乱后，由于战时民户逃亡，赋税大幅度减少，朝廷财政出现危机，而河东盐利，在缓解财政危机上起了一定作用。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刘宴为盐铁转运使。“（刘）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州）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即蒲州解、安邑盐池，今山西省今运城、夏县一带），度支主之；汴、滑、唐、

〔1〕《资治通鉴》（15）卷222《宝应元年》，7 119页。

〔2〕《资治通鉴》（15）卷224《大历元年》，7 193页。

〔3〕《旧唐书》（11）卷132《李抱真》，3 647页。

蔡（州）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敝。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1〕河东盐利虽不及江淮海盐，但数额不小，其盐利对缓解当时朝廷财政危机上也起了一定作用。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在河中府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县）置紫泉监。因该县“有铜穴十二”〔2〕，该监采铜以铸钱。

代宗笃信佛教，于大历二年（767年）“造金阁寺于五台山（原注：忻州五台县（今山西省五台）有五台山，释氏相传以为文殊道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3〕“铸铜涂金为瓦”可知河东道锻冶业的发达。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河东道社会经济未遭重大破坏。唐后期在农田水利、矿冶和盐业方面均有发展。

农田水利

河东节度使　马燧在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年）任河东节度使。至任，“以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大肉，用武之地，北蕃东夏，且有外虞，而都城之东，平坦受敌，乃股引汾、晋二川，涨为平湖，能顺地渤，以导水势，守陴者岁减其役，滨河者日厚其生，而又广堤渚池，密树如织，金汤自固。”〔4〕

令狐楚于文宗太和六年（832年）至七年任河东节度使。李商隐在《上令狐相公状》中说：令狐相公“轩车才临，日月未几，旱

〔1〕《资治通鉴》(16) 卷226《建中元年》，7 286页。

〔2〕《新唐书》(4) 卷39《地理三》，1 000页。

〔3〕《资治通鉴》(15) 卷224《大历二年》，7 196页。

〔4〕《全唐文》(5) 卷507《司徒兼侍中……马公行状》，5 162页。

云藏燎于天末，甘泽流膏于地中，堡郭复完，污莱尽辟。”〔1〕

河中节度使所领绛州（治正平县，今山西省新绛）韦武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至十五年任降州刺史。在任期间“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玺书劳勉。”〔2〕

泽潞节度使所领潞州屯留县（今山西省屯留）“贞元七年（791年）潞州屯留（县）令平原（人）明济，受连帅相国、大司空、义阳王李公（抱真）之命，假领兹邑……下车之日，咨访故老，问人疾病，佥曰：‘……惟水之歉，讵敢求救于公耶！……有丹水者，始自县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议壅以导。’明侯载审厥事，将利于人。乃下谋于乡耆。次白于郡守、上言于节制，才获所请。”于是“候农桑之隙，先储乎薪刍之物，次具乎锹锸之器，然后量功命日，使里人乐助，竞子来而展力，故不更数，宛有其成，始潴流而为潭，因疏渠以绕郭，筑防以补其陷巢，刳木以道其险阻，脉分枝散，贯邑周回，弥弥菅草之间，阴阴槐柳之下，遂使家开沼沚，户植芰荷，濫觞可以寄傲，垂钓可以烹鲜，岂直丰畦圃之沃灌？”〔3〕屯留县令明济在贞元年间治理丹水收效巨大。

唐宪宗元和（806—820年）中，在河东道北部至关内道北部大兴屯田。

元和中，由于振武军（驻“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军粮所需，宰相李绛请开屯田，宪宗采纳。“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治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借）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有了成功的经验，“田募人为于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1〕《全唐文》（8）卷774，8 076页。

〔2〕《新唐书》（13）卷98《韦挺·附韦武传》，3 905页。

〔3〕《全唐文》（6）卷613《移丹河记》，6 188页。

市），西逾云州（治云中县，今山西省大同市），极于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二千石万”。[1]

矿冶

蔚州飞狐县（今河北省涞源县）有很多铜矿。该县有“三河冶”，“旧置炉铸钱，至德以后废”。宪宗元和七年（812年）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

> 臣访问飞狐县三河冶铜山约数十里，铜矿至多，去飞狐钱坊二十五里，两处同用拒马河水，以水解销铜……铸钱人工绝省，所以平日（指唐前期）三河冶置四十炉铸钱，旧迹并存，事堪复实。今但得钱本，令本道应接人夫，三年以来（意：只须三年）其事即立，救河东困竭之弊，成易、定（二州）援接之形。制置一成，久获长利。

奏书被朝廷采纳。“其年六月起工，至千月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铜钱）一万八千贯。时朝廷新收易、定，河东道久用铁钱，人不堪弊，至是俱受利焉”。[2]

盐业

河中两池盐（即蒲州解、安邑盐池，在今山西省运城、夏县一带）的销路比前更广、盐利也有所增加。

卢坦（唐德宗时人）在《请放河中盐入兴元府等州奏》中指出：“河中两池课盐敕文，只许于京圻（京城的边界）、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二十五州界内粜货，比来因循，兼越入兴元府（梁州）及洋、兴、凤、文、成等六州（在今陕西省汉中至甘肃成县一带）……得兴元诸府耆老状申诉，臣今商量，河中盐请放入六州界粜货。”[3]这就是说，以往，河东盐除在当道销售

---

〔1〕《新唐书》(5) 卷53《食货三》，1 373页。

〔2〕《元和郡县图志》（上）卷14《河东道·蔚州》，407页。

〔3〕《全唐文》(6) 卷544，5 515～5 516页。

以外，朝廷只准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销售，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已经扩销到陕西汉中以至甘肃东部一带。由于汉中等州“耆老”要求，卢坦建议朝廷允许河东盐扩销至汉中一带。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沈亚之在《解县令厅壁记》中指出：“蒲盐田居解邑下，岁出利，流给雍州（治长安，今西安市）、洛（治洛阳，今洛阳市）二都、三十郡”[1]。说明河东盐自德宗至宪宗朝，销售扩大到二都、三十州。

随着河东盐销量的扩大，盐利也有所增多。前面提到唐代宗时刘宴改革盐法，“河东盐利，不过八于万缗（贯）”。至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从此，两池每年上缴朝廷一百万贯盐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正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先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今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2]唐代绢帛与铜钱同为货币，太宗交易钱数多，不方便，往往以绢帛交易。太和年间规定两池盐税缴纳“实钱”，会昌年间改缴精好的绢帛。由此可知，两池盐利在唐后期有所增加。

商业

河东道商业也很发达。“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以商为业，常行货于代（治雁门县，今山西省代县）北。长庆二年（822年）夏中，于雁门关行道中……”[3]

邢州（治龙冈县，今河北省邢台市）“邢州富商最多……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子弟。”[4]这些都是例证。

---

〔1〕《全唐文》(8) 卷736，7 601页。

〔2〕《册府元龟》(6) 卷494《邦计部·山泽》，5 904、5 908页。

〔3〕张读：《宣室志》卷之一，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资治通鉴》(17) 卷248《会昌四年》，8 005页。

第三节　唐末的破坏与恢复

唐朝末年继农民起义之后又演变为各节度使之间的混战，尤以朱全忠（宣武军节度使）和李克用（河东节度使）之间的争战频繁而激烈。在争战过程中，河东道遭到巨大的破坏。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昭义节度使（即泽潞节度使）高浔死，部将孟方立“抶裂邢、洺、磁为镇”，“倚朱全忠为助。故（李）克用击邢、洺、磁，无虚岁，地为斗场，人不能稼”。[1]

李克用部将李罕之为泽州刺史，领河阳节度使。“罕之留其子顾事克用，自还泽州，专以寇钞为事，自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州无刺史，县无令长，田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2]

不过，在远离战场之地，一些地方官仍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

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年）三月，李存进奉命权知石州（治离石县，今山西省离石市）军州事。“时以慈、隰未归，西南为患，委之守郡，志在安边。公乃和以养兵，仁而抚俗，轻其徭役，劝以耕农，茕嫠者由是遂生，逋窜者以之复业，远来近悦，老安少怀，五谷有年，一方无事。”[3]

僖宗中和二年（882年）蒲州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夏县一带）建成新城。司空图在《解县新城碑》中指出：解县“因沃饶之润，置榷货之司，官帑委输，商徒繁会”，如此富饶，繁华的城市，在战乱期间，“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王重荣自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任河中节度使后，即着手筹备建新城事宜。“自

〔1〕《新唐书》（17）卷187《孟方立》，5 449页。

〔2〕《资治通鉴》（18）卷257《文德元年》，8 378页。

〔3〕《全唐文》（9）卷840《后唐招讨使李存进幕碑》，8 835页。

(僖宗) 中和二年 (882 年) 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周绕九里一百六十步。隍刳浚洫，堞冠层楼，外牣犒军之营，内修御敌之具。观其地素壮址，云郁平川，拥形势而增严，屏要冲而莫犯。”[1] 王重荣建设解县新城这在战乱期间是难能可贵的。

〔1〕《全唐文》(9) 卷 809，8 507 页。

第十五章　陇右道

第一节　战乱后的陇右、河西

《新唐书》卷37《地理一》："天宝盗起（指安史之乱），中国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于吐蕃。"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763年）》："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岐州，至德二年改为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一带）以西、邠州（治新平县，今陕西省彬县）以北，皆为左衽矣。"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初（806年）指出："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侵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1]由此可知自代宗广德至宪宗元和初年，陇右、河西皆被吐蕃控制，而唐朝西边边防在凤翔。

第二节　唐后期的河陇与二庭、四镇

二庭（安西、北庭都护府）、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自河陇陷虏，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间者李嗣业、荔非元

[1]《全唐诗》（13）卷427《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4 701－4 702页。

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1]

其时，安西、北庭并未为吐蕃控制，只不过由于河陇被据，音讯阻隔而已。“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建中二年）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2]“德宗诏曰：‘四镇、二庭统西复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与率职。自关、陇失守，王命阻绝，忠义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将交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曹）令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赐氏李，更名元忠。（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诸将吏超七资叙官’云。”[3]

由于安西、北庭被吐蕃阻隔，为加强对二庭的控制，德宗任当时在二庭掌实权的曹令忠为北庭大都护、郭昕为安西大都护。

然而，数年后二庭、四镇失守。《册府元龟》卷452《将帅部·识暗部》：“杨袭古为北庭节度使。（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冬，吐蕃帅葛禄、白眼（服之误）之众来寇北庭。回纥大相颉于迦斯率众援之，频战败绩。吐蕃攻围颇急，北庭之人既苦回纥，是岁，乃举城降之于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袭）古与麾下二千余人出奔西州，颉于迦斯不利而还。”此后吐蕃控制了二庭、四镇之地。

陇右、河西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二月“吐蕃秦（治成纪县，今甘肃省秦安北）、原（治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安乐（咸亨三年以灵州故鸣沙县，今宁夏吴忠南，置安乐州）三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4]

---

〔1〕《旧唐书》（2）卷12《德宗上》，329页。

〔2〕《资治通鉴》（16）卷227《建中二年》，7 303页。

〔3〕《新唐书》（15）卷137《郭子仪传附郭昕传》，4 613页。

〔4〕《资治通鉴》（17）卷249《大中五年》，8 044页。

大中五年春，“时吐蕃大乱”，沙州（治敦煌县，今甘肃省敦煌）人张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1]

十月，“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2]

早在大中三年唐廷收复三州七关时，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宣宗乃下诏曰：“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四道将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节度使之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3]

此后有一些内地人至陇右、河西，发现居于这一地区的蕃人的一些变化。王建在《凉州行》（凉州，治姑臧，今甘肃省武威）中写道：“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4]陇右、河西有很多吐蕃人学习汉族百姓的耕种和养蚕。

饶有趣味的是，尽管河陇地区征战频繁，秦州却“引进”了芭蕉，“输出”了牡丹。

“天水（指秦州，天宝元年改为天水郡，今甘肃省秦安一带）之地，迩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唐后期）戎帅使人于兴元（府）（梁州，兴元元年（784年）改为兴元府，治南郑县，今陕西

〔1〕《新唐书》(1) 卷8《宣宗》，247页。

〔2〕《资治通鉴》(17) 卷249《大中五年》，8 084页。

〔3〕《资治通鉴》(17) 卷248《大中三年》，8 039--8 040页。

〔4〕《全唐诗》(9) 卷298，3 374页。

省汉中）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1]

秦州有牡丹，前蜀（911—933年）时传入成都。“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无所不有。”“秦州（治成纪县，今甘肃省秦安以北）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框，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2]当时在成都成为珍奇之物。

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纥陷甘州（治酒泉县，今甘肃省酒泉），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原注：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按：河，指黄河；湟，指湟水）河湟之地，指陇右河西］遂悉为戎，中国不能复取”。[3]

〔1〕《太平广记》(3) 卷140《秦城芭蕉》，1 011页。

〔2〕《太平广记》(3) 卷136《伪蜀主舅》，980页。

〔3〕《资治通鉴》(17) 卷252《咸通十三年》，8 164页。

第十六章　淮南道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置淮南节度使，领扬、楚、滁、和、寿、庐、舒、光、蕲、安、黄、申、沔十三州，治扬州。寻以光州隶淮西。后蕲、沔、安、黄属鄂岳观察使。

第一节　战乱的破坏与复苏

安史叛军止于河南，未及江淮。不过，在安史叛乱的影响之下，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十一月，淮西节度副使、宋州刺史刘展发动叛乱，占领广陵（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给江淮造成巨大损失。为平刘展，淮南节度使邓景山请求平卢军马使田神功派大兵支援，答应田神功在进入淮南后，淮南的金帛、子女归他所有。田神功打败刘展，入楚州，占广陵，“大掠，杀胡商以千数”，为了发掘财宝，“城中地穿掘略遍”。[1] 史称“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不过，刘展叛乱为期仅四个月，其破坏的范围、程度有限。

《太平广记》载：“宝应（762—763年）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即扬州）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之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2] 所谓“兵荒”即刘展叛乱。兵

〔1〕《资治通鉴》(15) 卷221《上元元年》，7 102页。

〔2〕《太平广记》(8) 卷369《元无有》，2 937页。

荒之后二三年间“人户多逃”。然而，这只是个别地区。时人贾至指出：“兵兴（指安史之乱）十年，九州残敝，生人凋丧，植物耗竭”，“独扬州一隅，人尚完聚……室家相保，耕绩未罢。”〔1〕

时人韩云卿在《平淮碑铭》中说：“叛臣刘展，窃地弄兵，悖挠天常，肆虐黎人，淮泗而南，施于闽越，人残令绝。”经田神功平叛后，“吴楚之人，父子相欢，戚属相贺，土壤耕辟，年谷丰登。”〔2〕这虽是溢美之词，至少可知其破坏程度有限。

随着北方安史之乱平定，自大历初年起，淮南道各州的流民归附、社会安定、农业恢复。

黄州（今湖北省新洲市）元结在《左黄州表》中说：“乾元己亥（二年）赞善大夫左振出为黄州刺史。”至任，“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元结指出：“天下兴兵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关以东、海滨之南，屯兵百万，不胜征税。岂独黄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谁曰不可颂乎!”〔3〕黄州人因有好刺史而安居乐业，在当时情况下是很难得的。

直到代宗大历初年，淮南百姓又有流徙。张延赏于大历六年（771年）至八年（773年）任淮南节度使（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岁旱，民它迁，吏禁之。延赏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毙，不如适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为?’乃具舟遣之。敕吏为修室庐，已逋债，而归者更增于旧。”〔4〕

濠州（治钟离县，今安徽省凤阳以北）　独孤及于大历三年（768年）至五年（770年）任濠州刺史。“公下车，以淮土轻剽，

〔1〕《文苑英华》(5) 卷720《送蒋十九……归淮南幕府序》，3 728页。

〔2〕《全唐文》(5) 卷441，4 500页。

〔3〕《全唐文》(4) 卷383，3 897页。

〔4〕《新唐书》(14) 卷127《张嘉贞传附延赏》，4 445页。

承兵革之后率多不法，长吏不能制，遂先董之以威，格之以致，然后用恺悌宽厚，渐渍其俗，三年而圄境大化。"〔1〕大历十年（775年）至十二年（777年）张镒任濠州刺史，朝廷考核天下刺史政绩，在"劭桑稼、均赋税、业徕游口"诸方面"濠州张镒为第一"。〔2〕

和州（治历阳县，今安徽省和县）　大历七年（772年）至十一年（776年）穆宁任和州刺史，在任期间"实增户数倍"。〔3〕

舒州（治怀宁县，今安徽省潜山）　独孤及于大历五年（770年）至八年（773年）任舒州刺史。他在《谢舒州刺史兼加朝散大夫表》中说："今以九月二十七日到州上讫，州经积年寇盗，疮痍之后，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臣以奉宣圣慈，与之休息，劳徕鳏寡，薄其徭赋，是以招携亡者，辑柔存者，庶经秋之后，赖获安集。"〔4〕二三年后，独孤及指出："昨日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惟有三千五百。"〔5〕独孤及甫至舒州时，民户逃散，"十不存一"，二三年后，已有民户33 000。而唐前期户籍上民户最多的天宝十二载（753年）舒州民户有35 353〔6〕。经过独孤及的治理，舒州民户已接近唐前期最高的数字。尽管这是"百姓并浮寄户"的总数。所谓"百姓"是指有户籍的民户；所谓"浮寄户"指外来民户（即客户）。值得注意的是，"应差科者，惟有三十五百"，也就是有户籍的只有3 500，而其余29 500户都是"浮寄"客户，即外来人口，或者是当地百姓出逃，并已注销了户口，此后又回归者。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看出淮南地

〔1〕《全唐文》(6) 卷522《金鱼袋独孤公行状》，5 303页。
〔2〕《新唐书》(11) 卷101《萧瑀传附萧定传》，3 963页。
〔3〕《新唐书》(16) 卷163《穆宁》。
〔4〕《全唐文》(4) 卷385。
〔5〕《全唐文》(4) 卷386《答杨贲处士书》，3 929页。
〔6〕《旧唐书》(4) 卷41《舒州》，1 054页。

区在肃、代宗时百姓由流动到安居的过程。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唐后期淮南节度使管内修筑了很多水利工程，以利通漕，且溉田千百万亩。

江都爱敬陂　“爱敬陂”在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西五十里。（曹）魏陈登为太守，开陂，民号爱敬陂，亦号陈登塘。[1] 杜亚十德宗兴元元年（784 年）至贞元五年（789 年）任淮南节度使。

> 既下车，乃验图考地，谋新革故，相川原，度水势，自江都而西，循蜀冈之右，得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浸曰“爱敬陂”，方圆百里，支辅四集，盈而不流，决而可注。图以上闻，帝用嘉允。乃召工徒，修利旧防，节以斗门，酾为长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然后漕挽以兴，商旅以通，自北自南，泰然欢康，其夹堤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归，化硗薄为膏腴者，不知几千万亩。[2]

在杜亚的主持下，疏导句城湖、修筑爱敬陂，既可通舟，又可溉田，效果显著。

江都县雷陂　“雷陂在县北十里，汉江都王传有雷陂。”[3] 杜佑于德宗贞元六年（790 年）至十九年（803 年）任淮南节度使。“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五十万斛”。[4]

高邮县（今江苏省高邮）平津堰　高邮县地处漕渠（邗沟）中

---

〔1〕《元和郡县图志》（下）缺卷逸文卷 2《淮南道江都县条》，1 073 页。

〔2〕《全唐文》（6）卷 519《通爱敬陂水门记》，5 274 页。

〔3〕《元和郡县图志》（下）缺卷逸文卷 2《淮南道江都县条》，1 073 页。

〔4〕《新唐书》（16）卷 166《杜佑》，5 088 页。

段东岸。由于漕渠地段为北高南低，因而“漕渠庫下不能居水”，漕渠之水迅速流过，漕渠两岸地区不能利用渠水灌溉。李吉甫于元和二年（807年）至五年（810年）任淮南节度使。他“于高邮县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人受其惠”。[1]《新唐书》卷146《李吉甫》对此有具体叙述：“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筑堤闼，以防不足，泄有余，名曰平津堰。”

所谓“堰”即将渠水拦截住的建筑物，设水门，可以调节。这样，雨季水足，关闭水门，将水拦住，提高水位，需要时打开水门，使水流出，灌溉田畝。平津堰至今仍存，继续起调节水势的作用。

楚州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常丰堰　楚州临东海。大历中，淮南西道黜陟使李承，“奏置常丰堰于楚州（治山阳县，今淮安），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收常十倍它岁”。[2]

农产品

藕　“大历中，高邮（今江苏省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3]

梨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4]

茶　淮南道诸州盛产茶叶。

扬州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蜀冈茶“《蜀冈图经》云：冈有茶园，其茶甘香，味如蒙顶。”（《太平寰宇记》卷123《扬州江都》）

寿州霍山（今安徽省霍山）茶和蕲州（治蕲春，今湖北省蕲春）茶　《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

---

〔1〕《旧唐书》（12）卷148《李吉甫》，3 994页。

〔2〕《新唐书》（15）卷143《李承》，4 668页。

〔3〕《太平广记》（5）卷232《张存》，1 776页。

〔4〕《酉阳杂俎》续集卷9，282页。

舒州茶　《唐国史补》卷下："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治怀宁，今安徽省潜山）者……此蕲门者。'"由此可知，舒州茶与寿州、蕲州茶同属名茶，连吐蕃赞普都熟知并享用。

天柱茶　《北梦琐言》卷4："唐薛能尚书……因有诗谢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真抛却，赖有诗名合得尝。'"

由此可知，淮南所产之茶，享有盛名。

二、扬州：手工业和商业

淮南道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是唐后期最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时人认为在全国最富庶的扬州和益州（治成都县，今成都市。）中，扬州居第一。"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1]杜荀鹤（大顺二年状元）在《送蜀客游维扬（扬州）》："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盛西川。"[2]

安史乱后，北人大量南徙。"天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3]很多人到了淮南。

德宗兴元（784年）初年，杜亚任扬州长史兼淮南节度观察使。当时"扬州官河填淤，漕挽堙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亚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4]南下仕人和工商业者为造住宅和店肆，侵街占道，以致"行旅拥弊"，可知外来人口之多。

此后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一派繁荣景象。元和时人姚合在《扬州春词三首》中写道：

---

〔1〕《资治通鉴》(18) 卷259《景福元年892年》，8 430页。

〔2〕《全唐诗》(20) 卷692，7 972页。

〔3〕《太平广记》(9) 卷404《肃宗朝八宝》，3 254页。

〔4〕《旧唐书》(12) 卷146《杜亚》，3 963页。

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

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

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

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1]

《梦溪笔谈》卷3《杂法》："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这与唐武宗会昌（841—846年）年日本和尚园仁所云："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2]基本相同。

姚合谓扬州"车马少于船"，是说扬州城中河多。《梦溪笔谈》接着列举了扬州24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入西水门有九曲桥，次东正当帅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西南，有洗马桥。次，南桥。又南，阿师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泗桥、太平桥、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次，东水门东出有山光桥。又自卫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

"扬州有四十余（佛）寺，就中（从日本）过海来（之）鉴真和尚，本住兴龙寺。"[3]

扬州，在唐后期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

杜亚自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至贞元五年（789年）为淮南节度使。扬州"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按：即赛龙舟），诸州征伎乐，两县（江都、江阳）争胜负，彩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未之有也。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4]

---

〔1〕《全唐诗》(15) 卷498，5 666页。

〔2〕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13～14页。

〔3〕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22页。

〔4〕《太平广记》(6) 卷278《王播》，2 204页。

穆宗长庆（821—824年）中，张祜在《纵游淮南》诗中写道：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边好墓田。[1]

牛僧儒自文宗太和六年（832年）至开成二年（837年）任淮南节度使，辟杜牧为“掌书记”。此时“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数万，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2]

夜晚，扬州灯火辉煌。王建（大历十年进士，太和中任陕州司马）在《夜看扬州市》中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正因扬州繁华、热闹，因而成为富人聚集之处。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3]有人写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些浪漫的诗句，表达了人们对扬州的向往。(殷芸：《小说》)

手工业　《新唐书》卷41《地理五》扬州广陵郡条载土贡(应为穆宗长庆（821—824年）年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

铜镜　白居易在《百炼镜》中写道：

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

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

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4]

上好的江心镜“献蓬莱宫”，而民间也无不使用。韦应物（大历—建中时人）在《感镜》诗中写道：“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

---

〔1〕《全唐诗》(15) 卷510，5 846页。

〔2〕《太平广记》(6) 卷273《杜牧》，2 151页。

〔3〕《太平广记》(6) 卷290《吕用之》，2 304页。

〔4〕《全唐诗》(13) 卷427，4 700页。

发。”[1]张文成有《扬州青铜镜留与十娘》[2]一诗。

造纸　《唐国史补》卷下：“纸则有……扬（州）之‘六合笺’。”六合笺是著名产品。

毡帽　“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裴度）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3]

印刷业　冯宿（贞元中进士）在《禁版印时宪书奏》中写道：“剑南两川及淮南道（治扬州江都县）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4]雕版印刷自隋代已有，唐后期民间已有雕版日历鬻于市。贞元年间剑南及淮南市上已有雕版日历出售，这说明这两地区科学技术在全国领先，所谓“扬一益二”说法，信矣哉！

商业　《唐会要》卷86《市》：“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所谓“百货所集”即意味着百货所集，也意味着百货所散，作为“南北大冲”百货的集散地，其集散情形，举例如下：

茶　前面提到，淮南道寿州、舒州、蕲州等均产茶。这些茶大部经扬州运到北方。而江南所产茶也多经扬州北运。《封氏闻见记·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尔后）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河南）、沧、棣（河北）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封氏闻见记校注》卷6《饮茶》）由此可见一斑。

乾符（874—879年）以前，吕用之父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5]吕璜就是以贩运茶叶为业的专

---

〔1〕《全唐诗》(6)卷191，1 969页。

〔2〕《全唐诗》(25)《全唐诗逸》卷下，10 220页。

〔3〕《太平广记》(4)卷153《裴度》，1 101页。

〔4〕《全唐文》(7)卷624，6 301页。

〔5〕《全唐文》(9)卷897《广陵妖乱志》，9 361页。

业户。

药　谢皎然（贞元中，德宗敕写其文集入于祕阁）有《买药歌送杨山人》诗："扬州喧喧卖药市"、"江南药少淮南有"。[1]"唐贞元（785—805年）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至六合（今江苏省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俊乃归告其妻而后从之。"[2]由此可知扬州是药材的集散地。从"江南药少淮南有"一句中透露出，扬州不仅有江淮所产药材，而且有西南、岭南的药材，正因如此，才会形成"江南药少淮南有"。

木材　扬州木材加工业发达。而木材则由外地供应。"豫章（即洪州，治钟陵县，今江西省南昌市）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之广陵（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利则数倍。"[3]

"广陵（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今南京市，吴名建业，宋为建康，时人往往书古地名。），卖以求利。"[4]

从以上记载可知，从豫章诸县购进木材，扬州加工，制成木器出售。这说明扬州手工业的发达，也说明扬州是木材的集散地。

金银珠宝　《因话录》卷3：卢仲元曾持妻兄之百两黄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每）两获八千。"《旧唐书》卷174《李德裕》：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七月，"诏浙西（浙西节度使治润州曲阿县，今江苏省丹阳市）造银盏子妆具二十事进内"。时李德裕为浙西节度使，因此事上奏："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

〔1〕《全唐诗》(23) 卷821，9 260页。

〔2〕《太平广记》(1) 卷23《冯俊》

〔3〕《太平广记》(7) 卷331《杨溥》

〔4〕《太平广记》(8) 卷355《广陵贾人》，2 810页。

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另）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扬州，治江苏省江都）收买，旋到旋造。”这说明润州手工业水平高，也说明扬州市上有大量金银买卖。《太平广记》卷345《孟氏》：“维扬（扬州）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元和（806—820年）初，苏州华亭县（今江苏省松江）陆四官庙前，有守船者得一宝珠，“至扬州胡店卖之，获数千缗。”[1]以上事例说明扬州有金银、珠宝市场，外地人多持金银、珠宝来此交易。

货币存取业务　扬州自南朝已有货币存取业务。前面提到梁天监（502—519年）中，韦恕凭张老席帽，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钱一事。德宗贞元（785—804年）中，扬州波斯胡店也经营此项业务。时有李生，“偶过扬州阿使桥（即前面的阿师桥）……逢卢生。”卢生昔年号“二舅”卢二舅得知李生掌管桔子园时欠官钱二万贯，“乃与李生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妻之。”[2]［按：陆长源于贞元十二年（797年）任宣武军行军司马，驻汴州］。可知其事发生在是年。由此可知，自南朝至唐后期，扬州始终存在货币存取业务，这透露了扬州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

顺便指出，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田神功打败刘展，在扬州“杀胡商以千数”。而从上述扬州胡店收买宝珠、波斯胡店经营货币存取业务，说明唐后期扬州胡商再度活跃起来。不仅如此，唐后期，扬州与岭南、福建是胡商集中的地区。唐文宗在《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说：“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即关税）、收市（向其购买）、进奉（蕃客向朝廷奉

〔1〕《太平广记》(9) 卷402《导船者》，3 241页。

〔2〕《太平广记》(1) 卷17《卢李二生》，119页。

献）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表示对扬州等地胡商保护之意，也说明扬州与岭南、福建是唐后期三大外贸港口。

据《文汇报》1997年报道，扬州市郊至今仍有“波斯”后裔居住，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扬州东郊有群“波斯人”》

扬州市东郊昌松乡，有个村被称为“波斯庄”，庄上居民多为古代波斯人后裔。扬州自唐代以来就是著名的商业重镇和重要出海口岸，不少被称为“胡商”的波斯商人便聚集于此，有的则定居下来，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波斯番客聚居地。“波斯庄”就是这种演变的历史遗存。

“波斯庄”居民中佴姓居多。据说，佴姓还是波斯后裔的大族世家，明朝万历年间还出过一位名叫佴祺的进士。尽管由于与汉族人通婚，不少波斯人后裔已经汉化，但世居昌松境内的胡裔子孙，仍俱有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皮肤白皙，两腮络须浓的外貌特征。

（摘自上海《文汇报》）

扬州商人十分活跃。王建（大历十年进士，太和中任陕州司马）：《江南三台词四首》诗中写道：“扬州桥边少妇，长安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2〕反映了扬州商人长年在外的情况。

唐后期扬州还出现了大批发商。《唐国史补》卷中：“扬州有王生者，人呼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所谓“匿迹货殖”，大概是批发商。《大平广记》卷499《郭使君》：“江陵（今湖北江

〔1〕《全唐文》（1）卷75，785页。

〔2〕《全唐诗》（9）卷301，3 423页。

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域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郭七郎是大批发商，因为江淮、河朔的贾客，依仗他提供的货物往来交易。而扬州王四舅，只有将其货物批发给商贾，他才能做到“匿迹货殖”即看不见他往来贸易，却实实在在地在货殖。正因他与郭七郎一样，都是大批发商，才能有如此气势，只要写一个字，扬州的富商大贾，质库酒家“悉奔走之”。

三、水上交通

邗沟（漕渠）在淮南道楚州、扬州之间，是沟通淮河和长江的人工运河。随着南北经济交流的日益发展，至唐后期邗沟（漕渠）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河南道有两条河流入淮。白居易：《长相思》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1] 这是说，汴水（隋炀帝时开凿的通济渠，唐代名为汴水）流入邗沟，至长江沿岸的瓜洲；泗水（发源于山东境内的古河道）流入邗沟，至长江沿岸的瓜洲。这就是说，河南道境内有汴水、泗水两条河道入淮：

汴水——邗沟——江南河（官河）

崔颢在扬州送别从长安至苏州的好友，他写道：“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2] 其友正是经这条水路至苏州的。

岑参：《送张秘书充……赴江外觐省》：“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老亲在吴郡。”[3] 李翱在元和四年（809年）奉命自洛阳至岭南，他著《来南录》，将他由汴水，经邗沟入江南河的历程详细记录下来：

---

〔1〕《全唐诗》（25）卷890，10 057页。

〔2〕《全唐诗》（4）卷130《维扬送友还长安》，1 330页。

〔3〕《全唐诗》（6）卷198，2 035页。

宿于巩（县），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及河阴（县），次汴州，宿陈留（县）、宿雍邱（县），次宋州，至永城（县），至埇口（埇桥）次泗州。转淮上河（即邗沟或曰漕渠）及盱眙（今江苏省盱眙），至楚州，至扬州。济大江，至润州（按：从此进入“官河”即江南河）至常州，至苏州。济松江——至杭州。[1]

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是邗沟入官河（江南河）的枢纽。顾非熊（长庆至大中年间人）在《瓜洲送朱万言》诗中写道：“渡头风起叶飞频，君去还吴我入秦。”[2]熊、朱二君在瓜洲分手，一经邗沟北上入秦；一入官河南下还吴。

汴河——泗水——邗沟——江南河（官河）

在汴水（通济渠）以北，有三条相连的古河道：睢水、汴河、泗水（与汴水平行）。睢、汴在宋州境内衔接；汴河与泗水在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相连。张建封于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至十六年（800年）任徐泗濠节度使，驻徐州。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建封》诗中写道：“汴泗交流郡城角。”[3]证实了这一点。

泗水在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入淮。唐人往往将这条水上交通线称“淮泗”。刘晏为考察漕运，至江淮，与元载书曰：“浮十淮泗，达于汴，入于河。”[4]这是入淮水，经泗水，入汴河，入黄河的水上交通路线。马戴（会昌、咸通年间）有诗：《送吕郎中牧东海郡》，诗中指出吕某“假道经淮泗”[5]，也是经这条水路至江南的。这就是说时人除经汴水（通济渠）以外也可经“淮泗”古河道北上黄河或南下江南。

---

〔1〕《全唐文》(7) 卷638，6 442页。

〔2〕《全唐诗》(15) 卷509，5 792页。

〔3〕《全唐诗》(10) 卷338，3 786页。

〔4〕《旧唐书》(11) 卷123《刘晏》，3 512页。

〔5〕《全唐诗》(17) 卷555，6 432页。

唐后期漕运多走汴水——邗沟——江南河（官河）一路。

汴水在盱眙（今江苏省盱眙）入淮。元和九年（814年）李稼在盱眙南都梁山置粮仓。“元和九年，陇西李稼为盐铁官，掌署淮口，病其涸滞……创庾于淮南都梁山。”沈亚之指出：“汴水别河而东，合于淮。淮水东，米帛之输关中者，由此会入其所。”[1]由此可知这条水道是唐后期南北漕运的主要通道。

由于从盱眙顺淮河至楚州山阳入漕渠，漕粮往往不能及时输运，而在都梁山置仓，可减轻运输的压力。

为了护卫这条漕路，朝廷在楚州山阳县（今江苏省淮阴、涟水之间）、寿州寿春县（今安徽省寿县）驻军。杜牧（唐文宗时人）在《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中指出：“淮南军西蔽蔡壁，寿春有团练使；北蔽齐壁，山阳有团练使。（淮南）节度使为军三万五千人，居中统制二处一千里三十八城，护天下饷道，为诸道府军事最重。”[2]

第三节　唐末扬州的破坏与恢复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六年（879年）高骈以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割据淮南，治扬州。高骈“积年不贡奉，货财在扬州者，填委如山。骈作郊天、御楼……及大殿。元会、内置、行幸，供张器用，皆刻镂金玉、蟠龙、鹫凤数十万事”。[3]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左厢知兵马使”毕师铎率兵入扬州，因高骈，“焚进奉两楼数十间（原注：骈自乾符以来，贡献不入天子，宝货山积于进奉楼。）宝货悉为煨烬。”[4]不久，

〔1〕《文苑英华》（5）卷808《淮南都梁山仓记》，4 269页。

〔2〕《全唐文》（8）卷753，7 812页。

〔3〕《资治通鉴》（18）卷257《光启三年》，8 355页。

〔4〕《资治通鉴》（18）卷257《光启三年（887年）》，8 354页。

杨行密发兵讨毕师铎，而宣歙观察使秦彦为支援毕师铎率军至扬州，杀死高骈，杨行密包围扬州，秦彦、毕师铎逃跑，杨行密入扬州，自称“淮南留后”。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秦宗权部将孙儒一度攻占扬州，最后杨行密打败孙儒，复占扬州。史称：“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1]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892年）》：“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杨）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从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赋，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从孙儒的破坏到杨行密的治理只有几年的时间，能够“复承平之旧”不免有所夸大。不过，由于扬州经济基础雄厚，乱后恢复较快，是毫无疑问的。

---

〔1〕《旧唐书》（14）卷182《秦彦》，4 716页。

第十七章　江南东道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唐初10道分为15道。其中，将江南道，划为江南东、江南西和黔中道。

安史乱后，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将江南东道，又分为二道。“（二月）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领苏、润等十州（原注：领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湖十州、治升州）。”“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等八州（原注：领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治越州）”[1]不久，浙西罢领宣、歙、饶、江四州，领六州。升州原为润州的一部分，后复并入润州，浙东节度使治所复为润州。

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又置福建节度使。长乐县严湖碑：宝应二年“升福建都防御使为节度使，（李）承昭为福、建、泉、汀、漳、潮六州节度使。”[2]后改为观察使；潮州隶岭南。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叛军止于江淮以北，江南东道未罹荼毒。然而也受到战乱的影响。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十一月，正当河北节度使李光弼与叛将史思明争战洛阳以北地区时，淮西节

〔1〕《资治通鉴》（15）卷220《乾元元年》，7 063页。

〔2〕郁贤浩：《唐刺史考》（4）1 89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度副使、宋州刺史刘展叛乱、先后占领扬州、攻陷润州、常州，进攻杭州。淮南节度使邓景山请求平卢军马使田神功派兵支援。叛军和官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平卢军在杭州，“大掠十余日（原注：田神功所将平卢军也）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1〕不过，刘展叛乱，为期仅四个月，破坏的范围和程度有限，因而，恢复也较快。

李栖筠自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三年（768年）任常州刺史。至任“时寇乱之后，旱暵仍岁，编户转徙，卢（庐）井半空。乃浚河渠、导江流，以资溉灌。是岁大稔，流民毕复”。〔2〕

李华于永泰元年七月撰《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近岁灾沴繁兴，寇盗连起，百战之后，城池独存。王师雷动，元恶授首。”卢幼平于永泰元年任杭州刺史，“公体而清，直方简亮……未逾三月，降者迁忠义，归者喜生育，旌次让利，辕门无声，人咸曰：休哉。”〔3〕

拓宽练湖

韦损自永泰元年至大历四年任润州刺史，他主持了丹阳县（今江苏省丹阳）“练塘”的疏浚。“（丹阳）有练塘，周八十里。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田，民刻石颂之”。〔4〕

人口增多

安史之乱爆发，战乱在北方，因而北人大量渡淮过江。“两京（长安、洛阳）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5〕“李希仲，赵郡（治平棘县，今河北省赵县）人，天宝初宰偃师（今河南省偃

〔1〕《资治通鉴》（15）卷222《七元二年》7 104页。

〔2〕《册府元龟》（9）卷678《牧守部·兴利》，8 102页。

〔3〕《全唐文》（4）卷316，3 206页。

〔4〕《新唐书》（4）卷41《地理五》，1 057页。

〔5〕《旧唐书》（12）卷148《权德舆》，4 002页。

师），范阳兵起，挈家避乱入江淮。”[1] 于邵在《河南于氏家谱后序》中指出：“幽寇叛乱，今三十七年。顷属中原失守，族类逃难，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2] 由此可知安史之乱期间，关中、河南的民户大量举家南渡，尤以至江南者为多。梁肃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令厅壁记》中指出：“国家当上元（761—762 年）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兹土，参编户之一。”[3] 苏州吴县安史乱后的外来人口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可见北方人南下之多。

州县的繁荣

江南东道在唐前期已出现一些繁荣的州县。安史乱后，这些州县虽经刘展之乱，一度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很快又恢复并发展起来。

润州（治所在丹徒县，今江苏省镇江市），李栖筠于大历三年（768 年）任浙西观察使，驻润州丹徒县。常衮在撰写的《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中指出：丹徒“方州震泽之北，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奸之所生。资于大才，济我难理，加以中宪，雄兹按部，慎乃教令，薄其征徭，无倚法作威，无割下附上，勉副朝寄，以绥一方。”[4] 由此可知丹徒县在当时是江南的经济的中心。

苏州（治所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梁肃在大历四年（769 年）二月撰《吴县令厅壁记》中指出：“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以户口多少、资地美差划分县的等第：望、紧、上、中、下。望县为户多、地美者）十数，而吴为大。”[5]

常州（治所在晋陵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李华于永泰二年（766 年）撰《常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常州当楚越之襟束，居

---

〔1〕《全唐诗》（5）卷 158《李希仲》，1 616 页。

〔2〕〔5〕《文苑英华》（5）卷 737，3 837 页。

〔3〕《文苑英华》（5）卷 805，4 254 页。

〔4〕《文苑英华》（3）卷 408，2 068 页。

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领五县，版图十余万。”[1]

杭州钱塘县（州治所。今浙江省杭州市）李华于永泰元年七月撰《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骈穑二十里，开肆三万室。”[2]

福建地区也有较大发展。代宗大历七年（772年）至十年（775年）李琦任福、建、泉、汀、漳五州观察使。其时，“闽粤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然而，“犹有无诸余善之遗俗，号曰难治。”而李琦至任，“视年丰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烦苛。法之掊克者，吏不奉职、民不帅教，则惩以薄刑，俾寝迁善。”在他的治理之下，“由是民知方矣”。[3]意为百姓知道遵守法纪。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合浙江东、西道，置都团练观察使。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以韩滉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复分浙江东、西为二道。

韩滉为浙江东、西道节度使时，领15州：“浙江东、西道所统、惟润、升、常、湖、苏、杭、睦、越、明、台、温、衢、处、婺、宣）其时，两浙节度使“管郡十五，户百万。里正、亭长、书佐、小吏、令丞、牧守，通数万人”。[4]以后，宣州属宣歙池观察使。

韩滉至任，“安辑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称理”。[5]

建中初年，德宗裁抑藩镇，引起成德、魏博等藩镇“五镇连兵”抗拒朝廷。建中四年（783年）朝廷发泾原等道兵镇压五镇连

---

〔1〕《文苑英华》(5) 卷800，4 234页。

〔2〕《全唐文》(4) 卷316，3 206页。

〔3〕《全唐文》(4) 卷390《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3 964页。

〔4〕《全唐文》(6)卷530《检校左仆射……韩公行状》,5 382页。

〔5〕《旧唐书》(11) 卷129《韩滉》，3 600页。

兵。由于泾原士卒不满粗粮淡菜，发生叛乱，即“泾师之变”。

韩滉“闻京都未平，乃闭关梁，禁牛马出境，筑石头（今南京市北）五城……起建业（今江苏省江宁），抵京峴（即京峴山，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以南），楼雉相望，以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馆第数十于石头城……造楼船三千柁，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乃还。”〔1〕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十一月，德宗以“关中乏粮”示韩滉，韩滉得信，“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2〕韩滉以米百万斛支援朝廷，渡过难关，显示了江东十五州的经济实力。以下列举江东各州经济长足发展的状况。

一、浙江东道、浙江西道节度使

（一）润州

1. 农业

润州（治丹徒县，今江苏省镇江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冬，为削平割据已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势力，对淮西用兵，历时三年，始告平息。元和十一年（816年）十月，“时宿兵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富，乃以（李）脩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3〕

崔郾于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至开成元年（836年）任浙江西道观察使。其时，“上田沃土，多归豪强。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酷，甚于亡秦’今其是也。于是，料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赋，一其徭役……民有宿逋，不可减于上供者，必代而输之。诚祷山川，岁获大稔。”〔4〕崔郾在任时减轻百姓负担，使农业发展起来。

---

〔1〕《新唐书》（14）卷126《韩休传附韩滉传》，4 435页。

〔2〕《资治通鉴》（16）卷231《兴元元年》，7 448～7 449页。

〔3〕《旧唐书》（13）卷162《李脩》，4 240页。

〔4〕《文苑英华》（6）卷977《银青光禄大夫……崔公行状》5 146页。

茶“韩滉闻奉天（长安西北奉天县）之难（泾师之变时，德宗出逃奉天），以夹练囊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1〕

2. 手工业、商业

精美丝织物　长庆四年（824年）七月，浙西观察使（治所在润州丹徒县，今江苏省镇江市）李德裕上表曰：

> 臣当道奉诏，更令织造定罗丝袍段及盘绦绫一千匹，况立鹅、天马、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宜更赐节减。（《太平御览》卷816《布帛部三》）

新即位的敬宗令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织造有“立鹅”、“天马”、“豹”等纹彩的精美丝织品。虽然此事在李德裕的请求下作罢，然而，从中可知润州丹徒县当时能够织造如此高级的丝织物。这一点由李德裕“至于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一语得以证实。

金银制造〔2〕敬宗即位之年七月，诏浙西造银盏子，妆具二十事进内。李德裕说：“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令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3]“旋到旋造”表明当时丹徒县金银制造业水平之高。

“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润州江宁县，今江苏省南京市，旧曰金陵）至吴泰庙，见“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4〕由此可知，江宁县有许多制作金银手饰的作坊、店肆、因为数量多了才有“金银行”这一组织。

铜器《新唐书》卷41《地理五》润州丹阳郡载土贡（按：《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土贡，据北京大学王永兴教授考证，实为长庆

---

〔1〕《唐国史补》卷上，26页。

〔2〕〔3〕《旧唐书》(14) 卷174《李德裕》4 512页。

〔4〕《太平广记》(6) 卷280《刘景复》，2 235页。

年间的土贡〔1〕）：伏牛山铜器。可知其时润州所产铜器十分精美，因而每年上贡朝廷。

润州江宁县（今江苏省南京市），楚称金陵邑，刘宋为建康，武德改称金陵，贞观年间改为江宁。不过唐人往往以江宁之古称名之，习以为常。从以下记载中可知唐后期江宁是商业发达的城市。

《太平广记》卷86《杜鲁宾》："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属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恒来市药。"

张籍（贞元时人）：《贾客乐》："金陵向西贾客多，人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2〕

从豫章来江东的药贩；从江东入蜀经蛮的贾客，说明当时江宁县是润州与各地贸易的一个枢纽。不仅如此，江宁县设"市"，对活跃当地的商品交流起了巨大作用。《唐语林》卷7："韦楚老，李宗闵之门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居于金陵，常乘驴经市中。"《太平广记》卷353《建康乐人》："建康有乐人，日晚入市。"这两条资料，虽未正面描述"市"内的商业活动，但从"常乘驴经市中"、"日晚入市"可领略其市的景观。

润州丹阳县（今江苏省丹阳）还有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李白在《丹阳湖》诗中写道："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3〕"天外贾客归"透露了这一现象。

（二）常州

常州（天宝元年改为晋陵郡。治晋陵县，今江苏省常州市。）

孙会于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任常州刺史，同年其弟孙晟授苏州刺史。常、苏二州毗邻。梁肃撰写的《贺苏、常二孙使君邻郡诗序》："兴元、贞元间，偕以治行闻，天子器之，于是仲有吴苑之

〔1〕《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北大学报》1982年第4期）

〔2〕《全唐诗》（12）卷382，4 287页。

〔3〕《全唐诗》（6）卷181，1 850页。

寄，伯受晋陵之命。自虔亭以东、御儿以北，面五湖，负大江，列城十二（按：常州领晋陵、武进、江阴、义兴、无锡五县。苏州领吴、嘉兴、昆山、常熟、长洲、海盐七县），环地二千里，政教同和，风雨同节，礼让同俗，熙熙然有太平之风。每岁土膏将起，场功向毕，二公各约车舆，将命者十数人，循行邑里，劳之斯耕，喻之斯藏，民乐其教，且饱其和……二邦之人，十斯观德，可谓之荣矣。"[1] 由此可知，常州以及苏州在贞元年间社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元和八年（813 年）三月，常州刺史孟简始到任，"州有孟渎，久淤阏，简治道，溉田凡四千顷"。[2]

常州义兴县（又称宜兴县，今江苏省宜兴）所产紫笋茶当时即为名品。《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常州有义兴之紫笋。"

紫笋茶是贡品。《新唐书·地理五》所载"土贡"据王永兴先生考证为"长庆贡"。常州的紫笋茶列为土贡。杜牧在太和中作《题茶山(在宜兴)》诗："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修贡亦仙才。"[3]

白居易有《晚春闾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一诗："闻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即常州，隋为毗陵郡）运到茶。"[4] 可知常州紫笋茶为名茶。

（三）苏州

苏州（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白居易于敬宗宝历元年（825 年）至二年（826 年）任苏州刺史。他指出："江南诸州，苏最为太，兵数不少，税额至多。"[5] 他在《自到郡斋仅经旬日……》

---

〔1〕《全唐文》(6) 卷 518，5 263 页。

〔2〕《新唐书》卷 160《孟简》，4 968 页。

〔3〕《全唐诗》(16)卷 522，5 969 页。

〔4〕《全唐诗》(14) 卷 454，5 146 页。

〔5〕《全唐文》(7) 卷 666《苏州刺史谢上表》，6 774 页。

一诗中写道："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1] 苏州领县七：吴县（州治所，今江苏省苏州市）、长洲、嘉兴、昆山、常熟、海盐、华亭。他还有《登阊门闲望》一诗："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2] 写出了苏州当时的富实。

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一诗中，描绘了苏州吴县的城市面貌：

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
半酣悉槛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
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
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
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
高厅大馆居中央。[3]

李绅有《过吴门二十四韵》：

烟水吴都郭，阊门架碧流。
缘杨深浅巷，青翰往来舟。
朱门千家室，丹楹百处楼。
竹扉梅圃静，水巷桔园幽。[4]

白、李之诗，将苏州秀丽的山水，雄伟的高楼厅馆和梅桔树色，层次分明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水利工程

李素于宪宗元和二年（807 年）至五年（810 年）任苏州刺史。至任，开常熟水塘。刘允文在《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中曰："（常熟塘）自城而遥，百有余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潮……畴接壤制，

〔1〕《全唐诗》（13）卷 447，5 020 页。
〔2〕《全唐诗》（13）卷 447，5 021 页。
〔3〕《全唐诗》（13）卷 444，4 968～4 969 页。
〔4〕《全唐诗》（15）卷 481，5 474 页。

动涉千顷。”李素至任，主持开塘。“塘开地中，工毕泉出，山泽作气，江湖发源，积为长流，实自新浙，舟楫鳞集；农商景从，春秋有施，水旱斯备。”[1] 常熟塘不仅使千顷耕地成为良田，而且可通舟楫，便利了交通。

《新唐书·地理五》苏州海盐县（今县名）：“有古泾三百一，长庆中，（县）令李谔开，以御水旱。又西北六十里有汉塘，大和七年（834年）开”。

粮食与经济作物

苏州嘉兴县（今浙江省嘉兴市）有官营屯田，称“嘉禾屯”。李翰在《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中，指出：“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自朱公为屯，无下岁，无年终，收入若千斛，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2] 嘉禾屯的年产量相当于浙西六州的租赋。

桔“苏州入弘执信，载桔来郑州”。[3]

藕《唐国史补》卷下：“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曰‘伤荷藕’。或云‘叶甘，为虫所伤。’；又云：‘欲长其根，则故伤其叶。’”赵嘏（武宗会昌时人）有《秋日吴中观贡藕》一诗。

手工业、商业

丝和丝织品《新唐书·地理五》苏州土贡（长庆贡）：“丝绵、八蚕丝、绯绫。”白居易《新制布裘》：“桂布白似雪，吴绵软如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4] 白居易新制的棉裘，是用桂管布，

---

〔1〕《全唐文》(8) 卷713，7 324～7 325页。

〔2〕《全唐文》(5) 卷430，4 375～4 376页。

〔3〕《文苑英华》(4) 卷546《梨桔判》，2 791页。

〔4〕《全唐诗》(18) 卷424，4 668页。

即桂林所产的木棉织成的面料，而内用苏州所产的丝绵。这在当时是最讲究的冬衣，而以吴绵为絮，可知苏州丝绵是当时的上品。而长庆贡中有“绯绫”则属高级丝织品。

石砚　皮日休有《太湖砚》一诗：“求于花石间，怪状乃天然。寄与先生后，应添内外篇。”〔1〕

唐后期苏州不仅拥有浙西最大的屯田，还拥有“淮海闽貉”中最大的盐监。顾况于贞元于七年（801年）撰苏州《嘉兴监记》：

> 天宝末，天下兵起，乾元（759—760）初，上司奏议：宜以盐铁之职总以社稷之臣，斡乎山海之利以富人也。淮海闽貉，其监十焉，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南）为首……十年六监，兴课特优。至是末期，从百万至三百万。盐人、贾人，各得其所。〔2〕

苏州嘉兴盐监，自乾元初至元和、开成年间，都很兴旺。《太平广记》卷402《守船者》载：“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可见其盛况。开成初苏州刺史卢商，鉴于‘郡人苦盐法之烦’放宽了限制，‘籍见户量所要自售，无定额。苏人便之，岁课增倍。’”〔3〕

唐后期苏州的商业也很发达。苏州常熟县元阳观以清法师“大历中，常往嘉兴，人船中……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4〕杜荀鹤《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5〕可知苏州有夜市。

（四）湖州

湖州，领县五：乌程（州治所，今江苏省吴兴）、武康、长城、安吉、德清。

---

〔1〕《全唐诗》（13）卷612，7 059页。

〔2〕《全唐文》(6)卷529,5 372页。

〔3〕《旧唐书》（14）卷176《卢商传》，4 575页。

〔4〕《太平广记》（1）卷29《李卫公》，190页。

〔5〕《全唐诗》（20）卷691，7 926页。

安史乱后，湖州局势平稳。杨夔《湖州录事参军新厅记》："自兵兴十五载，事隳宿贯，守国之法制，禀朝之政令者由关而东，郡亦无几，唯吴兴（湖州天宝元年改为吴兴郡）遵国经、体旧章，上下谦敬，确然不渝。"〔1〕

兴修水利　于頔于贞元七年（791年）至于年（794年）任湖州刺史。至任"因行县至长城（今浙江省长兴）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千顷，久湮废，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2〕

湖州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市）"东百二于三里有官池，元和中，刺史范传正开。东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宝历中，刺史崔玄亮开。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杨汉公开。"〔3〕

经济作物

紫笋茶　湖州长城县（今浙江省长兴县）西北四于里有顾山，"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4〕《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州有顾渚之紫笋。"看来紫笋茶是在贞元年间成为名品，并成为贡品的。从此，顾山紫笋成为宫廷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贞元中湖州刺史于頔曾"遵奉诏命，诣顾渚茶院修贡。"（《两浙金石志》卷2《唐于頔题目》）升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充死，"吏不谨，进献新茶不及当年。"朝廷派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玫充"湖州造茶使"〔5〕进行监督。可见朝廷的重视。而《茶经》的作者陆羽"置园顾渚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6〕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茶叶专家所置茶园之地选择于

〔1〕《文苑英华》(5) 卷803，4 248页。

〔2〕《旧唐书》(13) 卷156《于頔》，4 129页。

〔3〕《新唐书》(4) 卷41《地理五》湖州条，1 058页。

〔4〕《元和郡县图志》(下) 卷25《江南道一》湖州条，606页。

〔5〕《册府元龟》(6) 卷494，5 906页。

〔6〕《新唐书》(18) 卷196《陆龟蒙》，5 613页。

此，也说明顾渚山的茶叶质量之高。

柑桔《新唐书·地理五》湖州“土贡（即长庆贡）：乳柑”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其贡桔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1〕湖州所产柑桔以及其他物产，“虽临淄之富不若也”，表明湖州在唐后期经济的发达，较之北方著名的富地临淄不相上下。

若下酒《唐国史补》卷下：“酒有乌程之‘若下’。”若下酒与郢州的‘富水’，荥阳的‘土窖春’齐名。《元和郡县图志》湖州：“若溪水，酿酒甚浓，俗称‘若下酒’。”可见湖州若下酒质量之高。

丝织业《新唐书》卷41《地理五》所载湖州上贡有“御服”和“鸟眼绫”等高级丝织品。其中“御服”，即皇帝所穿服装，这表明唐后期湖州的丝织业水平之高。

（五）杭州

杭州（余杭郡）领县八：钱塘（州治所，今浙江省杭州市）、盐官、余杭、富阳、于潜、临安、新城、唐山。“江南列郡，余杭为大”〔2〕

唐后期杭州有很大的发展。杜牧于开成年间撰《上宰相求杭州启》中说：“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3〕是江南之名郡。

杭州钱塘县（今杭州市）风景优美，建筑辉煌。白居易在《余杭形胜》诗中描述：“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4〕他在《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中写道：“越国封疆吞碧海，杭城楼阁入青烟。吴兴（湖州）卑小君应屈。”〔5〕由此可知杭州钱塘县是风景秀丽、楼阁高耸、人口众多的

〔1〕《全唐文》(6) 卷529，5 372页。

〔2〕白居易《卢元辅杭州刺史制》（《全唐文》卷661）

〔3〕《全唐文》(8) 卷753页，7 806页。

〔4〕《全唐诗》(13) 卷443，4 961页。

〔5〕《全唐诗》(13) 卷446，5 004页。

繁华城市。

杭州唐后期的大发展与杭州在唐后期成为旅游胜地有密切关系。随着唐后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到江南游览者渐多。唐诗中以“游吴越”为题的诗作，屡见不鲜。杭州胜景更为人们所向往。长庆初杭州刺史白居易将《杭州郡楼登望画图》寄给在长安的张籍，张籍即兴赋诗：“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1〕可见杭州风景的巨大魅力。

唐后期的杭州能够吸引大量游客，主要是有三大奇观：

钱塘江观潮　张籍《赠李杭州》有“开门长望浙江潮”〔2〕之句。白居易有“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回流六十回”〔3〕之句。姚合有《杭州观潮》一诗，写出了江潮的气势：

楼有章亭号，涛来自古今。
势连沧海阔，色比白云深。
怒雪驱寒气，狂雷散大音。
浪高风更起，波急石难沉。
鸟惧多遥过，龙惊不敢吟。〔4〕

徐凝有《观浙江涛》：“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5〕。杨巨源还生动地描绘了钱塘江看日出的情景：“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潮色银河铺碧落，日光金柱出红盆。”〔6〕

〔1〕《全唐诗》(12) 卷385，《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4 337页。
〔2〕《全唐诗》(12) 卷385，4 339页。
〔3〕《全唐诗》(13) 卷446《潮》，5 006页。
〔4〕《全唐诗》(15) 卷499，5 677页。
〔5〕《全唐诗》(14) 卷474，5 377页。
〔6〕《全唐诗》(10) 卷333《送章孝标校书归杭州因寄白舍人》，3 724页。

西湖胜景　白居易在《春题湖上》中描绘了西湖景色："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他留恋西湖："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1]

寺观　杭州有天竺、灵隐、孤山等著名的佛寺和龙泉道观。白居易《答微之见寄》中说："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羡若耶溪。"[2]

正因杭州风景独胜，吸引了大批游人。牟融有《处厚游杭做诗寄之》，说明韦处厚曾专程游览过杭州。"唐龙纪（889年）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3]唐后期士人大批来游，对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繁荣，都有积极作用。

兴修水利　长庆初，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4]白居易离任时，做《别州民》诗："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原注：今春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故云。）"[5]

杭州余杭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市）"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宝历（825—827年）中，（县）令归珧因汉令陈浑故迹置。北三里有北湖，亦珧所开，溉田千余顷。"[6]

杭州于潜县（今浙江省临安县西）"南三十里有紫溪水溉田，贞元十八年（802年）（县）令杜泳开。又凿渠三十里，以通舟楫。"[7]

经济作物

柑桔　《新唐书》卷41《地理五》杭州富阳县（今浙江省富阳）"王洲有桔，以供贡"。

木瓜《唐语林》卷3："崔涓守杭州，湖上饮饯，客有献木瓜，所未尝有也，传以示客。有中使即袖归，曰：'禁中未曾有，宜进

---

〔1〕〔2〕《全唐诗》（13）卷446，5 003、5 002页。

〔3〕《太平广记》（8）卷354《柳鹏举》，2 808页。

〔4〕《新唐书》（14）卷119《白居易》4 303页。

〔5〕《全唐诗》（13）卷446，5 007页。

〔6〕〔7〕《新唐书》（4）卷41《地理五》1059、1 060页。

于上。'顷之，解舟而去。”崔涓为杭州刺史，据《唐刺史考》，当为宣宗大中（847—859年）末年。此时木瓜“禁中未曾有”，然而《新唐书·地理五》杭州土贡列有“木瓜”。而《新唐书·地理志》所列“土贡”，据王永兴先生考证当为“长庆贡”，也就是说，穆宗长庆（821—824年）年间，杭州的木瓜被列为贡品。

柿　白居易《杭州春望》：“红袖织绫夸柿蒂（原注：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1〕

牡丹《唐语林》卷3：“尚书白舍人（白居易）初到钱塘，令访牡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栏围甚密，他亦未知有也……牡丹自东越分而种之也。”

手工业、科技和商业

藤纸　余杭县（今浙江省余杭市）有由拳山，“傍有由拳村，出好藤纸。”〔2〕

雕版印刷　“杭、越作碑模勒乐天（白居易）及予（元稹）杂诗，卖于市肆中。”〔3〕当时杭州、越州（今绍兴市）雕版印刷元、白诗歌，在市肆中出售。

早在至德（756—758年）中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就指出：“杭州东南名郡……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可知杭州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在唐后期商业的发达。白居易在《东楼南望八韵》中写道：“不厌东南望，江楼（原注：名望海楼）对海门。鱼盐聚为市。”〔4〕

杭州有官盐场　沈亚之《杭州场壁记》：“国家始以输边储塞，不足于用，遂以盐铁榷估为助，使吏曹计其入于郡县近利之

〔1〕《全唐诗》（13）卷443，4 959页。

〔2〕《元和郡县图志》（下）卷25《江南道一》杭州，603页。

〔3〕《文苑英华》（5）卷705《白氏长庆集序》，3 637页。

〔4〕《全唐诗》（13）卷443，4 960页。

地得为（巡）院、盐场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顾杭州虽一场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粤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即“贯”）计。”〔1〕

“闽粤瓯越之宾货”、“盐鱼大贾所来交会”说明杭州商业的发达。

（六）越州

越州领县七：会稽（州治所，今浙江省绍兴市）、山阴、诸暨、余姚、剡、萧山、上虞。越州是浙东观察使驻地，浙东观察使领七州；越、衢、婺、温、明、处、台州

白居易：《答微之见寄》中说：“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2〕也就是说，以风景幽美来说，在江南一带，会稽仅次于杭州，名列第二。

越州的发展经过了大起大落的过程。开元、天宝年间，越州是本地区人口最多的州，手工业和经济作物都较发达。然而，“永泰中，妖贼杀郡将以叛。”〔3〕这次动乱对越州社会经济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丝织业的萎缩上。宝应元年（762年）至大历五年（770年）任越州刺史、浙东节度观察使的薛兼训，鉴于“越人不工机杼”，“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竟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4〕前面提到开元年间越州以白编、交梭、吴绫这些精美丝织品为贡品，而在宝应、大历间、越人却“不工机杼”这只能说明至德至大历初年，越州丝织业受到较大的摧残。薛兼训的举措只是重振越州的丝织业而已。

此后，越州的社会经济又大步向前发展。

经济作物

---

〔1〕《全唐文》(8) 卷736，7 604页。

〔2〕《全唐诗》(13) 卷446，5 002页。

〔3〕《文苑英华》(6) 卷956《越州长史李公墓志铭》，5 027页。

〔4〕《唐国史补》卷下，65页。

桔　《新唐书》卷41《地理五》越州土贡：桔。李绅在越州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作《桔园》诗："江州雾敛轻霜早，园桔千株欲变金。"〔1〕

藕　徐彦伯：《采莲曲》："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折藕丝能脆，开花叶正圆。"〔2〕李颀：《采莲》："越溪女，越溪莲，齐菡萏，双婵娟。嬉游向何处？采摘且同船。"〔3〕施肩吾：《遇越州贺仲宣》："君在镜湖西畔住，门前几个采莲女。"〔4〕都说明越州盛产莲藕。

手工业

丝织业　自薛兼训令军中未有家室者至"北地娶织妇以归"。此前，北方优良蚕种曾引入越州。早在贞观年间，有萧翼者"随商人船，下至越州。"一日入寺，对法师辨才说："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5〕虽然，萧翼乃奉命向辨才购《兰亭序》，卖蚕种只是托词，但当时有不少北人将北方优良蚕种携至越州出售，恐为不争的事实。这都说明大历初年以前越州的丝织业不及北方。然而，代宗大历以后，越州丝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新唐书》卷41《地理五》所载越州"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绢?）、生縠、花纱、吴绢。"《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各州丝织物的"土贡"中，像越州这样有多种罗、绫以及纱、绢等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知唐后期越州的丝织业的长足发展。

不仅如此，"自贞元（785—805年）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种"。〔6〕这

〔1〕《全唐诗》(15) 卷481，5 478页。

〔2〕《全唐诗》(3)卷76,824页。

〔3〕《全唐诗》(4)卷133,1 355页。

〔4〕《全唐诗》(15)卷494,5 607页。

〔5〕《太平广记》(5) 卷208《购兰亭序》，1 589页。

〔6〕《元和郡县图志》（下）卷26《江南道二》越州，618页。

就是说自贞元年间，越州不仅按例进贡精美的丝织品，此外，还要“别进”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数十种。《唐会要》卷85《逃户》：贞元十年（794年）越州“进绫縠一千七百匹。”所谓“进”即进贡之意。

越州所产的蚕丝供应外州。元和进士施肩吾《江南织绫词》：“卿卿买得越人丝，贪弄金梭懒画眉。”就是证明。

越州的丝织技术更是技高一筹。越州土贡中有“轻容（绢?）”，就是高技术的产物，《太平广记》卷232《令孤绹：“唐丞相令狐绹因话奇异之物……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视之似非人世作。”看来越州的土贡“轻容”就是这种轻绢。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浙东贡舞女二人，她们所穿“罗衣，无缝而成，其文织巧，人未能识”。[1]可作为旁证。

唐后期，无论蚕丝的产量，还是质量以及丝织技术，越州都是首屈一指，因而，吕温指出：“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2]可知越州的丝织业居全国重要地位。

制瓷业《新唐书·地理五》越州“土贡”中有瓷器。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越州瓷碗为“上”，超越鼎、婺、洪州。邢州瓷器也是贡品，然而，“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越瓷居于全国之首。

剡县（今浙江省嵊州市）藤纸《新唐书·地理五》越州“土贡”中有纸。剡县有溪，“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3]剡县藤纸“剡藤苔笺。是当时名产[4]崔道融有《谢朱常侍寄赐蜀茶、剡纸二首》，其中

---

〔1〕《太平广记》(6) 卷272《浙东舞女》，2 143页。

〔2〕《文苑英华》(6) 卷901《故太子少保……韦府君神道碑》，4 745页。

〔3〕《全唐文》(8) 卷727《悲剡溪古藤文》7 495页。

〔4〕《唐国史补》卷下，60页。

描绘剡纸诗曰："百幅轻明雪未融，薛家凡纸漫深红。"对这样好纸，"不应点染闲言语"，"留记将军盖世功。"[1]

剡溪纸工在造纸技术上有惊人的突破，竟用纸制成纸帐和纸被。乾宁（894—897年）进士徐夤在《纸帐》中有"避寒深入剡藤中……自宿嫦娥白兔宫"[2]诗句，看来这种纸帐透明度极佳。而纸被则是："细柔轻缀好鱼笺……数尺白云笼冷眠。"[3]可知纸被轻而暖。《太平广记》卷289《纸衣师》"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絮布纯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纸衣与纸帐、纸被一样，是当时的新产品，这禅师讲究衣着，时人不解误以"苦行"视之。文中未明言纸衣的产地，从纸帐为"剡藤"制作一事看来，纸衣也应是剡县的产品。

二、福州及福建观察使管州

安史之乱以后，全国遍置节度使。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以李承昭为福建泉汀漳潮六州节度使。代宗太历七年（772年）以李椅为福、建、泉、汀、漳五州观察处置使。以福州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为治所。

福建地区起步较晚，自开元、天宝年间"开山洞"置一些州县以后，福建地区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就经济发展来说，农业发展较为显著，而手工业次之。

福建闽县既为州治所，建筑也很可观。周朴：《登福州南涧寺》："晓日青山当大海，连云古堑对高楼。"[4]

唐朝初年，福建、岭南、黔中等地的官员往往由"土人首领"担任。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起，"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

---

〔1〕《全唐诗》(21) 卷714，8 210页。

〔2〕《全唐诗》(21) 卷710，8 174页。

〔3〕《全唐诗》(21) 卷716《纸被》，8 174页。

〔4〕《全唐诗》(20) 卷673，7 701页。

充”。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七月二十九日敕：“桂、广、泉、建、贺、福、韶等州县，既是好处，所有缺官，宜依选例省补。”[1]这就是说自上元三年起，福、建、泉（属福建观察使）和广、桂、韶、贺（属岭南道）的州县官，皆由吏部选派。这对上述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农业　“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山中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2]

除山地种粟以外，大多种水稻。《新唐书》卷41《地理五》福州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二年（828年）（县）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碱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长乐县（今福建省长乐市）“东十里有海堤，大和七年(833年）（县）令李茸筑，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

《太平广记》卷355《林昌业》：“林昌业，漳浦人也。……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退居本郡龙溪县（今福建省漳州市南）羊额山之阳。……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诸州货之。”

经济作物

茶　《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福州有方山之露牙。”《新唐书·地理五》福州“土贡”有茶，看来即“方山之露牙”。

橄榄　《新唐书·地理五》福州“土贡”还有橄榄。哀帝有《停贡橄榄敕》：“福建一道，远在海隅，尝勤土贡，每年所进橄榄子……今后不进奉橄榄子，永为常例。”[3]福建至唐末哀帝(905—907年）时才停贡橄榄。

---

〔1〕《唐会要》（下）卷75《南选》，1 369页。

〔2〕《太平广记》(9）卷432《食虎》，3 509页。

〔3〕《全唐文》（1）卷94，975页。

荔枝　李洞：《送沈光赴福（州）幕》：“岭前齐鸟飞，雨熟荔枝肥。”〔1〕

药材

蚺蛇胆　《朝野佥载·补辑》：“泉（治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建（治建安县，今福建省建瓯）州进蚺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封取，药封放之。”《太平广记》卷218《卢元钦》：“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风，唯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风，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这说明泉、建二州所产蚺蛇可治脑溢血病，其胆尤佳，因而成为贡品。

手工业　“元和九年(814年)八月诏：“太府奏：建州、泉州……所纳物粗恶短狭。布帛有幅，制度所存。近日劝课不精，窳滥方甚。”〔2〕透露了福建地区所产布帛之类手工业品质量不够标准。

畜牧业　《旧唐书》卷13《德宗上》：“贞元二十年（804年）七月十九日福建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牛、羊万头、匹，监吏主之。”

交通　有陈寨者，医生，来往泉州、漳州等地行医。“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递铺！递铺！’以警之。”〔3〕

外贸　福建临台湾海峡与南海，唐后期有一些“蕃舶”来福建的一些港口停靠，为防止地方官吏谋私，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下诏：“南海蕃舶……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停舶税）、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4〕

〔1〕《全唐诗》(21)卷721，8 272页。

〔2〕《册府元龟》(6)卷504《邦计部·丝帛》6 056页。

〔3〕《太平广记》卷220《陈寨》

〔4〕《全唐文》(1)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785页。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一、浙江东道、浙江西道观察使管州

唐朝末年两浙经济仍然有所发展。《新唐书·地理五》杭州钱塘县："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861年）刺史崔彦曾开。"农田水利工程仍在进行。唐懿宗在位（860—874年），长安"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1]可知此时两浙的精美丝织品仍源源入贡京师。

不仅如此，唐末两浙的贡品比前还有增加之势。昭宗乾宁元年（894年）义胜军节度使（原注：广明三年升浙东道观察为义胜军节度）董昌"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万五千匹，他物称是。"[2]这虽然是董昌"苛虐"百姓的表现，但也反映出唐末两浙的富庶。

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起义失败，唐朝也名存实亡，境内四分五裂，都被藩镇割据。西浙被钱镠占据，建立吴越地方政权，治杭州。

吴越大修水利工程　"吴越王镠筑捍海塘（原注：今杭州城外濒浙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长山门外，皆钱氏所筑。）。[3]《梦溪笔谈》卷11《官政一》："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于余行，谓之'滉注'。宝元、康定间（宋仁宗时年号，1038—1041年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析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

---

〔1〕《太平广记》(5) 卷238《大安寺》，1 835页。

〔2〕《资治通鉴》(18) 卷259《乾宁元年》，8 460页。

〔3〕《资治通鉴》(18) 卷267《开平四年》8 726页。

吴越大治城池　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1] 后梁太祖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广杭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2]

吴越物产丰富　由于吴越的北面与西面临吴，南面临闽，三面受敌，因而钱镠一直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从其纳贡中可知吴越经济繁荣、物产丰富。以下所叙虽为唐朝灭亡以后一段时间的事，但也反映了唐后期两浙经济发展的势头。

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钱镠向后唐进贡：金银器、秘色瓷器、吴绫、越绫、盘龙凤锦、白龙瑞红地锦被、银装花梳木橱、红藤龙凤箱等。后唐明宗三年（928年），钱镠又向后唐进贡：白金5 000两、茶27 000斤。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钱元瓘向后晋进贡：金器500两、白金10 000两。吴越异纹绫8 000匹、金条纱3 000匹、绢20 000段、绵90 000两、大茶、脑源茶24 000斤。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钱弘佐向后晋进贡：银铤5 000两、绢5 000匹、丝10 000两。此外又贡：细纸、秘色瓷器、细甲弓弩箭、扇子、茶25 000斤、干姜30 000斤。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钱弘俶分别于四、七、八月先后三次向后周进贡总计为：白金20 000两、绫绢50 000匹、细衣锻2 000匹、龙舟、天禄舟各一艘，“皆饰以白金”。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钱弘俶向北宋贡白金100 000两、绢50 000匹。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贡：金银器物6 000两、绫锦10 000匹、龙凤香等二万件。[3]

从后唐至北宋开宝年的50余年中，吴越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

---

〔1〕《资治通鉴》（18）卷259，8 445页。

〔2〕《资治通鉴》（18）卷267《开平四年》8 726页。

〔3〕吴任臣：《十国春秋》（3）卷82《吴越六》1 171、1 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物品，除了茶和干姜以外，均属手工业产品。其中以各种精美丝织品尤为突出。秘色瓷器是当时重要的新产品。细纸、精制木榻、藤箱也反映了吴越地区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吴越地区贡品数量之大是隋唐五代史书中仅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愈到后来数量愈大。以金银而论，后唐同光年间贡白金 5 000 两，而至北宋开宝年间贡白金 10 万两；后晋天福年间贡金器 500 两，至北宋开宝年间贡金银器 6 000 两。天福以前贡绫绢数千匹，而至后周、北宋初年，动辄数万匹。这都说明：吴越国在其存在的 70 余年中，两浙的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福建观察使管州

唐朝末年福建经济也有所发展。唐懿宗咸通三年（862 年）南诏攻安南，“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溯湘江入零渠、漓水，劳费艰涩，诸军乏食。润州人陈磻石上言：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1〕可知唐末福建地区盛产粮食。

僖宗中和四年（884 年）六月，黄巢起义失败，唐朝也名存实亡，境内四分五裂，都被藩镇割据，福、建、泉、漳、汀五州被王潮、王审知占据，建立闽国，治于福州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

昭宗景福二年（893 年）九月，唐昭宗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三年（896 年）唐廷升福建为威武军，以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

王潮在境内“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使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2〕

乾宁四年，王潮死，弟王审知自称留后，光化元年（899 年）十月，昭宗以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

天复二年（902 年）王审知筑福州外罗城 40 里。天祐二年

〔1〕《资治通鉴》（17）卷 250《咸通二年》，8 105 页。

〔2〕《十国春秋》（3）卷 90《闽世家》，1 300 页。

(905 年）又筑福州内城，周 26 里。

后梁开平三年（909 年），后梁太祖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史称在他治理下，“宽刑薄赋，公私富实，境内以安”。开平四年，王审知“大浚侯官县（今福建省闽侯县）西湖，广至四十里，灌溉民田无算”。发展对外贸易，“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闽国冶炼也很发达，“泥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王审知“好礼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宦”。又扩充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1] 这条材料虽是唐亡以后之事，但它说明在王潮、王审知治理下，福建地区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

[1]《十国春秋》(3) 卷 90《闽世家》1 301、1 310、1 313、1 319 页。

第十八章　江南西道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唐初10道分为15道，其中将江南道划分为江南东、江南西和黔中道。

安史乱后，全国遍置节度观察使，于江南西道分置宣歙池观察使、江西观察使、鄂岳观察使（后改为武昌军节度使）、湖南观察使。于黔中道置黔州观察使。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叛军止于江淮以北，江南西道未罹荼毒。然而，代宗永泰（765—766年）“宣、饶剧贼方清、陈庄西绝江，劫商旅为乱，支党盘结。”[1]不过为时较短、破坏不大。此外，安史叛军虽未过江，但是，江南西道百姓在物力、人力负担上也因而加重。例如元结在《夏侯（名宋客）岳州表》中指出：“天下兵兴已六七年矣”，而岳州“人疲州小，比太平时力役百倍！”[2]夏侯宋客于上元元年（760年）至广德元年（763年）任岳州刺史。元结此《表》当作于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由《表》可知，岳州因安史之乱而“比太平时力役百倍！”可知江南西道社会经济多少也受到战乱的影响。

---

〔1〕《新唐书》（15）卷147《李芃》，4 756页。

〔2〕《全唐文》（4）卷383，3 898页。

代宗即位后，江南西道各州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

岳州（治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市）元结指出：自夏侯宋客任州刺史，针对过去力役过重的情况，“公能清正宽恕，静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悦，为当时法则”。[1]

潭州（治长沙县，今湖南长沙市）崔瓘自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二年（767年）任潭州刺史。在任期间，“能使孤寡老弱无悲忧；单贫困穷安其乡；富豪强家无利害；贾人、就食（即客户）之类，各得其业”。[2]

袁州（治宜春县，今江西省宜春市）阎伯玙自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任袁州刺史。“时征役繁重，袁州特为残破，伯玙专以惠化招抚，逃亡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3]

澧州（治澧阳县，今湖南省澧县）崔瓘自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四年（769年）任澧州刺史。至任“不为烦苛，人便安之，流亡归还。居二年，增户数万。”[4]

鄂州武昌县（今湖北省武昌）安史之乱时，韩仲卿任武昌县令，李白在《武昌宰韩君（仲卿）去思颂碑》中指出：在“两京城守，易子而炊骨”之时，“吴、楚转输，苍生熬然。”吴、楚的负担也很重。在南北大都困顿之时，只有“此邦（武昌一带）宴如，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不仅如此，武昌还盛产铜铁：“其初，铜、铁曾青，不择地而出，大冶鼓铸，如天降神，既烹且炼，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5]

鄂州（治江夏县，今湖北省武汉市）在代宗朝成为“盐铁租

---

〔1〕《全唐文》(4) 卷383，3 898页。

〔2〕《全唐文》(4) 卷383《崔潭州表》，3 899页。

〔3〕《唐语林》(上) 卷1，59页。

〔4〕《新唐书》(15) 卷141《崔瓘》，4 656页。

〔5〕《全唐文》(4) 卷350，3 549页。

赋”转运的枢纽。

安史之乱以前，江淮贡赋自江南河、邗沟，过淮河，经汴河（通济渠）入两京。而汴河水源来自黄河，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因而唐前期“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浊淤，清明桃花以后，远水自然安流。”[1] 安史之乱爆发，汴河处于战乱范围，每年一度的疏浚工作不能进行，以致“汴水堙废”。《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原注：自安禄山作乱、关、洛路阻，漕运溯江入汉，抵梁、洋，故汴渠堙废不治）。”

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楚州安宜县有尼真如，得宝数件，楚州刺史崔侁遣从事卢恒送真如将宝物上献。这时由于“史朝义方围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绝，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关。”[2] 真如走的就是“溯江入汉”这条路。

《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宝应元年……是时淮河阻兵（按：即史朝义围宋州，南陷申州），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史，以总东南贡赋。”这就是说，自代宗宝应元年（762年）起，江淮的贡赋，皆避开淮水、汴河，而逆长江、汉水，经洋、梁二州，越南山（一名商山）入京畿。正因如此，鄂州（治江夏县，今武汉市）一跃成为盐铁、租赋的转运枢纽，穆宁为鄂州刺史，“以总东南贡赋”。

正是因为鄂州成为漕运枢纽，因而鄂州江面经常有大量船只停泊。《旧唐书·五行志》：“广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鄂州失火，烧船三千艘。”这证明当时鄂州处于盐铁、租赋枢纽的重要地位。

洪州（治豫章县，今江西省南昌市）张镐自代宗宝应元年

---

〔1〕《旧唐书》（11）卷123《刘宴传》，3513页。

〔2〕《太平广记》（9）卷404《肃宗朝八宝》，3256页。

(762 年) 至广德二年 (764 年) 任洪州刺史。在任期间，“三吴饥，人相食，厉鬼出行，札丧毒痛；淮河之境，骼胔成岳，而我仓如陵，我民孔阜，犬牙之境，疵疠不作：灾不胜德也”。[1] 在江淮受灾之时，洪州未受影响。

不仅如此，洪州在安史乱后的 10 年之间，有很大的发展。于邵在《送王司议季友赴洪州序》中指出：“自幽蓟外奸，加以师旅，十年之间，为巨防焉。”洪州不仅地位重要，而且“当闽越奥区，扼江关重阻，既完且富，行者如归。”[2]

洪州当时是“江淮之间一都会”，有“市”市中还有胡商。“乾元 (758—760 年) 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洪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市之而去。”[3]

洪州武宁县 (今江西省武宁) 是当时著名的大邑。代宗永泰年间 (765—766 年) 薛廷珪起草的《授卢蟾富平县令……等制》中指出：“十年兵戈，兆人流散，朕延执政与百执事，问所以聚人之方，皆慎选令长而已。夫畿赤之富平，可谓大邑。而洪之武宁……亦皆著名者也。”[4]

道州 (治营道县，今湖南省道县) 元结自代宗广德元年 (763 年) 至大历三年 (768 年) 任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5] “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才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元结“到官未五千日，承诸使征求 (苛捐杂税) 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

---

〔1〕《全唐文》(4) 卷 390《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碑》，3 966 页。

〔2〕《全唐文》(5) 卷 427，4 354 页。

〔3〕《太平广记》(9) 卷 403《紫珠囊》，3 251 页。

〔4〕《文苑英华》(3) 卷 415，2 103 页。

〔5〕《全唐诗》(8) 卷 241《春陵行并序》2 704 页。

其限者，罪至贬削”。元结认为：“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于是上言朝廷：“臣州为贼焚破，粮储、屋宅、男女、牛马几尽，十不一在，耄孺骚离，未有所安，岭南诸州，寇盗不尽，得守捉候望四十余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乱。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帝许之。”元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1]贼亦怀畏，不敢来犯”。[2]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唐后期江南西道分置五观察使，依次叙述。

一、宣歙池观察使管州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置宣歙观察使，领宣、歙、池三州，治宣州（治宣城县，今安徽省宣州市）。

唐后期宣州户口大为增多。崔端自德宗建中十二年（796年）至永贞元年（805年）任宣歙等州团练观察使时，大兴土木，建筑房舍。顾况在《宛陵公署记》中赞曰：“所部无事，缉乎井屋，高栋大庑，楼传高亭，署以崇牙，虔君命也。”不过，并未扰民，因为“夫宣户五十万，一户二丁，不待募于旁郡，而宣男之半，已五十万矣。”[3]这说明建中末年宣州民户已有50万。这比天宝十二载民户数大为增加。

《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诸州“天宝”户当为天宝十二载户数[4]。其宣州天宝户为121 204。歙州天宝户为38 330。池州为

---

〔1〕《新唐书》(15) 卷143《元结》，4 685～4 686页。

〔2〕《全唐文》(4) 卷344《唐故容州都督……元（结）君表墓碑铭》，3 495页。

〔3〕《全唐文》(6) 卷529，5 373页。

〔4〕翁俊雄：《各地志所载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系年和校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19 000 户。三州相加，共为 178 534 户。看来，顾况所说“宣户”不包括歙、池二州。这就是说，宣州民户自天宝至建中年间增加了三倍。

正因唐后期民户大为增加，宣州的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路应自永贞元年十二月至元和五年（810 年）任宣歙池观察使，他“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仓，得石五十万余，府得钱千者八十万”。唐制，一千文为一贯，此言即 80 万贯之意。其所以能如此，与他的治理也是分不开的：“公之为州，逢水旱，喜贱出与人。岁稔，以其得收，常有赢利。故在所，人不病饥而官府蓄积。”〔1〕

杜牧指出：宣歙池观察使，“赋多口众，最于江南。”〔2〕元稹指出：“宣城重地，较缗（缗即贯）之数，岁不下百余万。”〔3〕

粮食生产　李频（大中八年进士）在《宣州献叔大夫》诗中描述宣州农民的生产情状时说：“万家闾井俱安寝，千里农桑竞起耕。”〔4〕话虽如此，但是毕竟“宣、歙土狭谷少”〔5〕受自然条件限制，粮食生产有限。

手工业　宣州“赋多”，“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主要是因手工业发达。

红线毯　贞元（785—805 年）中，宣州进开样加丝毯，白居易有感于此作《红线毯》一诗：

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
练丝练线红兰染。
染为红线红于兰，织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
……

〔1〕《全唐文》（6）卷 562《银青光禄大夫……路公（嗣恭）神道碑铭》5 692 页。
〔2〕《全唐文》（8）卷 755《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7 831 页。
〔3〕《全唐文》（7）卷 648《授卢弇监察裒行宣州判官等制》，6 564 页。
〔4〕《全唐诗》（18）卷 587，6 811 页。
〔5〕《资治通鉴》（16）卷 237《元和三年》，7 653 页。

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

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1]

宣州丝毯织成十丈余　毛柔褥厚，颜色光鲜，超过太原、蜀郡，居全国第一，因而成为贡品。

兔褐　《唐国史补》卷下："宣州以兔毛为褐，亚于锦绮，复有染丝织者尤妙。"

紫毫笔　白居易在《紫毫笔》中写道：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

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

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2]

宣州紫毫笔以质量优良成为贡品，为唐代文人所喜爱。耿沣：《咏宣州笔》：

落纸惊风起，摇空见露浓。[3]

对宣州笔极为赞美。

冶炼　《新唐书·地理五》宣州宣城郡之"土贡"（据王永兴先生考证当为长庆贡）：除"丝头红毯"、"兔褐"、"纸、笔"等之外，还有"银"、"铜器"。《全唐文》卷47载代宗《停扬、洪、宣三州作坊诏》："扬、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可知此前宣州有兵器作坊，也可知宣州冶炼业很发达。

商业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三年》："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坦到官，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辏"。

---

〔1〕《全唐诗》(13) 卷427，4 702、4 708页。

〔2〕《全唐诗》(13) 卷427，4702、4 708页。

〔3〕《全唐诗》(8) 卷268，2 980页。

歙州（治歙县，今安徽省歙县）陆傪自贞元十八年（802年）二月二十八日任歙州刺史。”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指出：“歙，大州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1〕

崔玄亮自元和十五年（820年）至长庆三年（823年）任歙州刺史。白居易在《唐故虢州刺史……崔公墓志铭》中说：“先是歙民畜马牛而生驹犊者，官书其数，吏缘为奸。公既下车，尽焚其籍，孳息贸易，一无所问。先是，歙民居山险而输税米者，担负跋涉，勤苦不支。公许其计斛纳缗（以税米折钱），贱入贵出，官且获利，人皆忘劳，农人便之，归如流水。”〔2〕

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祁门）盛产茶。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 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蜚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3〕

吕延祯在《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指出：“太和中，以婺源（今江西省婺源之西北）、浮梁、祁门、德兴（原浮阳县境、太和初分置），茶货实多。”〔4〕

看来歙州号称富州，主要是靠祁门，婺源两县之茶。

池州（治贵池县，今安徽省贵池）张严在大历末年任池州刺史。“张严在任三年，辟田加户。”〔5〕开成（836—840年）李方玄

---

〔1〕《全唐文》(6) 卷555，5 612页。

〔2〕《全唐文》(7) 卷679，6 947页。

〔3〕《全唐文》(9) 卷802，8 430～8 431页。

〔4〕《全唐文》(9) 卷871，9 116页。

〔5〕《文苑英华》(4) 卷611《举前池州刺史张严自代表》3 171页。

任池州刺史，“复定户税，得与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户，衮入贫弱，不加其赋”。[1]

在州刺史精心治理下，池州农业有了发展。杜荀鹤在《献池州牧》诗中，描述池州的农业生产情状：“分开野色收新麦，惊断莺声摘嫩桑。”[2]

二、鄂岳观察使管州

鄂岳观察使　《旧唐书·地理三》鄂州：“永泰（765—766年）后，置鄂岳观察使，领鄂、岳、蕲、黄四州，恒以鄂州（治江夏县，今湖北省武汉市）为使理所。”

唐后期鄂、岳、蕲、黄四州人口比前有了大幅度增长。《旧唐书·地理三》所载此四州天宝口数（当为天宝十二载口数）如下：

鄂州天宝口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三

岳州天宝五万二百九十八

蕲州天宝口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千九

黄州天宝口九万六千三百六十八

合计天宝口四十一万八千七十八

何士干自贞元四年（788年）至十八年（802年）任鄂岳观察使时，人口大为增加。符载在《中和节陪何（士十）大夫会宴序》中指出，何士干自“下车于江夏”，“垂二十载矣”。在这期间“德行浃人于骨髓，礼义泽人于思虑馨香问望，久而益茂，故地方千里，民盖百万口”。[3]尽管符载所说“民盖百万口”只是估计的数字，但也不会相差太远。如果大致不差，那么，自天宝十二载(753年)至贞元18年（802年）的50年间，鄂岳四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

---

〔1〕《文苑英华》(6) 卷954《处州刺史李（方玄）君墓志铭》5 020页。

〔2〕《全唐诗》(20) 卷692，7 960页。

〔3〕《全唐文》(7) 卷690，7 068页。

唐后期鄂州成为重要的水运枢纽。赵憬在《鄂州新厅记》中指出："天宝以前，四方无虞，第据编户众寡、等衰州望，鄂是以齿于下。后戎狄乱华，寓县沸腾，屯兵阻险，斯称巨防。"〔1〕鄂州在安史乱前以人口不多，在州等级中排列下等。自安史乱后，因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巨防"。不仅如此，前面指出，自战乱后，鄂州成为江淮漕运的枢纽，至唐末不改。杜牧（唐文宗时人）指出：岳鄂安黄蕲申等州观察使"囊山带江，三十余城，缭绕数十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汉而会注焉。"〔2〕便可证明。

鄂州江夏县（今湖北省武汉市）产稻谷"陆社儿者，江夏民，常种稻于江际"。〔3〕

鄂州武昌县（今湖北武昌）　风景优美、楼台林立。孟浩然在《溯江至武昌》诗中写道："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4〕

武昌产鱼，当时著名。岑参：《送费子归武昌》诗中写道："秋来倍忆武昌鱼，梦著只在巴陵道。"〔5〕武昌鱼，至今仍享盛名。

鄂州盛产木材　鄂州于天宝元年改为江夏郡。符载在《钟陵夏中送裴判官归浙西序》中写道："去年春三月至于秋八月不雨，关中饥馑，职司忧焉。以豫章、江夏（鄂州）、长沙诸郡地产瓌材，且凭江湖，将刳木为舟，以漕国储。乃命河东裴从事，承檄拥传，与三诸侯图之。"〔6〕

鄂州产茶"《茶谱》云：鄂州之东山、蒲圻（今湖北省蒲圻）、唐年（今湖北省大沙坪）县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太平寰宇记》卷112《江西道十鄂州》）

---

〔1〕《全唐文》(5) 卷455，4 652页。

〔2〕《全唐文》(8) 卷756《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崔公行状》7 841～7 842页。

〔3〕《太平广记》(9) 卷425《陆社儿》，3 461页。

〔4〕《全唐诗》(5) 卷160，1 652页。

〔5〕《全唐诗》(6) 卷199，2 054页。

〔6〕《文苑英华》(5) 卷727，3 771页。

三、江西观察使管州

江西观察史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置洪吉都防御团练观察处置使，领洪、吉、虔、抚、袁五州，治洪州。上元元年（760年）洪吉观察使增领信州。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洪吉观察使更号江西观察使。大历三年（768年）以后增领江、饶二州。

安史乱后，江西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白居易在《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中指出："江西七（八?）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1]裴堪任江西观察使是在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可知此时江西是很富庶的地区。

（一）洪州

洪州钟陵县（洪州治所。原为豫章县，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六月，以犯代宗讳，改为钟陵县。今江西省南昌市。）符载在《钟陵东湖亭记》中指出："斯郡也……扼七城（钟陵、丰城、高安、建昌、新吴、武宁、分宁县），控百越，地侔千乘，艘驾万舳，王臣聘客，环至吾府。"[2]可知洪州之繁荣。

唐后期洪州民户大为增加。李绅在长庆三年(823年)作《过钟陵》诗："江对楚山千里月，郭连渔浦万家灯。"[3]而杜牧在《怀钟陵旧游四首》中描述更为具体："控压平江十万家"、"城头晚鼓雷霆后，桥上游人笑语多。"、"一声明月采莲女，四面朱楼卷画帘。"[4]钟陵不仅有"十万家"。而且城内处处有"朱楼"。即使这十万家不是单指钟陵，而是指洪州所领七县，那么此时洪州民户也比天宝年间多了一倍。《旧唐书·地理三》洪州：天宝领户五万五千五百三十。杜牧是文宗时(828—840年)人，在七八十年后，农户增加了近一倍。

---

〔1〕《全唐文》(7) 卷661，6 720页。

〔2〕《全唐文》(7) 卷689，7 061页。

〔3〕《全唐诗》(15)卷480，5 464页。

〔4〕《全唐诗》(16)卷522，5 977页。

韦丹自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至五年（810年）任江西观察使。驻南昌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28洪州南昌县条："宝应元年六月改为钟陵县，十二月改为南昌县。"）"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蔓而焚。"[1]韦丹至任"始教人为瓦屋，取材于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于场。度其费以为估，不取赢利，凡取材瓦于官，业成而受其偿。从令者免其赋之半。逃未复者，官与为之。贫不能者，畀之财，载食与浆，亲往劝之"。结果，"为瓦屋万三千七百，为重屋四千七百，民无火忧暑湿"。

第二年，"筑堤捍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

此外，"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2]韦丹在任期内多有建树。

产茶　《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洪州有西山之'白露'。"

盛产木材　敬括在《豫章赋》中指出：

> 东南一方淮海惟扬，爰有乔木，是名豫章。根坎窖，簪天纲，郁四气，焕三光。矗缩云笋，离披翼张，一擢而其秀颖发，七年而其材莫当。[3]

符载在《钟陵夏中送裴判官归浙西序》中写道："去年春三月至于秋八月不雨，关中饥馑，职司忧焉。以豫章（洪州）、江夏、长沙诸郡地产瓌材，且凭江湖，将刳木为舟，以漕国储。"[4]

史俊在《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中指出：

> 此木尝闻生豫章，
> 今朝独秀在巴乡。[5]

---

〔1〕《新唐书》(18) 卷197《循吏·韦丹》，5 630页。

〔2〕《全唐文》(6) 卷566《江西观察使韦公（丹）墓志铭》，5 726页。

〔3〕《全唐文》(4) 卷354，3 592页。

〔4〕《全唐文》(7) 卷690，7 073页。

〔5〕《全唐诗》(3) 卷75，819页。

可知洪州（治豫章县，今南昌市。）产楠木，而巴州（属山南道，治化城县，今四川省巴中）的楠木可能是从洪州引进的。

由上可知，唐代洪州是首要的木材产区。

产瓷碗　陆羽《茶经》："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洪州次。"洪州（今南昌市）名列全国第四。

商业　《唐国史补》卷下："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洪（州）、鄂（州）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栲栳之下。"《太平广记》卷118《熊慎》："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尝载鱼宿于江浒，闻船内千百念经佛声。"

洪州有胡商《太平广记》卷404《岑氏》：

>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谿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蓬实……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岑虽宝之而无用，得钱喜，即以与之。

洪州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也有胡商。"李灌，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1]以上数例说明洪州商业的发达。

（二）江州

江州（天宝元年改为浔阳郡。治浔阳县，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内有鄱阳湖。符载在《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中指出："浔阳，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环至。"[2]可知江州的富庶。

江州北接长江，经鄱阳湖南连赣江，是南北必经之路。独孤及

---

〔1〕《太平广记》(9) 卷402《李灌》，3 240页。

〔2〕《文苑英华》(5) 卷803。

指出："走闽禺而驰千越，必出此路。"〔1〕

由于江州江湖水多，往往为患。白居易在《大水》诗中写道：

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

闾阎半飘荡，城堞多顷坠。

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2〕

正因如此，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浔阳县"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822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东有秋水堤，大和三年（829年）刺史韦珩筑。西有断兴堤，会昌二年（842年）刺史张又新筑，以窒水害。"〔3〕

物产　白居易在《与元微之书》中写道："江州风候稍凉，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蛟蚋，虽有，甚稀。湓鱼颇肥，江酒极美，其余食物，多类北地。"〔4〕所谓"江酒极美"是指名酒"湓水"而言。《唐国史补》卷下："酒则有……浔阳之湓水。"《国史补》所列酒名，皆唐后期的名酒。

白居易在《浔阳三题并序》中指出："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虽宫囿省寺中，未必能尽有。"〔5〕

商业　"任华，浔阳之贾也。父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扬州）间。唐贞元十一年（795年）之潭州不复。"〔6〕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记述浔阳江头一倡女，她"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武德五年析鄱阳东界置新平县，寻废，开元四年，刺史韦玢再置，改名新昌，天宝元年改为浮梁，今江西省景德

〔1〕《文苑英华》（5）卷800，4232页。《江州刺史厅壁记》

〔2〕《全唐诗》（13）卷424，4 671页。

〔3〕《新唐书》（4）卷41《地理五》，1 068页。

〔4〕《全唐文》（7）卷674，6 880页。

〔5〕《全唐诗》（13）卷424，4 670页。

〔6〕《太平广记》（3）卷128《尼妙寂》906页。

镇）买茶去。”[1] 可知江州商贾十分活跃。

（三）饶州

饶州，领县四：鄱阳、余干、乐平、浮梁，治鄱阳县，今江西省波阳。

饶州，唐后期最为富庶。章孝标（元和至大中时人）：《送张使君赴饶州》：

饶阳（鄱阳之俗称）因富得州名，
不独农桑别有营。
日暖提筐依茗树，
天阴把酒（一作抱火）入银坑。[2]

兴修水利　《新唐书·地理五》饶州鄱阳郡：鄱阳“县东有邵父堤，东北三里有李公堤建中元年（780年）刺史李复筑、以捍江水。东北四里有马塘、北六里有土湖，皆刺史马植筑”。

稻谷　姚合（元和——开成时人）：《送饶州张使君》诗曰：“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3]

茶　前面提到吕延祯在《婺源诸县都置新城记》中指出：浮梁县“茶货实多”。前面提到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述浔阳江头倡女之夫“前月浮梁买茶去”，可知浮梁县（今江西省景德镇是盛产茶叶之地。《元和郡县图志》卷28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产量惊人，也为朝廷提供大量税收。

饶州乐平县（今江西省乐平以东）“有银山，在县东一百四十里。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七千两。”

鄱阳县（今江西省波阳）“郭下，有永平监，每岁铸钱七千贯。”[4]

---

〔1〕《全唐诗》（13）卷435，4 822页。
〔2〕《全唐诗》（15）卷506，5 752页。
〔3〕《全唐诗》（15）卷496，5 625页。
〔4〕《元和郡县图志》（下）卷28《江南道四》饶州，671、673页。

（四）吉州

吉州（治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市）张靓于元和（806—820年）中任吉州刺史。治理有方，“鳏寡有怡，流亡既来，徭税先具，污莱尽开”，结果，“公来几时，积粟埋梁”；“公来几时，库缗山积”。[1]

吉州庐陵县　吉州元和年间（806—820年）有民户41 025[2]而庐陵县居半数。皇甫湜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指出：“庐陵户余二万，有地三百余里。”吉州领县五：庐陵、安福、永新、太和、新淦。而民户之半集中在庐陵县，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皇甫湜还指出：庐陵县“骈山贯江（指赣江）”，因而“扼岭之冲”，是南北水路必经之路。

庐陵县的粮食生产是“土沃多稼，散粒荆扬”；手工业也很发达：“材竹、铁石之赡殖，苞筐纬缉之富聚。”[3]

《太平广记》卷162《刘行者》：“唐庐陵阛阓中，有一刘行者，以钉铰为业……一日，忽有衲僧携净水铜瓶子觅行者磨洗，出百金为酬。”可知手工业的情形。

（五）信州

信州　“乾元元年（758年）析饶州之弋阳，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抚之地置。”[4]治上饶（今江西省上饶市）

木材　《太平广记》卷354《徐彦成》：“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汭口场……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日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

《新唐书》卷41《地理五》信州：有玉山监钱官，有铜坑一、铅坑一。卢纶在《送信州姚使君》中写道：“铜铅满穴山能富，鸿雁连群地亦寒。”[5]

---

〔1〕《全唐文》（7）卷686《吉州刺史厅壁记》7 028页。

〔2〕《元和郡县图志》（下）卷28《江南道四》饶州，671、673页。

〔3〕《全唐文》（7）卷686，7 027页。

〔4〕《新唐书》（4）卷41《地理五》信州，1 070页。

〔5〕《全唐诗》（9）卷276，3 135页。

铜铅之外，还有银冶。《太平广记》卷73《郑君》："贞元（785—805年）末，郑君知盐铁信州院。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银并成就。"

四、湖南观察使管州

湖南观察使　代宗大历四年（769年）置领潭、衡、永、邵、道、郴、连七州，治潭州。

潭州（治长沙县，今湖南长沙市）

张渭在《长沙土风碑铭》中指出：

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秔稻。厥草惟繇，兰杜荃蘅留夷璚车出焉。厥木惟乔，椅桐桂柽贞松文梓生焉。[1]

长沙山水秀丽，草木繁茂，秔稻遍野。

长沙是南北交通要道。符载：《长沙东池记》："长沙大郡也，江山亘千里，道途控百越。"[2]

李巽自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至十三年（797年）任湖南观察使。至任"公乃斋其经用，代其赋输，厚施已责，过于万数，得以赡助，使之均安"。对衡、永等州，"又以支郡地征，有系军实，量力调谷，减轻缗钱，经始致用，为之仓庾，时其发敛，而岁无凶荒"。[3]

崔倰自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至十四年（819年）任湖南观察使。"湖南旧法，虽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恤也。倰至，谓属吏曰：'此岂人情乎？无闭粜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旅流通，货物益饶"。[4]

---

〔1〕《全唐文》（4）卷375，3 809页。

〔2〕《全唐文》（7）卷689，7 062页。

〔3〕《全唐文》（5）卷496《大唐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李公遗爱碑铭》5 054页。

〔4〕《新唐书》（15）卷142《崔倰》，4 670页。

产菱芡、甘子　“贞元（785—805年）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1]

于邵在《谢恩赐甘子状》中说：“右中使某乙至，奉宣进止，赐臣前件甘子。伏以江潭所出，见重于南州，苞茅入贡，远归于北阙。”[2]

郴州（治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韩愈在《送廖道士序》中曰：“郴之为州……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桔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间。”[3]

郴州还产铜和银。盐铁使李巽于元和三年（808年）五月《请于郴州铸钱奏》中指出：

> 郴州平阳（今湖南省桂阳）、高亭（在今郴县与永兴之间）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校复，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4]

值得注意的是，《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郴州郴县（有）桂阳监，在城内，每年铸钱五万贯。”看来，《元和志》所载“每年铸钱五万贯”，应是元和三年以前的数字。也就是说，元和三年恢复桂阳监时，估计年产铜钱7 000贯，而数年后，年产达50 000贯之多。

《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还载：“郴州平阳县，（有）银坑，在县南三十里。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偈子银’，别处莫及。”

---

〔1〕《太平广记》(4) 卷152《郑德璘》，1 089页。

〔2〕《文苑英华》(4)卷632,3 267～3 268页。

〔3〕《全唐文》(6) 卷555，5 619页。

〔4〕《全唐文》(6) 卷526，5 340页。

此外，《元和志》还载："郴州郴县，（有）温水，在县北，常溉田，十二月种，明年三月熟，可一岁三熟。"

衡州（治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元和六年（811年）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

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衡州"元和户一万八千四十七"与吕温所说"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应是一件事，看来应以《唐会要》为准。这可证明《郡县图志》诸州"元和户"应为"元和六年"前数字。此其一。另《旧唐书·地理三》衡州"天宝领户三万三千六百八十八"。而吕温所说"旧额户"比天宝户少15 281户。过去学界对此没有明确说法，现在看来，其差额正是"所由（即当地官吏）隐藏"的16 007户。据笔者看来，这16 007户，大多是丧失了耕地之"客户"。衡州出现的这一现象正是唐后期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

产藕　裴说：《旅次衡阳》诗中写道："晚秋红藕里，十宿寄渔船。"〔1〕

衡州茶陵县（今湖南省茶陵）《太平广记》卷55《伊用昌》："伊用昌至茶陵县门，大题曰：'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载槐。'"可知当时茶陵县是个很具规模的县城。

永州（治零陵县，今湖南省零陵）柳宗元：《代韦永州谢上表》指出："此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即少数民族居半。而"可垦乃石田之余。"〔2〕多山少田。

柳宗元：《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

〔1〕《全唐诗》(21)卷720，8 266页。

〔2〕《全唐文》(6)卷571，5 775页。

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跼、瘿、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州）之人争奔走焉。[1]

韦宙于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任永州刺史。至任“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抽签）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即百姓积资，轮流买牛。

韦宙还“立学官，取仕家子弟于五人充之”。

易俗　“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宙条约，使略如礼，俗遂改”。[2]

五、黔中观察使管州

黔中观察使　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置黔中观察使，领、黔、夷、费、思、辰、叙、播、南、溱、珍、锦、奖、溪、涪、巫十五州，治黔州。

黔州（治彭水县，今四川省彭水）

权德兴：《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武陵、辰溪，四封十五郡，大凡五十余城。”[3]黔中道地域辽阔。以今贵州省为主体，包括湖北、湖南及广西的部分地区。

刘长卿(开元——宝应时人)在《送侯侍御赴黔中充判官》诗云：

不识黔中路，今看遣使臣……

地远官无法，山深俗岂淳？

须令荒徼外，亦解惧埋轮。[4]

唐后期朝廷对黔中道加强了管理。权德兴在《奉送裴二十一兄阁老中丞赴黔中序》中写道：“自牂柯（播州，隋为牂柯郡）通道

---

〔1〕《全唐文》(6) 卷584，5 897页。

〔2〕《新唐书》(18) 卷197《循吏·韦宙》，5 631页。

〔3〕《文苑英华》(5) 卷728，3 780页。

〔4〕《全唐诗》(5) 卷147，1 496页。

夜郎（珍州，天宝元年改为夜郎郡），置吏以是绥怀。”〔1〕

权德兴在《黔州观察使新厅记》中写道：“元和二年（808年）夏四月，制诏商州刺史陇西李君以忠执法剖符兹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余城，裔夷岩险，以州部脩贡职者，又数倍焉。”〔2〕

朝廷在黔中置官、收赋税，还派遣“选补使”于当地选拔吏员。权德兴：《送主客仲员外充黔中选补使序》：

> 选部每岁以四才、三实铨署群吏。每三岁则有诏以诸曹郎分命南辕，调其任次。有黔江、辰溪十五郡、五十余城，赋其吏员，便其习俗，主客郎仲君实司之。君始以岷峨诸生，献赋京师，因文章典义，浚发声实。〔3〕

由此可知“主客郎中”仲君实至黔中，将当地选士的“文章典义”报送京师。严谟自元和十四年（819年）至长庆元年（821年）任黔中观察使。白居易在起草《严谟可桂管观察使制》中指出：他曾“刺黔巫，州部县道，谧然安理，是能用宽猛相济之政，抚夷夏杂居之人故也”。〔4〕

《太平广记》卷445《崔商》：“元和中，荆（荆州，治江陵县，今湖北省江陵）客崔商，上峡（峡州，治夷陵，今湖北省宜昌）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这说明长江中游的百姓常有来黔者。

许彬：《黔中书事》一诗，描绘了黔中农村景象：“岁时将近腊，草树未知寒。独狖（猿）啼朝雨，群牛向暮滩。”〔5〕

物产　贞元十三年（797年）十月“黔中观察使奏：‘溪州人

---

〔1〕《全唐文》(5) 卷490，5 006页。

〔2〕《文苑英华》(5) 卷800，4 231页。

〔3〕《全唐文》(5) 卷491，5 013～5 014页。

〔4〕《全唐文》(7) 卷657，6 686页。

〔5〕《全唐诗》(20) 卷678，7 766页。

户诉，被前刺史魏从琚于两税外，每年加进朱砂一千斤，水银二百驮，户民疾苦，请停。’从之。”〔1〕按：溪州治大乡县，今湖南省永顺。由此可知溪州出产朱砂和水银。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高力士“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治龙标县，今湖南省洪州市），地多荠而不食。因感伤而咏之曰：‘两京作斤卖，五谿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2〕可知巫州遍地生荸荠。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唐朝末年，江南西道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唐末黄巢起义虽南至池、鄱州，但对江西影响不大。

宣歙池

宣州（治宣城县，今安徽省宣州市）　李璋自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至十四年（873年）任宣州观察使。其时，“杨收造白檀香亭子成，会亲宾观之。先是，（李）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3〕可知唐朝末年宣州地毯仍然名贵。

赵锴自僖宗光启三年（887年）至龙纪元年（889年）任宣歙观察使。在秦彦暴虐之后，赵锴“用文德以来之，既来而安之”。结果，“不期岁，车者阗阗，舟者联联，比屋滞货盈市溢廛”。“民室完矣，民逃复矣”、“仓廪实矣，田野辟矣”。〔4〕

池州（治秋浦县，今安徽省贵池）　李冉在《举前池州刺史张严自代表》中指出：张严在池州刺史任内的三年中“辟田加户”政绩斐然。窦滈自僖宗中和元年（881年）至二年（882年）任池州

〔1〕《旧唐书》（1）卷13《德宗下》，387页。

〔2〕《旧唐书》（15）卷184《宦者·高力士》，4 759页。

〔3〕《太平广记》（5）卷237《李璋》，1 828页。

〔4〕《文苑英华》（5）卷802《宣州重建小厅记》4 240页。

刺史。他自撰《池州重建大厅壁记》中说：在“氓（黄）巢虐池（州）之二年，滴自平原郡得此郡。”至任，做了两件事：

其一恢复生产　“其始至也，无屋宇城壁之事、无市井人物之类，瓦骼凹亚，相愁杂视。一之月检访乡籍，二之月完聚疮痍，三四月后，病者起，亡者归……明年，春夏熟、冬熟。”〔1〕

其二建城墙、修廨宇　“既成壁焉，则人得以避寇。既廨署焉，则物得以营帑。鼓角器械，厅堂檐庑，自濠堑周于四隅，其间合建置者，一无所缺”。〔2〕

鄂岳

鄂州　罗隐（光化年（898—901年）进士）：《忆夏口（即江夏县，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3〕从中可知唐末夏口一片繁华景象。

江西

饶州（治鄱阳县，今江西省波阳）《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

>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扬州）间……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数岁，璜卒家。乾符（874—879年）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

从中可知，唐末鄱阳与扬州之间贸易往来。

袁州（治宜春县，今江西省宜春）　颜遐福自大中十四年（860年）至咸通三年（862年）任袁州刺史。李思密在《袁州城隍庙记》中称赞颜遐福到任“洎今未逾二载，百谷丰，万汇苏，而疆理无事。”〔4〕

---

〔1〕《全唐文》(7) 卷622，6 285页。

〔2〕《全唐文》(9) 卷829，8 734～8 735页。

〔3〕《全唐诗》(19) 卷655，7 536页。

〔4〕《全唐文》(9) 卷802，8 427页。

然而，唐末哀帝天祐（904—907年）年间，群雄争战，袁州遭到破坏。《太平广记》卷366《宜春人》："天祐初，有人游宜春（今江西省宜春），止空院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至梁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数十亩。"

抚州（治临川县，今江西省临川市）李寂自咸通九年（868年）至十一年（870年）任抚州刺史。柏虔冉在《新创千金陂记》中写道：有田户邹稜谈到八十年来筑"冷泉陂"终未成功。李寂遂自咸通九年八月起"凿冷泉故基，自文昌桥直抵南洲铺上口，凡九百七十余丈"使之"按汝江"。这"九百七十余丈"河渠，即"新渠"。"又于其上横截汝江，置千金陂，南北百二十五丈（斩木为橦，叠薪为滹，间以巨石而络之）"结果："江水小涨，陂则蹙其水丈余，而入于冷泉之新渠，奔流贯激，通舟楫之利，利于穷民走文昌桥北。沿流三十余里，灌注原田，新旧百有余顷。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尔后又不可胜纪其顷亩矣。"〔1〕。

湖南

唐末湖南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唐僖宗：《南郊赦文》指出："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纲官若得钱收籴，每斗必有盈余，道途既可经营，输纳自无败阙。"令"自今仰所在长吏切须饶润纲官，并令交付脚钱，仍与善价籴买，严示刑赏，不使稽迟。"〔2〕可知唐末湖南管内诸州盛产稻米。

渔业　杜荀鹤：《寄益阳武灌明府》诗，说益阳县（潭州益阳县，今湖南省益阳市）"溪山入城郭，户口半渔樵。"〔3〕

岳州（治巴陵县，今湖南省岳阳）　《太平广记》卷133《岳阳人》："唐咸通（860—874年）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鱼，

〔1〕《全唐文》(9) 卷805，8 468页

〔2〕《全唐文》(1) 卷88，933页。

〔3〕《全唐诗》(20) 卷691，7 944页。

获龟犹倍多，悉刳其肉截龟板，至江陵（今湖北省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岳州“长庆贡”：鳖甲〔1〕

竹编　衡州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产竹编。皮日休：《鲁望以‘竹夹膝’见寄因次韵酬谢》：“圆于玉柱滑于龙，来自衡阳彩翠中。”〔2〕

湖南盛产茶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马）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原注：回图务，犹今之回易场也。），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3〕由此可知，唐末、五代初年，湖南地区茶的产量十分可观。

〔1〕《新唐书》（4）卷41《地理五》岳州条，1 069页。其“土贡”据王永兴先生考证为“长庆贡”。

〔2〕《全唐诗》（18）卷614，7 079页。

〔3〕《资治通鉴》（18）卷266《后梁纪…开平二年》，8 702页。

第十九章　山南东道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唐初10道，分为15道，其中，将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治襄州）和山南西道（治梁州）。

安史乱后，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将山南东道一分为二：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邓、隋、唐、郢、复、均、房、金等州；荆南节度使领江陵府（荆州）、澧、朗、峡、夔、忠、万、施、归、涪等州（治江陵府）。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山南东道节度使

襄州（治襄阳县，今湖北省襄樊市）

“至德二载（757年）五月……会二京平，贼走河北。时襄汉数百里，乡聚荡然，举无樵烟。”[1]

乾元元年（758年）八月“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为叛，凶党万余人……又南袭破江陵。”当年十一月“生擒楚元以献，余众悉走散。”[2]

安史叛军和康楚元之叛，给本地区造成破坏。然而，在战乱中，又有大批北人南徙。

---

〔1〕《新唐书》（15）卷，147《鲁炅》，4 752页。

〔2〕《旧唐书》（12）卷，138《韦伦》，3 781页。

安史乱后，襄州民户大为增加。《唐国史补》卷上："元结，天宝之乱，自汝濆（今河南省叶县一带）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太平广记》卷23《张李二公》："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同书卷335《李叔霁》："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刘宴也是如此："禄山乱，避地襄阳。"[1]安史之乱，北方百姓大量南投襄汉，使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增多。

人口增多，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代宗大历（766—779年）中处士张潮在《襄阳行》诗中写道："昨见襄阳客，剩说襄阳好无尽。"[2]就透露了这一消息。

邓州菊潭县（今河南省内乡）李华在《临湍县令厅壁记》中写道："开元（年间）裂此乡三千户为菊潭县。天宝、至德之间，往虏南侵，南阳（属邓州，在菊潭县之东，今河南省南阳市）为战地，地荒人散，千里无烟。""孟威字承彦，自在骁位兵曹参军，本道节度使表为此县。始至户不盈百，为政七月，尽室而归者千余家。"[3]

荆南节度使

荆州（治江陵县，今湖北省江陵）"自至德（756—758年）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4]安史乱后，长安、洛阳的官员及襄州、邓州百姓举家南徙，以至荆州地区民户"十倍其初"，可知人口骤然增多。

吕諲自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至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任

---

〔1〕《新唐书》（15）卷，149《刘宴》，4 793页。

〔2〕《全唐诗》（4）卷114，1 160页。

〔3〕《文苑英华》（5）卷804，4 252～4 253页。

〔4〕《旧唐书》（5）卷39《地理二》，1 552页。

荆南节度使。至任“号令明，赋敛均一。治尚威信，故军士用命，阖境无盗贼，民歌咏之。自至德以来，处方面数十人，谭最有名。”[1]

此时荆州（江陵府）经济发展。杜甫在《峡隘》诗中写道：“闻说江陵府，云沙静眇然。白鱼如切玉，朱桔不论钱。”[2]李白：《荆州乐》：“荆州麦熟茧成蛾，缫丝忆君头绪多。”[3]白鱼、朱桔、麦熟、茧成，一片繁荣景象。正因如此，荆州江陵县与各地的贸易往来也很发达。“大历十才子”李端有《荆州泊》一诗，写出：“荆州津济闹”[4]的诗句，描绘了江陵渡口的繁忙景象。

澧州（治澧阳县，今湖南澧县）崔瓘自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四年（769年）任澧州刺史。崔瓘“下车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居二年，风化大行，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5]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山南东道节度使

襄州（治襄阳县，今湖北省襄樊市）

唐后期襄州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

王起自太和八年（834年）至九年（835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册府元龟》卷678，《牧守部·兴利》：“王起，太和中，代裴度镇襄阳，为民修淇堰以灌田，一境利之。”

卢钧自会昌元年（841年）至四年（844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在任期间，重修名堰，经过如下：

---

〔1〕《新唐书》(15) 卷140《吕谭》，4 650页。

〔2〕《全唐诗》(7) 卷229，2 506页。

〔3〕《全唐诗》(2) 卷26《杂曲歌辞·荆州乐》，358页。

〔4〕《全唐诗》(9) 卷284，3 234页。

〔5〕《旧唐书》(10) 卷115《崔瓘》，3 375页。

会昌元年……卢公既来襄阳，始用李从事允之画，能成新堤。即问可以为治状，对曰："天子以襄阳饥氓，寄活于公，宜有以休养之者。襄阳之属城为唐州，唐州之支邑为泌阳（今河南省泌阳），泌之东有二流走出，断堤啮道，而西派于二流，南别为沟，壤高岸颓，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尝为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能为民障水泉，广溉灌，世赖其利，俗用蕃富。尝披地图，北尽南阳故地，其古所谓台堰者耶。代邈移时，功不加修，堤谿于流，漫泄为波。自泌阳以南、平陵以西，居民甚逋。垦田甚凋。公能复信臣旧规，真民十世利者。"

卢公立召管田部将、出卒与谷，率以听命。李从事即为条分程度、指画经略，且使即其故堤以鳙二渠，凿其枯沟，析为南流，水门既陈，百渎脉分，蔓蔓于原，支支于屯，数百里间，野无隙田，旱无枯苗。台堰即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饥。[1]

徐商自大中十年（856年）至咸通元年（860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至任即修汉水：

汉南数郡，常患江水为灾，每至暴雨飘流，则邑居危垫，筑土环郡，大为之防，绕城堤四十三里。非独筑溺是惧，抑亦工役无时，岁多艰忧，人倦追集。公乃详究本末，寻访源流，遂加高沙堤拥，扼散流之地，于是谿其穴口，不使增修，合入蜀江，潴成云梦，是则江汉终古不得与襄人为患矣。[2]

物产

米　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关畿之内，连岁兴戎，荐属天灾，稼穑不稔"，因而仓廪空虚，谷物腾贵。德宗下诏："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一十五万石，设法搬赴上都，以救

〔1〕孙樵：《复台堰籍》（《全唐文》卷795），8 337～8 338页。

〔2〕《文苑英华》（6）卷870《徐襄州碑》4591、4 592页。

百姓荒馑。”[1] 朝廷令度支将襄州南运至江西、湖南的稻米，设法运至长安，以救百姓饥荒，可知平日襄州米经常运至南方各州，说明襄州盛产稻米。

漆器　“襄阳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2]

胶腊　“襄州两税，每差纲官送纳（京城），并有直进胶腊，其数甚多。”[3]

邓州（治穰县，今河南省邓县）王某自贞元二年（786年）任邓州刺史。至任“首年而富，中年而教，季年而政成。其籍版，自四千户至于万三千户。其藏屯，粟自三千斛至数（一作“四”）万斛。其余饰传遽之舍，作栖旅之馆，储什器之用，盖余力也”。[4]

张正甫自元和五年（810年）至七年（812年）任邓州刺史。“仅经三载，廉平清简，以临其人，人安政和，理行第一。”[5]

隋州（治隋县，今湖北省随州市）李惠登自建中四年（783年）至贞元二十年（804年）任隋州刺史。至任“居官无枝叶，率心为政皆与理顺、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间，田畴辟，户口加，诸州奏吏入其境，无不歌谣其能”。[6]

郢州（治京山县，今湖北省京山）《唐国史补》卷下：“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

复州竟陵县（今湖北省天门）《茶经》的作者陆羽是竟陵县人。裴迪：《西塔寺陆羽茶泉》：“竟陵西塔寺，曾经陆羽居。草堂荒产蛤，茶井冷生鱼。”[7]《因话录》卷3：“陆鸿渐，名羽，性嗜茶，

---

〔1〕《文苑英华》(3) 卷425《贞元元年冬至郊祀大赦天下制》2 156页。

〔2〕《唐国史补》卷中，37页。

〔3〕《文苑英华》(6) 卷870《徐襄州碑》4 591、4 592页。

〔4〕《全唐文》(7) 卷689《邓州刺史厅壁记》7 056页。

〔5〕《全唐文》(7) 卷661《张正甫苏州刺史制》6 719页。

〔6〕《旧唐书》(15) 卷185下《良吏下》，4 828页。

〔7〕《全唐诗》(4) 卷129，1 315页。

始创煎茶法。”他所著《茶经》是茶的经典著作，陆羽也因而享有盛名。正因此，“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唐后期茶的推广，陆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荆南节度使

1. 荆州（治江陵县，今湖北省江陵）自安史乱后，“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唐后期荆州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

安史乱后，“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正因如此，《太平广记》卷266《卢程》载：“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士人）多于鲫鱼。’”

元和中，元稹曾任江陵府士曹参军。他在《遣兴十首》中写道：“…到江陵郡，三年成去尘。”、“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1]“城中百万家”虽然并非统计数字，但仍可知民户之盛。唐代末年，王仙芝起义“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2]这是僖宗乾符五年（878年）之事，而此前江陵县有30万民户。据《旧唐书·地理二》荆州江陵府：天宝领县七（江陵、长宁、当阳、长林、石首、松滋、公安），户30 192。自天宝至乾符初年百二三十年间，只江陵县就有30万民户，是天宝年间江陵等7县民户总合的10倍！由此可知，唐后期江陵县民户“十倍其初”并非夸张之辞。

由于户口不断增多，开拓耕地、安置流民。李皋自贞元元年（785年）至三年（787年）任荆南节度使。“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属襄州，今湖北省荆门市北）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

〔1〕《全唐诗》（12）卷398，4 468、4 467页。

〔2〕《资治通鉴》（17）卷253《乾符五年》，8 195页。

百家。”[1]

田庄　柳宗元之从弟柳谋在江陵有田庄，“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牛不少四十蹄。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柳河东集》卷24）

《北梦琐言》卷3：“唐相国韦公宙（文宗时）善治生。江陵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

以上两例，印证了“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而“良田美产”“树之谷，艺之麻”说明江陵多膏腴之地。

经济作物

茶　《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江陵有‘楠木’。”

桔　《太平广记》卷415《崔导》：“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原）家贫乏，偶种桔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独异志》卷下：“李衡，江陵种桔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由此可知江陵盛产桔。

桃、杏　“王栖岩，自湘川寓江陵鹭白湖……所居桃、杏，手植成数十列，四藩其宇”[2]

玫瑰　《唐语林》卷8：“丛有似蔷薇而异，其花叶稍大者，时人谓之‘枚槐’，实语讹，当呼为‘梅槐’。‘槐’在灰部韵，音回。按《江陵记》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树?）’当因梅与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蔷薇者，得非分枝条而滋演哉？至今叶形尚处梅、槐之间，可取此为证……正使便为‘玫瑰’字。”

手工业、商业　《北梦琐言》卷12：“唐王潜镇荆南（长庆元年），有染户许琛，一日暴卒。”有以染为专业者，说明手工业分工之细。《太平广记》卷43《卢山人》：“唐宝历中，荆州卢山人，常

---

〔1〕《旧唐书》（11）卷131《李泌》，3 640页。

〔2〕《太平广记》（5）卷217《王栖岩》，1 659页。

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洑南草市。”有专营石灰的行业，也说明这一点。

《太平广记》卷73《俞叟》：“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因寓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由此可知江陵县有“市”而且设“市门监”进行管理，透露出江陵商业的活跃。

江陵地处长江的枢纽，水上交通十分发达。《太平广记》卷422《周邯》：“贞元中，有处士周邯……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艳澦。”李白：《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 刘禹锡：《荆州歌二首》：“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2]《太平广记》卷431《赵偶》：“荆州有一商贾，姓赵名偶，多南泛江湖。”从上述几例可知唐后期商旅乘船从四川经三峡至江陵，又从江陵向东、向南的情景。

2. 夔州云阳县（今重庆市万县东）《太平广记》卷401《张彦》：“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夔州云安县）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太平广记》卷401《龚播》：“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自业……于是遂富。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这表明唐后期云安县比较富庶。

3. 澧州（治澧阳县，今湖南省澧县东）崔芸于太和四年（830年）前后任澧州刺史。“《自理澧阳，课绩尤异，得赋敛变通之法，置邮馆供待之资，创立堤防，修缮城洫，事必可久，政皆有经”。[3]

---

〔1〕《全唐诗》(6) 卷181，1 844页。

〔2〕《全唐诗》(11) 卷364，4 103页

〔3〕《文苑英华》(4) 卷639《荐前澧州刺史崔芸状》，3 290页。

4. 朗州（治武陵县，今湖南省常德市）唐后期大兴水利。《新唐书·地理四》朗州武陵县：

东北八十九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821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余顷。

又有右史堰（长庆）二年，刺史温造增修。

（同年）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

又北百一千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初（县）令崔嗣业开。翱、造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

5. 金州（治西城县，今陕西省安康市）方干：《路入金州江中外》诗曰："数里时逢一两家，知是从来贡金处。"[1]《新唐书·地理四》金州土贡："麸金"。

金州石泉县（今陕西省石泉县）《太平广记》卷366《宋洵》："进士宋洵，下第南归。兄波，为金州石泉（县）令。洵以县邑喧杂，于县东数里葺一山居。""县邑喧杂"透露了当时石泉县城较为繁华。

6. 忠州（治临江县，今四川省忠县）白居易：《初到忠州登东楼……》诗曰：

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

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畲田。[2]

"烧畲"、"煮盐"写出农村的生产情景。

盛产荔枝　白居易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至十五年（820年）任忠州刺史。他在庭院中种荔枝。他写道："红颗珍珠诚可爱，白发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3]他还写道："欲知州远近，阶前摘荔枝。"[4]

---

〔1〕《全唐诗》（19）卷653，7 503～7 504页。

〔2〕《全唐诗》（13）卷434，4 798页。

〔3〕《全唐诗》（13）卷441《种荔枝》，4 920页。

〔4〕《全唐诗》（13）卷434《郡中》，4 798页。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唐朝末年，山南东道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继续发展。然而，江陵却在唐朝末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直到唐末也远未恢复。

襄州（治襄阳县，今湖北省襄樊市）皮日休：《陈先辈故居》：

千株桔树唯沽酒，

十顷莲塘不买鱼……

襄阳无限烟霞地，

难觅幽奇似此殊。（《皮子文薮》附录1《皮日休诗文》）

“千株桔树”、“十顷莲塘”、“不（需）买鱼”虽是“陈先辈故居”，但是这也是唐后期襄阳的田野一般情景。

前面提到“襄阳人善为漆器”，皮日休指出：“襄阳作髹器（即漆器），中有‘库露真’”（《皮子文薮》卷10）看来应是新的品种。

荆州（治江陵县，今湖北省江陵）“唐咸通（860—874年）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刳其肉，载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1] 由此可知江陵是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贸易往来者。乾符（874—879年）初年……[2] 郭七郎是江陵的大批发商，他的货物远销江淮以至河北。

唐末的江陵，水上交通依旧繁忙。“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堰。”[3] “唐乾宁（894—898年）中……学士李峣，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4]

---

〔1〕《太平广记》(3) 卷133《岳州人》，949页。

〔2〕《太平广记》(10) 卷499《郭使君》，4 097页。

〔3〕《太平广记》(7) 卷312《尔朱氏》，2 469页。

〔4〕《太平广记》(7) 卷312《李峣》，2 472页。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黄巢起义军自岭南北上，进逼江陵，而江陵唐军守将刘汉宏乘机“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1]江陵遭到巨大破坏。直到僖宗文德元年（888年）郭禹（又名成汭）任“荆南留后”（后为荆南节度使），从此江陵才开始恢复。“荆南兵荒之余，止有一十七家。禹励精为治，抚集凋残，通商务农，晚年殆及万家”。[2]按成汭（即郭禹，十龙纪元年（889年）复姓名为成汭）自龙纪元年至天复三年（903年）为荆南节度使。所谓“殆及晚年”应为天复三年。“晚年殆及万家”与唐后期“江陵城下三十万户”不能同日而语。

金州（治西城县，今陕西省安康）也遭到极大破坏。冯行袭自乾宁（894—898年）初至天祐二年（905年）任金州刺史。“金实名郡，燎于兵火，毒我编氓”，而冯行袭“保之如家，视之如子。尽宽井赋，恐夺农时，耕无惰夫，廪有丰食”。[3]

〔1〕《资治通鉴》（17）卷253《乾符六年》，8 217～8 218页

〔2〕《资治通鉴》（18）卷257《文德元年》，8 378页。

〔3〕《全唐文》（9）卷832《授金州刺史冯行袭……加食邑制》，8 775页。

第二十章　山南西道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山南道分为山南东、西二道。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置山南西道观察使，后为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处置使。领梁、洋、集、壁、果、通、巴、兴、凤、利、开、渠、蓬、金、阆等州，治梁州。

本地区，相当今陕西南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在唐代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滞后，唐后期比前有了一定的发展。

1. 梁州（治南郑县，今陕西省汉中市）“梁汉间，刀耕火耨，民采稆为食，虽领十五州而赋人才比东方数大县。自安史后，山贼剽掠，户口流散”。[1]

张献诚自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至大历三年（768年）任“工部尚书、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观察使”。岑参在《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诗中写道：“自公布德政，此地生光辉。百堵创里闾，十家恤惸嫠……芃芃麦苗长，蔼蔼桑叶肥。浮客相与来，群盗不敢窥。”[2] 张献诚着手盖民房，恢复生产，使流民回归。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泾师兵变，德宗逃至梁州，于翌年（兴元元年）六月，收复长安。德宗在离开梁州前，“诏改梁州为兴元府”[3]“官员资序，一切同京兆、河南二府”。[4]

---

〔1〕《新唐书》(16) 卷158《严震》，4 943页。

〔2〕《全唐诗》(6) 卷198，2 024页。

〔3〕《资治通鉴》(16) 卷231《兴元元年》，7 438页。

〔4〕《旧唐书》(5) 卷39《地理二》梁州兴元府，1 528页。

归融自文宗开成四年（839年）至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刘禹锡在《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中写道：

“我之提封，踞右扶风（县名，属京畿道，今陕西省扶风），触剑阁（今四川省剑阁县），千一百里。

“自散关（今名，在陕西省宝鸡市南）抵褒城（属梁州，今陕西省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门将贾黯董之。

“自褒而南，逾利州（治绵谷，今四川省广元）至于剑门（县名，今剑门关一带），次舍十有七，同节度副使石文颖董之。”

两使“分曹星驰”，“从而拓之”，结果1100里之驿路修通，“由是驶行者忘其劳，吉行者徐其驱，孳行者家以安，货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茧，乘行者蹄不刓。公谈私咏，溢于人听。”[1]

2.开州（治盛山县，今四川省开县）“乾元（758—760年）、上元（760—761年）之间，岁比凶灾，州壤萧然。”唐文编（又名次）于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夏任开州刺史。“既至，则敷宣化条，简易廉平，居者胥悦，流者自复，期月有成，三年大穰，狱有茂草，野无弃地，既均而安，既阜而藩，官修其方，物有其容”。[2]

3.利州（治绵谷县，今四川省广元）欧阳詹在《益昌行（并序）》中写道：

> 贞元年中，天子以工部郎中、兴元少尹、吴兴陆公长源牧利州。其为政五年，予旅游于利，睹人安俗阜，欲所以美，做诗一章。利，故益昌郡也，目之曰“益昌行”。
>
> 驱马至益昌，倍惊风俗和。
>
> 耕夫陇上谣，负者途中歌。
>
> 处处川复原，重重山与河。

---

〔1〕《全唐文》(6) 卷606，6 122—6 123页。

〔2〕《文苑英华》(5) 卷807《开州刺史新宅记》，4 267页。

人烟遍余田，时稼无闲坡。

问业一何修？太守德化加。

问身一何安？太守恩怀多。[1]

利州商业也很繁荣。《太平广记》卷86《天自在》：利州“州之南有市，人甚阗咽。”同书卷86《掩耳道士》：“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

4. 通州（治通川县，今四川省达县）唐后期通州社会经济仍然滞后。

通州少数民族很多：“通州杂以华夷”。[2] 元稹在《酬乐天得微之诗和通州事因成四首》诗中描述通州的情况：

“茅檐屋舍竹篱州，虎怕偏蹄蛇两头（自注：通州元和二年，偏蹄虎害人，比之白额。两头蛇处处皆有之）。”

“田仰畬刀少用牛”“市井无钱论尺丈，田畴付火罢耘锄。”[3] 这一地区仍是刀耕畬田，而交易之间以布帛为货币。

5. 凤州（治梁泉县，今陕西省凤县）《太平寰宇记》卷134《凤州》：“风俗，土少桑麻，妇人无机杼之勤，至于井税之布帛、口食之盐、酪、皆资于他郡焉。”

6. 阆州（治阆中县，今四川省阆中）杜甫在《南池（自注：在阆中县东南。）》诗中写道：“峥嵘巴阆间，所向尽山谷。南池阆城南，枕带巴江腹。芰荷人异县，粳稻共比屋。”[4] 在县城附近“芰荷人异县，粳稻共比屋”，生机盎然，而离开居民区，就会出现：“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5] 的景象。

---

〔1〕《全唐诗》(11) 卷349，3 900～3 901页。

〔2〕《文苑英华》(3) 卷411《授郑滑除通州刺史……等制》，2 083页。

〔3〕《全唐诗》(12) 卷416，4 593页。

〔4〕《全唐诗》(7) 卷220，2 323页。

〔5〕《全唐诗》(7) 卷220《发阆中》，2 324页。

第二十一章　剑南道

安史乱后，将剑南道一分为二。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以益、彭、蜀、汉、眉、邛、嘉、嶲、黎、戎、维、茂、雅、合14州置西川节度使，治益州（治成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以梓、遂、剑、龙、阆、普、陵、泸、荣、资、简、绵十二州置东川节度使，治梓州（治郪县，今四川省三台）。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复苏

安史之乱，剑南道成为避难之地。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前夕，唐玄宗一行于至德元载（756年）七月逃入成都，一年多后，于至德二年十二月归长安。长安、洛阳的官员、百姓大批逃入剑南。“唐王鄂者，尚书（王）鄙之弟也。两京乱离，鄙挈家入蜀。”[1] 杜甫原居鄜州（治洛交县，今陕西省富县），安史乱后，辗转“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2]

高适自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至上元元年（760年）任彭州刺史。他于此时上《请罢东川节度使疏》中指出：“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益州，天宝元年改为蜀郡，治成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唐人常

〔1〕《太平广记》（8）卷388《王鄂》，3 095页。

〔2〕《新唐书》（18）卷201《文艺上·杜甫》，5 737页。

以蜀泛指今四川省）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1]

由以上事例可知，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洛阳“衣冠士庶，”大批至剑南，“与蜀人杂居”。这说明安史乱中，剑南是富庶而且安定的地区。然而，此后一段时间，剑南道内部也一度发生战乱。

“属车驾迁幸；其后郭英乂谣崔宁之室，遂纵崔宁、杨之琳交乱；及崔宁得志，复极侈靡，故蜀土残弊，荡然无制度。”[2] 这是指，玄宗入蜀（今成都市以后的一段时间）其后，代宗永泰元年（765 年）剑南节度使严武死，都将郭英乂与崔宁为争夺节度使而用兵，至大历三年（768 年），以郭英乂死、杨之琳败走、崔宁任节度使而结束。不过，战乱历时不长，影响有限，因而很快就得以恢复。

杜甫入蜀后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些反映了当时剑南诸州的物产：

麻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3]；“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4]。

桔　杜甫在《章梓州桔亭饯成都窦少尹》诗中描述梓州（治郪县，今四川省三台）“秋日野亭千桔香”[5]。

渔业　杜甫在绵州（治巴西县，今四川省绵阳）作《观打鱼歌》：

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鲅鲅色胜银。
渔人漾州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
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6]

---

〔1〕《全唐文》（4）卷 357，3 627－3 628 页。
〔2〕《旧唐书》（11）卷 129《张延赏》，3 608 页。
〔3〕《全唐诗》（7）卷 229《夔州歌十绝句》，2 508 页。
〔4〕《全唐诗》（7）卷 221《客居》，2 331 页。
〔5〕《全唐诗》（7）卷 227，2 468 页。
〔6〕《全唐诗》（7）卷 220，2 314 页。

“众鱼常才尽却弃”，说明当时渔业资源丰富，有选择地捕捞，并非竭泽而渔。

瓷器　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写道：“大邑（今四川省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1]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2]至大历元年以杜鸿渐为西川节度使，以张献诚兼东川节度使。[3]从此剑南又分为东川、西川。

西川节度使

德宗建中（780—783年）中，“西山兵马使张朏袭成都为乱”[4]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志益骄，求兼领三川（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作乱[5]。然而，为时不长，影响不大。

自德宗建中年起，除少数以外，历任西川节度使者，均有所建树，因而西川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张延赏自大历十四年（779年）至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任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接任时，“蜀土残敝，荡然无制度”至任“延赏事为之制，薄人谨出，府库遂实”。德宗因“泾师之变”逃至奉天，张延赏“贡献踵道”。德宗转至梁州，“倚剑蜀为根本”。[6]

韦皋自贞元元年（785年）至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任西川

---

〔1〕《全唐诗》(7) 卷226，2 448页。

〔2〕《资治通鉴》(15) 卷223《广德二年》，7 159页。

〔3〕《资治通鉴》(15) 卷224《大历元年》，7 190页。

〔4〕〔6〕《新唐书》(14) 卷127《张嘉贞》，4 445页。

〔5〕《资治通鉴》(16) 卷237《元和元年》，7 626页。

节度使。“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始，皋务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岁一复”，这就是说韦皋将民户分为三部分，每年免除其中一部分百姓的赋税。因此，“蜀人德之，见其遗像必拜”。[1] 由于吐蕃经常骚扰，为加强战斗力，韦皋对其军队军士很照顾。“韦太尉在西川凡事设教。军士将吏婚嫁，则以熟采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来者将迎之”。[2] 因而，“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

高崇文自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至二年（807年）任西川节度使，刘辟于元和元年正月发兵叛乱，宪宗命神策军使高崇文平刘辟，当年九月擒刘辟。“崇文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毫不犯”。[3]

郭钊自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任东川节度使。“（文宗）大和三年冬，南蛮（指南诏）陷嶲州，遂寇西川。（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失于控御，蛮军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帅，乃以（郭）钊兼领西川节度。蛮军已寇梓州，诸道援军未至，川军寡弱，不可令战。钊致书于蛮首领箜巅，责以侵寇之意。箜巅曰：‘杜元颖不守疆场，屡侵吾圉，以是修报也。’与钊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与南诏（今云南省）立约，疆陲不扰”。[4]

唐后期西川的人口有很大发展。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白敏中自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四月由邠宁节度使改为西川节度使，“领州十四，县七十一，户百万，兵士五万。”[5] 而天宝十二

〔1〕《新唐书》（16）卷158《韦皋》，4 936～4 937页。

〔2〕《唐国史补》卷中，32页。

〔3〕《资治通鉴》（16）卷237《元和元年》，7 636页。

〔4〕《旧唐书》（11）卷120《郭子仪传附郭钊》，3 472页。

〔5〕《全唐文》（8）卷744，7 703页。

载（753年）这14州民户只有592 080户。

据《旧唐书》卷41《地理四》所载益、彭等州“天宝领户”（即天宝十二载领户，详见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开列如下：

益州：	160 950户	嶲州：	40 721户
彭州：	55 922户	黎州：	1 731户
蜀州：	56 577户	戎州：	4 359户
汉州：	69 500户	维州：	2 179户
眉州：	43 529户	茂州：	2 510户
邛州：	42 107户	雅州：	10 892户
嘉州：	34 289户	合州：	66 814户
合计：	592 080户		

注：合州见《旧唐书》卷39《地理二》

这就是说，西川14州民户自天宝十二载至大中六年这100年中，民户增长了68.9%。

成都县人口增长尤为显著。李景让自大中十二年（858年）任西川节度使。翌年某日，李景让览《朝报》，得知“蒋伸相登庸”，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1]

天宝十二载（753年）益州领10县（成都、华阳、新繁、犀浦、双流、广都、郫县、温江、灵池、新都），民户共有160 950户。至大中十二年（858年）只成都一县就有10万户，可知增长幅度之大。

《资治通鉴》卷259（昭宗景福元年（892年））：“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原注：言扬州居一，益州为次也）。”益

[1]《北梦琐言》卷5，32页。原文为李景逊。“逊”为“让”之误。逊与让意相通，作为名字不可调换。

州，至德二年改为成都府。由此可知，唐后期成都仅次于扬州，是唐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唐后期西川物产十分丰富。

柑、石蜜《新唐书·地理六》眉州土贡（长庆贡）：柑、石蜜。

荔枝　张籍（贞元时人）：《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1] 薛能（会昌六年进士）做《荔枝诗》有序："杜工部老居两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居易）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其诗曰："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2] 从"未识蹉跎欲半生"一句可知，当时荔枝较少，而"两蜀"较多。

茶　《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

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故事，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上务恭俭，不欲逆其物性，诏所供新茶，宜于立春后造。"[3]

蜀茶著名于世，时人往往以此作为馈赠礼品相互寄送。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

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

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4]

崔道融有《谢朱常侍寄贶蜀茶、剡纸二首》[5]

酒　《唐国史补》卷下："酒则有……剑南之烧春。"《北梦琐言》卷3："蜀之士子，莫不酤酒……（陈会）家以当炉为业。"

---

〔1〕《全唐诗》（12）卷382，4 290页。

〔2〕《全唐诗》（17）卷561，6 509页。

〔3〕《旧唐书》（2）卷17下《文宗下》，547页。

〔4〕《全唐诗》（13）卷437，4 852页。

〔5〕《全唐诗》（21）卷714，8 210页。

蜀锦　唐后期剑南盛产绫罗锦缎等精美丝织品，尤以蜀锦最为著名。《唐语林》卷8："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然后文采焕发。"杜牧有"蜀船红锦重"[1]之句《旧唐书》卷17下《文宗下》：（大和四年（830年）五月"敕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令数内减二千五百十匹"。此前西川每年进贡8千匹精美丝织品，其数十分惊人。此后削减至5 657匹，数量仍然可观。由此可知唐后期西川丝织业的发达。

麻布　扶风（今陕西省扶风）人窦乂（德宗时人）"买蜀青麻布，百钱个匹，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2]

纸　《唐国史补》卷下："纸有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看来蜀纸多为麻纸，故质量高。鲍溶（元和时人）在《寄王璠侍郎求蜀笺》诗中写道："蜀川笺纸彩云初，闻说王家最有余。"[3]蜀川信纸色如彩云，看来即"十色笺"，而"王家最有余"说明十色笺乃贡品。《太平广记》卷174《柳公权》："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武宗"目御前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唐摭言》卷13）

雕版印刷　冯宿（贞元中进士，开成元年（836年）卒）：《禁版印时宪书奏》：

> 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4]

冯宿自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至九年（835年）历任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上列书奏，可能是这时期上奏的。这是

---

〔1〕《全唐诗》（16）卷522《扬州三首》，5 963页。

〔2〕《太平广记》（5）卷243《窦乂》，1 876页。

〔3〕《全唐诗》（15）卷487，5 537页。

〔4〕《全唐文》（7）卷624，6 300－6 301页。

我国历史上有关雕版印刷的较早记载。

“（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1] 自大和至中和历时50余年，雕版印刷由日历发展到阴阳占梦，进而到教科书，逐渐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剑南处于领先地位。

科学技术　《独异志》卷上：“蜀人杨行廉精巧，尝刻木为僧，于益州（治成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市，引手乞钱。钱满五十于手，则自倾写（泻）下瓶，口言‘布施’。”

商业　《太平广记》卷85《击竹子》：“击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许人，年可三十余，在成都酒肆中……一旦，自诣东市卖生药黄氏子家。”《酉阳杂俎》续集卷3：“成都乞儿严七师……居西市悲田坊。”可知成都有东、西二市，商业较为发达。

《大唐新语》卷12：“韩思彦以御史巡于蜀，成都富商积财巨万，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讼。”成都富商较多，自唐前期即很活跃。

东川节度使

鲜于叔明（后赐姓李）自代宗大历三年（768年）至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任东川节度使。“初，东川承兵盗，乡邑凋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抚接有方，华裔遂安”。[2] 于邵在《唐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经武颂》中指出：鲜于叔明至任，“一之岁，二之岁，葺郡邑、正疆理，而树牙幢。三之岁、四之岁，辟田畴、阗帑藏，而耀军实。五之岁，而甲兵大振。六之岁，而勇可贾余。七之岁，而人有取、训有常矣。无暴可禁，所谓保大定功，有财斯半；所谓

---

〔1〕《旧五代史》（2）卷43《明宗纪第九》588页。长兴三年二月乙卯“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注文所引《柳氏家训》序文。

〔2〕《新唐书》（15）卷147《李叔明》，4 757页。

安人和众，兼之者”。[1]

郑复自文宗开成四年（839年）至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任梓州（治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刺史。孙樵在《梓潼（天宝元年改梓州为梓潼郡）移江记》中指出：梓州境有江水为患，夏秋之季，大水来，“包城荡墟，岁杀州民”。郑复至任，“闻前观察使欲凿江东堰地，别为新江”而未兴工。他力排众议，将新江凿成，“新江长步一千五百，阔十分其长之二（即300步），深十分其阔之一（即150步），盘堤既隆，旧江遂墟，凡得田五百亩。其年七月，水果大至，虽逾防稽陆，不能病民，其绩宜何如哉！”[2]

物产

茶　《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

桔　杜甫在《章梓州桔亭饯成都窦少尹》诗中写道：“秋日野亭千桔香”[3]

盐　《元和郡县图志》卷31《剑南道上》资州内江县（今四川省内江市）：盐井二十六所。资州银山县（今四川省内江市北）：盐井一十一所。

麸金　《元和志》：资州磐石县（今四川省资中）：出麸金。泸州泸川县（今四川省泸州市）：出麸金。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西川节度使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攻入长

---

〔1〕《文苑英华》（5）卷776，4 088～4 089页。

〔2〕《全唐文》（9）卷794，8 328～8 329页。

〔3〕《全唐诗》（7）卷227，2 468页。

安，僖宗一行逃往成都，至文德元年（888年）二月，才回长安。剑南又一次成为避难之地。

《资治通鉴》卷254《中和元年》："群臣追从车驾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

高骈自僖宗乾符二年（875年）至五年（878年）任西川节度使。在任期间，曾修筑成都罗城。僖宗《奖高骈筑成都罗城诏》中曰：

省所奏：修筑罗城毕功并进画图事具悉……每日一十万夫，分筑四十三里，皆施广厦，又砌长砖，城角曲收，逶迤攻而势胜，甕门直截，容拒守之兵多，利及后人……役徒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卓哉懋绩，固我雄藩。[1]

高骈组织偌大人力物力建筑如此坚固的罗城，主要是因为"自咸通十年（869年）以后，两遭蛮寇攻围。"[2]成都罗城修成后，大大加强了防御能力，对成都的安全和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时人王建说："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锦"[3]。这是唐朝末年成都的实际情况。前面提到西川节度使李景让有诗"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说的就是这时期成都的情况。

茶、纸　郑谷（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进士擢第）有《蜀中三首》一诗，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

雕版印刷　《唐语林校证》卷7："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成都之"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

〔1〕《全唐文》(1) 卷87，910～911页。

〔2〕《全唐文》(9) 卷802《请筑罗城表》，8 428页。

〔3〕《资治通鉴》(18) 卷258《大顺二年》，8 418页。

是择，所误于众多矣。”由此可知，唐末成都雕印日历者众多，版本很多。

商业　彭州唐昌县（今四川省唐昌）新设草市和歇马亭镇。陈谿（咸通时人）在《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乡）草市、歇马亭镇……等记》中写道：

建德乡草市设置以前，“昔之此民，往复百里，饥不得续食，寒不得易衣”，生活极为不便。草市设置以后，“今则百货咸集”，“今之出户，而所缺皆足，市之功其可量乎！”

歇马亭镇设置以前，“昔之此民，村坊遥远，萧索人稀，盗贼织路，行者恐畏”。设镇以后，“今之出户，歌笑自若，醉饱群归，镇之功其可量乎！”[1]

东川节度使

邛州（治临邛，今四川省邛崃）时人周庠曰：“邛州城堑完固，食支数年，可据之以为根本。”[2]

荔枝　《唐大诏令集》卷86《咸通八年五月德音》：“东川每年进蜜浸荔枝，道路遥远，劳费至多，自今以后，宜令停进。”可知东川盛产荔枝。

---

〔1〕《全唐文》(9) 卷804《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等记》，8 457页。

〔2〕《资治通鉴》(18) 卷257《文德元年》，8 379页。

第二十二章　岭南道

唐初岭南道，自高宗开耀（681—682年）至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分出桂管、邕管、容管和安南管内经略使。“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合称“五府”。至唐末而不改。

第一节　战乱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广州　《资治通鉴》卷220《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原注：广州治南海县）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李勉自代宗大历四年（769年）至七年（772年）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其时，“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战，隐没十余州”。李勉到任“遣将李观与容州刺史王翃并力招讨，悉斩之，五岭平。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1]

《资治通鉴》卷224《代宗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据岭南反。”[2]至大历十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为将，讨哥舒晃。瑶以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丁未，克广州，斩哥舒晃[3]岭

〔1〕《旧唐书》（11）卷131《李勉》，3 635页。

〔2〕《资治通鉴》（15）卷224《大历八年》，7 221页。

〔3〕《资治通鉴》（15）卷225《大历十年》，7 235页。

南平。

安史之乱虽然远离岭南，但是，在战乱期间，王权衰落，其影响也波及岭南，自乾元元年至大历初年，大食、波斯围广州城在前，冯崇道、朱济时、哥舒晃谋乱于后，前后十余年岭南不安定，至大历末年，经过近20年才安定下来。大历末王虔休为检校工部尚书，他在《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中指出：

> 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缺。车徒相望，城府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1]

这说明，自大历末年起，波斯"远慕望风"，而"宝舶荐臻，倍十恒数"。对外贸易十分活跃，以致"家给户足"，一派兴旺景象。

桂州（治始安县，今广西桂林市。）张光奇自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至上元元年（760年）任始安太守，充桂管经略使。"初张公受命之日，以为五岭荒服，不同于他邦，百蛮犷俗，不可以独理。乃荐武功苏浣，自秘书省校书郎除金吾椽摄监察御史以佐荐。浣在幕中，多所匡辅，洎张公家艰去职，浣统其留务，凛其正色，操持纪纲，而十州之地晏如也。"[2]

第二节　唐后期经济的发展

一、岭南节度使管州

（一）广州

广州（治南海县，今广东省广州市）

---

〔1〕《全唐文》（6）卷515，5 235页。

〔2〕《全唐文》（4）卷376《桂林送前使判官苏侍御归上都序》，3 821页。

王锷自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至十七年（801年）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工商业发达，因而，商税比田税多。王锷因“地征簿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商税），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1]不仅如此，“诸蕃舶至，尽有其税”，因而，王锷“财蓄不资”[2]。他将得来的大量财货“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运往北方。“周一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3]从王锷敛财一事可知广州工商业发达，同时又是外贸的港口。

孔戡自元和十二年（817年）至十五年（820年）任岭南节度使。他公正清廉，至任后着手改革前弊。“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阅货之宴；犀珠磊落，贿及仆隶，公皆罢之”。以前“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孔戡认为：“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无算（时日之）远近。”[4]孔戡的改革，改善了海商的处境，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卢钧自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至五年（840年）任岭南节度使。卢钧为政廉洁。“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洁廉”。[5]“钧始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于预”。[6]当时海商有的留居广州，“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挺为乱。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禁（其）名产（不准蕃商占田营地）。阖部肃一，无敢犯”。[7]

---

〔1〕〔3〕《旧唐书》（12）卷151《王锷》，4 060页。

〔2〕《新唐书》（16）卷170《王锷》，5 169页。

〔4〕《全唐文》（6）卷563《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5 703页。

〔5〕《新唐书》（17）卷182《卢钧》，5 367页。

〔6〕《旧唐书》（14）卷177《卢钧》，4 591～4 592页。

〔7〕《新唐书》（17）卷182《卢钧》，5 367页。

顺便提及卢钧还向朝廷建议岭南官吏改从本地挑选。他在《岭南官吏请停吏部注拟奏》中指出：岭南地远，北方人有才学者都不愿来，来的多是“无能之流”加以“贫穷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任四年，备知情状”。因此，他建议：“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有闻（即试用一段时间），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1] 看来，此前潮州官吏已由本地选派，卢钧的建议，似将这一办法推广于“岭南”诸州。

物产

榕树：《太平广记》卷256《苏芸》：“岭表多假吏，而里巷目为使君，而贫窭徒行者甚众。元和中，进士苏芸南地淹游，尝有诗云：‘郭里多榕树，衙中足使君。”

荔枝：“南海郡（广州，天宝元年改为南海郡。治南海县，今广东省广州市）多荔枝树。荔枝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条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劗（音 lí）取其枝，故以为名。”[2]

桄榔树（《本草纲目》：《本草》名桄榔子，又名面木、铁木。李时珍曰：“其木似槟榔而光利，故名桄榔，面，言其粉也。铁，言其坚也。”）《酉阳杂俎》续集卷之十《支植下》：“桄榔树，古南海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

睡莲　《酉阳杂俎》前集卷19《草篇》：“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屯田郎中从事南海，亲见。”

杏　《太平广记》卷410《仙人杏》：“南海中多杏。”

柑　广州有罗浮山“罗浮山有御园柑子”。

龙眼、橄榄　“四会县(今广东省四会市)厓山在县南八十里，临大海，出龙眼子、橄榄之树”。(《太平寰宇记》卷157《广州》)

---

〔1〕《全唐文》(8) 卷759，7 888页。

〔2〕《太平广记》(9) 卷406《荔枝木》，3 275页。

竹　“唐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遇巨竹万于竿。”[1]

酒　《唐国史补》卷下：“酒有岭南之灵溪、博罗。”

矿产

金　“广州四会县，金山，一名金冈山，在县北六十五里，出金沙。”[2] 元和十二年（796 年）孔戡任岭南节度使。“既至，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岁八百两。”[3] 免去从岭南应收取的 800 两黄金，透露了岭南产金之多。

手工业　《太平广记》卷 66《卢眉娘》：

> 唐永贞年（805 年）南海（广州南海郡）贡奇女卢眉娘，……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更善于作“飞仙盖”，以丝一钧，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执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无三两。煎灵香膏敷之，则坚硬不断。

水陆交通

自广州至桂林　《太平广记》卷 308《柳澥》：

>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戡，遇之甚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烛、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南六十里……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至桂州（治始安县，今桂林市）。

自广州入湖南　《太平寰宇记》卷 161《英州（唐为浈阳

---

〔1〕《太平广记》(9) 卷 412《罗浮竹》，3 350 页。

〔2〕《元和郡县图志》(下) 卷 34《岭南道一》，891 页。

〔3〕《新唐书》(16) 卷 163《孔戡》，5 009 页。

县)》：广州浈阳县（今广东省英德）“东南八十里（有）大驿路，下至广州，上至韶州。”同书卷159《韶州》乐昌县（今广东省乐昌）“县南临武水溪（今名武水）当郴州（治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往韶州驿。”可知从广州出发走大驿路，经英德、乐昌可至湖南郴县。　　自广州至西南、东南沿海

海路：“凡自广州至勤（今广东镇安）、春（今阳春市）、高（今高州）、潘（今茂名市）等七州，旧置传舍（按：指水路驿站），此路自广州泛海行数日方登陆。”不过，一般人“惮海渡”，多走陆路。只有出使、递符牒者”走这条海路。这条自广州泛海经恩（今广东恩平）、春、高、潘等州海岸的海路，“颇有广陵（治江都县，今江苏省江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贾人循海东南而至，故吴越所产之物不乏于斯”。（《太平寰宇记》卷158《恩州》）这就是说江苏、浙江的物产循东、南海纷纷运至广州，故广州不乏吴越产品。

陆路：“端州（治高要，今肇庆市）直下十余里至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人皆惮海波，多不由传舍（指水路驿站），虽公行亦自便陆路去，直达于海滨。”由于新州处于陆路咽喉，因而“州郭甚微（小），然为西南尤好郡也。”（《太平寰宇记》卷159《端州》）

自海南岛至雷州　“其崖、儋、振、琼、万安五州，都在海中，洲之上方千里，四面抵海（即今海南省），北渡海洋，帆一日一夜，至雷州（治海康县，今海南省海康）。”

自海南岛至广州　“琼州（治琼山县，今海南省琼山市）北十五里，极大海，泛大船，使西风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门。从岸门山入小江，一日至新会县（今广东省新会市），从新会县入，或使风，十日到广州。”（《太平寰宇记》卷169《琼州》）

由广东至越南　《太平广记》卷25《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骠、爱州（均在越南北部）。二公结行李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东北），登

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隋为交趾郡，唐为安南府，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元、柳二人的从父分别贬至驩、爱二州，二人省亲，就是打算从广西合浦坐船去越南的。

自贵州入广东　《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三年》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隋牂柯郡，唐改为牂州，今贵州省瓮安东北）开道，经"西赵"，出邕州（治宣化县，今广西南宁市），以通交（趾）、桂（州）"。侯弘仁是从贵州出发，经桂林、出南宁至越南的。

外贸《唐国史补》卷下：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即今海关负责人）籍其名物，纳舶脚（关税），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唐后期朝廷对外贸十分关切。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在《疾愈德音》中曰：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

（二）韶州

韶州（治曲江县，今广东省韶关市）徐申自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至贞元四年（789年）任韶州刺史。在任期间，他做了四件事：

第一，垦植300顷废弃公田。安史乱后"四十余年，刺史相循

---

〔1〕《全唐文》(1) 卷75，785页。

居于县城，州城与公田三百顷皆为墟……公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种与食。所收其半与之；不假牛犁者，三分与二。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连年宜岁，得粟比余田亩盈若干，凡积粟三万斛。”

第二，重建州城“复筑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其艺来者，与粟有差。刺史亲临给与，吏无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应募者数千人……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属迁于新城，县令之下，各返其室（按：此前县令、丞、尉杂处民屋）。”

第三，修驿道、驿馆、市“创六驿、新大市、二道、四馆，器用皆具。”

第四，减轻百姓负担。“其始来也，户仅七千，凡六年迁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数，又益四千户焉。”在6年间，民户由7000增至18 000户。”[1]权德舆在《金紫光禄大夫……徐公（徐申）行状》中指出：“罢去之日，夫家名数倍差于始至，而不书于籍。”[2]所谓“不书于籍”，就是将新增的11 000户不列入户籍之上，这样就可免去他们的两税负担，从而使全州百姓的负担大为减轻。

李某，元和（806—820年）中任韶州刺史。白甫湜在：《朝阳楼记》中说：“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先时，此州无政，有闻土秽水烦，人创吏侵，田亩莽而不垦，城郭牢而不实。时唯李君，奉诏而来，一年粗洽，二年称治，三年大成。”[3]

物产

纸　《唐国史补》卷下：“纸则有……韶之‘竹笺’。”

矿冶　《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一》：“韶州曲江县（今广东省韶关市）玉山在县东南十里，有采玉处。

---

〔1〕《全唐文》(7) 卷639《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徐公行状》，6 458页。

〔2〕《全唐文》(5) 卷502《金紫光禄大夫……徐公墓志铭》，5 109页。

〔3〕《全唐文》(7) 卷686，7 026～7 027页。

银山，在县西二十二里，出银。”

（三）潮州

潮州（治海阳县，今广东省潮安）

韩愈元和十四年（819年）任潮州刺史。他至任半年，在《送区册序》中指出：

“阳山（潮州潮阳县西南45里有西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语夷面。”韩愈“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1]

潮州管三县：海阳县（今广东省潮安县）、潮阳县（今广东省潮安以西）、程乡县（今广东省梅县）。此州天宝十二载有户4 420[2]。元和十四年韩愈指出：“今此州户万有余”[3]。50余年户口增长一倍。

韩愈任职时间很短，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驱逐鳄鱼。《太平寰宇记》卷160潮州：“恶水，即州前大江，东流至潮州出海。水中多鳄鱼。遇江水泛涨之时，随水至州。”韩愈到任不久，即设法驱逐鳄鱼。他的《祭鳄鱼文》是为名篇。文中提到：“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否则）必尽杀乃止。”[4]尽管鳄鱼冥顽不灵，不会自动入海，但是“必尽杀”而后人畜得安。第二件事是置乡校。韩愈鉴于“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者，因而他给岭南节度使上《潮州请置乡校牒》，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

〔1〕《全唐文》（6）卷555，5 621页。

〔2〕《新唐书》（4）卷43《地理七上》潮州。其户数实为天宝十二载（753年）户数。

〔3〕《全唐文》（6）卷554《潮州请置乡校牒》5 612页。

〔4〕《全唐文》（6）卷568，5 747页。

无庶几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1] 他大力提倡教育，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物产

《太平寰宇记》卷158《潮州》：“稻得再熟，蚕亦五收。”

《元和郡县图志》卷34《岭南道一》：“潮州海阳县（今广东省潮州市）盐亭驿，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

（四）新、罗、雷、端、琼等州

新州（治新兴县，今广东省新兴）“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颇异，自谓即毙，以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2]

罗州（治石城县，今广东省廉江）“罗州为昭义郡。郡傍海，海有煮海场三，然郡民盗煮，亦不能禁。郡多蜜，洁白如雪。”[3]

雷州（治海康县，今广东省海康市）“雷州为海康郡、雷之南濒大海，郡盖因多雷而名焉。”[4]“稻再熟，五月、十一月再熟。”（《太平寰宇记》卷169《岭南道一》）

端州（治高要县，今广东省肇庆市）刘禹锡在《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诗中写道：“端州石砚人间重。”[5]

琼州（治琼山县，今海南省琼山）琼州又名琼山郡。韦公干于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任琼山郡郡守。他经营大规模手工业作坊。“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大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熔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6] 韦公干经营的手工业作坊，使用奴隶劳动，但

---

〔1〕《全唐文》(6) 卷554，5 612页。

〔2〕《太平广记》(9) 卷408《治蛊草》，3 304页。

〔3〕《太平广记》(6) 卷269《胡证》，2 112页。

〔4〕《太平广记》(8) 卷394《陈义》，3 150页。

〔5〕《全唐诗》(11) 卷359，4 051页。

〔6〕《太平广记》(6) 卷269《韦公干》，2 113页。

规模很大，有纱织、角器、木器甚至锻冶金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劳动者“日考月课，唯恐不程”，说明这个手工业作坊实行计时、计量的定额管理制度。

二、桂管经略使管州

桂州（治始安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卢岳自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至贞元三年（787年）任桂州经略使。“南越犷俗，井税之人鲜具。其布帛之幅、通流之货，悉异中土。府君以美利利之、王制制之。又每岁有西原，（蛮）之警，府君布政，群盗为人。元年春赋人，贞元三年来朝，拜少府监。”[1] 卢岳解决了桂州长期不缴赋税的问题。

李佐自贞元三年（787年）至四年接任桂州经略使，进一步加以整顿。“部内不及朝贡之羁縻州者十八，旧例首领（少数民族酋长）尽于官署为刺史。一州所贡悉以奉之，其或鱼肉斯人之甚。有来讼者，率以遐远阻险，非文法所及置之。”李佐至任，“公于是易之以中土温良之吏。越人之男女不为所鬻，资产不为所夺，悦而载之，相与禀令，其移风俗如此者，非一”。[2]

王拱自贞元八年（792年）至十四年（798年）任桂州刺史。先是，“临桂县（即始安县后改名，州治所），城东南十五步有回涛堤，桂江西岸水自岭南流至桂岭。去州二百里，水势极高，每岁三月至五月，大水暴涨，淹浸城池”。“唐贞元十四年刺史王拱筑此堤，长五百五十四步，以捍水势，居人免垫溺之患”。（《太平寰宇记》卷163《桂州·临桂县》）

桂州汉族与壮族杂居，风俗各不相同。《桂林风土记·迁莺坊府廓》：“迁莺坊，本名阜才，在市西门。因曹邺中丞进士及第，前政令狐大夫（令狐定，大中三年（849年）至六年任桂州经略使）改

---

〔1〕《全唐文》（8）卷784《陕虢观察使卢公墓志铭》，8 197页。

〔2〕《文苑英华》（6）卷944《京兆少尹李（佐）公墓志》，4 964页。

为迁莺坊。”而少数民族风俗别具特色：“每月中旬，年少儿女盛服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曰‘夜泊’以为娱。二更后，匹耦两两相携，随处相合，至晓则散。（《太平寰宇记》卷162《桂州》）

物产

“桂管布”（木棉布）“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朝谒。开成（836—840年）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问宰相：‘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上嗟叹久之，亦效著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1] 早在长庆年间（821—824年）白居易在《新制布裘》中写道：“桂布白似雪，吴绵软如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2] 说明此时桂管布已经流行。

山茶　《酉阳杂俎》续集卷8：“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柳州（治马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宗元自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至十四年（819年）任柳州刺史。他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中写道：“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3] 说明柳州盛产黄柑。

宜州（治龙水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宜州见管四县、一场（都感场），又管羁縻十六州……其文兰等四州最居偏僻，有州县且无厮字。所有赋租，宜州差人征催，皇朝（北宋）因之。”

宜州多少数民族。“人风犷戾，常持兵甲以事战争。皆左衽、椎髻，礼异俗殊，以岩穴为居止。”（《太平寰宇记》卷168《宜州》）

梧州（治苍梧县，今广西梧州市）“南人以桐为苍梧，因以名郡（梧州又名苍梧郡）。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丛生繁茂，不

〔1〕《太平广记》(4) 卷165《夏侯孜》，1 205页。

〔2〕《全唐诗》(13) 卷424，4 668页。

〔3〕《全唐诗》(11) 卷352，3 939页。

如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荣，未尝见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1〕

物产

药　《酉阳杂俎》前集卷17《虫篇》：“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矿　“孟陵县（今广西梧州市西北）古钱村，有金坑三所。”（《太平寰宇记》卷164《梧州》）

昭州（治平乐县，今广西平乐县）张愁自贞元七年（791年）任昭州刺史。令狐楚在《荐昭州刺史张愁状》中曰：“伏见岭南风俗惰懒，苟避征徭，易成逋窜。张愁忧人若己，理郡如家，劝课农桑，置立保社，移风为敦厚之境，征赋无惨急之名，周旋六年，其道一致。”〔2〕

昭州野生动物不少。李商隐：《昭州》：“桂水春犹早，昭州日正西。虎当官道斗，猿上驿楼啼。”〔3〕

三、容管经略使管州

容州（治北流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

李复自德宗贞元二年（786年）至三年任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到任，“亲率其下，以抚吾人……选武艺、归老疾，罢减塞卒四千余人，以趋农事。率浮惰，辟污莱，开置屯田五百余顷，以足军资。舍寇贼之为缧囚者，释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犷以顺。禁人民之相虏卖者，执而诛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岁有灾，滥炎而连烧于庐舍，公创制以御其郁攸，而邑居以葺”。〔4〕

房济自贞元十三年（797年）至十六年（800年）任容管经略

〔1〕《太平广记》（9）卷406《刺桐》，3 276页。

〔2〕《文苑英华》（4）卷638，3 286页。

〔3〕《全唐诗》（16）卷540，6 210页。

〔4〕《全唐文》（5）卷429《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4 371页。

使。“管有岭外十三州之地。林蛮洞蜒，守条死要，不相渔劫，税节赋时，公私有余。”[1]

韦丹自贞元十七年（801年）至永贞元年（805年）任容管经略使。到任“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2]看来，容州原无州城，韦丹建州城，周十三里。教种茶、麦和耕织，看来是将狩猎经济转为农业经济。而“兴学校”则将中原文化移入容州。韦丹的贡献巨大。

廉州（治合浦县，今广西合浦东北）“廉州边海中有洲岛，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赋。”[3]

郁林州（今广西贵县、玉林之间）“南流县、犀牛有角在额上，其鼻上又有一角，食荆棘。冬月掘地藏而出鼻。”

“槟榔树，五月熟，大如鸡子，嚼之香美，除口气，久食令人黑齿。”

“椰子树，如瓜，壳中有肉，如熊白，味似胡桃，肉有浆汁，清如水，甘如蜜。”（《太平寰宇记》卷165《郁林州》）

四、邕管经略使管州

邕州（治宣化县，今广西南宁市）

李位于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任邕州刺史、邕管经略使。“既至，则韬弓橐甲，去斥候，禁部内无敢以贼名，使得自浣濯。诸酋长咸顿首送款：放虏获，输税奉贡，愿比内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复耕稼，无有威刑”。[4]

邕州少数民族较多，“俚獠有四色语，各别译而方通”。

---

〔1〕《全唐文》(6) 卷563《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5 697页。

〔2〕《新唐书》(18) 卷197《循吏·韦丹》，5 629页

〔3〕《太平广记》(9) 卷402《珠池》，3 236页。

〔4〕《全唐文》(6) 卷589《唐故邕管经略使……李公墓志铭》，5 956页。

物产

茶："都茗山在（封陵）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太平寰宇记》卷166《邕州》）

矿：德宗于即位时下《罢邕府金坑敕》："邕州所奉金坑……其金坑宜委（刺史）康泽差择清强官专勾当，任贫下百姓采剔，不得令酋豪及官吏影占、侵扰，闻奏当重科贬。"[1]

宾州（治岭方县，今广西宾阳县）"岭外邑居，犹有冠冕之风。其姓陆者，贵之，遗嗣。尚有银章、青绶、铜虎符，乡宗重之，皆云贵物也……其俗有'礼会'，击皮鼓、吹葫芦笙为乐。"（《太平寰宇记》卷165《宾州》）

五、安南经略使管州

安南（又名交趾）

马植自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至五年任安南都护。"马植，文宗开成中为安南都护，上言：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处巢穴自固，为南蛮（指南诏）所诱，久不招喻，事有可虞。臣自到镇，约以诚信，晓之逆顺，令诸首领恳发忠言，愿纳赋税。"[2]

高骈自懿宗咸通五年（864年）至九年（868年）任安南都护。"高骈，咸通末为安南都护，奏开海路，从之。初，交趾以北，距南溟，有水路，多覆巨舟。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然在于水中。因奏请开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牵财利，石限衡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今若稍加疏凿，以导往来，自然货殖贸迁，华戎利涉。'时有诏听之。骈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广之民，至今赖之以济焉。"[3]

对外贸易　《唐国史补》卷下："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

〔1〕《全唐文》卷54，578页。

〔2〕《册府元龟》(9)卷692《牧守部·招辑》，8 256页。

〔3〕《册府元龟》(9)卷678《牧守部·兴利》，8 103页。

安南、广州，师子国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

《资治通鉴》卷234《德宗贞元八年（792）》：六月，“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国商船少至广州而多至安南贸易。

《太平广记》卷461《交趾》：“交趾郡人多养孔雀。”

第三节　唐末的经济

桂州兴安县（今广西兴安县）《新唐书》卷43《地理七上》桂州理定县：“本兴安，至德二年更名理定”今广西兴安。县“西十里有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初（825年）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俄又废。咸通九年（868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铧堤，互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鱼孟威在《桂州重修灵渠记》中说道：“凡用五万三千余工，费钱五百三十余万。”“自（咸通）九年兴工，十年告毕。其铧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四十里……其斗门悉用坚木排竖，至十八重”。结果“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由是徭役顿悉，来往无滞”。[1]灵渠至今仍然通畅。

物产

珍珠　咸通四年（863年）懿宗颁《制》：“廉州（治合浦县，今广西合浦东北）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

〔1〕《文苑英华》(5) 卷813，4 297页。

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1]

谷纸　《新唐书》卷101《萧瑀附萧仿》："（咸通初）南海多谷纸，（萧）仿救诸子缮补残书。"

桄榔、翡翠毛　周繇（咸通十二年进士）：《送杨环校书归广南》："山村象踏桄榔叶，海外人收翡翠毛。"[2]

[1]《全唐文》(1) 卷83《恤民通商制》，871页。

[2]《全唐诗》(19) 卷635，7 292页。

后记

笔者自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40年来，致力于隋唐五代史的探讨和研究，尤以隋唐经济史为重点。30余年来，先后发表论文40余篇，大部收入《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论文集中，并先后出版了《唐初政区与人口》、《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和《唐后期政区与人口》三部专著。

在搞清了唐代各个时期的行政区划和人口分布及其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本书探讨了唐代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

在探讨、研究唐代政区、人口和经济的过程中，笔者深刻认识到，唐后期的经济比唐前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对“‘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一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实际情况是：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总体来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鼎盛时期。唐后期政治、军事状况不如以前。然而，就经济、文化两个方面来说，唐朝后期比唐前期则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说，是极不全面，也是站不住脚的。

本书的出版，承蒙王永兴先生、宁可先生、刘新成同志和周然毅同志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翁俊雄　　2000年8月1日

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附录：　涉今市、县名称索引

二　画

九江市　100　236

三　画

三台县　112　263　264　271
三门峡市　33　38　45　46　62　142
三明市　99
三原县　127
上杭　99
上饶市　239
大邑　265
大同市　174
大名　25　61　63　88　98　167
大荔　8　10　20　127
广元　261
广汉　110
广州市　26　115　117　274　276　277　278　279

四　画

丹阳市　26　92　191　204
云阳县　256
五台县　88　172
五原县　18　19　138
内黄县　56
内江市　271
内乡　250
化隆回族自治县　76
天水市　30
天门　253
屯留　173
太原市 71　93　170　171　175
巴中市　104　236
文水县　70
文登　161
龙溪县　99
巨鹿县　57
永安　99
永年县　159
永修　236
开封市　37　48　142　149
开县　261
邓县　101　153
凤台县　38
凤阳　183
凤翔县　8　11　12　125　128　134　178
乌拉特前旗　138
乌拉特后旗　138
乌审旗　76
长安　28

五　画

代县　68　73　173　175
仪陇　102
汉中市　181　260
正定　63

东阿县 40
东海县 48
宁化县 99
宁波市 96 100
宁县 12 18 140
宁晋县 54
兰州市 76
邛崃市 108 110 273
乐平 238
乐昌 279
乐都县 75
包头市 18 138 174
北京市 52 55 58 62 63 73 163 167
古田县 99
北流市 286
四会市 277 278
平乐县 286
平凉市 134
平阴县 25
永年县 170
玉林 287
白城 19 136
石泉县 257
句容 92
卢氏县 143
长治市 69 170 171
长兴县 209
长汀县 99
长沙市 95 225 240
长清县 142

六 画

任丘 60
合川市 102
合阳县 74
合浦县 287 289
吉安市 239
安阳市 52 54 63 159 167
安岳县 113
托克托县 18 138 173
汝阳县 48
江山 96
江都市 26 86 87 182 183 185 186 187 191 279
江陵县 250 254 258
合阳县 20
西宁市 30 76
西安市 8 11 23 27 128 130
许昌市 37 48 151 156
西华县 38
西昌市 107
邢台市 25 63 170 175
成都市 106 110 263 268 270 272
吐鲁番市 12 23 76
华阴 125 134
华县 8 127
祁门县 231
庆阳县 19
达坂城县 78
阳朔县 278
共和县 83
兴安县 289
齐河县 49
沙县 99

曲沃县 70
当涂县 100
成都市 272

七　画

吴兴县 209
吴忠市 19 31 123 179
扶风县 133 261
沁阳市 33 159 162
沈阳市 58
汲县 63
沙县 99
沧州市 53
余杭市 212 213
苏州市 26 43 94 97 200 207 208
连江县 93
连云港市 40 48 50
汾阳市 24 73
即墨 38
岳阳市 225
岚县 73
陈留县 38
陇西县 30
陇县 124
寿县 48 88
灵武 76 137
邯郸市 25 159
库车县 75 79

八　画

周至县 11 134
和县 88 184
和政县 77
宜昌市 244
宜兴市 205
宜春市 225 246
英德市 279
瓮安县 280
宜阳县 49
宝应县 87
宝鸡市 10 261
定边县 19
定州市 57 63 168
忠县 257
张掖 78
盱眙县 89 156 195 196
杭州市 97 129 199 201 210 211 212 213 220
林县 57
松潘县 111
凤台县 38
武汉市 225 232 246
武昌 225 233
武威市 75 78 180
武陟县 52
河间市 53 61 63 164
河津县 70
河源市 115
泾川 12 125
波阳 95 238 246

泸州市 271
郑州市 33 39 43 94 143 151 156
兖州 156
绍兴市 26 93 94 96 97 214 215 279
陕县 153
郓城 152
易县 56 62 160
肥乡县 55
佳县 136
京山 253
金华 97
金坛县 92
固原 18 30 124 179
范县 56
茂名市 279
阜南 38
奉化 100
房县 102 103
建瓯 218 219
枣庄市 38
孟村回族自治县 54 60 166 167

九 画

咸阳市 10
南宁市 280 287
南皮县 60
南充市 102
南阳市 250
南和县 168
南京市 191 202 203 204
临汾 25 70
临洮 30
临汝 33 37 142 157
临漳县 54
南昌市 26 95 100 191 204 226 234 236
南宫市 54
姚安 107
宣城 26 95 132 228 229
柘州 112
柏乡县 60
柳州市 285
洛阳市 24 33 34 35 43 44 45 141 142 143 145 146 147 148 155 175
济宁市 152
济南市 152
济源县 46
泉州 219
剑阁县 261
荥阳市 50
盐池县 31
盐官 96
神木县 138
眉山 110 112
茶陵 242
赵县 54 57 63
贵池 231
荆门市 254
贵南县 83
贵德县 76 83
饶阳县 66
闽侯县 223

十　画

亳州市　39　50　143
徐州市　195
恩平　279
忻县　40　48　50
朔州市　69
桂林市　26　116　275　284
桂阳　241
海兴县　57
海盐县　207
涞源县　174
酒泉县　78　181
浚县　56　164
宾阳县　288
盐山县　57
唐县　107
秦安　179　180
秦皇岛市　168
高州　279
高邮　185　186
高陵县　127
莱阳市　40
莱芜　48
鹿泉县　54
莆田　93
寿光　39　49　152
资中　110　113　271
诸暨　96
陵县　63　166
阆中　262
离石市　176

十一　画

梧州市　285　286
商丘市　39　48　50
宿州市　38
崇庆　112
莱州市　41
常州市　26　97　98　199　200　204
常德市　102　104
彬县　8　12　124　178　241　279
梅县　282
清流　99
清河县　25　65
淮安　89　153　186
淮阳　48　151　156
淮阴　196
深州市　61　63
渠县　102
菏泽　39　152
涪陵　104
淄博市　66　144　152
聊城市　25　63　167
随州市　253
郓城县　25　152
鄂托克旗　31　136
巨鹿县　55
绵阳　108　264
黄县　41
曹县　48

十二 画

偃师 199
喀什市 79
富平 10 20 29
富阳 92 212
富县 263
琼山 118 279 283
辉县 55
彭州市 107 110
彭泽县 95
惠民县 52
惠州市 117
黑水县 112
敦化 67
敦煌 180
背陀区 100
景德镇 237 238
朝阳市 58 66 168
温江县 112
渭南市 124
雄县 163
婺源县 231

十三 画

嵩县 45
新会市 279
新兴县 119 283
新河县 60
嵊州市 216
遂宁 102 108 113
蓬莱市 153
临安县 92
新绛县 25 173
渝关 58
榆林市 73
滑县 143
靖远县 18 30 124
简阳 110
蒲县（永济县西） 62 73 170
蒲城县 10
蓟县 55 62
廉江 283

十四 画

漳州市 218
漳浦县 99
潍坊市 38 49
磁县 62
韶关市 280 281
肇庆市 279 283
嘉兴市 207 208

十五 画

潮州 283
潮安 282
德州 52
蕲春 186
镇江市 98 200 202
潜山 184

十六　画

澧县　225　251　256
翟山　186
衡阳市　117　242　248
歙县　231
冀州市　63

十七　画

襄樊市　103　249　251　258
魏县　64　160

二十　画

灌县　107

二十四　画

衢州市　96　97